



選文寧列

冊五第

涉干裝武國外
期時爭戰內國和

社放解

基本定價 18.40



列寧文選

第五冊

外國武裝干涉
和國內戰爭時期

解放社

列 寧 文 選

第 五 冊

著 者 列 寧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再 版

5,001—10,000 (T)

出版者的話

本冊所選印的，是列寧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的一些重要著作、論文及報告。讀本書時，可參讀『聯共黨史簡要讀本』第八章，了解一下這一時期的一般情況。全部譯文及簡要註釋是依照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所出中文本『列寧文選』翻印的。原譯本共訂兩冊，現在因裝訂關係，訂為六冊。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列寧文選要目

冊數	內容
第一冊	<p>1、斯大林論列寧與列寧主義 2、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3、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人黨而鬥</p> <p>1、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成立。黨內波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之出現</p>
第二冊	<p>1、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2、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波爾什維克正 3、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3、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工人運動 高漲時期</p>
第三冊	<p>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p>
第四冊	<p>準備與實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p>
第五冊	<p>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p>
第六冊	<p>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p>

目次

論飢荒（致彼得城工人的信）	一
致各省縣蘇維埃電	一四
工人同志們！我們去作最後的決戰呵！	一七
在『紅色軍官日』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二六
序言	二六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三〇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四九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能否有平等呢？	六三

蘇維埃不應該變爲國家的組織嗎.....七五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八六

蘇維埃憲法.....一〇一

什麼是國際主義？.....一一六

在所謂「經濟分析」的幌子下替資產階級效勞.....一三八

附錄一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一八一

附錄二 王德威爾得論國家的新書.....一八一

奪得了與記載了的東西.....一九四

在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

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一九九

在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

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二三四

關於幫助東方戰線事致彼得格拉工人的信.....二三六

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有關東方戰綫情況的提綱	二六六
謹防奸細！	二七二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二七四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二八八
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二九六
大家都去與 <u>鄧尼金</u> 鬥爭！（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致黨組織的信）	三三八
目前主要的任務	三三九
向人民解釋關於 <u>高爾察克</u> 和 <u>鄧尼金</u> 的真象	三四二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	三四三
在逃兵中的工作	三四五
直接幫助軍隊	三四六
縮小非軍事工作	三四九
臨近戰綫地區的工作	三五三

對軍事專家的態度	三五七
後方肅反工作	三六一
動員全民作戰	三六六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三六八
關於戰勝高爾察克導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三七〇
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	三八四
告紅軍兵士同志們	三八九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三九一
與燃料恐慌作鬥爭	四〇九
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 演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四一六
關於戰勝鄧尼金事致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信	四三一
論勞動紀律	四四三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俄國共產黨（波）第九次

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二) 波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三) 波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四) 波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

和鍛練出來的呢？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四四六

四七七

四八二

四八二

四八七

四九一

五〇〇

五一二

五二五

五四〇

五五七

五七六

(一〇) 幾個結論.....	五九七
增補.....	六二一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六二一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六二四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六二九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六三一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六四〇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六五九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六七〇
青年團底任務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六七四
致士拉城同志書.....	七〇六
簡要註釋.....	七〇八

論飢荒

致彼得城工人的信

同志們！日前有你們的一個代表來見過我，他是普梯洛夫工廠底工人，我黨黨員。這個同志把彼得城內極端嚴重的飢荒情形詳細講給我聽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許多工業省區裏，糧食問題也同樣尖銳，工人和一般貧民也是同樣瀕臨於痛苦的飢荒線上。

同時我們却看見拿糧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機的情形。飢荒並不是由於俄國沒有糧食，而是由於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銳的糧食問題上，對勞動者

底統治，即工人國家這蘇維埃政權作最後的決戰。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有鄉村的富豪和富農，破壞糧食壟斷事宜，破壞國家的糧食分配辦法，這種辦法，正是利於和爲了把糧食供給全體人民，首先是供給工人、勞動者和貧民。資產階級破壞固定價格，藉糧食投機發財，每普特糧食賺得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盧布，破壞糧食壟斷事宜和正確分配糧食的辦法，它所用的破壞手段，就是賄賂，收買和惡意贊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權的一切罪行，而這工人政權是在力求實現社會主義底第一個主要根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懂得的。這是所有一切工人，所有一切貧農以至中農，所有度過貧苦生涯的人，所有靠工錢生活過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伊國居民贊成這個真理。社會主義底基礎，社會主義力量之不可湮沒的泉源，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之不可摧毀的保障，也就在這個簡單的，十分簡單和再明顯不過的真理中。

但問題的實質却在於：甘心同意這個真理，發誓贊成這個真理，口頭上承認

這個真理，是一回事，而善於把這個真理實現起來，却是另一回事。當在自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中，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人遭受飢餓痛苦（在彼得城，在非農業省區，在莫斯科），而那些富人，富農和投機者却把千百萬普特糧食匿藏起來的時候，每個有覺悟的工農都須認真仔細地思考一番。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原則，怎樣才可以實現呢？顯然，爲要實現這個原則，第一，就必須實行國家的糧食壟斷制，即絕對禁止任何私人的糧食貿易，務須把所有剩餘糧食按照固定價格繳給國家，絕對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隱藏餘糧。第二，就必須嚴格統計一切餘糧，以及有條不紊地把糧食從多餘的區域運往缺糧的地方，還要有供消費，供製造，供播種的存糧。第三，就必須在工人的，即無產階級的國家監督之下，實行正確和公道分配糧食的辦法，按國內全體公民來分配糧食，不給富人以任何的特權和優越地位。

只要把這些克服飢荒的條件稍微想想，便可懂得那班否認爲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爲了使勞動者擺脫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而必須有國家政權（並且

要是對資產階級極端嚴酷，對向政府搗亂者鐵面無情的政權）的無政府主義底可鄙空談家，真是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正是現在，當祖國革命已緊接着在實際上具體實現——這也就是這革命不可磨滅的功績——社會主義的任務時，正是現在，並且恰恰是在當前主要問題，即糧食問題上，可以最明顯地看見，必須有鋼鐵般的革命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在全國廣大範圍內，組織收集食品，運輸和分配食品的事業，並且要統計幾千萬以至一兩萬萬人的消費，要估計到往後一年以至若干年內的生產條件和結果（因為要預防歉收的年份，要預計到爲了增加糧食收成，常常要有多年的工作來改良土壤等等）。

羅曼諾夫和克倫斯基遺留給工人階級的國家，是一個被他們所進行的劫掠、犯罪、創深痛鉅的戰爭弄到極端破產的國家，是一個被俄國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搶劫一空的國家。只有嚴格地計算每一普特糧食，只有絕對勻調地分配每一俄磅糧食，才能使糧食够一切人吃。供機器用的『糧食』，即燃料，也是極端缺乏的：如果不用全力來嚴格無情地節省燃料和實行正確分配，那末鐵路和工廠都會

停頓起來，全國人民都會受到失業和飢荒現象的危害。災禍就在眼前，它已經逼近到我們頭上。在萬分困難的五月以後，還有更困難的六月，七月和八月。

國家糧食壟斷制，在我國已由法律明文規定，可是實際上它隨時隨地都被資產階級破壞着。鄉村中的富人，富農，土豪，這些把四圍鄉里搶劫了好幾十年的人們，寧願藉投機業，藉造臥酒來營利，須知這可以使他們自飽私囊，至於造成飢荒的罪過，那他們就推到蘇維埃政權身上。那些在政治上保衛富農的人，如立憲民主黨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也是同樣的作法，他們又公開又秘密地爲反對糧食壟斷制，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工作着』。無氣節者的黨，即左派社會革命黨，在這裏也表現自己的毫無氣節性：它甘受資產階級那種自私的叫喊號泣所蠱惑，它大呼反對糧食壟斷制，它提出『抗議』反對糧食獨裁，它甘受資產階級的恐嚇，它害怕反對富農，而瘋狂地搖擺不定，提議抬高固定價格，允許私人貿易等等。

這個無氣節者的黨在政策上反映着某種實際生活中所常有的情形：當富農挑

唆貧農去反對蘇維埃的時候，就設法收買貧農，譬如給某個貧農一普特糧食，不要他付六個盧布的價錢，而只要他付三個盧布，好使這個被腐化了的貧農也去「享受」投機利益，也去以一百五十個盧布，賣出這一普特糧食，「發發小財」，讓他也變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對那禁止私人糧食貿易的蘇維埃。

凡是能够思索的人，凡是願意去那怕稍加思索的人，都會明白，究竟鬥爭是按那條路綫進行着：

或者是有覺悟的先進工人把貧農群眾團結到自己周圍，建立鐵一般的秩序，建立嚴厲無情的政權，即真正無產階級專政，而獲得勝利來強迫富農服從，並在全國範圍內樹立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的辦法；或者是資產階級得着富農幫助，得着無氣節和昏頭昏腦之輩（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間接贊助，而把蘇維埃政權推翻，來擁立一個親德的或親日的科爾尼洛夫，這個科爾尼洛夫就會強迫人民每日作十六小時的工作，每星期領得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槍殺工人羣衆，在審訊室裏實行拷打，如在芬蘭和烏克蘭一樣。

或者就是那樣，或者就是這樣。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國內狀況危急到了極點。

凡是細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會不看見，立憲民主黨人正在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互相協商：究竟是親德的科爾尼洛夫，還是親日的科爾尼洛夫『較爲愜意一些』；究竟是帝制的科爾尼洛夫，還是共和制的科爾尼洛夫，對於鎮壓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現在已是一切覺悟工人，一切先進工人應該協商的時候了；他們應該即時振奮起來，懂得每一分鐘的遲延，都有使國家陷于淪亡，使革命陷于覆滅的危險。彌補的辦法是無濟於事的。訴苦是會毫無結果的。各人企圖爲自己，即是爲『自己的』工廠，爲『自己的』企業，『零星』去找得糧食和燃料的辦法，只會助長混亂狀態，只會方便投機者所幹的自私自利和黑暗醜惡的勾當。

彼得城工人同志們！我之所以要寫這封信給你們，原因就在這裏。彼得城不

是全俄國。彼得城的工人只是俄國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彼得城的工人是俄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羣衆中一支優秀的，先進的，最有覺悟的，最革命的，最堅決的，最少受空洞辭句誘惑，最少受無氣節的絕望情緒影響，最少受資產階級威嚇的隊伍。在各國歷史中，當危急關頭，甚至人數不多的先進階級底先進隊伍竟能把全國人吸引到自己周圍，用革命火焰燃起羣衆的熱情，而實現了偉大歷史功勳，這乃是常見不鮮的事。

彼得城底工人代表向我說：在他們普梯洛夫工廠裏原來有四萬工人，但其中大多數都是『臨時』工人，不是無產者，而是不可靠和軟弱的人們。現在只剩下萬五千人了，但這都是無產者，都是經過鬥爭考驗和鍛鍊的人。

正是這樣的革命先鋒隊——在彼得城的以及在全國的——應當大聲號召，應當一齊奮起，應當認清，國家命運就操在自己手中，他們必須表現出與一九〇五年一月和十月，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同樣的英勇精神，他們應當起來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反對糧食投機者，反對富農、土豪、破壞份子、貪贓受賄

的人，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來反對在收集、運輸和分配糧食與燃料事宜上一切破壞國家嚴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進工人大眾熱情底高漲，才能挽救國家和革命。需要有幾萬先進工人，即受過鍛鍊的無產者，他們要具有這樣高的覺悟程度，能夠向全國各地千百萬貧民說明眞象，並成爲這千百萬人的領袖，他們要具有這樣大的堅毅精神，能夠無情地拋棄和無情地槍斃一切甘受投機利益「誘惑」——這是常有的事，——甘願從爲人民事業奮鬥的戰士而墮落爲劫掠者的人；他們要具有這樣堅定這樣忠於革命的赤忱，能夠有組織地把應在全國各地進行征伐的一切重荷，担負到底，來樹立秩序，鞏固各地方蘇維埃機關，在各地監督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燃料的消費。

這較之那在幾天之內表現英勇精神，既不要離開久居之地，也不要作長途征戰，而只限於奮發熱情，舉行起義去反對惡魔和白痴的羅曼諾夫，或反對又愚蠢又自誇的克倫斯基的事情，要困難得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長期堅毅的組織工作上

表現英勇精神，是比在起義中表現英勇精神要困難得無比的，可是也就高尚得無比了。然而工人政黨和工人階級底力量始終是由於它能大胆公開地正視危險，而不害怕承認危險，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勢力是站在『自己』營壘方面，哪些勢力是站在『外人』，即剝削者底營壘方面。革命正在向前發展着，增長着。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也就增長起來。鬥爭也就擴大和加深起來。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加緊設法獲得糧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國範圍內嚴格統計和監督這些事情，這就是進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和主要的門徑。這已經不是一一般革命的『任務，而是共產主義的任務，正是在這個任務上，勞動者和貧民應當向資本主義作一堅決的戰鬥。爲了這個戰鬥值得獻出一切力量；這個戰鬥底困難是巨大的，然而我們奮鬥的事業，即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事業也是巨大的。

當人民忍飢受餓，當失業現象日益猖獗的時候，凡是在家裏隱藏一普特餘糧的人，凡是使國家損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窮兇極惡的罪犯。

在這樣的時光，——而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則會永遠如此，——每一普

特糧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聖物，比神父們用來愚弄蠢入的聖物還高尙得多，因爲神父們素來是以昇登天堂來安慰在地上過着奴隸生活的人們的。爲要從這種眞正聖物上把神父們所認爲的「神聖性」拋棄無餘，那就必須實際掌握這種聖物，必須做到在實際上正統分道揚鑿，必須把所有的餘糧一無例外地搜括盡淨，作爲全國存糧，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隱蔽而無剩餘糧尚未收集的景象，必須用工人底堅決手腕做到使個人用最大的努力，來增加燃料採掘量，大大節省燃料，在燃料運輸和消費方面建立極端嚴格的秩序。

須要有先遣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到所有一切生產糧食和燃料的區域去，到所有一切運輸和分配糧食燃料的重要地點去，來提高工作的毅力，使工作毅力增加十倍，來在實行統計和監督事業上幫助各地蘇維埃政權機關，來用武力消滅那些投機、受賄和疏忽大意的現象。這個任務並不是新的。老實說，歷史並沒有提出新的任務，只是隨着革命規模的增大，革命困難的增長及其全世界歷史任務之意義的增長，而使舊任務底範圍和規模擴大起來。

十月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大而不可摧毀的創舉，就是先進工人以貧民領導者底資格，以鄉村勞動羣衆領袖底資格，以勞動國家建設者底資格，到『民間』去了。彼得城派出了成千成萬的優秀工人到鄉村裏去，其他無產階級中心也派出了許多優秀工人。爲了同卡列金和杜托夫作鬥爭而組織的戰鬥隊，以及徵糧隊並不是什麼新奇事情。任務只是，由於災禍逼近，情況艱難，而使我們必須作出比以前更增多十倍的工作。

工人成了貧民底領袖，並不就成了聖人。他領導了人民前進，可是他也就染上了小資產階級的腐化病。工人隊伍中最有組織、最有覺悟、最有紀律和最堅決的工人愈益減少，則這隊伍也就愈易腐化，而代表舊時的小私有者自發勢力，也就愈易毀滅代表將來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覺悟性。

工人階級開始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後，並不能一下子就把自身的弱點和毛病拋棄掉。這些東西都是從地主資本家社會，從剝削者和土豪社會，從少數人醜態地營私致富而使多數人遭受貧困的社會中所繼承下來的。可是工人階級是能够戰

勝——並且歸根到底必然會戰勝——舊世界，能够戰勝它的毛病及其弱點的，只要工人階級不斷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數日增，經驗日富，在困難鬥爭中所受鍛鍊日多的工人隊伍就行了。

現在俄國底情形正是這樣。單獨奮鬥，分散作戰，決不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必須有先進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出發到幅員廣大的全國各地去。必須增加十倍地派出由有覺悟而矢忠於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組成的鋼鐵般的隊伍。那時我們就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那時我們就能把革命引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門徑。那時我們也就能於進行勝利的防衛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強盜。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〇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二六至三一頁

致各省縣蘇維埃電

萬一敵人向顯示力求和平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侵犯時，究竟應當怎樣對付。

(給各地蘇維埃和全體居民的指令)

在烏克蘭常常有過農民和工人反抗把財物運走或就地毀滅的事情，而希圖把這些財物替自己保存起來。結果他們受到了極殘酷的懲罰。外寇一到，便把所有糧食、牲畜、煤炭、五金和機器概行搶走，運回本國去了。烏克蘭底例子應成爲

全俄人民的慘痛教訓。

所以，當敵人企圖轉爲進攻時，該地居民務須在自己的蘇維埃領導下，嚴格遵行下列指令：

首先要把軍用儲存品運走。凡是無法運走的，概應焚燒或炸毀。

穀類和麵粉務須運走或埋藏在地裏。凡不能埋藏的食物，盡行消滅。

牲畜一律趕走。

機器要或整或零運走。不然，便毀滅之。

無法運走的五金，應埋藏起來。

車頭和車箱務必開走。

鐵軌務必拆除。

橋樑要埋上地雷，將其炸斷。

敵後森林和禾稼概行焚燬。

竭力設法阻礙敵人前進。安設埋伏。用刀槍火器與敵人作戰。

保障自己的後方。爲了這個目的，必須把直接間接幫助敵人的一切偵探、
奸細、白匪份子、反革命叛徒，概行槍斃。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

人民委員會

人民委員會主席烏里揚諾夫（列寧）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五十四期

工人同志們！我們去作最後的決戰呵！

蘇維埃共和國被敵人包圍了。可是它定會戰勝國內國外的一切敵人。工人羣衆中已顯現出熱情的高漲，這便是勝利的保障。在西歐，革命底火花和革命底爆發已日益瀕繁起來，這就使我們相信國際工人革命底勝利已經不遠了。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外的敵人，在目前就是英法和日美帝國主義。這個敵人現時正向俄國進攻，搶掠我國土地，它侵佔了阿爾漢格爾斯克，並已從海參崴前進（如法國報紙所載屬實的話）到烏蘇里江尼古拉斯克。這個敵人收買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⁵⁸底將領和軍官。這個敵人向愛好和平的俄國進攻，其

殘暴掠奪行爲正如德國人在二月進攻時一樣，但其區別，祇是英日兩國不僅要侵佔和搶劫俄國領土，而且要推翻蘇維埃政權，以便『恢復戰線』，即迫使俄國再行捲入英德間的帝國主義（簡言之，即強盜）戰爭中去。

英日資本家想在俄國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好來共同瓜分在戰爭中掠奪的贓物，好使俄國工農去備受英法資本的盤剝，好從他們身上刮得幾十萬萬國債的利息，好來撲滅這已在我國爆發，烽焰騰騰，行將燃燒到全世界去的社會主義革命巨火。

英日帝國主義野獸的力量決不足以佔領和征服俄國。甚至連我們的鄰國——德國的力量，都不够這樣來作，這是德國進攻烏克蘭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的。英日帝國主義者本打算弄得我們措手不及。這種打算沒有成功。首先奮起的是彼得城底工人，接踵而起的有莫斯科工人，繼莫斯科之後又有全中部工業省區底工人，他們都愈益齊心，愈益堅毅，人數日益衆多，精神日益奮發起來了。這就是我們勝利底保證。

英日資本主義匪寇進攻愛好和平的俄國時，還打算與蘇維埃政權底內部敵人結成聯盟。我們熟知這內部敵人是誰。這就是資本案、地主、富農、他們的子弟、這些都是仇視工人和勞動農民（即不肯殘殺自己同鄉的勞動農民）政權的人。

富農的勞動英雄全倒各地。富農對蘇維埃政權憤恨若狂，恨不得把千千萬萬的工人斬盡殺絕。我們明白知道，如果富農獲得了勝利，那他們就會加入地主資本家的聯盟，更無情地屠殺千千萬萬的工人，恢復禁錮工人的苦工牢獄，取消八小時工作制，把工廠重新放到資本家底桎梏之下。

以前歐洲各次革命中，一當富農利用工人底薄弱性，得以使共和政體退回到君主政體，從勞動者政權又退回到剝削者、富人、寄生虫底專政時，其情形都是如此。在拉脫維亞，在芬蘭，在烏克蘭，在格魯吉亞，我們親眼見過的情形也是如此。到處都是貪婪殘暴的富農與地主資本家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反對一般貧民，到處都是富農以空前血腥手段懲治工人階級。到處都是富農與外國資本家聯盟來反對本國工人。立憲民主黨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前這樣幹

過，現在還是這樣幹着；只須回顧一下他們在「捷克斯拉伐克軍團」事件中的勞績就足夠證明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極端愚蠢和毫無氣節，也在這樣行動，他們在莫斯科舉行的叛亂幫助了雅羅斯拉夫里的白軍，幫助了嘉桑城的捷克斯拉伐克軍和白匪；無怪乎這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能博得克倫斯基及其朋友法帝國主義者的稱讚。

毫無疑義，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或者是讓富農來殘殺無數的工人，或者就是工人無情地鎮壓那些佔人口少數的強盜式富農所舉行的反對勞動者政權的暴動。這裏決不能有中間的道路。和平共處是談不到的：富農可以而且容易與地主、沙皇、神父講和，那怕他們真是吵了嘴的話；可是富農同工人階級是任何時候也不會講和的。

所以我們把反富農的戰鬥叫做最後的決戰。這決不是說，富農不可能舉行多次的暴動，也不是說，外國資本主義不可能進行多次反蘇維埃政權的進攻。「最後」戰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剝削階級中最後的一個階級，而且是其中人數衆多

的一個階級，在我國暴動起來反對我們了。

富農是最殘忍，最橫暴，最野蠻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歷史上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和資本家底政權。富農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些。但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是佔少數。

譬如，按以前俄國來說，即是強盜們還沒有把烏克蘭等地方從俄國奪去以前的時候來說，在我國約有一千五百萬農戶。在這一千五百萬農戶中，大概有一千萬戶是靠出賣勞動力生活，或受富人盤剝，或沒有剩餘糧食，特別是被戰禍弄到破產境地的貧農。中農大約有三百萬戶，而富農，財主和糧食投機者恐怕不會多過兩百萬戶。這些吸血鬼在戰時利用民衆生活困苦而發了大財，他們用提高糧食及其他農產物價格的手段刮得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吸取戰時破產農民底脂膏，專靠吸取飢餓工人底脂膏養肥了。這些吸血鬼吮吸了勞動羣衆底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飢餓，他們也就越加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

舉行無情的戰爭來反對這些富農吧！殲滅他們！痛恨和鄙棄那些保護富農的政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現在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吧！工人們應當用鐵的手腕來撲滅那些與外國資本家聯盟反對本國勞動者的富農所舉行的暴動。

富農利用貧農的愚昧無知和零碎分散的狀況，挑唆他們來反對工人，有時使用收買手段，讓他們去作糧食投機生意，賺百把盧布『發發小財』（同時又搶劫貧農們成千累萬的金錢）。富農力圖把中農吸收到自己方面，而且這點有時他們也竟如願以償。

但工人階級並不一定要和中農分離。工人階級決不能同富農調和，可是它與中農是可以而且正在設法謀妥協的。工人政府，即波爾什維克政府，已經不是用空話而是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用來證明這點的，是已經通過並在嚴格執行的『土地社會化』法令；在這個法令裏，向中農底利益和觀點作了許多讓步。

我們用來證明這點的，是把糧食價格增加了兩三倍（這是日前的事情），因

爲我們完全承認，中農所賺得的錢常常與現時工業品價格懸殊，所以應當提高中農這一收入。

每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會向中農解釋這點，並耐心地、堅持地、再三再四地向他們說明，對於中農說來，社會主義是比沙皇、地主、資本家政權有利萬分的。

工人政權從來沒有欺侮過中農，而且決不會欺侮中農。而沙皇、地主、資本家底政權對中農就不僅隨時欺侮而已，簡直是窒息他們，搶劫他們，使他們破產，這種情形，在全世界各國毫無例外，俄國也是一樣。

要與貧農結成極親密的聯盟，與他們完全溶合起來；要對中農讓步和妥協；要無情鎮壓富農，鎮壓這些吸血鬼、惡魔、搶劫人民的強盜，利用飢荒發財的投機者；這就是覺悟工人底綱領。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政策。

寫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上半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八頁

在『紅色軍官日』的演說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代表各人民委員向你們致賀，——列寧說。——當我想到我國軍隊和紅色軍官底任務時，我記起了不久前我在芬蘭鐵路火車箱裏遇見的一件事情。

我看見有群人聽到一個老太婆說話時都在微笑什麼。就請人把她的話譯給我聽。這個芬蘭老太婆把舊軍隊兵士與革命兵士加以比較，說舊軍隊的兵士是保護地主資本家的，革命兵士却保護窮人。『從前窮人在林子裏拿了一根樹枝，若沒有問過主人的話，就要受到毒打。現在呢，——這個老太婆說，——要是你在林

子裏遇見了一個兵士，他還幫忙你把一捆劈柴搬走哩」。她說：「現在用不着害怕帶槍的人了」。

我認爲——列寧說，——對於紅軍再想不到比這更高貴的獎譽了。

列寧又繼續說，舊軍官多半是嬌養廢化了的資本家子弟，他們與普通兵士是格格不相入的。所以現在建立新軍隊時，我們應當只用從民衆出身的人充任軍官。只有紅色軍官才會在兵士中享有威信，才能够在我們軍隊中鞏固社會主義。這樣的軍隊定會是不可戰勝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載於全俄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百五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二九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了考茨基著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六三頁），這本小冊子是最明顯不過地証實了各國一切忠誠的社會主義者所老早就指出的第二國際之最可恥與最澈底的破產。現在，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底叛徒詭辯及其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加以分析是很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提到，從歐戰剛一開始時起，本書作者就已屢次指出考茨基之背棄馬克思主義這一事實。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國外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與共產主義者雜誌上，有多篇論文，講到了這點。這些文章，曾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彙刊成書，標名為反潮流，季諾維也夫，列寧合著，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出版（共五〇頁）。作者在一九一五年出版於日內瓦當時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一本小冊子上，關於「考茨基主義」曾這樣描寫過：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乃是一種最標本和最顯著的例証，表明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如何弄到在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為「司徒盧威主義」或「布連坦諾主義」（即變為承認無產階級底非革命「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而將這種學說表現得特別明顯的，就是俄國作家司徒盧威與德國經濟學家布連坦諾）。我們從普列漢諾夫的例子上也可以看到這點。他們用明顯的詭辯，闡割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生動精神，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當中，除了革命的鬥爭手段，除了鼓吹和準備這些手段，以及用這種精神去教育羣衆之外，其他一

切都加以承認。考茨基藉在表決軍事預算時放棄表決權以及口頭上表示其反對黨姿態等等，向左派作外交式的外表上的讓步，然而同時却無原則地對於在此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這一社會沙文主義基本思想採取『調和』立場。一九〇九年，考茨基著有專書，論述革命時代的逼近以及戰爭與革命的聯繫；一九一二年，考茨基在主張利用即將到來的戰爭以進行革命的巴塞爾宣言上署過名，然而現在却用盡各種說法來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和粉飾，並且也同普列漢諾夫一樣，甘願與資產階級攜手，譏笑一切革命思想以及進行直接革命鬥爭底任何步驟。

工人階級若不與這種叛徒立場，無氣節性，對機會主義獻媚而對馬克思主義則在理論上加以空前庸俗化的行爲進行無情的戰爭，便不能實現其全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決非偶然現象，而是第二國際矛盾底社會產物，即口頭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和實際上屈服於機會主義的社會產物』（見季諾維也夫、列寧合著：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一九一五年，日內瓦出版，第一三至一四頁）。

其次，我在一九一六年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一九一七年彼

（得格拉出版）一書中，曾詳細分析過考茨基關於帝國主義的一切議論之在理論上荒謬無稽。我引用了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我已經指明，這個定義是完全不正確的，其目的是『適應』於抹煞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以及同機會主義調和。我提出了我自己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就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已經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已經完結了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我指明了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甚至還不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批評。

最後，我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即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前夕，著有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一九一八年初彼得格拉出版），在該書第六

章論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中，我也曾特別提到考茨基，證明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馬克思學說，把它們造成爲機會主義，我說「他在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却背棄了革命」。

其實，考茨基在其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理論上所犯的基本錯誤，正是他對於馬克思底國家學說所作的機會主義曲解，這種曲解已被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揭露出來了。

這幾句卷頭語，我認爲是必要的，因爲這裏證明出：還在波爾什維克尚未奪取政權和考茨基尚未以此責備波爾什維克以前，我老早就已公開斥責過考茨基底叛徒立場了。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冊子中所講到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

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於各先進國，尤其是在目前，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鬥爭中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加以仔細說明。

考茨基曾這樣提出問題：『這兩個社會主義派別（即指波爾什維克與非波爾什維克）的對立，乃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即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的對立』（第三頁）。

這裏我們要順便說明一句，考茨基把俄國的非波爾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稱為社會主義者，是只以他們的名稱，即只以他們的空話，而不以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所佔的實際地位為根據。這是何等高明地來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啊！但關於這一點，往下我再比較詳細的去說吧。

現在應當說明的是主要之點，即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根本對立』這個偉大發明。問題的中心就在這裏。考茨基那本小冊子底全部實質，也

就在這裏。這真是怪誕絕倫的糊塗理論，這真是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所以必得承認說，考茨基是遠遠超過伯恩施坦之上。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國家對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係問題。看起來這已是明如皎日。然而考茨基好像專門背誦歷史教科書的中學教員似的，固執地把背對着二十世紀，把面朝着十八世紀，第一百次乾燥無味地在該書許多篇章中，反復咀嚼着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君主專制與中世紀制關係的爛調！

真像在大夢裏咀嚼樹皮呢！

這根本是文不對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的這種企圖，祇能令人發笑而已。考茨基之所以必須用這種空話來扶煞並混淆問題，因為他是按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問題，祇是說什麼一般的民主制，而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他甚至避開這個確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講什麼『社會主義前期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在

全書六十三頁中佔了二十頁）篇幅的這位空談家底空談，是資產階級所非常樂聞的，因為這套空談等於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但考茨基所標榜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華正在這裏，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空話之後，也只好引用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話來。

呵：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怎樣做了這件事，這簡直是一齣大滑稽劇！聽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宣稱爲蔑視民主制的見解）『所根據的，祇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字。』——考茨基在該小冊子第二〇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六〇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爲（波爾什維克）『湊巧記起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字眼』（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ern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個『字眼』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⁵⁹。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議論，稱爲一個「字」，甚至稱爲一個「字眼」，——這簡直是污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把馬克思著作讀得幾乎能橫流倒背的一個人；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裏或腦袋中定是藏有許多木箱，其中把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擺列得極有條理，極便於隨時引證。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在通信中或刊印的著作中，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過許多許多次，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前後這個時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公式，不過是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任務在歷史上更具體的和科學上更確切的說明而已；關於這個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從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這四十年過程中，

都時常說到的。

爲什麼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竟會如此怪誕絕倫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呢？如果說到這種現象底哲學基礎，那這就是用折衷論與詭辯說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原是最會耍這套偷換把戲的能手。如果從政治與實際內容來看，那這就是效忠於機會主義者，即歸根到底是效忠於資產階級。自歐戰開始時起，考茨基在這口頭上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做資產階級奴僕的藝術方面，真是突飛猛進，巧奪天工了。

「當你去考察考茨基如何巧妙地『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字眼』的時候，你就會更加相信這一點。聽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較爲詳細地指示出，他究竟怎樣了解這個專政』：（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談，因爲馬克思與恩格斯恰恰有過許多極詳細的指示，不過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故意加以抹煞罷了。）『：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

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獨裁與君主專制的區別，就是前者不是一種經常的國家機關，而是一種暫時的極端辦法。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既然不是說個人專政，而是說一個階級專政，可見馬克思說到專政時，決不是指該字底本意而言。

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指凡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地方所必然出現的那種狀態。單就馬克思認為英美可以和平地實現過渡，即用民主方法來實現過渡的這一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專政並不是指管理形式而言」（第二〇頁）。

我故意把考茨基底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好使讀者能夠明顯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所運用的是怎樣的一種方法。

考茨基想先從專政這「字」底定義來着手觀察問題。

好極了。觀察問題時採用任何一種方法，本是每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要把觀察問題的真誠態度與不真誠態度，分別清楚。誰想用這種方法去

認真觀察問題，他就必須作出他自己對於這個「字」的定義。那時，問題才會提得清楚而直爽了。考茨基却不這樣做。他說：「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

第一，這不是定義。既然考茨基不願意對於專政這一概念下個定義，那末他爲什麼又採取這種方法來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不正確。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會講到一般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忘記提出「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問題。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底起義或激烈的騷動，立刻就暴露出古代國家底實質是奴隸主底專政。試問這個專政毀滅了奴隸主中的民主，即供奴隸主享受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是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講出這種怪誕絕倫的謊言爛語，是因爲他「忘掉」了「階級鬥爭」：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義的虛假論斷變爲馬克思主義的和合乎真理的論

斷，那就必須說：專政的意思，不一定是毀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但它一定是毀滅（或加以極重大的限制，這也就是毀滅底形式之一）受專政所制壓或受專政所反對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怎樣真確，然而它還沒有下出一個專政底定義。

我們且來考察考茨基以下的話吧：

「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兒用鼻子隨便東嗅西嗅，偶然在這裏嗅到了一種真確的意思（就是說，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還是沒有作出專政底定義來；此外他又說出了歷史上明明不正確的議論，彷彿專政就是個人獨裁。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行專政的也可能是一小羣人，或是寡頭，或是一個階級等等。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專政與君主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解說顯然是不正確，

但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所研討的問題完全無關。考茨基愛把自己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時代，他的這種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的無產階級達到專政之後，會估計到考茨基底這種嗜好，譬如說，叫他到中學裏去充當古代史教員吧。用關於君主專制的機智推論，來避免作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這若不是極端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拙笨的欺詐伎倆。

總之，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的時候，講了一大堆顯然不正確的廢話，却沒有作出任何定義來！他本來可以不依靠本人的才智，祇藉自己的記憶，從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述專政的一切語句來。要是這樣，他就一定能得到下面這個定義，或實質上與此相符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藉於強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所獲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這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即群眾代表，而不是如像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這班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僧混蛋底上層份子）都明如皎日的真理，這對於每個爲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這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無待爭辯的真理，我們竟非得『用戰爭手段』才能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裏把它『解放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可鄙諂媚者，即第二國際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始而玩弄了一套偷換把戲，公然胡說八道，說『專政』底本義是表示個人獨裁，隨後他——根據這種偷換把戲！——就聲明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沒含有該字底本義（而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的強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制之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與『管理底形式』區別開來。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像我們竟把一個拙於推論的人底愚蠢『狀態』與其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爲『統治底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二

一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爲那時就能使革命的強力化爲烏有，使強力的革命化爲烏有。『統治底狀態』，就是一種在：『民主制』下可以有任何一種大多數的狀態。運用這樣一套詐術，就能安然無事地使革命化爲烏有了。

但這套詐術實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專政底前提和意思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採用叛徒們所不高興的那種革命強力底『狀態』，這是誰也隱瞞不了的真理。所謂『狀態』與『管理形式』有區別，這種議論之荒謬可笑，是顯而易見的事。在這裏談什麼管理形式便是加倍愚蠢，爲因連三尺之童也知道君主國與共和國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解釋，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底各種變態而已。

末了，談論什麼管理形式，就不但是愚蠢，並且是粗魯地偽造馬克思底意思，因爲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分明是國家底形式，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機器來代替它，那末無產

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種新的機器，據恩格斯的話來說：『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與歪曲，因為他那叛徒的立場使他非這樣作不可。

試看他所運用的，是怎樣卑鄙無聊的遁詞吧！

遁詞一：『單就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有和平的變革，即用民主方法實現的變革這一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不是指管理底形式而言』：

這裏絕對談不到什麼管理底形式，因為有些並非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君主國，例如，恰沒有軍閥機關，而有些本是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共和國却具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這是大家知道的歷史上與政治上的事實，也是考茨基所無法偽造的。

若是考茨基肯認真地誠意地談論問題，那他就會反躬自問一下：有沒有關於革命之絕無例外情形的歷史規律呢？那時他的回答便會是：這樣的規律是沒有

的。這樣的規律所指的，祇是標本式的現象，即「理想式」的現象，如像馬克思有一次把中等的、常態的、標本式的資本主義，稱為「理想式的」資本主義。

其次，在我們以上所述問題方面，前世紀七十年代，是否有使英美成為例外的因素呢？凡屬稍有歷史科學常識的人，都顯然知道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的。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偽造科學，就是玩弄詭辯。但一提出這個問題，便無疑地要得出下面這個回答：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即是用強力手段反對資產階級；這種強力手段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存在有軍閥機關與官僚制度，關於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屢次極詳盡地說明過了（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序言上）。但是，恰恰當馬克思說出這個意見時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恰恰沒有存在這些機關（而現在，這樣的機關在英美也有了）。

考茨基為要遮掩他的叛變立場，所以處處只好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這裏如何儼然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是用民主的方法！！

在作專政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曾拚命向讀者隱瞞專政這個概念底基本標誌，即革命的強力。可是現在真相畢露了：問題正是關於和平變革與使用強力的變革二者間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考茨基之所以要運用一切遁詞、強辯和贗造，爲的是要避免開強力革命，爲的是要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爲，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去，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爲。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

『歷史家』考茨基這樣無恥地假造歷史，以致忘掉了一件基本事實：壟斷制前期的資本主義（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是這種資本主義底極盛時期），由於它在英美表現得特別標本化的那些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比較最愛好和平，最愛好自由的特徵。但是帝國主義，即僅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也是由於自己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最不愛好和平，最不愛好自由，軍閥機關最爲發展且到處發展的特徵。在談論和平變革或是強力變革怎樣標本和怎樣可靠的問題時，而竟「不注意」這一點，那就無異是墮落爲最下流的資產階級奴

僕。

遁詞二：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未曾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擇出來的。於是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純粹民主制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如果無產階級佔有大多數的話』（*Der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第二一頁）。

考茨基底這種論據，荒謬絕倫，真使人感到有駭不勝駭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底精華，大本營和上層份子，都從巴黎逃亡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布蘭，這又表明考茨基所說似乎在公社中有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參加的話完全是造謠。試想把當時巴黎居民分成了兩個交戰營壘，其一方集中有一切鬥爭頑強與政治積極的資產階級份子的這種情形，說成爲『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制』，這豈不是太可笑了麼？

第二，公社同凡爾賽的鬥爭，乃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

既然巴黎當時決定着法蘭西底命運，試問那裏怎樣談得上「純粹民主」與「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為公社因沒有奪取屬於全法蘭西的銀行，以致鑄成大錯的時候，難道他是根據「純粹民主」的原則與實踐來出發的麼？

幸而考茨基著書立說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們『成羣結隊』發笑的國家，不然考茨基真會被人笑死呵。

第三，我不想揣冒昧地諳熟讀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回憶一下恩格斯從：『純粹民主』的觀點上對於公社所作的下列估計：

「這些先生」（指反威權主義者）『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砲，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會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為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⁶⁰

你們看，這就是『純粹民主制』！一個異想天開，竟在階級社會中一般地講什麼『純粹民主制』的卑鄙市僧『社會民主黨人』（是指此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國的用法，以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在全歐洲的用法而言），該會怎樣受到恩格斯底嘲笑呵！

够了，要想把考茨基所說的一切無稽之談盡行列舉出來，當然是做不到的事，因為在他的每一字句中間都充滿了絕頂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與恩格斯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就在於毀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嘗試。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所以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陳舊了的』（有些部份）綱領，祇作了這樣一個修改⁶¹。馬克思與恩格斯特別指明公社實行消滅了軍隊和官僚制，消滅了國會制，破壞了『寄生的贅瘤，即國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居然饒頭傻腦，安閑自得地重複着自由主義教授們所千番百次說過的東西，即關於什麼『純粹民主制』的蠢話。

難怪盧森堡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已是一具臭屍了！

這詞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那我們就不能說是階級專政。因為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過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祇有「組織」或「政黨」。

「糊塗顧問」先生，你真弄糊塗了，糊塗到了萬分！專政當然不是一管理底形式，這樣胡扯是很可笑了。馬克思所講的也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這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是那回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全然不對的。這種廢話祇有那些除了資產階級國會外什麼也看不見，除了「當權政黨」外什麼也不注意的「國會迷」，才能說得出來。考茨基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中都可看見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這樣，雖然他們的組織性是不充分的。

結論：考茨基簡直是空前未聞地曲解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概念，把馬克思變成

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了自由主義者的地步，祇有自由主義者才妄談什麼「純粹民主制」的鄙陋言論，掩飾並抹煞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階級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所採用的革命強力手段。當考茨基這樣「解釋」
「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底概念，竟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施行的革命強力化為烏有時，他就在用自由主義態度來曲解馬克思的事業上打破了全世界的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後生小子了。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被考茨基弄得一場糊塗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樣。

凡是頭腦健全而不想嘲弄歷史的人，都明白知道，當有各種階級存在的時候，決不能說什麼「純粹的民主制」，而祇能說階級的民主制。（附帶說說，「純粹民主制」不但是暴露出既不懂階級鬥爭，也不懂國家實質的愚昧之論，而

且是十足加倍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為習慣，而歸於消亡，但永遠也不會有「純粹的」民主制。

「純粹民主制」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者底謊話。歷史上既有代替封建制而起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起的無產階級民主制。

考茨基幾乎花費了幾十頁篇幅來「證明」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制度是進步的，又說無產階級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制，這類的話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空談。須知這不但在文明的德國，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國，也是盡人皆知的真理。考茨基簡直是拿他的「學者」知識來蒙哄工人，他擺起莊嚴面孔來談論惠特林，談到巴拉圭的耶穌教士，還談到許許多多別的東西，為的是不來談到現代民主制，即資本主義民主制之資產階級的實質。

考茨基僅從馬克思主義中擇取那些對於自由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東西（如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一般資本主義底，局部地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底歷史進步作用），而把馬克思主義中對於資產階級不能接受的東西（如無產階級

爲了消滅資產階級而採用革命強力手段反對資產階級（拋棄掉，抹煞掉和隱瞞起來。所以，不管考茨基底主觀信仰怎樣，但其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爲資產階級的奴僕。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制度雖有偉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之下不能不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者爲天堂，對於貧人和被剝削者爲陷穽爲騙局的民主制。正是這個爲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最重要組成部分的真理，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所不了解的。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用科學批判態度去揭露出那些使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制變爲專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的條件，反而一味去博取資產階級底『歡心』。

我們先來叫博學的考茨基先生記起那些他雖背得爛熟但却可恥『遺忘了的』（爲逢迎資產階級而遺忘了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之理論上的主張，然後再來作一最通俗的說明。

不僅古代的和封建時代的國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

備勞動的工具」(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⁶²)。「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利用來以強力鎮壓自己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恩格斯給伯爾的信)。「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恩格斯爲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普選制是：「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的東西的」(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考茨基先生把這個論點中，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前半段不怕令人厭惡地再三加以咀嚼。對於我們加上了着重點而爲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後半段，叛徒考茨基却隱瞞不說了！

「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這裏，普選權不是爲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

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 und Zertreter），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正好似個人選舉權服務於任何其他僱主來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會計員一樣」（見馬克思論巴黎公社的著作法蘭西內戰一書）。

這些原理是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所熟聞深知的，其中每一點，都在痛擊他的險嘴，揭發他的一切叛徒立場。在考茨基底整個小冊子中，對於這些真理，簡直是一竅不通。他這一小冊子底整個內容全是在挪揄馬克思主義！

試看現代國家底基本法律，試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制，試看集會自由或出版自由，試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你就會知道處處都表現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底虛偽性，而這是一切誠實而有覺悟的工人所熟知的。世界上無論哪一個國家，那怕是最民主的國家也好，在它們的憲法上總有許多漏洞或限語，以保證資產階級「在有人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壓迫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狀態和企圖不像奴隸那樣俯首聽命時，有可能調動軍隊來鎮壓工人與施行軍事戒嚴等等。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但對於像美國或瑞士最民主與

最帶有共和派色彩的資產者之反對罷工工人的這種行動，則緘默不言。

呵，聰明而博學的考茨基，關於這一點，居然保持緘默！他，這位博學的政治活動家殊不知對這點表示緘默，就是卑鄙醜態。他寧願向工人們講一些什麼民主就是『保護少數』這類的童話。這真妄誕得難於令人置信，但這是事實！在耶穌降生後第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第五年度，在一切『民主國家』中迫害國際主義者（即那些不像倫諾德爾和龍格輩，不像謝德曼和考茨基輩，不像亨德孫和維伯輩那樣無恥叛變社會主義的人們）少數派的第五年度，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他那甜蜜蜜的歌喉頌揚着『保護少數』。誰願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去讀讀考茨基這小冊子的第一五頁。而在同書第一六頁上，這位博學先生還會把十八世紀英國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說給你聽哩！

唔，好一個博學精神！唔，好一個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僕態度！唔，好卑躬屈膝替資本家舐靴子的文明樣子！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勒孟梭或倫諾德爾，那我就要用百萬黃金來報酬考茨基，用猶渥大底接吻來獎賞他，

在工人前面稱讚他，勸告他們去與考茨基這樣『可敬的』人們保持『社會主義底統一』。著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侈談十八世紀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護少數』，而對於在『民主』共和制的美國之摧殘國際主義者的事實則緘默不言，難道這不是奴顏婢膝地效忠於資產階級嗎？

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統治黨，僅僅對於其他的資產階級政黨才實行保護少數，而對於無產階級則在一切嚴重、深刻和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實行『保護少數』，反而橫施軍事戒嚴或摧殘蹂躪。民主制愈是發達，則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政治分歧之下，摧殘或內戰也就愈加容易發生。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這個『規律』，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國法蘭西的德來福斯事件⁶²中，在民主共和制的美國所施及黑人與國際主義者私刑中，在民主制的英國對於愛爾蘭與烏爾斯脫的實例中，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民主共和國俄羅斯對波爾什維克的壓迫與摧殘中，都可以看到。我故意不但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和平時期的例子。甘言蜜

語的考茨基先生儘可閉眼不看二十世紀的這些事實，却把關於十八世紀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一些非常新鮮、極端有趣、特別值得注意而且格外重要的故事，講出給工人們聽。

且拿資產階級的國會來看吧。能不能說博學的考茨基從來不曾聽見過民主制發展得愈厲害，則交易所和銀行家就愈加能操縱資產階級國會的事實呢？從這裏當然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波爾什維克之利用國會制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更有成效，因為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內，我們在第四屆杜馬中獲得了全部工人選區所投的選票）。但從這裏應當得出結論說，祇有自由派才會像考茨基一樣忘記資產階級國會制之歷史上的局限性與條件性。那怕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內，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遇見，在資本家『民主制』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與使無產者成爲僱傭奴隸之成千成萬實際上的限制和排斥這兩者間炯然刺目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使群眾認清了資本主義底腐敗、欺騙和虛偽。正是這種矛盾要由社會主義底宣傳家與鼓動家在群眾面前不斷加以

揭露，以便準備這些群衆去進行革命！然而當革命的新紀元已經開始之際，考茨基却立刻搖身一轉把背對着革命，並來讚美垂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妙處。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形式之一即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爲絕大多數民衆、爲被剝削勞動者之所享受、並發展與擴大到空前未有地步的民主制。如像考茨基那樣，寫了一整本論民主制的書，其中只有兩頁說到專政，有幾十頁說到什麼『純粹的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這就是等於用自由主義的態度來完全曲解問題。

拿對外政策來說吧。無論在哪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內，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都是欺騙群衆，而在民主制的法國、瑞士、美國、英國，這樣的欺騙比其他國家更增大百倍，巧妙百倍。蘇維埃政權用革命手段揭破了對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對於這一點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對於這一點默而不言，雖則這點在進行掠奪戰爭與簽訂『分割勢力範圍』（即資本家強盜分割世界）的秘密條約時代，是有根本意義的，因爲和平問題和千百萬人的生死問題，都以此爲轉移。

拿國家底結構來看吧，考茨基極力抓住一些「小事情」，連「非直接的」選舉（在蘇維埃憲法內）都沒有放鬆，但問題的本質：他却沒有看見。國家機關，國家機器底階級實質：他却沒有注意到。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資本家用千百種詭計（「純粹的」民主愈是發達，則這種詭計愈加巧妙，愈有效力）來排除群眾，使其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嚴格說來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過）吸引群眾，即被剝削群眾來參加管理的政權。勞動羣衆之參加資產階級國會（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國會從來沒有解決過有最嚴重意義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明白知道而且覺到，都看到而且觸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人階級，即少數剝削者底機關。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羣衆自己的直接組織，它使他們易於盡量由自己來建立國家，在各方面管理國家。這裏，恰恰是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即城市無

產階級獲得有由各大企業把自己極好地聯合起來了的優勢；並且他們最容易實行選舉與監視選舉。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地使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易於聯合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週圍。舊的資產階級機關——官僚制度，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和交情等等特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愈是發達，則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加紛繁）——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都消除了。出版自由不再是虛偽的了，因為印刷所與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裏拿過來了。對於最好的建築、宮室、別墅、地主邸宅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累萬這種最好的房屋都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裏奪過來了，這就使羣衆享有的集會自由權之「民主化」，增加到千百萬倍，沒有這種集會自由權，則民主制不過是欺人之談。對於非地方的蘇維埃採用非直接的選舉制，就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於舉行，使全部機關更加便宜，更加靈動，而在生活緊張與需要能急速召回自己地方代表或派遣他們去參加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時期，更加接近工農。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制都要更民主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

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要更民主幾百萬倍。

祇有自覺的資產階級奴僕，或是政治生命已經完全死亡，爲陳腐的資產階級書籍所蒙蔽，看不見生動的實際生活，腦子裏充滿了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了資產階級走狗的人，才能看不見這一點。

祇有那些不會從被壓迫階級底觀點上提出問題的人，才能看不見這一點。

試問在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間，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其中等的普遍的工人，中等的普遍的僱農，或一般的鄉村半無產者（即被壓迫群眾底代表，絕大多數民衆底代表），能够多少像在蘇維埃俄羅斯一樣，享有在最優良大廈內開會的這種自由，享利用最大印刷所與最好紙張貯藏室來表示自己思想，保護自身利益的這種自由，享有提出正是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去『建設』國家的這種自由？

在任何一國內，考茨基先生要想從一千個略知時務的工人與僱農中，那怕找到一個在回答這問題時表示懷疑的人，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全世界的工人們

從資產階級報紙中聽到了一些承認真理的片段消息，就本能地同情於蘇維埃共和國，正因為他們看清了其中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是為貧人享受的民主制，決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甚至最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實際上都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

管理我們的一以及『建設』我國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在內），被壓迫階級中千百萬人們從自己生活經驗中所知道的，每日感覺到和接觸到的，簡單明顯而無可爭辯的真理。

至於在俄國，却已經把官僚機關完全打毀了，澈底打毀了，把一切舊的法官完全趕走了，把資產階級的國會解散了，而建立了恰恰為工農所更加容易參加的代議機關，用他們的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是由他們的蘇維埃監督着官吏，使他們的蘇維埃變成了法官的選舉者。單是這件事實，已足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底這一形式要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民主一百

萬倍。

考茨基簡直不了解這個爲一切工人所了解的顯明真理，因爲他「忘記了」提出下面這個問題：究竟是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民主？他是從「純粹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制觀點去推論。他所持的論據正像施洛克的論據一樣：只是「一磅肉」，再不管別的東西了。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不得不對博學的考茨基、「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考茨基，提出如下的問題：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能否有平等呢？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領袖著作時，必得提出這樣的問題來，這真是怪誕萬分，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已動手論列考茨基，就必須向這位博學之士說明，爲什麼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平等的。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能否有平等呢？

考茨基這樣推論道：

(一)「剝削者在民衆中總是祇佔很少數」(考茨基底小冊子第一四頁)。
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從這一真理出發，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依照馬克思主義，即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拿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關係爲基礎。也可以依照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拿多數人對少數人的關係爲基礎。

若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推論，就應該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我們所說的是民主制，即是說國家底形式之一）變成他們剝削者階級統治被剝削者的工具。所以當統治着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剝削者還存在的時候，民主國家必然是供剝削者享受的民主制。被剝削者的國家，應當同這種國家根本不同，它應該是供被

剝削者享受的民主制，對剝削者則加以鎮壓，而一個階級之被鎮壓，就是表示這
個階級不能享受平等權，表示它是被排除於『民主制』之外。

若依照自由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不服從者則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了。什麼一般國家底階級性，局部地是『純粹民主制』
底階級性，都用不着去推論了；這與問題毫不相干，因為多數是多數，少數是少
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再沒有別的了。

考茨基恰恰是這樣推論的：

(二)『爲什麼無產階級底統治要採取而且必然要採取同民主制不相容的形
式呢？』(第二一百)。接着他就極詳細而極冗長地說明無產階級方面擁有大多
數，並引用馬克思底話以及巴黎公社選舉票數來加以證明。結論就是：『在群
衆中這樣根深蒂固的制度，沒有絲毫理由要去危害民主制。當人家用強力來壓倒
民主的時候，這個制度有時也不能不採用強力。對於強力，也祇有用強力來作回
答。但知道自己係享有群眾擁護的制度之所以運用強力，祇是爲了保護民主制，

而不是爲了消滅民主制。如果它想消滅自己最可靠的基礎，自己偉大道德權威之深刻泉源的這個普選制，那它簡直是自殺』（第二二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關係，在考茨基的論據中已經化爲烏有了。所剩下的，祇是一般的多數，一般的少數，一般的民主制，以及我們所熟知的『純粹民主制』。

請注意，這些話還是論到巴黎公社時所說的哩！爲了使問題明顯起見，我們且來引用馬克思與恩格斯論到巴黎公社時關於專政所說的話：

馬克思說：

：『如果工人：爲要打破資產階級底抵抗，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是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恩格斯說：

『獲得勝利（在革命中）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帶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威

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

恩格斯又說：

『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來以強力鎮壓自己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

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間，即自由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者間，實有天淵之別。考茨基所說的純粹民主制和一般『民主制』不過是『自由人民國家』的另一說法，亦即純粹無稽之談。考茨基帶着飽有學識，埋頭窗案的書呆子態度，或十歲女孩底天真爛漫神情問道：既然擁有了大多數，那還要專政幹麼呢？但馬克思與恩格斯解釋說：

——爲要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

爲要使反動派畏懼。

爲要維持武裝民衆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

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够運用強力去鎮壓它的敵人。

這些解釋是考茨基所全不了解的。迷戀於民主制之『純潔性』而看不見它的資產階級性的考茨基，『澈底』主張，以爲多數人既然擁有多數，就用不着『打破』少數底『反抗』，也用不着運用『強力鎮壓』少數，——只要在破壞民主制的時候，才去加以鎮壓就够了。迷戀於民主制之『純潔性』的考茨基，偶然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常常犯着的這點小小錯誤：亦即他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十足欺騙，十足虛偽的平等）看做是實際上的平等！小事情呵！

剝削者決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這個真理，雖則對於考茨基是很不愜意的，然而它是社會主義底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真理，在沒有完全消滅一個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一切可能時，決不能有真正的、實際上的平等。

在首都發生順利的起義或海軍隊騷動時，可以一下子就把剝削者打倒。然而除了完全稀罕的特殊情形之外，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子就被消滅的。在一個相當大的國家裏，並不能一舉而剝奪所有一切的地主與資本公司。而且祇是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剝奪，還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還需要在事實上剷除地主與資本公司，需要在事實上用另一種由工人對工廠與田莊的管理，來代替地主與資本公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決不能有平等，因為剝削者在多代以來享有教育特權、富裕生活條件和具備各種經驗閱歷，而被剝削者，就其大多數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也是受蒙蔽的，愚昧無知的，被恐嚇和被分散了的民衆。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

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因為剝削者底國際聯繫是非常大的。至於一部份被剝削者或一部份最無知識的中農，手工業者等群眾跟着和能够跟着剝削者走的事實，這已由過去的一切革命所證明，巴黎公社也在其內(因為凡爾賽軍隊中也有過無產者，這是飽學的考茨基所『忘記』了的)。

在這種情形下，以為在多少深刻的，嚴重的革命中，可以簡單由多數對少數的關係來解決問題，便是絕大的愚蠢，便是庸俗自由主義者底最蠢笨的偏見，便是欺騙群眾，向羣衆隱瞞顯明的歷史真理。這個歷史真理是，照例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剝削者總是進行長久的、堅決的、拼命的抵抗，因為他們比起被剝削者

來，在多年內還保持着巨大的實際優勢。剝削者在沒有利用自己的優勢作一次或多大最後的，拚命的戰鬥以前，決不會像甜蜜蜜的傻子考茨基所抱的甜蜜蜜的幻想那樣，來服從被剝削者大多數底決議的。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如像

我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在這種情形下，在進行拚命的激烈戰爭時代，當歷史提出千百年特權底生死存亡問題的時候，竟說什麼多數與少數，什麼純粹的民主制，什麼專政沒有必要，什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真是要有萬分愚蠢，絕頂庸俗的頭腦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但是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止這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在極力遷就機會主義的各國社會黨內，的確成了積滿庸俗氣概，狹窄眼界，叛變行為等等的骷髏馬廐。

讀者大概注意到了，考茨基在以上我們從他那本書中所摘引來的一段話內，說到了什麼侵害普選制的話（在這裏，我們附帶說說：考茨基稱普選制為偉大道德威權底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時候，却說的是武裝民衆反對資產階級時所用的威權，把庸人與革命者雙方對於『威

權」的見解來作一比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

必須指明一下，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假仁假義，硬把他的小冊子標題爲：反波爾什維克，那時這本小冊子，就會名符其實，那時考茨基就有權直接說到選舉權了。但是考茨基首先想拿『理論家』的資格來寫文章。他却把自己的小冊子一般也標名爲：無產階級專政，他祇在該小冊子後半部中，從第五節起，才特別說到蘇維埃與俄羅斯。在前半部中（我所引證的話也就是從這半部中摘出的）却說的是一般的民主與一般的專政。考茨基既然講到選舉制，他便暴露了自己是爲反對波爾什維克而舉行論戰，而這樣論戰也就沒有絲毫理論的氣味了。因爲理論，卽是論述民主與專政底一般（而不是某個特殊國家的）階級基礎，就不應該說如像選舉權那樣的特殊問題，而應該說一般的問題：在推倒剝削者以及用被剝削者底國家來代替剝削者國家的歷史時期，能否保持刑同時既爲富人，又爲剝削者享受的民主制呢？

理論家定會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底實例，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巴黎公社以及論到巴黎公社時所發出的一切議論。我根據這種材料，例如，已經在十月革命前所寫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上，分析了民主與專政的問題。至於限制選舉權這點，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現在應該說，限制選舉權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特殊國家中的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論到限制選舉權問題時，就應該研究俄國革命底特殊條件及其發展底特殊道路。這點是我在以後的敘述中要加以說明的。但如果預先担保說，歐洲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必定要全部或大部分限制資產階級底選舉權，那就會是錯誤的了。這也許會是這樣。在大戰之後，在有了俄國革命經驗之後，這大概會是這樣的，但這並非為實現專政所必需，這不是專政底邏輯概念之必要的標誌，這不是在專政底歷史概念與階級概念中所必需的條件。

專政之必要的標誌與必備的條件，就是用強力壓倒剝削者這個階級，因而也

就是破壞「純粹民主制」，即是說，破壞對於這個階級的平等與自由。

理論上定會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考茨基既沒有這樣提出問題，就證明他不是以理論家的資格，而是以向機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資格來反對波爾什維克。

在哪些國家裏，在某種資本主義底哪些民族特點上，對於剝削者享有民主權利一事，將採用（完全地或大半地）某種限制和破壞手段，這是某種資本主義、某種革命底民族特點問題。在理論上，問題不是這樣，而是：若不破壞對於剝削者階級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恰恰把這個在理論上唯一重要而有實際意義的問題迴避不說。考茨基從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各種各樣的話，恰恰沒有引用與本題有關，亦即我在上面所引証過的話。

考茨基講盡了一切，講盡了為自由主義者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能接受而不出乎他們思想範圍之外的一切，所沒有講到的恰恰就是主要的東西，即無產階級若

不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若不用強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而凡是在採用『強力鎮壓』手段的地方，在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這是考茨基所不了解的。

現在我們來論述俄國革命底經驗，論述蘇維埃與立憲會議之間的分歧及由於這種分歧以致必得解散立憲會議和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問題。

蘇維埃不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嗎

蘇維埃，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底俄國形式。如果著書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真正研究過這種現象（不豫考茨基附和孟什維克所唱的曲調這樣來重複小資產階級反對專政的悲嘆），那末這樣的理論家就會先作出專政底一般定義，然後再來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形式即蘇維埃，而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

政底形式之一來加以批判。

當然，在考茨基用自由派手法來『修琢』了馬克思關於專政的學說之後，希望他再說出什麼有嚴重意義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把考茨基如何研究什麼是蘇維埃的問題以及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來作一考查，倒是十分有趣的事。

他回憶到一九〇五年蘇維埃底產生時寫道：蘇維埃造成了『無產階級組織中最能包羅一切的 (umfassendste) 一種組織形式，因為它把一切僱傭工人都包括進去了』(第三一頁)。在一九〇五年，蘇維埃不過是地方的團體，而至一九一七年，就變成了全俄的聯合。

考茨基又繼續說：

『蘇維埃的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偉大光榮的歷史。它的未來歷史一定還更加偉大，而且不祇限於俄國而已。到處可以看到，要抵抗財政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所擁有的雄厚勢力，無產階級用以進行經濟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

已是不够的了』（原文爲 *versteekt*；這個德文比「不够」二字的意思稍強，而比「無力」二字的意思又稍弱）。『這些舊方法是不能拋棄的，在平常的時候，它們還是必要的；但是有時會發生一些爲這種方法所不能解決的任務，此種任務祇有當工人階級集中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工具時，才能順利解決』（第三二頁）。

接着他就說到群眾罷工，說到『工會官僚』也同工會一樣，是必要的，但它們不適用於領導那些日益成爲時代特徵之強大的羣衆戰鬥』：

考茨基由此得出結論說：

：『這樣看來，蘇維埃的組織，乃是現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在行將到來的勞資間最後的諸大決戰中，蘇維埃將起決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可否向蘇維埃要求更多的東西呢？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指新曆說，若照我國舊曆即爲十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佔得多數的波爾什維克，在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後，竟

把向來是一個階級底戰鬥組織的蘇維埃，變成爲國家組織。他們毀滅了俄國人民在三月革命（指新曆說，若照我國舊曆即爲二月革命）中所獲得的民主制。由是波爾什維克也就不再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而稱自己爲共產黨人了」（第三三頁，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

凡屬讀過俄國孟什維克著作的人，立刻就會看到考茨基如何盲目地抄襲了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維得與尼騰之流的言論。真正是「盲目」抄襲，因爲考茨基簡直可笑地曲解事實去適應孟什維克的偏見。例如，考茨基竟未顧到要去問他的通訊員，如在柏林的史騰或在斯托哥爾摩的阿克雪里維得。關於波爾什維克改名爲共產黨人以及蘇維埃應成爲國家組織的問題，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作了這種簡單的查訪，那他就不會寫出這段令人可笑的話，因爲波爾什維克提出這兩個問題都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例如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寫的『提綱』中，即遠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的時候（更不必說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以前的時候了）。

但我所完全引來的考茨基這段議論，便是蘇維埃全部問題底關鍵。關鍵就在於蘇維埃應否力圖變爲國家組織（波爾什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已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波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波爾什維克又聲明他們不以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爲滿足，他們要求巴黎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工農共和國），或是蘇維埃不應該力圖這樣做去，不應該奪取政權，不應該變爲國家的組織，而應該保留爲一個『階級』底『戰鬥組織』（正如馬爾托夫所說，他說這話的目的，是想用純粹幼稚的願望來掩飾蘇維埃在孟什維克領導下曾是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工具這一事實）。

考茨基盲目地重複了馬爾托夫底話，截取了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作理論爭辯中的一些片段，且毫無批評，毫無意義地將這些片段議論移植到一般理論的，一般歐洲的基地上去。結果弄成這樣一團糟，使每一個俄國覺悟工人看到上述考茨基這段議論，定會捧腹大笑。

當我們向一切歐洲工人來說明事實真相時，那末，考茨基也定會受到他們

(除了極少數頑梗不化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外)同樣的嘲笑。

考茨基本想幫馬爾托夫的忙，反而害了他，因為他把馬爾托夫的錯誤十分明顯地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試看看從考茨基底論據中所得出的結論吧。

蘇維埃包括一切僱傭工人。用無產階級之經濟與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去反對財政資本已是不夠的了。蘇維埃不僅在俄國將起偉大的作用。它們在歐洲勞資間的諸大決戰中，將起着決定的作用。這就是考茨基所說的話。

好極了。『勞資間的決戰』不是要解決這兩個階級中哪一階級將獲得國家政權的問題嗎？

胡說，決不是的！

在『決戰』中，包括一切僱傭工人的組織，不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

那末，什麼是國家呢？

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

總之，被壓迫階級，現代社會中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應該努力

去進行『勞資間的決戰』，但不應該去觸犯資本所用以鎮壓勞動的機器！不應該破壞這個機器！不應該利用自己那包羅一切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極了，妙極了！『我們』承認階級鬥爭，也如一切自由派承認它那樣，祇是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可見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完全脫離的地方也就顯明了。這實際上就是已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因為資產階級除了它所壓迫的那個階級底組織變成爲國家組織這點以外，什麼都可以容許。這裏，考茨基之調和一切、用空話來搪塞一切深刻矛盾的立場已經絕對無可挽救了。

或者是考茨基完全拒絕把國家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或者就是他認爲工人階級可以取得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但無論如何不容許它破壞和打碎這個機器並用新的無產階級的機器來代替。不論是這樣或那樣來『解釋』並『說明』考茨基底議論，而在兩種情形下，考茨基之脫離馬克思主義與投降資產階級，都是十分明顯的了。

馬克思還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勝利的工人階級需要何種國家時說寫道：「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現在居然有一個自命爲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起來聲明說，全體已組織起來並同資本實行『決戰』的無產階級，不應該把自己的階級組織變爲國家組織。這就是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說的『國家迷信』，這種迷信『在德國已經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了』，而考茨基在這裏所暴露出來的正是這種迷信。我們的這位庸人『同意』說：工人們！你們鬥爭吧！（這是資產者也『同意』的，既然，工人橫豎是要鬥爭的，那就只好想到怎樣去挫折他們的劍鋒罷了）——鬥爭吧，但是你們決不要取得勝利呵！不要破壞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不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正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爲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誰對於這個真理多少經過思考，那他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荒唐話，說什麼能夠戰勝財政資本的無產階級組織不應該變爲國家組織。小資產者底立場正是在這一

點上表現出來了，因為在小資產者看來，國家「總歸是」一種什麼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究竟爲什麼可以容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去同那不僅統治無產階級而且統治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實行決鬥，而不能容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把自己的組織變爲國家組織呢？因爲小資產者懼怕階級鬥爭，不能把這種鬥爭進行到底，進行到最主要的地步。

考茨基完全弄糊塗了，把自己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來了。你們看，他親口承認歐洲現在正走向勞資間的決戰，承認無產階級用以進行經濟與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够用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那麼？

考茨基害怕再進一步去推想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

：那麼，祇有反動派，祇有工人階級底敵人，祇有資產階級底走狗，才能在現時去粉飾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美態，空談什麼純粹民主制，而面對着死亡了的過去。資產階級民主制同世紀制度比較，曾經是進步的，而且那時是應該利用它的。但現在，對於工人階級，它已經是不够的。現在不應該向後望，而應該向

前看，應該拿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既然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無產階級隊伍底教練與編制，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內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然而到了『決戰』的時候，還把無產階級限制在這種範圍內，這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也就是叛徒行爲。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境地，因為他重複了馬爾托夫底論據，而沒有注意到馬爾托夫這種論據是憑靠於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個論據之上的！馬爾托夫說（考茨基則跟着他背誦），俄國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從此自然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蘇維埃從鬥爭的機關變爲國家的組織，爲時尚早（即是說，在孟什維克領袖們幫助之下，把蘇維埃變成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機關，倒是適時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爽直說出，歐洲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在一九〇九年，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寫道，現在懼怕過早的革命是不行的，誰因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直接來否棄這種思想，考茨基還沒有這樣的勇氣。結果，就得出了把小資產者底全部怯懦與愚蠢澈底暴露出來的荒誕無稽之談：一

方面，歐洲已成熟到了社會主義，並正在走向勞資間的決戰；而另一方面，戰鬥的組織（即在鬥爭中形成，發展和鞏固起來的組織），無產階級底組織，被壓迫者底先鋒隊、組織者及領袖底組織，却不能變為國家的組織！

認為蘇維埃之為鬥爭組織是必要的，但不應該變為國家組織，這種思想在實際的政治方面，比在理論方面更要荒謬得多。甚至在和平時期，當還沒有革命形勢存在的時候，工人反資本家的群眾鬥爭，如羣衆罷工，就要引起雙方極大的憤恨，引起非常的鬥爭熱情，引起資產階級常常主張它要保持，而且很想保持其為「家主」的地位等等。但在革命時期，即當政治生活緊張沸騰的時候，如像蘇維埃這種包括一切工業部門底全體工人，以至全體兵士，全體勞動者和貧苦農民的組織，由於鬥爭底進程，由於攻守底簡單「邏輯」，必然要直截痛快地來提出問題。想站在中間地位來「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一企圖不僅是愚蠢，而且定要遭到慘敗：在俄國，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底這種鼓吹已遭到失敗，在

德國及其他各國，如果蘇維埃發展得稍爲廣泛並能聯合與鞏固起來，那末這樣的宣傳也必然要遭到同樣的失敗。對蘇維埃說：鬥爭呀，但不要把全部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不要把自己變爲國家組織，這就是宣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和『社會和平』。此種立場，在劇烈的鬥爭中間，除了遭到可恥破產之外決不能達到什麼別的結果。騎牆態度是考茨基底畢生運命。他裝腔作勢地說，他在理論上完全不同意機會主義者，而其實，他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問題）方面都在實際行動上同意機會主義者。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關於立憲會議與波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全部小冊子底中心問題。他經常回復到這個問題上來。波爾什維克如何『毀滅了民主』（見上面我們從考茨基那裏引來的一段話），此種指摘充滿了第二國際這位思想領袖底全

部作品。的確，這是一個很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因為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相互關係已經在實踐上擺在革命面前了。我們現在來看，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何觀察這個問題。

他引用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報上發表的我那篇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這似乎是考茨基握有真憑確據，而以莊重態度來討論問題的最好證明了。但是不然，試看考茨基如何引用我的話吧。他既不說這個提綱共有十九條，也沒有說在這些提綱中提出了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又不說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革命中的分歧經過情形。所有這些，考茨基都避開不談，他祇簡單地對讀者聲言，『其中（在這提綱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社會革命黨底分裂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之後，但在立憲會議召集之前（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五條）；二，一般說來，蘇維埃共和國較之立憲會議乃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三條）。祇在提綱第三條上，考茨基才完全引用了其中的一段，原意如下：

「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與具有立憲會議這一花冠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比較），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考茨基在這裏省略了『普通的』字樣，並且把提綱底第一句話：『對於由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省去了）。

引來這幾句話之後，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諷刺語句說道：

附帶說說，考茨基多次引用了『最無痛苦地』過渡這幾個字，大概，他想借此來表示諷刺。可是因爲他所用的方法既不中用，所以在幾頁之後，他就實行僞作，假造引文僅僅爲『無痛苦地』過渡！當然，用這種方法來把無意識的話加到論敵身上是不困難的。作僞也能幫助迴避問題底實質：即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祇有在把全體貧農組織起來（成爲蘇維埃）的時候，祇有在國家政權中堅（即無產階級）對這種組織予以幫助之下，才有可能。

「唯一可惜的，這種結論只是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才作出來。從前誰也沒有像列寧那樣熱烈要求過召集立憲會議」。

這是考茨基書上第三一頁中一字不遺的話！

這是何等的奇談妙論呵！祇有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才能這樣說謊，好使讀者得到一種印象，彷彿波爾什維克關於國家更高形式的一切談論，都是波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才憑空想出來的東西！！祇有那些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無賴漢，或者是託信阿克塞里羅得，又已道訊員隱瞞不說的同樣無賴之徒，才能說出這種下流無恥的慌話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回到俄國的第一天，即當衆宣讀了我的提綱，其中就聲明過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要優越於資產階級國會議制的共和國。後來我又屢次在刊物上，例如在我那論各政黨的小冊子上（這小冊子曾譯成英文，並轉載於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紐約晚郵報上）也說過這點。況且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末波爾什維克黨底代表會議上通過了決議，說工農共和國要高於資產階

級國會制共和國，說我們黨不能以後者為滿足，說黨綱應該作相當的改變。

既然有了這一切，那末考茨基硬向德國讀者武斷地說，彷彿我曾熱烈要求過召集立憲會議，而祇是到波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我才『詆譏』立憲會議底榮譽和價值。試問對於這種胡說八道，應當如何稱呼呢？試問對於這種胡行妄為，又怎能加以寬恕呢？○難道可以寬恕說考茨基不知道事實麼？如果真是這樣，那他為什麼對這個問題大發議論呢？那他為什麼不老老實實說：我，考茨基，所寫的文章是根據孟什維克史騰和阿克雪里羅得這班人的消息呢？考茨基祇是想藉口什麼客觀態度來掩蓋他替那些因失敗而懷恨在心的孟什維克充當奴僕的作用而已。

但這不過是小小的花朵。果實還在前面咧。

○ 附帶說說：在考茨基底小冊子中，這種孟什維克式的謊話非常之多！這是心懷憤恨的孟什維克底謊語。

我們就假定，考茨基不願或不能（??）從他的通訊員那裏得到波爾什維克決議案底譯文以及他們是否滿意資產階級國會制民主共和國這問題的聲明書底譯文吧。雖然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我們甚至就假定這樣吧。然而我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寫的提綱，是考茨基在他這本著作第三〇頁上直接提到過的。

究竟考茨基是完全知道這些提綱，還是只知道史騰、阿克雪里羅得諸人所譯給他的部分呢？考茨基引用了關於波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曾否意識到和曾否向民衆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基本問題的第三條。但考茨基對第二條却緘口不言。

而第二條上却說：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最初之日起，便屢次着重指出過，蘇維埃共和國較之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更高形式的民主制』（着重點是我加的）。

爲要把波爾什維克描寫爲沒有原則的人，描寫爲『革命的機會主義者』（考

茨基在他的著作中有個地方用過這一術語，但我不記得是講什麼問題時說到的），考茨基先生就把這在提綱上直接引證過的『屢次』聲明，在德國讀者面前隱藏起來！

考茨基先生所運用的渺小可憐而又可鄙的方法，便是如此。他就這樣偷偷避開了理論問題。

說資產階級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比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共和國要低些，這是否對呢？這就是問題底中心，而考茨基却恰避開這點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話，考茨基都『忘記了』。他『忘記了』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寫給伯爾爾的信中，特別顯而易解地重述了馬克思底意思說：『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請看，這位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書上，專門論到那會屢次公開提出了比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問題的俄國時，却對於這一點緘口不言。這在實際上又與投降資產階級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附帶說明一下：在這裏，考茨基也跟在俄國孟什維克後面當尾巴。孟什維克中知道從馬、恩著作內摘來的『一切引証』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然而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再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間，竟沒有一個孟什維克曾作過一次嘗試去研究公社式的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也迴避了這個問題。想必還是閉口不談為妙吧。）

很明顯的，同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而實際上關於主要問題，即關於公社式的國家問題，則漠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來討論解散立憲會議，這真是對牛彈琴。我只要在本書底附錄中把我的立憲會議提綱完全登載出來就夠了。從這些提綱中間，讀者會看到這個問題已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已經從理論上，從歷史觀上與從政治實踐上都提出過了。

既然理論家的考茨基已經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那末他也許可以用歷史家的資格來考察考察蘇維埃同立憲會議鬥爭的問題吧。我們從考茨基底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會能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他的這些著作，仍舊是無產階級穩固的

財產，雖然他後來變成了叛徒。但對於這一問題，歷史家的考茨基又離開真理，抹煞人所共知的事實，變成了一個逢迎諂媚的奴才。他力圖把波爾什維克描寫爲沒有原則的人，所以他說波爾什維克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如何設法緩和與立憲會議的衝突。這裏並沒有絲毫不好的事情，我們半點也不否認；我把我的提綱全部印出，其中再明顯不過的寫着：『盤據在立憲會議中動搖不定的小資產者先生們，或者是你們同意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我們『用革命手段』來戰勝你們（提綱第十八及第十九條）。』

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待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向來是這樣，而且將來還永遠會是這樣。

考茨基關於立憲會議問題，是站在形式觀點上。在我的提綱內屢次明顯說過，革命底利益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法權（見提綱第十六及第十七條）。形式的民主觀點，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承認無產階級底利益與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是高於其他利益的。歷史家的考茨基也許不能不承認

資產階級的國會是某一階級底機關。但現在考茨基因爲需要（爲了實行背棄革命這種前辭行爲）忘記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就不提出俄國立憲會議是哪個階級底機關的問題。考茨基不去分析具體的環境，他不願意考察事實，他連一個字也不告訴德國讀者說，在我的提綱中，不但在理論上解釋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底反階級性問題（提綱第一條至第三條），不但說到了使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各黨派名單與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實際情形不相符合的具體條件（提綱第四條至第六條）並且說到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二月間階級鬥爭與國內戰爭底經過（提綱第七條至第十五條）。從這種具體經過中，我們得出了結論（提綱第十四條）：『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已經變成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派及其幫手們底口號了。

歷史家的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歷史家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見過，普選權有時產生出小資產階級的國會，有時產生出反動的與反革命的國會。馬克思主義歷史家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過，選舉底形式，民主底形式是一回事，這個機關底階級內容乃是另一回事。關於立憲會議底階級內容問題，在我的提綱中已經直

接提出而且解決了。也許我解決得不對。假使旁人對於我們的分析能夠加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那我們是再願意不過的了。考茨基用不着去說些似乎有人阻礙批評波爾什維主義這類十足愚蠢的話（這種話在考茨基著作中很多），而應該從事於這樣的批評。可是問題正在於考茨基沒有進行這種批評。他甚至沒有提出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從階級性上加以分析的問題。所以無法同考茨基來爭論或辯論，而祇好告訴讀者說，爲什麼除了把考茨基稱爲叛徒外，再沒有其他適當的稱呼了。

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的分歧，有它分歧的歷史，對於這種歷史事實，甚至就是不站在階級鬥爭觀點上觀察問題的歷史家，也不能避開不管。考茨基就連這種實際的歷史，都不願意論及。他向德國讀者隱瞞了衆所共知（現在只有頑固不化的孟什維克才能加以隱瞞）的事實：蘇維埃就在孟什維克統治的時候，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至十月間，也是同『全國家的』樞關（即資產階級的機關）分歧的。的實際上，考茨基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協定和合作的觀點之上；不管考茨基怎樣否認這一點，但他的這種觀點確是他的全部小冊子所已證實的事

實。所謂不應該解散立憲會議，也就是說：不應該把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不應該推翻資產階級，而應該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

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便做了這種不光榮的事情，並且毫無成就，爲什麼考茨基對於這點却默而不言呢？如果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可能的話，那末，爲什麼在孟什維克統治之下，這種調和竟未成功呢，資產階級置身蘇維埃之外，把蘇維埃稱爲（被孟什維克稱爲）『革命的民主』機關，而資產階級則被稱爲『有法定資格的份子』呢？

考茨基向德國讀者隱瞞着：正是孟什維克在自己統治的『時代』（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稱蘇維埃爲革命的民主機關。這樣，他們也就承認了蘇維埃優於其他的一切機關。也正由於隱瞞了這個事實，所以在歷史家的考茨基看來，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分歧並沒有其分歧的歷史，而是因爲波爾什維克舉動錯誤、無緣無故、一下子突然發生的。其實，正是孟什維克底妥協政策，企圖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這半年以上的（對於革命，這是很長的時間）經驗，使民衆相信到

這些企圖之徒勞無功，使無產階級離開了孟什維克。

考茨基承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之具有偉大前途，極好的，戰鬥的組織。既然如此，那末考茨基底整個立場，就如紙房子，或如小資產階級指望避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劇烈鬥爭的幻想一樣坍塌着。因為全部革命是連續不斷而且竭盡全力的鬥爭過程，而無產階級乃是一切被壓迫階級中的先進階級，是一切被壓迫者力求自身解放的一切願望底中心和焦點。蘇維埃既是被壓迫群眾底鬥爭機關，在反映與表現這些群眾底情緒及其觀點底變動上，自然要比其他任何機關迅速得多，完滿得多。正確得多（這也就是蘇維埃民主制所以成爲民主制最高形式的原因之一）。

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舊曆二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五日這期間內，竟召集了兩次俄國絕大多數民衆，即全體工人和全體兵士以及十分之七八的農民底全國代表大會，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的縣市省和省區的地方代表大會了。在這期間內，資產階級沒有能够召集一次代表大多數民衆的機關（除了那個顯然僞造的，侮辱

無產階級而使其憤恨的『民主會議』之外)。立憲會議反所映的民衆情緒和政治派別分化，與第一次(六月)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反映的完全一樣。在立憲會議召集(一九一八年一月)以前，舉行了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月)及第三次(一九一八年一月)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都十二分明顯地表露出，群衆左傾了，革命化了，離開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而轉到波爾什維克方面來了，這就是說，他們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拋棄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走到爲推倒資產階級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方面來了。

所以，單是蘇維埃底外表的歷史，就已經指明立憲會議解散之必不可免以及立憲會議底反動性。但考茨基還是堅持着他的『口號』：就讓革命死亡吧，就讓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吧，只要『純粹民主制』繁榮昌盛就好了！*Fiat justitia, percat mundus*！^①

① 意思是：只要實行裁判，那怕『世界沈淪』。——編者。

下面就是俄國革命史上各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簡短總結：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代表人數	波爾什維克所佔人數	波爾什維克所佔的百分比
第一次（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	七九〇	一〇三	一三
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六七五	三四三	五一
第三次（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七一〇	四三四	六一
第四次（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一・二三二	七九五	六四
第五次（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	一・一八四	七七三	六六

只要看看這些數字，就會了解，何以擁護立憲會議，或者說（如像考茨基之流所說）波爾什維克沒有大多數民衆擁護的話，祇能引起我國人士一笑而已。

蘇維埃憲法

我已經說過，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的和必然的標誌。俄國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已提出了這種專政的口號，他們並沒有預先說要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專政底這個組成部份之出現，並不是由於某個政黨底『預定計劃』，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歷史家的考茨基當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不了解還當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中佔統治地位時，資產階級自己就已經同蘇維埃分立，抵制它，對峙它，運用種種陰謀來反對它。蘇維埃底產生，並沒有根據任何憲法，而且在它成立之後一年以上的時間內（一九一七年春至一九一八年夏）。也是沒有任何憲法的。祇是由於資產階級極端憤恨地反對被壓迫者之獨立的與萬能的（因為它是包括全體人的）組織，由於資產階級寡廉鮮恥、自私自利、卑鄙齷齪地進行反蘇維埃的鬥

爭，末了，由於資產階級（從立憲民主黨人直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米留可夫直到克倫斯基）公開參加科爾尼洛夫底叛亂——正由於這一切，才造成了從蘇維埃中正式排除資產階級的事實。

考茨基聽說過科爾尼洛夫底叛亂，但是他竟昂然鄙視歷史事實，以及決定專政形式的鬥爭形式和進程；的確，既然講的是『純粹』民主制，那末這些事實又有何關係呢？因此考茨基關於反對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批評』，帶有一種：甜蜜蜜的天真爛漫的腔調，如果這話是三歲小孩說的，倒很令人可愛，但是大家尚未公認爲蠢材的他竟說出這種話來，那就不免令人憎惡了。考茨基說：

『：如果資本家在普選制之下，祇佔很小的少數，那他們定會安於他們自己的命運了』（第三三頁）。妙哉奇也！聰明的考茨基在歷史中多次看見，並且從實際生活的觀察中明白知道，竟有這樣尊重大多數被壓迫者意志的資本家和本地主哩。聰明的考茨基堅定不移地站在『在野黨』底觀點上，即是站在國會內部鬥爭的觀點上。他真是這樣寫着：『在野黨』（第三四頁及其他許多地方）。

唔，好一個博學的歷史家兼政治家！你該知道，『在野黨』是一種和平鬥爭並且祇是國會鬥爭底概念，就是說，適合於非革命形勢的概念，適合於沒有革命時的觀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國內戰爭中無情的敵人，
不管懼怕這種戰爭，正如考茨基那樣懼怕這種戰爭的小資產階級發出怎樣的悲嘆，都不能變更這個事實。當資產階級已不惜採取一切罪惡手段時（凡爾賽派及其同俾斯麥勾結的例子，對於凡是不以戈果里小說中的彼得魯什卡⁶³底態度去看待歷史的人，都是多少有些教益的），當資產階級已求助於外國並與它們同謀反對革命時，才來觀察無情的國內戰爭底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也像『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傻頭傻腦安閑自得地把組織杜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軍團等反革命暴動以及拿出千百萬金錢付給怠工者的資產階級，看做是合法的『在野黨』。唔，這真是何等深奧的思想呵！

考茨基感覺到興趣的，只是形式法律方面的問題，所以讀他關於蘇維埃憲法的議論時，遂令人不由地回憶起伯伯爾底話：『法律家是澈頭澈尾的反動者』。

考茨基說：「實際上，單單使資本家都變爲無權的人是不行的。從法律意義上講來，什麼叫做資本家？有產者嗎？甚至像在德國這樣經濟非常進步，無產階級數量極多的國家中，蘇維埃共和國底成立，還會使大量的羣衆成爲政治上沒有權利的人。譬如在一九〇七年德意志帝國內，在三大產業部門——農業、工業、商業——中謀生的人及其家屬，約有三千五百萬人是屬於僱傭工人和職員一類，有一千七百萬人是屬於獨立生產者一類。這樣看來，黨在僱傭工人中間，很可以成爲多數，但在全體人民中，則還是少數」（第三三頁）。

這就是考茨基底標本議論之一。看咧，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號泣嗎？考茨基先生，你明明知道，俄國極大多數農民都不使用僱傭勞動，因而也就是沒有被剝奪權利的，爲什麼你把一切「獨立生產者」都算做沒有權利的人呢？難道這不是捏造事實嗎？

爲什麼你這個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摘引你所十分知道，而且在一九〇七年德國統計中已載有的關於農業中各類農莊使用僱傭勞動的數目字呢？爲什麼你不把

這些統計，即從中可以看出究有多少剝削者以及剝削者在『農業主』總數中佔着很少數的德國統計，給你那小冊子的讀者德國工人看看呢？

因為你的叛徒立場，已經把你變成了一味向資產階級諂媚的奴才。

請看吧，資本家是個不確定的法律上的概念，於是考茨基便在好幾頁中，攻擊蘇維埃憲法底『專橫』。這位『莊嚴的學者』容許英國資產階級，在數世紀內去編製和規訂新的（對中世紀而言是新的）資產階級的憲法，但一講到我們俄國時，這位奴僕科學底代表，却不給我國工人與農民以任何期限。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內就製定出無微不至的憲法：

……『專橫』！試想一想，這種責難，該暴露出他在資產階級面前獻媚的何等最醜惡的奴僕性，以及他本身的何等最蠢笨的迂腐觀念。當資本主義國家內那班十足資產階級的與大部分是反動的法律家們，在幾百年或幾十年內，製定出無微不至的規則，寫下幾十幾百本用以約束工人、束縛貧人，對民衆中任何一個普通勞動者都加以無數障礙的法律與法律解釋的時候，——哦，那時資產階級的自由

主義者連同考茨基先生却不認爲這是「專橫」！這裏乃是「秩序」與「合法」！這裏一切，都是想得周到，寫的完備，即如何可以去「多多壓榨」窮人。這裏是成千累萬的資產階級的律師與官僚（關於他們，考茨基根本就默而不言，想必是正因爲馬克思非常重視破壞官僚機器的意義吧！）——他們能把法律解釋得使工人與中農永遠不會跳出這種鐵的法網。這不是資產階級底「專橫」，這不是自私自利、醜態齷齪、吮吸民脂民膏的剝削者底專政。絕對不是。這是「純粹的民主制」，一天比一天更加純粹的民主制。

但是當被剝削的勞動階級，這些因帝國主義戰爭而與國外兄弟們隔絕開了的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號召了被資產階級壓迫、摧殘、愚弄的那些羣衆起來進行政治的建設，並已親自着手創造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在瘋狂鬥爭底火焰中，在國內戰爭底烽煙中，開始規劃出關於沒有剝削者的國家底基本原則，——而在這樣的時候，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底混蛋，一切貪嗜人血的強盜，以及他們的謳歌者考茨基，却出來狂吠什麼「專橫」！的確，這些無知之

輩，工人與農民，這班『小百姓』，哪能解釋他們自己的法律呢？他們這些普通的勞動者，不聽信學識豐富的律師們底忠告，不聽信資產階級著作家底忠告，又不聽信考茨基之流以及聰明的老官僚們底忠告，哪裏能找到對正義的感覺呢？

考茨基先生從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的演說中引出下面一句話：『羣衆自己決定選舉底程序與時期』。於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考茨基就推論道：

『：可見，大概，每個選民會議上，都可以隨意規定出選舉底程序。於是專橫手段與排除無產階級內部那些不利於己的反對份子的可能性，也就登峯造極』（第三七頁）。

哼，這些話頭，同資本家所僱用的文墨苦力，一看見罷工群衆壓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時，就大呼大叫的語句，有什麼區別呢？爲什麼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下，由資產階級官僚來決定選舉程序，就不是專橫呢？爲什麼毅然奮起同歷來剝削者鬥爭的羣衆，在這個激烈鬥爭中受到教育鍛鍊的羣衆，其對正

義的感覺應該比那班由資產階級偏見所教養出來的寥寥無幾的官僚、知識份子和律師要低些呢？

考茨基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不要擅自懷疑這位最可尊敬的家長，這位最純潔公民底真誠性。他是工人勝利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最熱烈與最堅信的擁護者啊。他只是希望這些甜蜜蜜的知識界中的市僧和傻頭傻腦安閑自得的庸人，在羣衆運動以前，在他們同剝削者作殊死鬥爭以前，並絕對不要進行國內戰爭，而首先去製定溫溫和和規規矩矩的革命發展章程：

我們這位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⁶⁴式的飽學考茨基滿胸義憤地對德國工人說道，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從蘇維埃中開除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蓋什維克底代表。於是悲憤填膺的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式的考茨基寫道：『這種辦法不是用以反對犯了某種罪行的某些個人；蘇維埃共和國底憲法沒有一個字說到蘇維埃代表們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這裏，從蘇維埃中間開除出去的，不是某些個人，而是一定的政黨』（第三七頁）。

不錯，這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這簡直是不可容忍的離開了純粹民主制的行爲，而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式的革命家考茨基正是要依照這種民主底規則來幹革命。我們，俄國波爾什維克，本來應該首先允許沙溫可夫之流，李伯爾唐恩及波特列索夫（『積極份子』）之輩，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然後製定刑法，宣佈凡參加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反革命戰爭或在烏克蘭及格魯吉亞同德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本國工人，乃是『應受懲治』的罪行，只有這樣之後，我們才有權依據這一種刑法，依照『純粹民主制』，從蘇維埃中開除『某些個人』。同時不言而喻，經過沙溫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爾、唐恩之流，或藉助於他們的鼓動，而從英法資本家手裏得到金錢的捷克斯拉伐克人，以及在烏克蘭與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幫助之下從德國人那裏得到槍械的克拉斯諾夫輩，當我們還沒有製好正確的刑法之前，他們定會安安靜靜坐着不動，而且正像最純粹的民主派那樣，僅限於幹『在野黨』的活動：

蘇維埃憲法剝奪『凡以取得利潤爲目的而使用傭工』的人們底選舉權，這也

引起了考茨基同樣大的義憤。他寫道：『使用一個藝徒的家庭手工業者或小僱主，其生活和感覺可以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而他們却沒有選舉權』（第三六頁）。

這是多麼違反『純粹民主制』呵！這該多麼不公平呵！固然，直到現在，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而且有無數事實都證明小僱主是最沒良心和最貪吝剝削傭工的人，但猶大什克、果洛孚路夫式的考茨基所說的，當然不是小僱主階級（究竟是誰憑空臆造出階級鬥爭這個有害的理論？），而是某些個人，那些『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剝削者。人們認為早已死去的著名『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底筆鋒之下復活了。這位節儉的阿格尼斯，是九十年前『純粹』民主派資產者李赫特所臆造出來而傳播於德國文藝中的。他曾預言到由於無產階級專政，由於沒收剝削者資本所將發生之無可形容的不幸情形，他假裝忠厚的樣子問道，從法律意義上講來，什麼叫做資本家呢？他舉出了那被咒惡的『無產階級專政者』剝奪了最後一文錢的可憐的節儉女縫工（『節儉的阿格尼斯』）

爲例。有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全體都把純粹民主派李赫特底這個『節儉的阿格尼斯』引爲笑談。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時伯爾還活着，他曾公開直爽地說：我們黨內存在着許多民族自由主義者；這是考茨基還沒有當叛徒時很久以前的事。

現在『節儉的阿格尼斯』，在『使用一個藝徒，其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小僱主』身上復活了。兇惡的波爾什維克竟欺侮他，剝奪他的選舉權。固然，在蘇維埃共和國內，『一切選舉大會』，像仍是這個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可以允許譬如同一工廠有關係的貧苦工匠來參加，只要這個工匠處於例外，不是剝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但試問，怎可信任簡單工人們所舉行的既無秩序，又不按章程行動的（噯呀，何等可怕呵！）工廠大會能有人生知識和正義感覺呢？與其去冒險讓工人有可能欺侮『節儉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工匠』，倒不如把選舉權給予一切剝削者，給予一切使用傭工的僱主，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讓受資產階級與社會沙文主義者◎歡迎的那些可鄙的叛徒混蛋們去誹謗我們這剝奪剝削者選舉權的蘇維埃憲法吧。這樣很好，因為這會使歐洲革命工人同謝德曼和考茨基輩，倫諾德爾和龍格輩，亨德孫和麥克唐納爾輩之間，同老的領袖與老的社會主義叛徒之間的分裂加速和加深起來。

被壓迫階級群眾，革命無產者中覺悟忠實的領袖，定會贊成我們。只要把我們的蘇維埃憲法給這些無產者和這些群眾知道，那他們立刻就會說：這才是真正的我們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真正的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用改良

◎ 我剛才讀了法蘭克福報（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二九三期）底社論，這篇社論歡天喜地的轉述了考茨基這本小冊子底內容。交易所主人底報紙十分滿意。這是理所當然的！有一位同志從柏林寫信給我說，謝德曼輩底前進報在一篇專論上聲稱，它對於考茨基底每一字句幾乎都可以簽字贊同。恭喜！恭喜！

的空談來欺騙工人，如像上述一切領袖們曾欺騙了我們那樣，它真正同剝削者鬥爭，真正實行革命，真正工人底完全解放而鬥爭。

既然在蘇維埃一年的「實際工作」之後，剝削者底選舉權被蘇維埃所剝奪了，這就是說，這些蘇維埃不是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底組織，而是真正被壓迫羣衆底組織。既然這些蘇維埃剝奪了剝削者底選舉權，這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同資本家妥協的小資產階級底機關，不是作國會空談（如考茨基輩，龍格輩和麥克唐納爾輩之空談）的機關，而是同剝削者作殊死鬥爭的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機關。

有一位消息靈通的同志，幾天以前（今天是十月三十日）從柏林寫來了一封信給我，他說「考茨基底小冊子這裏幾乎無人知道」。我很想勸駐德國與瑞士的蘇俄大使們不吝重價，把他這本書買來，分贈給覺悟的工人，好將這個早已變爲「臭屍」的「歐洲的」（請讀作：帝國主義的與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踐踏到爛泥坑裏去吧！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著作末尾（第六一頁與第六三頁）痛哭流涕地說，『新的理論』（他這樣稱波爾什維主義，而懼怕說及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如像瑞士這樣的老民主國中，也找到了同情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也接受這個理論』，這在考茨基看來乃是『不可了解』的事。

其實不然，這是極容易了解的事，因為在受到戰爭底嚴重教訓之後，革命的群眾已經討厭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了。

考茨基寫道，『我們』向來都是主張民主的，而現在我們却忽然要拒絕它！『我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向來都是反對無產階級政專的，科爾布一流人早已公開說過這點。考茨基是知道這一點的，他以為他可以蒙蔽讀者，使其看不見他已『回到』伯恩施坦輩與科爾布輩『懷抱中』去的明顯事實，這真是枉然的想法。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純粹』（資產階級的）民主

制看做神聖的東西。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三年，當普列漢諾夫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尙未可悲地轉到俄國謝德曼立場上去之前）的時候，他在通過黨綱的黨代表大會上說道，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要時，將剝奪資本人家底選舉權，將解散任何國會，如果這個國會竟成了反革命的話。這種觀點正唯一合乎馬克思主義，這是大家從我在前面引用的馬恩言論中，也都可以看到的，這顯然是從馬克思主義底一切基本原理中產生出來的。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向民衆說過那種爲各國考茨基主義者所愛說的言論，他們諂媚資產階級，迎合資產階級國會制，抹煞現代民主制底資產階級性質，而祇是要求擴大這種民主制，把這種民主制貫徹到底。

『我們』對資產階級說過：『你們這些剝削者和僞君子，口裏唱着民主，同時却到處百般地阻碍被壓迫羣衆參加政治。我們就利用你們自己的話，爲了這些羣衆底利益而要求擴大你們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以便準備羣衆去幹革命來推倒你們這些剝削者。如果你們剝削者妄想抵抗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那我們就會

毫不留情地鎮壓你們，把你們變成無權利的人，而且我們會不給糧食你們吃，因為在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中，剝削者將沒有權利，他們將得不到飲食，因為我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謝德曼式的，也不是考茨基式的社會主義者。」。

這就是「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說過了的和將來還要說的話，這也就是被壓迫群眾將定會贊助我們，同我們攜手，而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却定會落到叛徒們底泥坑中去的原因。

什麼是國際主義？

考茨基極端自信地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並自稱為國際主義者。他宣佈謝德曼輩為「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迨至考茨基擁護孟什維克時（他並沒有直接說他是同情他們的，但他却完全宣揚他們的見解），已經很明顯表現出他的「國際主義」究竟是哪一類的貨色了。既然考茨基不是孤單一人，而是在第二國際底環境

中必然產生的一種派別（法國的龍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與格里姆，格拉貝爾與寧恩，英國的麥克唐納爾等）底代表，所以我們來研究研究考茨基底『國際主義』，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考茨基強調地說，孟什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⁸³（無疑地是一張文憑，但：這是一張已經陳腐的文憑），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克觀點描寫如下：

：「孟什維克會想實現總的和平。他們想要各交戰國都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依照這個觀點，在這一目的尚未達到以前，俄國軍隊應作備戰狀態。而波爾什維克則要求立刻無條件地媾和，必要時，他們同意單獨媾和，他們力圖用強力強迫實現這一點，來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第二七頁）。據考茨基的意見，波爾什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而應該以立憲會議為滿足。

可見考茨基與孟什維克底國際主義就是這樣：向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要求改良，但是在一切交戰國尚未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之前，要繼續擁護這種政府，繼續擁護它所進行的戰爭。這種觀點無論屠拉梯也好，考茨基主義者（哈

〔阿茲等〕也好，龍格之流也好，都已經屢次表示過了，他們說他們是主張『保護祖國』的。

在理論上說來，這是完全不善於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區別開來，這簡直是在保護祖國問題上之十足的糊塗觀念。在政治上說來，這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國際主義，這是轉到改良主義方面和背棄革命。

從無產階級觀點上看來，承認『保護祖國』，就是替現在的戰爭辯護，就是承認它的合理性。但既然戰爭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論在君主制下或在共和制下，不論此刻敵軍是在我國境內或在他國境內，都是一樣），那末承認保護祖國，實際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強盜資產階級，就是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在俄國，即令是在克倫斯基時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時代，戰爭也還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為進行這一戰爭的，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須知戰爭是『政策底繼續』）；從前的沙皇同英法資本家所訂立的關於瓜分世界與掠奪他國的秘密條約，把這一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表現得特別明顯。

孟什維克會厚顏無恥地欺騙民衆，把這種戰爭稱爲防禦的或革命的戰爭，而考茨基之讚揚孟什維克底政策，也就是讚揚欺騙民衆，讚揚那班愚弄工人並使工人備受帝國主義者束縛，以此來效勞於資本的小資產者底作用。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僧庸人政策，竟以爲（並以這種荒謬思想去誘惑群衆）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哪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查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爲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不是用吹牛家，空談家或市僧庸人所提出來的一些甜蜜「口號」可以辦到的，而祇是當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以及與這種戰爭有無數經濟聯繫（甚至有更堅固得多的聯繫）的那個階級實際上已被推倒，而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起而代之掌握政權的時候，才可以辦到。否則，要想跳出帝國主義的戰爭——同樣要想跳出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是決不可能的。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底對外政策，宣佈這個政策爲國際主義的與齊美爾瓦爾得派的政策，這樣他就第一，表露出齊美爾瓦爾得機會主義派的多數之全部腐敗性（難怪，我們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同這樣的多數立即分開了哩！）；第二，——這是最重要的，——表露出他考茨基從無產階級底立場轉到小資產階級底立場上，從革命的立場轉到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無產階級所奮鬥的是用革命手段來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所奮鬥的是用改良主義去「完善」帝國主義，是以服從帝國主義去適應帝國主義。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例如在一九〇九年，那時他著有到政權之路一書，其中他所堅持的，恰恰是因有戰爭則革命便必不可免的這種思想，他說過革命時代的逼近。一九一二年的巴塞爾宣言，公開而確定地說到無產階級革命與英德兩大集團間行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連帶關係，而這個戰爭果然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可是當一九一八年因有戰爭而革命業已開始了的時候，考茨基不去說明這些革命底必然性，不去周到而澈底地思考革命的策略與準備革命的方法和手

段，反而聲稱孟什維克底改良主義的策略爲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變行爲麼？

考茨基因孟什維克主張保持軍隊備戰狀態而加以讚揚。他因波爾什維克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而加以責難。這也就是讚揚改良主義和讚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責備革命，而背棄革命。因爲在克倫斯基政府之下保持備戰狀態，就無異是，並真正是保持資產階級所指揮（即令是共和派資產階級所指揮）的軍隊。大家知道，——而且事變底進程也顯然證實了，——這個共和派軍隊由於保留了科爾尼洛夫派軍官而保持了科爾尼洛夫的精神。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不是科爾尼洛夫派的，不能不趨向於帝國主義方面，不能不趨向於用武力來鎮壓無產階級。把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切基礎，把資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基礎，照舊保存起來，祇是修補細節。粉飾小事（『改良』）——這就是孟什維克策略的實際內容。

反之，任何一個大革命，沒有不『破壞』軍隊的，而且不能不『破壞』軍隊。因爲軍隊是保護舊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擁護資本統

治、保持並徵育勞動者去奴服於資本的最堅硬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沒有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與軍隊同時並存的事實。恩格斯說過，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武裝工人會是新軍隊底萌芽，會是新社會制度底組織核心。破壞這個核心，不使它發展起來——這乃是資產階級底第一條金科玉律。而一切勝利革命底第一條金科玉律——馬克思與恩格斯屢次着重說過，——就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來代替它。走上統治地位的新社會階級，若不完全瓦解舊軍隊（即反動的或簡單的市儈叫喊着的所謂『破壞』），若不經過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法國大革命也曾經過這樣最痛苦的時期），若不逐漸在艱苦國內戰爭中，創造新階級底新軍隊、新紀律、新軍事組織，——那它始終也不能達到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歷史家考茨基從前懂得了這一點。叛徒考茨基却忘記了這一點。

如果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那他有什麼權利來稱謝德曼

輩爲「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呢？孟什維克既擁護克倫斯基，又加入他的內閣，也就同樣是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了。考茨基一旦來試試提出關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就絕對逃避不掉這個結論。然而考茨基却極力避免提出這一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關於統治階級的問題，因爲只要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揭破這些徒底真面目。

德國的考茨基派，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都發出如下的議論：社會主義是主張民族平等與自由，主張民族自決的，所以當人家向我國進攻，或敵軍侵入我國領土時，社會黨人有權而且定要起來保護祖國。但是，從理論方面說來，這種議論不是完全污辱社會主義，便是騙世欺人的遁辭，而在政治實踐方面說來，這種議論是與那些甚至從來不考慮戰爭底社會性與階級性以及革命政黨在反動戰爭時任務的愚夫俗子之談，完全相合。

社會主義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手段，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可是社會主義是
一般地反對對人施行強力手段的。然而，除了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與托爾斯泰主

義者之外，誰也不會從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強力。可見，只說一般的「強力」，而不分析那區別反動強力與革命強力的條件，這就成爲背棄革命的市僧立場，或簡單是用詭辯來自欺欺人。

對民族使用強力的問題也是如此。一切戰爭都是對民族使用強力，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者去贊成革命的戰爭。在社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來，基本問題，就是戰爭的階級性。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兩大集團間爲了瓜分世界，爲了分贓，爲了掠奪與征服弱小民族而進行的戰爭。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就是這樣估計戰爭的，而且這種估計已爲事實所證實了。誰離開這種對於戰爭的觀點，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在威歷統治下的德國人，或克勒孟梭統治下的法國人說，既然敵人已侵入我國，我這個社會黨人，就有權而且應該起來保護祖國，那末，這種議論便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不是國際主義者的，不是革命無產者的，而是民族主義市僧們的議論。因爲在這個議論中，抹煞了工人反資本的革命階級鬥爭，抹煞了從存在

有世界資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這事實的觀點上對整個戰爭的估計，也就是說抹煞了國際主義，而其中所剩下的只是一種狹隘的頑固的民族主義。祇是我國被人侵凌，其他一切我都不管——這就是這種議論的結論，這就是這種議論所包含的市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這正像有人看見對某人使用強力時，就發議論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強力的，所以我與其坐在監獄內，倒不如出賣階級好了。

假如法國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的，所以當敵人侵入我國時，我要起來自衛，那末，他們就是叛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因為這種人所看到的祇是自己的『國家』，他把『自己的』：『資產階級』，看得高於一切，而絲毫也不去想想使戰爭變為帝國主義的，使他的資產階級成為帝國主義掠奪鎖鏈中之一環的那種國際聯繫。

一切市儈和一切愚夫魯漢所持的議論，正像考茨基派、龍格派、屠拉梯派之流的叛徒們所持的議論一樣，就是說：敵人進到了我國境內，其餘一切我都不管。

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所持的議論，則是另一樣的：戰爭底性質（是反動的或是革命的），不是以誰先進攻和「敵人」在誰國境內來決定，而是要看哪一階級進行這一戰爭，以及這戰爭所繼續的是哪一種政策來決定的。如果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由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兩個世界集團所進行的戰爭，那末一切資產階級（連小國資產階級也在內）都變成了掠奪底參加人，而我這個革命無產階級代表者底任務，就

◎ 社會沙文主義者（謝德曼輩、倫諾德爾輩、亨德孫輩、葛培爾輩等等）在戰爭時拒絕一切關於國際的言論。他們認為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人，就是「叛徒」。社會主義的人。他們贊成本國資產階級侵略政策。社會和平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市儈和平主義者）表示一切「國際主義的」感覺，奮起反對兼併政策等等，但是實際上他們繼續擁護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兩派人之間的差別很小，正如兇言惡語的資本家與花言巧語的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一樣。

是要準備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戰爭慘禍的唯一救星。當我推論時，我不應該從『自己』國家底觀點出發（因為這是民族主義市僧這類可憐愚人底議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而應該從我之參加準備，宣傳與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

這才是國際主義，這才是國際主義者、革命工人、真正社會主義者底任務。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所『遺忘了』的起碼知識。當考茨基從讚許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國的哈阿茲派之流）底策略，轉到批評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時，他的叛變立場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了。請看他的批評吧：

『波爾什維克的革命，是建築在這樣的假定之上的：這次革命將為全歐革命底出發點；俄國大胆的倡首將喚醒全歐無產者一致奮起。

在這種假定之下，俄國的單獨媾和將採取何種形式，這種媾和將使俄國人民受到何種苦難和領土損失（原文為 *Verst. Ummelungen* 即殘缺或割裂的意

思) 以及如何來解釋民族自決，當然都可以置之不問。那時俄國是否能夠自衛，也是沒有關係的。照這種觀點看來，歐洲革命能最好地捍衛俄國革命，歐洲革命將給予舊俄境內各民族以完全的和真正的自決。

將在歐洲實現社會主義與鞏固社會主義的歐洲革命，也應該幫助俄國消除那些因國內經濟落後以致阻碍實行社會主義生產的障礙物。

所有這些都很合邏輯，很有根據，只要俄國革命必然引起歐洲革命這個基本假定能够成立。但是，如果歐洲革命不發生，那又怎麼辦呢？

直到現在，這種假定還沒有證實。於是人們現在就來責備歐洲無產者，說他們拋棄並叛賣了俄國革命。這種責備簡直是無的放矢，因為誰又能對歐洲無產階級底行動負責呢？」（第二八頁）。

往下考茨基還再三再四地補充說，馬克思、恩格斯、伯伯爾關於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之到來，也曾屢次發生過錯誤，但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築於「定期內」發生革命底期待上（第二九頁）。而波爾什維克却「把一切都放在全歐革

命這一孤注之上」。

我們故意摘錄這樣冗長的一段，好使讀者明白看見，考茨基如何「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用卑鄙的與反動的市儈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第一，把顯然的愚蠢思想加到他的論敵身上，然後再來駁斥這種愚蠢思想，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所用的手法，如果波爾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築於希望其他各國在一定期內發生革命的期待上，那當然是很愚蠢的。但波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做過這樣的蠢事。在我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我曾直接避開這種愚蠢思想，我說，我們指望着美國的革命，但並不指望在一定期內發生。在我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的時候（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三月），我曾屢次發揮了同樣的意見。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很小的偽造他人意見的把戲，他對於波爾什維主義的批評就是建築在這種把戲上的。考茨基把指望歐洲革命在較近期內發生，但不是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而與指望它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混為一談了。這是一個小小的，正是小小的騙局！

第二種策略是蠢舉。第一種策略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切革命的無產者和國際主義者所應該採取的策略，因為祇有這種策略才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估計到歐洲各國因戰爭而發生的客觀狀況，祇有這種策略才能符合無產階級底國際任務。

考茨基拿關於波爾什維克革命家可能犯而沒有犯的錯誤這個小問題，來代替關於一般革命策略底基礎的大問題，這樣他也就很巧妙地背棄了一般的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底客觀問題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說到第二點了。

第二，如果有革命形勢存在，那末，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打算到歐洲革命。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與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能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底起碼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這個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問題，那他就會看到，對

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的時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曾同意，歐洲戰爭定將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在一九〇二年（社會革命一書中）和一九〇九年（到政權之路一書中）都明確地承認了這一點。用第二國際全體名義發出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無怪乎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與考茨基主義者（即動搖於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之間的『中派』），其懼怕巴塞爾宣言上關於這點聲明，好像害怕惡魔一般！

可見對歐洲革命形勢的期待，不是波爾什維克底貪圖，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底公意。考茨基說什麼波爾什維克『向來都相信強力與意志萬能』，藉這類話來捕塞這個無庸爭論的真理，那這就無異是空談，正是用以遮蓋他自己逃避提出革命形勢問題的這種可恥行為而已。

其次，革命形勢是否真正到來？連這個問題也是考茨基所不會提出的。經濟事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到處都有戰爭造成的飢荒與破壞，這就是革命形勢。政治事實也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從一九一五年起，在所有各國內就已顯然暴露出

舊的，腐朽的社會黨的分裂過程，無產階級群眾離開社會沙文主義領袖，而左傾到革命思想與革命情緒以及革命領袖方面來的過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當考茨基寫他這本小冊子時，祇有懼怕革命叛變革命的人才會看不見這些事實。現在呢，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歐洲許多國家內的革命，已經在大眾面前很迅速地發展着。希望人家還像從前一樣認他爲馬思主義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是這樣的一個近視的庸人（正像一八四七年爲馬克思所譏笑的庸人一樣），看不見日益迫近的革命！！

我們要說到第三點了。

第三，在歐洲已經有了革命形勢的條件之下，革命策略應有什麼特點呢？變成了叛徒的考茨基會害怕提出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這個問題。考茨基的推論正像標本式的庸俗市僧或愚昧農夫一樣：『全歐洲革命』來到了沒有？如果已經來到，那末他也同意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們可以說，那時一切的混蛋（如像現在有時混入到已獲得勝利的波爾什維克隊伍裏來的混蛋一樣）都會宣佈自己是

革命者了！

如果沒有到來，那時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考茨基簡直絲毫也不懂得這樣的真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與庸夫俗子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有本領向蒙昧無知的群眾宣傳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來，證明它的不可避免，說明它對於民衆的利益，準備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進行革命。

考茨基把毫無意識的思想加到波爾什維克身上，似乎他們指望歐洲革命將在一定期內到來，而把一切都放在這一孤注之上。這種毫無意識的思想，正是反對考茨基自己的，因為從他的話裏正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歐洲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這天前到來的話，那末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就對了！（考茨基所指出的正是他寫這本小冊子的日子），而在八月五日這天後，經過幾星期已經可以顯然看出，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革命已在到來，於是考茨基底全部叛徒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假造，他不善於用革命精神去推論問題，甚至不善於用革命精神提出問題的全部毛病，都澈頭澈尾地暴露出來了！

考茨基寫道：人們責備歐洲的無產者爲叛變，這簡直是無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錯了！請你拿鏡子照一照吧，那你就會看到，這一責備之矢，究竟是向什麼人放的。考茨基裝做怪天真爛漫的樣子，似乎他不知道是誰發出這種責備言論，這種責備有什麼意思。其實，考茨基明明知道，這種責備是德國的『左派』，斯巴達克派，即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所發出的，而且現時他們還在這樣責備着。這種責備表示一種明確的意識：當德國無產階級窒息芬蘭、烏克蘭、拉脫維亞、愛斯特蘭時，它就是對俄國（與世界）革命作了叛變的行爲。這一責備所首先反對所主要反對的，並不是那些素遭抑壓的羣衆，而是那些像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這類的領袖們，因爲這些領袖沒有執行自己的天職，不到羣衆中去進行革命鼓動，革命宣傳與革命工作以反對羣衆底因循慣習，這些領袖的活動實際上都是違反被壓迫階級羣衆中所隨時蘊蓄着的革命本能與志向。謝德曼輩公開地、粗暴無恥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賣了無產階級，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考茨基派與龍格派所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情，不過他們動搖着，徘徊着，胆戰

心驚，左顧右盼，看看在這一時分，是誰強有力些。考茨基在戰時的一切著作都不是用來鼓勵與發展革命精神，而是消滅這種精神。

考茨基甚至不了解，關於歐洲無產者出賣了俄國革命的這種『責備』，有何等偉大的理論意義，又有何等更大的宣傳與鼓動意義，這種不了解簡直會成爲德國正式社會民主黨這『中派』領袖之市僧愚鈍性底歷史紀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這種『責備』，在德意志『帝國』出版檢查條件下，乃是沒有叛賣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所能採用的唯一方式來表示自己向德國工人號召，號召他們起來打倒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拋棄這類『領袖們』，從他們那種使人愚鈍，使人俗化的鼓動之下解放出來，違反他們的願望，不去理會他們，越過他們，而來奮起革命，實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這一點。那他又怎能了解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呢？我們能否希望一個根本背棄革命的人，來計較與估量在一種最『困難』情形下的革命發展底條件呢？

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唯一的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不是根據於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是根據於「不信任」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不是根據於那祇保護「自己」祖國（自家資產階級底祖國）而「唾棄」其餘一切之狹隘民族主義的願望，而是根據於對歐洲革命形勢之正確的（在戰爭以前，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為大家所公認的）估量之上的。這個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這種策略已為巨大成就所證實，因為波爾什維主義（這並不是俄國波爾什維克底功勞，而是由於民衆到處對於真正革命策略表示最深刻的同情）變成了世界的波爾什維主義，提供了在實踐上與社會沙文主義及社會和平主義具體不同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波爾什維主義把謝德曼與考茨基輩、倫諾德爾與龍格輩、亨德孫與麥克唐納輩底腐敗的舊「國際」完全打倒了，這些人現在夢想着「統一」和復活死屍，而定會來互相傾軋阻難的。波爾什維主義創造了第三國際底思想上與策略上的基礎，這個國際才是

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國際，它既估計到和平時代所獲得的勝利品，同時又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底經驗。

波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通俗化了，它把這幾個字起初從拉丁文譯成俄文，然後又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並且拿蘇維埃政權底實例指明出了：甚至在落後國家中，甚至是最缺少經驗、最缺少教育與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與貧苦農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內，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在同剝削者（爲全世界資產階級所援助的剝削者）的鬥爭中，保持着勞動者底政權，建立比世界上所有一切舊民主制都更高更廣的民主制，開始在實際上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來發揮千百萬工農底創造性。

波爾什維主義真正強有力地幫助了歐美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展，這是迄今以前任何一國底任何一個政黨所未能做到過的。全世界底工人日益明顯地看到，謝德曼與考茨基之流底策略沒有使他們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僱傭奴隸制，這種策略不能成爲供世界各國效法的模範，——同時，全世界無產者羣衆

也就日益明顯地認清波爾什維主義指出了擺脫戰爭和帝國主義慘禍的正確道路，認清波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

大家都親眼見到，不但全歐洲而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成熟着，而俄國無產階級底勝利，是幫助了這一革命，加速了這一革命，維護了這一革命。這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是否還不够呢？當然不够。一個國家不能作出更多事情來。但這一個國家，由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還是作出了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假設世界帝國主義，例如由德帝國主義與英法帝國主義協定的方法，能够在明天壓倒了俄國蘇維埃政權，甚至就假設有這種最壞最壞的情形，波爾什維克底策略還是對於社會主義有了莫大的貢獻，對於不可征服的世界革命底發展作了極大的幫助。

在所謂「經濟分析」的幌子下替資產階級效勞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考茨基底書爲要名符其實，就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稱爲附和資產階級對於波爾什維克的攻擊。

孟什維克關於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舊「理論」，就是說，孟什維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舊曲解，（即在一九〇五年被考茨基所駁倒了的曲解），現在又被這個理論家重新恢復起來了。無論這問題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枯燥無味，我們還是不得不再來論述一番。

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在一九〇五年前俄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這樣說的。以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由此就得出結論說：所以，無產階級不應超出於資產階級所容許的範圍，而應該採取同資產階級協定的政策。波爾什維克那時就說，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力圖照資產階級方式，用改良主義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儘可能保持君主政體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等等。無產階級應該不讓資產階級用改良主義來「束縛」自己，而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波爾什維克曾將資產階級革命時的階

級力量對比，歸納成這樣的一個公式：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以澈底破壞君主制度，中世紀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無產階級同一般農民聯合，就是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的表現，因為一般農民是基於商品生產的小生產者。接着，波爾什維克那時又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全體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的勞動者），使中農中立，以推倒資產階級：這就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底特徵（見我在一九〇五年著的兩個策略一書，在一九〇七年出版於彼得堡的十二年來文集又重刊出來了）。

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因當時已成爲孟什維克的普列漢諾夫底詢問，曾間接參加過這次爭論，而他的回答實際上是反對普列漢諾夫的。這件事那時引起了波爾什維克刊物上的特別譏笑。現在考茨基對於那時的爭論竟一字不提（害怕別人拿他自己的話來揭破他！），以致使德國的讀者無法了解問題底真相。考茨基先生於一九一八年不能給德國工人說明：他在一九〇五年，曾主張工人同農民聯合，而不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並在什麼條件之下他擁護了這種聯合，他對這個

聯合提出了什麼綱領。

開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誇耀詞句，來擁護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主張，引證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⁶⁷底話語，來阻嚼孟什維克舊日的自由派觀點；同時，他又用這些引證來證明關於俄國落後的新意見，而從這種新意見上得出的結論却仍是那一老套，說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下不應比資產階級走得更遠！這是完全違反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把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相比較時所說的話！

在研究考茨基所作『經濟分析』底主要『論據』與主要内容之前，我們要指出，他的頭幾句話就表現出作者底思想是糊塗得可笑或者是淺薄輕率。我們的『理論家』寓意深沉地說：

『直到現在，俄國底經濟基礎還是農業，而且是小農業。農民佔全體人口五分之二，也許甚至佔六分之五』（第四五頁）。第一，可敬愛的理論家，你想過沒

有，在這大批的小生產者中間，有多少剝削者呢？當然，不過總數十分之一，至於在城市中，他們的數量就更小了，因為那裏的大生產更加發展。就拿極少可能的最高數目字說吧，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產者是喪失了選舉權的剝削者，那你就可以看到，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佔百分之六十六的波爾什維克。是代表了大多數民衆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間常有極大部分人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即在原則上全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原來都擁護蘇維埃政權，迨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起來幹冒險暴動時，他們過去的黨中發生分裂，另組成了兩個新的政黨——『人民共產黨』與『革命共產黨』（組成這兩個新黨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曾經由舊黨提出來擔任最重要的國家職位，例如屬於前一黨的有查克思，屬於後一黨的有考里加也夫）。可見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無意中推翻了！——自己那種可笑的說法，似乎贊成波爾什維克的只是人民中的少數。

第二，可敬愛的理論家，你想過沒有，小農生產者是必然要動搖於無產階級

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呢？這一爲歐洲全部近代史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考茨基恰巧把它『忘記了』，因爲這真理把他所重複的孟什維克的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沒有『忘記』這一點，那他就不能否認在小農生產者佔優勢的國度裏，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

現在來考查我們理論家的『經濟分析』底主要內容吧。

考茨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專政，這是無可爭論的。『但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呢？』（第三四頁）。

『按照蘇維埃的憲法，在有權參加立法與管理的人民中，農民佔大多數。那末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如果真是澈底實行，如果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真是能够直接實現本來只有政黨才能實現的專政的話，則這種專政只會是農民專政而已』（第三五頁）。

良善的考茨基，非常滿意這一如此深微，如此聰明的議論，於是就企圖譏諷地說道：『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最無痛苦的實現，似乎只有把它交給農民手中的

時候，才有保證』（第三五頁）。

我們的理論家從半自由主義的普、馬斯洛夫那裏引用了許多非常濶博的話，極詳盡地來證明農民是利於麵包價格高漲和城市工人工資低廉等的新思想。附帶說說，這種新思想，對於戰後時期的真正新現象注意得愈少，所以也就敘述得愈是乾燥無味；這些現象就是：例如農民出賣麵包時，他們所要求的代價，不是金錢而是消費品，農民所缺乏的，是無論用多少錢都不能充其量買到的農具。關於這一點，下面我們還要特別講到。

總之，考茨基責備波爾什維克，責備無產階級底政黨，說它把專政，把實現社會主義的事業，交給到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手裏。

考茨基先生，妙極了！據你的高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究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論家，想必是記起了『開口如銀，閉口如金』的俗話，覺得還是閉口不說的好。但考茨基在下面的議論中却露出了自己的馬脚。

『在蘇維埃共和國開始時期，農民蘇維埃曾是全體貧民底組。現在這識個共和國宣佈，蘇維埃爲無產者與貧農底組織。殷實農民失去了蘇維埃的選擇。在這裏，貧農被認爲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社會主義土地改革時的經常的與大批的產物』（第四八頁）。

何等厲害的諷刺啊！在俄國，這種諷刺從任何一個資產者口裏都可以聽到：他們都幸災樂禍地嘲笑說，蘇維埃共和國承認貧農底存在。他們譏笑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社會主義者』竟來譏笑在四年大破壞的戰爭之後，在我國有貧農存在，而且在很長的時期內還將存在的這一事實，——這種『社會主義者』只有在大批叛變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出來。

請再聽下去吧：

……蘇維埃共和國干涉富農與貧農間的關係，但不是用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爲要消除城市居民的糧荒，遂把武裝工人隊伍派到鄉村中去，奪取富農底剩餘糧食。這糧食底一部份交給市民，另一部份則分給貧農』（第四八

頁)。

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一想到這種辦法會有擴張到大城市近郊以外的可能(而這種辦法在我國現在已擴張到全國了)，自然是憤激不平的了。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帶着庸人應蓋世無雙的、令人傾服的冷淡(或癡愚)態度，並用教訓口吻說道：『這些辦法(剝奪富農的麵包)使生產過程中添加了紊亂不安與國內戰爭底新因素：』(添加到『生產過程』中的國內戰爭，這真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啊！)：『其實生產過程要健全起來，是非常需要安定與安全的』(第四九頁)。

對啊！對啊！對於那些私藏餘糧，破壞糧食壟斷法律，使城市居民發生飢荒的剝削者與糧食投機者底安定與安全，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當然是應該歎息流淚。考茨基，維伯爾(在維也納)，龍格(在巴黎)和麥克唐納爾(在倫敦)等等一流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都主張工人階級革命，祇是：祇是不要擾害糧食投機者底安

定與安全啊！而這種替資本家服役的卑鄙齷齪行爲，竟是援引『生產過程』這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話來遮蓋着的：如果這是馬克思主義，那末什麼才叫做向資產階級卑躬獻媚呢？

請看我們的理論家所說的东西吧。他責備波爾什維克，說我們把農民專政當做無產階級專政。但同時他又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該把國內戰爭帶到鄉村中去（我們認爲這是我們的功績），不該派遣武裝工人隊伍到鄉間去，不該讓這些隊伍公開宣稱實行『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不該讓他們幫助貧農，去剝奪富農與投機商人之違反糧食壟斷法律所隱藏起來的餘糧。

一方面，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張純粹的民主制，主張革命的階級，即被剝削勞動群眾底領袖應該從大多數人民（自然也包括剝削者在內）。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我們而說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整個說來，農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基礎之上，而同時他又自命爲是擁護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不是「經濟分析」，這是超等的一踏糊塗。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自由主義學說底斷片，這是鼓吹向資產階級和富農逢迎獻媚的言論。

被考茨基弄成一團糟的問題，波爾什維克早已在一九〇五年完全說明了。是的，當我們還協同全體農民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我們十分明白認識到了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已說過數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的這個必經的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想在這一點上來「揭破」我們，結果不過是揭破他自己的糊塗觀點，揭破他自己害怕回憶起他在一九〇五年當他還不是叛徒時所寫的東西。

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很久以前，在我們奪取政權很久以前，我們就已公開說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程度，這種破產現象要求（不管誰願意與否）採取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否則便不能前進，便不能挽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便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底痛苦。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築一座人工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這就是冒學充者態度，援引資本主義制度比中世紀制度進步這一點來暗中對資產階級作反動的祖護，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也得說說，蘇維埃之所以是更高得無比的民主制度形式，正是因爲它把工農群衆聯合起來，引進到政治生活中去，它是最接近於「人民」的（即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說到真正人民革命時使用「人民」兩字所含的意思），是羣衆政治的和階級的成熟程度及其發展之最正確的晴雨表。蘇維埃憲法，不是依照什麼「計

劃』寫下來的，不是在書房內擬定出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家強制勞動群衆接受的東西。不，這憲法是在階級鬥爭發展進程中按照階級矛盾成熟程度而成長起來的。考茨基所不能承認的那些事實，正是證明了這一點。

起初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正因貧農之不開通，落後，無知識，才把領導權交給了富農、有錢人、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手裏。這會是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有考茨基那樣的傻瓜或叛徒，才會認爲這兩種人是社會主義者）統治的時候。小資產階級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沙溫可夫）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因爲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經濟地位底根本屬性，決不能有什麼獨立的行動。要附帶說說，當考茨基分析俄國革命時，既然用『民主制』在法律上形式上的概念，即限於替資產階級效勞，遮掩這階級統治以資欺騙羣衆的概念來捕塞敷衍，而忘記了『民主制』實際上有時是表現資產階級專政，有時是表現服從這專政的小資產階級之軟弱無力的改良主義等等，這樣，考茨基就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

照考茨基說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有過資產階級的政黨，有過領導無產階級大多數羣衆的無產階級政黨（波爾什維克），而並沒有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階級的根源，即小資產階級的根源！

小資產階級——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動搖，啓發了群衆，使他們的絕大多數，一切『下層羣衆』，一切無產者與半無產者離開了這類『領袖』。

波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在彼得城與莫斯科）佔了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內部的分裂加強了。

獲得了勝利的波爾什維主義的革命，就是動搖底終結，就是君主政體與地主地所有制底完全破壞（在十月革命以前這還沒有被破壞）。資產階級的革命，由我們進行到底了。全體農民都跟着我們走。他們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間的矛盾，一時還不能顯現出來。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沒有暴露出來。

這個過程在一九一八年夏秋兩季發展開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反革命暴動

喚醒了富農。俄國各處都發生了富農暴動。貧農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報紙上，而是從生活中知道了他們的利益同富農、有錢人、鄉村資產階級底利益，是不能調和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一切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反映出了羣衆底動搖，且恰恰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他們就分裂了：一部分同捷克斯拉伐克叛軍聯合（在莫斯科舉行暴動，當時普洛施洋奪取了——一小時！電報局，通告全俄說波爾什維克已被推倒了；後來有派去抵抗捷克斯拉伐克叛軍的軍隊總司令穆拉維也夫底叛變等等）；另一部分（上面已經講過）還是同波爾什維克在一起。

城市中缺乏食品的情形加緊，就日益銳厲地提出了糧食壟斷問題（理論家考茨基在他的經濟分析中，在他重複十年前普、馬斯洛夫所言的分析中，『忘記了』糧食壟斷這件事！）。

舊的地主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是民主共和國，常常把實際上受資產階級支配的武裝隊伍派到鄉村中去，這是考茨基先生所不知道的！他不認爲這是『資產階級專政』，絕對不是的！這是『純粹的民主制』，尤其是，如果這種行動爲資

產階級的國會所批准了的時候！關於亞甫克森鐵夫與斯、馬斯洛夫⁶⁸、聯同克倫斯基輩與策烈鐵里等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於一九一七年夏秋如何逮捕土地委員會委員，關於這一點，考茨基簡直『沒有聽到』，關於這一點他簡直一字不提！

全部問題就在於經過民主共和國形式而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不能在人民前面承認，說這個國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不能對人民說真話，不能不戴假面具。

而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蘇維埃的國家，則坦直公開地對民衆說真話，聲明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並且正因為它說出這種真話，所以把千百萬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了，這些公民在任何民主共和制度下都是被壓制的，而現在則由蘇維埃引進到參加政治，參加民主制，參加國家管理中來了。蘇維埃共和國把武裝的工人隊伍，首先是都市中最覺悟的工人隊伍，派到鄉下去。這些工人把社會主義帶到鄉村裏，將貧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去

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

凡是明白情形並到過鄉村裏的人都說，我國鄉村祇在一九一八年夏秋才經歷着自己的『十月』（即無產階級的）『革命』。轉變關頭到了。富農暴動的風潮，爲貧農底奮起，爲『貧農委員會』底發展所代替了。在軍隊內，由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員，由工人出身的軍官，師長和軍長增多起來了。正當考茨基爲七月危機（一九一八年）和資產階級底狂吠所嚇倒，而像『小公鷄』一樣跟着資產階級跑，並著了一整本深信波爾什維克必爲農民所推倒的小冊子之際，正當考茨基把左派社會革命黨之退出認作是擁護波爾什維克的人數『縮小了』（第三七頁）的時候，波爾什維主義同情者的真正數目却擴大得不可測量了，因爲正是這時，有幾千百萬鄉村貧民從富農和鄉村資產階級底影響與監督下解脫出來，都覺醒起來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了。

我們失去了幾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氣節的知識份子與農民中的富農，而我們却得到了數百萬貧農份子。

兩首都的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了一年以後，在窮鄉僻壤中，才在前者影響之下，並由於前者底幫助，也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最終地鞏固了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主義，最終地證明國內已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反對波爾什維主義了。

俄國無產階級同全體農民聯合既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最終地過渡到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它分裂了鄉村，把鄉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把他們統一起來，去反對富農與資產階級以及農民中的資產階級。

假如兩首都與大工業中心底波爾什維主義的無產階級，不曾善於把鄉村貧民團結到自己周圍來反對富農，那才可以証明俄國『尙未成熟』到社會主義革命，那才可以說農民仍舊是『整個的』，即仍舊是在富農、有錢人、資產階級底經

◎ 在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九日）上，有表決權的代表爲九百六十七人，其中波爾什維克佔九百五十人，有發言權的代表爲三百五十一人，其中波爾什維克佔三百三十五人。總計波爾什維克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七。

濟、政治和精神的領導之下，那才可以說革命還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之外。（但是要附帶說明一句，即使照上面這種說法，也還是沒有證明無產階級曾不應奪取政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真正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貫徹到底了，只有無產階級才作了一些認真的事情來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建立了蘇維埃國家，這是繼巴黎公社之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波爾什維主義的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與十一月，不善於等待鄉村中的階級分化，不善於準備和實行這種分化，就立刻試圖『命令』在鄉村中進行國內戰爭或『施行社會主義』，就試圖不同一般農民作臨時的聯合，不肯對中農做許多讓步等等，那末，這就是用布朗基主義式的精神來曲解馬克思主義，那末這就是少數人強制多數人接受自己意志的企圖，那末這就是理論上的荒謬思想，不了解全體農民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了解在落後國內不經過許多的過渡，不經過許多過渡的階段，是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

考茨基對於這個最重要的理論上與政治上的問題，簡直是全部弄糊塗了，於是在實際行動上他就簡單成了資產階級手下高聲叫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奴僕。

對於另一個極有趣味與極關重要的問題，考茨基也是弄得同樣，也許更加糊塗，這問題就是：在土地改革（這是極困難同時又極重要的社會主義改革）中蘇維埃共和國底立法活動，在原則上是否正確，其次在實施上是否適當？西歐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怕是祇看過最重要文件之後，能對我們的政策加以批評，那我們都是感激不已的，因為這不但對於我們，而且對於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均有非常大的幫助。但考茨基所作出的却不是批評，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爲自由主義的，在理論上極端糊塗的觀念，而在實際上便是反波爾什維克的一些空洞的、惡毒的、庸俗的攻擊。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大土地所有制不能保持下去了。這是革命造成的結果。這是馬上就表現得很明顯的事。不能不把它交給農民了！』（考茨基先生，這是不對的：你把你

覺得是『很明顯的東西』拿來代替各階級對於這問題的態度；革命歷史證明了資產者同小資產者，即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採取了保持大土地所有制的政策。斯、馬斯洛夫底法律與各土地委員會委員之被捕，特別證明了這一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就戰勝不了與資本家聯合的地主。

：『但是關於這應在什麼形式之下來實現的問題，還沒有一致的意見。那時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都是可以想像的』：（考茨基所最担心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底『一致』，而不管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是誰。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各基本階級對這問題必然有不同的解決辦法，這一點他却忘記了）：『從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最合理的辦法是將大田場收爲國有，然後交給向來在這些田場上充當僱工的農民，由他們用共耕社的形式來耕種這些大田莊。但這種解決法，應預計有農業工人存在，而這樣的農業工人是俄國所沒有的。還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將大地產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分成小塊，租給地少的農民。那時也許還會多少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份吧』：

考茨基總是用他的那套老把戲來加以搪塞：什麼一方面不能不認識，另一方面應該承認。他把各種解決辦法排列在一起，而毫不設想——唯一切實地，唯一按馬克思主義設想——在某種特殊條件之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究竟應該怎樣？俄國是有農業僱工的，但是不多，至於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問題：如何使土地經營轉變到公社的與共耕社的形式，考茨基竟一字不提。然而最荒謬可笑的就是考茨基想把小塊土地的出租辦法看作爲『多少有些社會主義成份』。其實這是小·產·階·級·的·口·號·，·其·中·絲·毫·也·沒·有·『·社·會·主·義·成·份·』。·如果·出·租·土·地·的·『·國·家·』，·不·是·公·社·式·的·國·家·，·而·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考·茨·基·底·經·常·假·定·恰·恰·是·這·樣·的·國·家·），·那·末·出·租·小·塊·土·地·，·簡·直·是·一·種·標·本·式·的·自·由·主·義·的·改·良·。

至於蘇維埃政權之廢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考茨基則緘口不言。不但如此，他在摘引蘇維埃政權底法令時，竟玩弄了不可思議的偽造手段，將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故意丟掉。

考茨基聲明說『小生產是趨向於把生產資料完全私有化』，說立憲會議是能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權威機關』（這種論斷在俄國只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為大家知道，工農認為有權威的只是蘇維埃，而立憲會議則已經成了捷克斯拉伐克叛軍與地主底口號），然後他繼續說道：

『蘇維埃政府頒佈的第一批法令內，有一個法令規定：（一）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二）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室和寺觀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都一律轉交區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土地問題時為止』。

僅僅摘引了這兩條之後，考茨基就作出結論說：

『關於立憲會議字樣，始終不過是死的條文。實際上各區農民已能任意處置土地』（第四七頁）。

請看，這就是考茨基『批評』方法底標本！這就是最近乎贗造的『科學』作品。他誘導德國的讀者說，波爾什維，在土地私有制問題上向農民投降了！說波

爾什維克讓農民各自爲政的（『各區』）任意處置土地！

其實，考茨基所摘引的法令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舊曆）頒佈的第一道法令，其中不止兩條，而是有五條，此外還有八條『委託書』⁶⁹，並且說過，這委託書『應作爲方針』。

在法令第三條上說，一切農莊轉歸『人民』，必須製定『所有被沒收財產之正確統計』，並要有『最嚴格的革命保護』。而在委託書中說，『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具有高度技術的農場』『不得分割』，『所有已被沒收土地上的耕畜與農具，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概無報償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全部土地劃入全民公有地產總額中』。

其次，在解散立憲會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時舉行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現在已包括在蘇維埃共和國基本法中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在這宣言第二條第一項中說『廢除土地私有制』，『一切模範田莊與模範農業企業，都宣佈爲國家財產』。

可見，關於立憲會議字樣，並沒有變爲死的條文，因爲另一種在農民看來，其權威更是大得不可計量的全民代表機關，已經負起了解決土地問題的責任。

其次，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六日（新曆十九日）又公佈了土地社會化的法令，再次批准一切土地私有制之廢除，把土地與全部私有農具交給蘇維埃政權處理，而受聯邦蘇維埃政權底監督，該法律指出處理土地的任務如下：

『在農業中發展集體農莊，減少個體經濟，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這種集體農莊，在節省勞動與資料方面說來，都是更有利益的』（第一一條，第五項）。

這個法律規定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對於『誰有權使用土地』這個基本問題回答說：

『第二〇條。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境內地面上的各地段，爲了社會與個人需要而可以使用的，是：（甲）以文化教育爲目的的者：（一）蘇維埃政權機關（聯邦的、省區的、省的、縣的、區的與鄉村的）所代表的國家。（二）社會團

體（在地方蘇維埃政權允許與監督之下）。（乙）以經營農業爲目的者：（三）農業公社。（四）農業共耕社。（五）鄉村團體。（六）單個的家庭與個人……讀者可以看見，考茨基完全曲解了事實，並且絕對虛假地把俄國無產階級國家底土地政策與土地法令介紹給德國的讀者。

考茨基甚至不會提出在理論上重要的基本問題！

這些問題如下：

（一）土地平均使用以及

（二）土地國有，——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一般地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局部地對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過渡中的關係。

（三）土地共耕制，是從零散小農業進到公共大農業的一種過渡形式。在蘇維埃法令中，這個問題底提法，是否會滿足社會主義底要求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以下兩個基本事實：（甲）波爾什維克在估計一九〇五年的經驗時（如像我自己論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問題的著

作），曾指出土地平均使用的口號，帶有民主的進步的意義，帶有民主的革命的意義，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以前也很確定地說過這一點。（乙）波爾什維克在施行土地社會化的法令時——這法令底『靈魂』就是土地平均使用的口號——萬分確定地聲明過：這並不是我們的思想，我們是不同意這一口號的；但我們以為我們有施行這口號的責任，因為這是絕大多數農民底要求。而大多數勞動者底理想和要求，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消除；這種要求是不能『取締的』，也不能『跳過的』。我們波爾什維克要幫助農民去消除小資產階級的口號，而儘可能迅速地、輕便地從這些口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口號。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用自己的科學分析來幫助工人革命，那就應該回答：第一，土地平均使用底思想是否真有民主的革命的意義，有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意義？第二，波爾什維克自己投票來通過（並十二分誠實地遵守着）關於土地平均使用的小資產階級的法令，這種行為是否正確？

考茨基甚至不能看見，在理論方面問題底關鍵何在！

考茨基絕對無法否認平均底思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這種革命不能比這走得更遠。當這個革命進行到底了的時候，它就將更加明顯地、更加迅速地、更加容易地在民衆前面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解決辦法之不足，而有超出這些辦法的範圍，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必要。

推倒了沙皇與地主的農民，渴望實行平均制，而世界上是沒有一種力量能阻止那擺脫了地主和擺脫了資產階級國會議共和國的農民去實現這種夢想的。無產者對農民說：我們來幫助你們達到『理想的』資本主義，因為土地底平均使用，從小生產者底觀點看來是資本主義底理想化。同時，我們將給你們指出這種辦法之不足與進到共同耕種土地的必要。

看看考茨基怎樣來否定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鬥爭的這種領導底正確性，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考茨基却覺得還是迴避這問題好些……

其次，考茨基簡直欺騙德國的讀者，向他們隱瞞着蘇維埃政權在土地法令上

把農業公社和共耕社放到了第一位，而給了它們直接優先權的事實。

同農民一起，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貧苦農民，即同農民中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起，前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波爾什維克底政策，而這也就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考茨基簡直弄糊塗了，連一個問題也不會提出！一方面，他不敢說在平均使用土地問題上無產階級應該同農民分離，因為他覺得這種分離是荒謬的（而且在一九〇五年，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爽直而明白地主張過工農聯合是革命勝利底條件）。另一方面，他又深表同情地摘引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底自由主義的鄙俗議論，而普、馬斯洛夫『證明』從社會主義底觀點看來，小資產階級的平等是空想的與反動的，但却不說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看來，小資產階級爲平等，爲平均的鬥爭是進步的與革命的。

考茨基的糊塗真是沒有止境：請注意吧，他曾堅持說（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他要求過（一九一八年）不要超越這個界限！而同是這個考

茨基却又把小資產階級的改革，把小塊土地租給貧農（即近於平均的辦法）作為『多少有些社會主義成份』（對於資產階級革命說來）！！

真是誰也不會了解！

此外，考茨基又表示出他對於一定政黨底實際政策的估計，是庸俗無能的。他摘引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底說話，但不願意看到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黨底實際政策：當時該黨與地主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實際上主張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和同地主妥協（證據就是各土地委員會委員之被捕與斯、馬斯洛夫底法律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見，普、馬斯洛夫關於小資產階級平等底反動性與空想性的說法，實際上是掩蓋孟什維克主張農民同地主妥協（即讓地主欺騙農民）而不叫農民去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那種政策。

這叫做『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

只有波爾什維克才嚴格估計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

他們把前者進行到底時，就打開了進到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考茨基枉費心機地重複着自由派並不刺人的譏刺話：『無論在什麼地方，小農從來沒有在理論說服底影響之下過渡到集體的生產』（第五〇頁）。

這真是太聰明了啊！

無論在什麼地方，大國底小農從來沒有受過無產階級國家底影響。

無論在什麼地方，小農從來沒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用宣傳、政治、經濟和軍事方法援助貧苦農民的條件下，進到貧農與富農間公開的階級鬥爭，一直到他們間的國內戰爭。

無論在什麼地方，投機者與有錢人從來沒有因戰爭這樣大發其財，而農民群眾則遭受這樣的破產。

考茨基只是重彈老調，咀嚼陳舊的東西，甚至害怕思索一下無產階級專政底新任務。

可敬愛的考茨基，請問如果農民經營小生產的工具不夠，而無產階級國家幫助他們得到機器來集體地耕種土地，難道這也是「理論上的說服」麼？

現在來講土地國有問題。我國的民粹派，一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在內，否認我們所施行的辦法是土地國有。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還留在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底範圍之內，那末土地私有個底廢除，就是土地國有。「社會化」這個名詞不過是表示轉到社會主義的趨向，願望與準備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土地國有，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考茨基在這裏也甚至不能提出理論的問題，或者更壞地故意逃避這個問題，雖然從俄國的出版物中顯然可以看出，考茨基很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老早就有關於土地國有、土地市有（將大地產交給地方自治機關）與分配土地的爭論。

考茨基斷定說，將大地產交給國家，再把這些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地少的農民，就會實現「一些社會主義的成份」，這簡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揶揄。我們已

經說過，這裏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這裏也沒有澈底完成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考茨基信任了孟什維克，這真是他的大不幸。由此發生了這樣的笑話：考茨基贊成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意見，又責備波爾什維克不該妄想走到社會主義去，但同時他自己却假借社會主義的名義提出自由主義的改良，而不使這種改良貫徹到完全肅清土地私有制上一切中世紀制度的殘餘！考茨基正像他的顧問們孟什維克一樣，不去擁護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却來擁護懼怕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

究其實，爲什麼祇把大地產收歸國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呢？因爲用這樣的辦法，自由資產階級就能保持最多的舊東西（這是革命中最不澈底的路綫），並且最容易回復到舊制度去。急進資產階級，即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口號，就是土地國有。

老早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寫了一本論土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傑作的考茨基，

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底話。土地國有是最澈底的資產階級口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同洛貝爾圖的論戰以及他在剩餘價值論一書中的精彩說明，在該書內馬克思特別明顯地指出了土地國有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意思上的革命意義。

考茨基所如此不恰當地挑選爲自己願問的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曾否認俄國農民會贊成一切土地（農民的土地在內）國有。普、馬斯洛夫底這種觀點，在相當程度內是同他的『新奇』理論（不論是重複那些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底話），即否認絕對地租，而承認『地力遞減律』（或這一『事實』，如普、馬斯洛夫所說的），有聯帶關係的。

實際上早在一九一五年革命中已經表現出了，俄國的大多數農民，不論他們是村社社員，或是單獨農戶，都贊成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一九一七年革命證實了這一點，而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之後，就把這一點實現了。始終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波爾什維克，並沒有企圖（恰與考茨基憑空責備我們的話相反）『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波爾什維克首先幫助了農民中最急進，最革命和最接近

於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家，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施行實際上就是土地國有的辦法。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第一天起，俄國土地私有制即被廢除了。

這樣就造成了從發展資本主義看來是最完善的基礎（考茨基若不背棄馬克思學說，當然不能否認這一點），同時也造成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是最靈活的土地制度。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來說，俄國的革命農民已經走到了盡頭；從這種觀點看來，再沒有比土地國有，土地平均使用制『更完善的東西』，從這種觀點看來，要實行比這『更完善的』辦法，是決不可能的了。正是波爾什維克，只有波爾什維克，只是因為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才幫助農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而且只是因為這樣，波爾什維克才儘可能促進和加速了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

由此可見，考茨基的讀者提供了多麼糊塗的思想，他責備波爾什維克不了解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而自己却表現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不談土地國有，反而

把最少革命意義的（就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作為含有「一些社會主義成份」的東西！

這裏我們要說到我們在上面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了：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怎樣估計到了進而實行耕土地的必要。考茨基在這裏又玩弄了一套切近欺詐的手法：他祇引證了一個流傳什維克所寫的論過渡到集體耕種土地任務的『提綱』！我們的『理論家』摘引了這個『提綱』內的一條之後，就洋洋得意地叫道：

『可惜得很，祇把人所共知東西宣佈為任務，任務並不因此得以解決。在俄國，集體農業，現在還祇會是一紙空文。無論在什麼地方，小農從來沒有在理論說服的影響之下過渡到集體的生產。』（五〇頁）。』

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來沒有像考茨基自甘墮落所幹出的這種文字上的欺騙行為。他祇摘引『提綱』，而對於蘇維埃政權底法令則默而不言。他說到『理論上的說服』，而對於握有工廠和商品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則緘口不語！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所著土地問題一書上關於無產階級國家擁有使小農漸漸

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工具這一切意見，在一九一八年時被叛徒考茨基完全遺忘了。

當然，由國家維持的幾百個農業公社和蘇維埃農莊（即由國家出資由工人共耕社經營的大農莊），是很不夠的。但考茨基之迴避這種事實，能够配稱爲『批評』麼？

在俄國，已由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的土地國有，儘可能地保證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甚至就是在反革命勝利使土地國有退到分配土地的情形下（關於這一點，我在論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馬克思主義者土地綱領一文內已特別分析過）也是如此。此外，土地國有使無產階級國家有了最大可能在農業中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總結：考茨基在理論方面真是一塌糊塗，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在實踐方面，便是墮落到了向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獻媚的奴才立場。不待說，批評是很漂亮的！

考茨基關於工業的「經濟分析」，是以下面這段絕妙的議論開場的：

俄國有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在這基礎上，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呢？『如果社會主義就是由各工廠各礦山底工人把這些工廠礦山拿來當作自己的私產（直譯是佔爲己有），在每個工廠中單獨地經營生產，那末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設想。』（第五二頁）。考茨基又補充說：『正在今天，八月五日，當我寫這些話時，從莫斯科傳來了列寧在八月二日的一個演說詞，據說列寧在這演說中講過：『工人會牢牢地把工廠拿在自己手裏，農民則不會把土地交還地主的』。『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令，迄今以前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口令，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令。』（第五二至五三頁）。

我們完全摘引了這一段話。爲的要使從前尊敬過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理的）俄國工人，親自看見投降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叛徒所使用的伎倆。

祇要想想：八月五日，那時俄國已頒佈了關於工廠國有的很多法令，而且沒有一個工廠是被工人『佔爲己有的』，所有一切工廠，都已轉爲共和國所有，

而在這個八月五日，考茨基竟把我演說詞中的一句話用顯然的欺詐手段加以曲解，來誘導德國的讀者，似乎在俄國，工廠是交給個別工人的！考茨基這樣說了之後，就在好幾十字行內把工廠不能交給個別工人的話，三反四覆地咀嚼得津津有味！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僱用來捏造謠言污蔑工人革命的那般資產階級走狗所使用的慣伎。

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公社或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再四這樣說，最後還加上一句話：

『俄國現在也就是企圖走上這條道路』：現在！！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是指八月說的嗎？難道考茨基竟不能向他的史騰，阿克雪里羅得和其他俄國資產階級朋友們去定譯那怕是一個關於工廠的法令嗎？

：『究竟這種事情已進到了多遠，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對於我們是最有興趣的，但是這種工作現在還完全處

在昏暗朦朧的狀態中。法令是多極了』……（因此考茨基就忽視其中的內容，或把這些內容向他的讀者隱瞞起來）！『但關於這些法令實施的結果，尚無可靠消息。若沒有各方面詳盡可靠與迅速報告的統計，社會主義的生產便是小可能的。蘇維埃共和國至今還不能做出這樣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它在經濟方面活動的消息，本身極爲矛盾，而且無從考證。這也是專政與鎮壓民主制的結果之一。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第五三頁）。

看呵！歷史就是這樣寫的！從資本家與杜多夫派底『自由』出版物那裏，考茨基就會得到關於轉到工人手裏的工廠消息：這個超階級的『認真的學者』真是如何出色！有無數的事實證明工廠祇是轉歸共和國、管理工廠的是蘇維埃政權所設立而由職工會代表佔多數的機關，即『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這些事實，考茨基一件也不願意提起。他以『囊中人』底頑固態度，翻來覆去地祇說：把和平的民主 不要國內戰爭，不要專政——加上很好的統計（蘇維埃共和國已創立了統計局，並任用了俄國所有一切最出色的統計人員，但要立刻得到完善

的統計，當然做不到）拿給我看看吧。總而言之，考茨基所要求的，是不要革命、不要猛烈鬥爭、不要使用強力的革命。這正像要求在罷工時工人與僱主雙方都不要有狂熱的衝動一樣。試看這種「社會主義者」到底與庸俗的自由主義官僚有什麼區別！

考茨基根據這類「實際材料」，也就是說，帶着極端蔑視的態度有意避開很多事實，便得出「結論」說：

「很可懷疑，俄國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中所獲得的真正實際的勝利品，——而不是一紙法令，——是比它能從立憲會議那裏——同蘇維埃一樣，其中大多數也會是社會主義者，不過色彩不同一些——得到的東西要多一些」（第五八頁）。

這豈不是奇談妙論嗎？我們向考茨基底信徒們建議，把這段格言更廣泛地散佈到俄國工人中去吧，因為這是考茨基所提供出來作為人們估計其政治墮落的最好不過的材料了。工人同志們，聽啊，克倫斯基也曾是個「社會主義者」，不過

「色彩不同一些」罷了！歷史家考茨基專以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自造」的名稱與稱號爲滿足。至於證明在克倫斯基時代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曾擁護過帝國主義政策和資產階級搶劫行爲的事實，歷史家的考茨基則連聽也不願意聽；至於在立憲會議中正是這些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與資產階級專政的英雄們佔居多數的事實，考茨基則很客氣地緘默不言。而這還叫做「經濟分析」哩！最後還要舉一個「經濟分析」底模範例子：

：「蘇維埃共和國在其存在了九個月之後，不但不能推廣普遍的幸福，反而不得不去說明普遍貧困的原因」（第四一頁）。

這種議論，我們從立憲民主黨人那裏已經聽得够多了。俄國資產階級底一切走狗都這樣議論着，他們說：經過九個月之後，拿出普遍的幸福來吧，——即是說，在經過四年破壞不堪的戰爭之後，在外國資本從各方面幫助俄國資產階級底怠工與暴動的時候，拿出普遍幸福來吧。考茨基與反革命的資產者之間實際上沒有絲毫差別，連一點差別的影子都沒有了。用「社會主義」做招牌的甜言蜜

語，不過是重複俄國科爾尼洛夫派，杜托夫派與克拉斯諾夫派所毫不粉飾，毫無忌憚，爽爽直直說出來的話罷了。

上面這些話，是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寫的。當天夜裏從德國得到了關於已經開始的勝利的革命消息，說革命已開始在基爾和北方與沿海一帶其他各城市，那裏的政權已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隨後蔓延到柏林，那裏的政權也歸蘇維埃所掌握了。

因此，關於考茨基與無產階級革命這本小冊子的結論，也就沒有寫的必要的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附錄一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①

附錄二

王德威爾得論國家的新書

我只在讀了考茨基底這一著作之後，才看過王德威爾得著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一書（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巴黎）。自然而然地要把這兩本書作一比較。考茨基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思想領袖；王德威爾得既是社會主義國

見本卷第三一二至三二六頁。——譯者。

際局主席，也就是第二國際底正式代表。他們兩個都代表第二國際底完全破產，他們兩人都「精巧地」，以其老成練達的新聞記者手腕，用馬克思主義的辭句，來掩飾這種破產，掩飾自己本身的破產及其投降資產階級的事實。前者特別明顯地表露出德國機會主義中的標本特徵，即用呆笨的，抽象的，肆意贗造馬克思主義的手段，把馬克思主義中凡是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東西概行截去。後者是在拉丁族中，在相當程度內可以說：是在西歐（就是說：德國以西部份）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底標本人物；這種機會主義較為圓滑，少嫌呆笨，更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其所用的基本手段則與前者相同。

他們兩人都根本曲解了馬克思底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可是王德威爾得多說到第一個問題，而考茨基則多說到第二個問題。他們兩人都抹煞這兩個問題之間極端密切而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兩人都口頭上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的叛徒，都是用全力找出各種遁詞來避開革命。他們兩入底書中都絲毫沒有那種貫徹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切著作中的東西，沒有那種分別真正社

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揶揄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沒有說明革命任務與改良任務的區別，沒有說明革命策略與改良主義策略的區別，沒有說明無產階級在消滅僱傭奴隸制度或秩序中所應起的作用，與「各大強國」內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瓜分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之極小部份額外利潤和額外贖物中所起的作用這兩者間的差別。

現在講講王德威爾得底幾個最重要的議論，來證實上面的估計。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非常熱心地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他也如考茨基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中，除了資產階級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及區別革命者與改良主義者的東西以外，是什麼都援引的。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話，他說過不知多少，因為這一點已由實際活動引進到純粹的國會鬥爭範圍內去了。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經驗之後，說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擄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應當打碎這個機器，並認為定要把這一真理來補充那部份上已經陳舊了的產共黨宣言——對於這一切他都一字不提！王德威爾得，也如

考茨基一談（好像他們預先商量好了似的），他們所隱瞞不說的，恰恰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中最重要東西，恰恰就是區別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改良的東西。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談，他之所以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爲的是要拒絕這個專政。考茨基以粗笨的假造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王德威爾得所幹的勾當也是一樣，不過手段要巧妙一些。他在『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在這裏他『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我重說一遍：他把那些恰恰是最主要的地方，恰恰是關於打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地方通通丟掉了），就作出結論說：

「在社會主義者中間，人們通常都是這樣來想像社會革命：建立第二個巴黎公社，但這次定將獲得勝利，且不是在一個地方勝利，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個主要中心裏獲得勝利。

這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因爲目前已

經看得很明顯，在戰後時期，在許多國內，將有空前未聞的階級衝突和社會動盪。

不過，如果說巴黎公社失敗——更不用說俄國革命底困難了，——給了我們某些教訓，那末這些教訓恰恰就是：當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準備來利用那可能爲情勢所迫而落到自己手裏的政權以前，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第七三頁）。

關於問題實質的話，不過如此而已！

請看這就是第二國際底領袖和代表啊！在一九一二年，他們曾在巴塞爾宣言上簽過字，在該宣言上逕直講到正是後來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的那種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聯繫，他們直接威嚇說要實行這種革命。但當戰爭已經發生而革命形勢已經造成了的時候，他們這些考茨基輩與王德威爾得輩，便開始用遁詞來背棄革命了。據說：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只是一種並非不可思議的假設！這同考茨基關於蘇維埃在歐洲可能發生的作用的議論是完全一樣的。

殊不知任何一個有學識的自由派都是這樣議論的，這種自由派現在顯然都同意說：第二個巴黎公社『並非不可思議的』，蘇維埃將有很大的作用等等。無產階級革命家與自由派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既是理論家，就要從理論上分析巴黎公社與蘇維埃底新國家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於這個問題有過詳細的說明，而王德威爾却把這一切完全抹煞了。

馬克思主義者既是實行家和政治家，就應當說明，現在只有社會主義底叛徒，才會拒絕下列的任務：闡明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式的、蘇維埃式的、或假定還有什麼第三種形式的）之必然到來，解釋有準備這種革命之必要，在群眾中宣傳革命，駁斥反對革命的市儈偏見等等。

無論考茨基或王德威爾得都絕對不來進行這類的工作，正因為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是希圖在工人中間保持其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底聲譽的叛徒。

祇從理論上來提出這個問題吧。

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考茨基知道這個真理，承認這個真理，贊成這個真理。但是：但是他避開了最根本的問題：當無產階級奪得無產階級的國家時，它應當鎮壓哪一階級，爲什麼要鎮壓這一階級，用什麼手段去鎮壓它。

王德威爾得知道馬克思主義底這個基本原理，承認、贊成並引證這個原理（見他的書中第七二頁），但是：他對於鎮壓剝削者底反抗這個（在資本家先生們看來）是「不愜意的」問題，却一字不提！！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完全避開這個「不愜意的」問題。他們的叛徒立場也就在這裏。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是用折衷論來代替辯證法的巧手：什麼一方面，不能不認識。另一方面，應該承認。一方面，國家可以了解爲「民族底總和」（見李特列著的字典。好一個學者的著作！請看王德威爾得書中第八七頁），另一方面，國家可以了解爲「政府」（同書同頁）。王德威爾得抄襲這

個學者的庸俗論調，稱讀這種論調，把這種論調和馬克思底說話列在一起。

王德威爾得說：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二字與通常的用法不同。因為這個緣故，便有發生『誤解』的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國家，這並不是廣義的國家，不是當作管理機關，當作社會共同利益(Interests and *Graux de la soci t *)底代表。國家是政權，是威權的機關。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王德威爾得書中第七五至七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滅國家，只是就第二種意義的國家而言：「過於絕對的論斷，未免有不確切的危險。在建築於專屬一個階級統治之上的資本家國家，與以消滅階級爲目的的無產階級國家之間，有許多過渡的階段。」(第一五六頁)。

請看，這就是王德威爾得底『手法』，其與考茨基所用的手法，只有微小的差別，其實是一邱之貉。辯證法否認絕對真理，而闡明歷史上對立物底更迭與危

機底意義。折衷論者不願意「過於絕對的」論斷，爲的是要暗中貫徹其市儈庸人的希望：以「過渡的階段」去代替革命。

至於，在資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之間的過渡階段，恰恰就是那推倒資產階級、打碎和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所默而不言的。

至於資產階級專政應由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專政來代替，至於在革命底各「過渡階段」之後，跟着就是無產階級國家之逐漸消亡的各種「過渡階段」，——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所一概抹煞的。

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立場。

這也就是他們在理論上，哲學上，用折衷論和詭辯說去代替辯證法。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它由一個階級專政轉到另一個階級專政的「過渡」，與由無產階級民主國家轉到非國家（「國家底消亡」）的「過渡」這兩者分別得很清楚。考茨基輩和王德威爾得輩底折衷論與詭辯說，爲了迎合資產階級，抹煞階級

鬥爭中一切具體的與確切的東西，而把『過渡』底一般概念提在前列，來借此掩蔽（現今十分之九的正式社會民主黨人，都借此掩蔽）其背棄革命的行為！

王德威爾得在運用折衷論和詭辯說方面，要比考茨基巧妙些，精細些，因為他用『由狹義的國家轉到廣義的國家的過渡』這句話，可以避開任何一個革命問題，可以避開革命與改良之間的一切差別，甚至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差別。因為試問哪一個有學識的歐式資產者會『一般』否認這樣帶有『一般』意義的『過渡階段』呢？

王德威爾得寫道：

『我同意黑得底意見，不預先執行下列兩個條件，就不能把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社會化，這兩個條件就是：

（一）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方法，使現在的國家，即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變為孟格爾所說的勞動底人民國家。

（二）把威權機關的國家和管理機關的國家分開，或如聖西門所說的，

把對人的管理和對物的支配分開』（第八九頁）

王德威爾得把這段話加上了着重點來特別指出這些論點底重要意義。殊不知這是純粹折衷主義的糊塗觀念，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分離了的！殊不知所謂『勞動底人民國家』，不過是抄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派所誇耀，而為恩格斯所責斥為毫無意思的『自由的人民國家』。『勞動底人民國家』一語，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俄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所配稱的辭句，就是以非階級的概念去代替階級概念的辭句。王德威爾得把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奪得國家政權與『人民』國家放在一起，而沒有看到這是一團糟。從考茨基底『純粹民主制』中，也得出同樣的一團糟，得出忽視階級革命底任務，忽視無產階級階級專政底任務，忽視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國家）底任務等等同樣的市儈反革命立場。

其次，只有在國家澈底消亡的時候，對人的管理才會消逝無餘而讓位於對物的支配。王德威爾得拿這種比較遙遠的將來，去堵塞並蒙蔽這在明天就要實行的推倒資產階級的任務。

這種伎倆又是等於替自由資產階級效勞。自由派是同意談談在不要對人施行管理的時候，將會是怎樣的。他們又怎得不來談論這種無害的空想呢？但關於無產階級之因資產階級反抗剝奪所採取的鎮壓手段，那就只好禁口不語了。這恰巧合乎資產階級利益的要求。

『社會主義反對國家』。這是王德威爾得在恭維無產階級。恭維是不難的，任何一個『民主主義』政治家都是善於向自己的選民說恭維話。但在『恭維話』的掩蓋之下，却幹着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勾當。

王德威爾得詳細地轉述了阿斯特羅果斯基所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文明的、溫柔的、粉飾的外觀之下，該掩藏着多少欺騙、強暴、收買、造謠、說謊、壓制貧民等等的把戲。但是，王德威爾得並不從這裏做出應有的結論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鎮壓被剝削的勞動群眾，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也就要鎮壓資產階級，這一點他絲毫沒有看出。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對於這一點都是瞎子。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小資產階級叛徒們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而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則

要求他們避開這個問題，隱瞞這個問題，或直接否認這種鎮壓的必要。

市僧折衷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詭辯論反對辯證法，庸俗改良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王德威爾得底書所應有的標題。

寫於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

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一至四一二頁

奪得了與記載了的東西

在革命中，只有無產階級群眾奪得了的東西才是牢固的。只有真正牢固奪得了的東西才值得記載下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這不僅是俄羅斯人，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群眾奪得了的勝利品底記載，而且是德國的，奧國的，匈牙利的，芬蘭的，瑞士的，——換句話說，是國際的無產階級群眾所奪得了的勝利品底記載。

正因為如此，所以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成立是牢不可破的事業。

僅在四個月前，還不能說，蘇維埃政權，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是國際的勝利品。在蘇維埃政權中，本來有一些東西，而且是很重要的東西，是不僅屬於俄國的，而且是屬於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可是，在未經事實檢查以前，還不能說，世界革命之繼續發展會引起何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底深刻程度和重要性如何。

德國革命作了這樣一種檢查。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步着最落後國家之一的後塵，在很短的期間內，在不過百餘日的時間內，向全世界表明了，不僅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相同的，不僅革命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而且無產階級的新民主制底基本形式也是相同的：即蘇維埃。

除此以外，在英國，在這個戰勝國，在這個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在這個以「社會和平」聞名最久的國家，在這個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都看見有蘇維埃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群眾鬥爭底蘇維埃新形式“Shop Stewards Committee”，即工廠代表委員會之廣泛強大，沸騰而不可阻遏的增長現象。

在美國，在這個最富強最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羣衆對蘇維埃表示莫大的同情。

堅冰開始融解了。

蘇維埃在全世界獲得了勝利。

蘇維埃獲得了勝利，首先而且最多是指在奪得無產階級羣衆對自己的同情這一方面。這是最主要的。不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採用何種殘暴手段，不管對波爾什維克採用何種壓迫和屠殺手段，都是不能把這個勝利品從羣衆手上奪去的。而且『民主派』資產階級愈加兇殘，則這種勝利品在無產階級羣衆底心靈中，情緒中，意識中以及在他們進行鬥爭的英勇決心方面，就會愈加牢固。

堅冰開始融解了。

於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創立了第三國際的共產黨人國際代表會議，也就這樣容易，這樣順利，這樣安穩而堅決地進行着自己的工作。

我們所記載了的，都是已經奪得了的東西。我們寫到了紙上的，都是在羣衆

意識中已經鞏固了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並且各人根據本國的經驗都看見了，覺得了，觸到了：新的無產階級運動已在沸騰起來，其強度與深度是世界上所空前未有的，這個運動不替任何陳腐框子所能拘限，也決不是那些慣要小政治把戲的名角，那些英美『民主』資本主義代表人，具有全世界政治經驗的老奸巨猾如路易·喬治和威爾遜之輩，那些久經水火厚顏無恥的亨德孫、倫諾德爾與布蘭亭之流，以及一切其他社會沙文主義的英雄們所能加以遏阻的。

這個新運動正走向於無產階級專政，雖然有着各種動搖，雖然迭遭嚴重失敗，雖然發生空前未有和無可形容的『俄國式的』混亂（如果按其外表來看），但它正以千百萬無產者底洪流之沖毀沿途一切障礙的雄力，向着蘇維埃政權邁進。

我們已把這記載下來了。在我們的決議案中，提綱中，報告中和演說中，都把已經奪得的東西反映出來了。

被全世界革命工人之豐富嶄新經驗底萬丈光芒所照耀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幫助了我們瞭解當前事變底全部規律性。它會幫助那些爲剷除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而奮鬥的全世界無產者去更加明白瞭解到自己鬥爭底目的，更堅決地按照已經規定的道路前進，更可靠地，更牢固地取得勝利和鞏固勝利。

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這就是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底前階，就是共產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底前階。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五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五至二六頁

在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

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鼓掌）。同志們，根據我們和布哈林同志商定的分工報告辦法，我負責來說明委員會對於許多具體而最引起爭論或使黨現時最爲關心的諸條文的觀點。

我首先把布哈林同志在自己報告末尾說到我們委員會內部發生爭論的一些條款，作一簡單說明。第一，這就是綱領總論部分結構底性質。我覺得布哈林同志在這裏把委員會大多數爲什麼絕不同意在黨綱內勾去所有關於舊資本主義條文的

理由，敘述得不完全正確。照布哈林同志的說法，有時令人覺得，似乎委員會大多數害怕人們非難這點，害怕人們責備委員會大多數不夠尊敬往事。毫無疑義，這樣來敘述委員會大多數人的立場，那末這種立場就很可笑了。但這與事實遠遠不相符合。委員會大多數之所以否決這種企圖，是因為這種企圖不正確，因為這種企圖不適合於實際情況。不帶資本主義主要基礎的純粹帝國主義從來也沒有過，現在沒有，將來也是不會有的。把財政資本主義描寫為似乎沒有絲毫舊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是關於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財政資本主義所得出的不正確的總和。

這是不正確的。特別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時代，是不正確的。以前恩格斯在一篇論到未來戰爭的文章中就已寫過，他說，未來戰爭比之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將要破壞得更加殘暴得多，人類將要大大退化，人工造成的工商業機構將要遭到破產。戰爭開始時，社會主義叛徒和機會主義者曾誇揚資本主義底生命力，而把我們稱為『幻想家或半無政府主義者』來加以嘲笑。他們

說：『看呵，這種預言並沒有實現。事變證明，這僅僅對於很少幾個國家並且是在很短時期內才是正確的！』那知現在，不僅在俄國，不僅在德國，並且在各戰勝國中也開始了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破壞，其表現往往是取消着這類人工造成的機構，恢復舊的資本主義。

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說可以來試試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破壞情景作一完整的描寫，那時我們反駁過他，在這裏我也要來駁斥他的這種意見，說：你去試試看，你也就會知道這是不會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曾作過一次這樣的嘗試，結果他也只好自行放棄。我絕對相信，假如有人能作到這點，那末布哈林同志便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因為他對這個問題研究得非常多，又研究得非常詳細。我敢斷言，這樣的嘗試決不會成功，因為這裏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我們俄國此刻正經歷着帝國主義戰爭結果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情景。同時在俄國許多彼此較前更加隔絕的省區內，我們往往遭逢着資本主義底復活及資本主義最初階段的發展。要想跳出這種狀況是不行的。若照布哈林的心願來寫成黨綱，那末這樣

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這樣的黨綱至多也不過是把關於財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最好的描寫重述一篇，但決不是現實的描寫，因為在我們現實中，恰巧沒有這種完整性。由性質不同的部分所構成的黨綱，是不漂亮的，（但這當然不重要），可是另一樣的黨綱，簡直會是不正確的。不管這種龐雜性，不管這種由不同材料所組成的結構是如何不快樂，如何不夠整齊，但我們在很長時期內還是跳不出這種狀況。當我們跳出了這種狀況的時候，我們就會製定出另一個黨綱。可是那時我們已經是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了。而硬說在那時也會像現在一樣，那就太可笑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資本主義底許多最原始的基本現象都復活了的時候。就拿運輸業的破產情形來說吧，這是我們切身所極感痛苦的事，這是在其他國家，甚至連戰勝國裏都有的現象。而在帝國主義制度下，運輸業破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等於退回商品生產底最原始形式上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究竟什麼是投機小販。這個名詞外國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至於現在呢？你們去和

出席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談談吧。你們就會知道，原來在德國，在瑞士也有與此相似的名詞發生着。這個名詞是決不能歸進到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範疇中去的，而一定要把它歸返到最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最低級的商品生產時期中去。

用製定漂亮完整黨綱的辦法來跳出這個可悲的現實，就無異跳上九霄雲外，無異製定不正確的黨綱。決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客氣暗示的那樣，由於尊敬往事，才迫使我們不得不把舊黨綱中的一些條文插進這裏來。結論就是：一九〇三年在列寧參加下所寫的黨綱，無疑義地是不好的黨綱，但因老年人最愛回憶過去，所以爲了尊敬往事，他們也就在新時代製定的新黨綱中重復着舊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這樣的傻子本可以拿來譏笑一頓。我敢斷言，並不是這樣一回事。一九〇三年所描寫的那個資本主義，到現今一九一九年時在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中，恰巧由於帝國主義底瓦解，由於帝國主義底破產而繼續存在着。例如，這樣的資本主義在離莫斯科並不很遠的薩馬拉省和維亞得卡省內都可以找到。當內戰把國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時候，我們決不會很快就能脫出這種投機小販

現象。因此把黨綱構成另一樣式，便不正確。黨綱上應當說到真實的情形，黨綱內所包括的應當是絕對不容置辯，事實確鑿的東西，只有這樣的黨綱，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綱。

布哈林同志在理論上完全瞭解這點，他說，黨綱應該具體。但瞭解是一回事，實行却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同志底具體性是對財政資本主義的書本上的敘述。而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看見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在每個農業省區內，我們都看見自由競爭與壟斷工業同時並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在許多部門中，不與自由競爭同時並存的壟斷資本主義，從來未曾有過，而且也決不會有的。寫出這樣的制度，就是寫出脫離實際生活的不正確的制度。既然馬克思說，手工工場制是普遍小生產底上層建築物、那末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主義便是舊資本主義底上層建築物。把這個上層一破壞，就會暴露出舊資本主義來。認為有不包含舊資本主義的完整帝國主義，這種觀點便是把願望當作現實。

這是容易犯到的一種很自然的錯誤。假如在我們面前真的存在有把資本主義

完全改造了的完整帝國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會輕易千百萬倍了。這就會構成這樣一種制度，那時一切都只會唯一服從於財政資本主義。那時就只須把上層拆除，而把其餘一切交給無產階級就行了。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這是現實中所沒有的。按照現實發展的情形，必須完全作另一種看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物。當帝國主義崩潰着時，便發生上層物的破壞和根基的暴露。所以如果能使我們的黨綱成爲正確的黨綱，就應在黨綱中寫出真情實況。存在有舊的資本主義，它在許多部門中成長到了帝國主義。它的趨向只是帝國主義的。對於各種根本問題只能從存在有帝國主義的這點來觀察。沒有一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可以不根據因存在此種趨向這點來解決的。此刻黨綱上所說的不是這一點。在現實中存在有舊資本主義莫大的基地。存在有帝國主義上層建築物，這上層建築物引起了戰爭，而從這戰爭中產生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始基。要想跳出這個階段是辦不到的。這一事實也就表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的本身，並且在許多年中仍然會是事實的。

西歐革命也許會經過得順利一些，可是爲了改造全世界，爲了改造大多數國家，畢竟還需要很多很多年。而這就是說，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過渡時期中，也無法跳出這種龐雜紛繁的現實。儘管這個由各種不同部分組成的現實是如何不漂亮，但要一棄了之是決不行的。用另一種方式製成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黨綱。

我們說，我們走到了專政。這是很瞭然的。可是應當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了的。舊的事物千頭萬緒地拖住我們，纏住我們，不讓我們前進一步，或者迫使我們前進得壞，正像我們現時的情形一樣。所以我們說，爲了使人瞭解我們究竟落到了什麼情況中，就必須說出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引我們來的，是原始商品經濟形式的資本主義。必須認清這一切，因爲只有綱計現實，我們才能解決例如對中農態度這樣的問題。的確，試問在純粹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怎樣能有中農的呢？須知甚至在普通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沒有過中農哩。如果我們唯一站在有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這觀點上來

解決我們對這個幾乎是中世紀現象（即對中農）態度的問題，那我們便絕對不能自圓其說，並且還會碰很多釘子。如果我們要改變對中農的態度，——那就請在理論部分費心說說，中農是從何處產生的，以及什麼是中農。中農是小商品生產者。這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初步常識，而必須直接說出的，因為我們終究還沒有了解這初步常識。如果藐視這一點，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財政資本主義，為什麼還要來研究這種初步常識！』——那麼這種態度就極不莊重了。

至於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我也要這樣說。布哈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把願望當作現實。他說，承認民族自決權是不可以的。民族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一起。我們，無產者，竟要來承認某一可鄙的資產階級底自決權！這真豈有此理！不對，請原諒，這是真情實理。如果勾去這一條，結果你那裏就只會是幻想。你所藉口的，是民族內部發生的分化過程，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可是我們且來看看這分化的經過情形怎樣吧。

例如德國是模範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它在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

性方面會超過美國。它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都比美國低些，可是在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在把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方面，曾高於美國。看來這可稱為模範。但其實那裏的情形又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與資產階級分化了呢？沒有！僅僅有關於幾個大城市的消息，說那裏多數的工人反對謝德曼派。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由斯巴達克團與德國那些可惡至極的孟什維克式的獨立黨人結成聯盟才達到的，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糟成一團，想使蘇維埃制度和所謂立憲會議結合起來！你看，這就是在這個德國發生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先進的國家哩！

布哈林同志說：『我們幹麼要民族自決權？』我應當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夏季提議取消最低限度綱領而只留下最高限度綱領時我所駁斥過他的話，拿來重復一遍。我當時回答他說：『不要在上戰場以前來吹，要下了戰場以後來吹吧』。我們首先要奪得政權，再稍微等等，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做的。果然，我們奪得了政權，也稍微等了一些時候，現在我同意來這樣做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全走進了

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已經打退了威脅我們的第一次逼攻，現在這樣來做是適宜的了。關於民族自決權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說：『我只願意承認各勞動階級底自決權』。這就是說，你所願意承認的，是除俄國以外，實際上在任何一國都還沒有達到的東西。這是很可笑的。

請看芬蘭的情形吧：芬蘭是民主國家，是比我們發達一些，文明一些的國家。那裏正在發生無產階級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進展情形是很特殊的，是比在我國困苦得多。芬蘭人受過了德國專政的壓迫，現在又受着協約國專政的壓迫，由於我們承認民族自決權，而使那裏的分化過程容易進展一些了。我當時在斯莫爾雷必須把正式文書交給那個起過創子手作用的芬蘭資產階級代表斯潤胡德。意譯就是『豬頭』的這番情景，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很客氣地握了我的手，我們互相說了一些恭維話。這是多變不好呵！但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因為當時這資產階級欺騙人民，欺騙勞動群眾，藉口說是大莫斯科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撲滅芬蘭人。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

昨天我們對於巴什基爾共和國不也是必須這樣做的嗎？當布哈林同志說：「對於某些民族是可以承認這種權利的」，我也就記下來了，在他所說的這張名單中，包括有霍屯督人，布西門人，印度人。當我聽到他所例舉的這張名單時，我就想到：布哈林同志怎麼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記了巴什基爾民族呢？布西門人在俄國境內是沒有的，說到霍屯督人，我也沒有聽見過說他們冀望成立自治共和國，但是在我國有巴什基爾人，基爾吉茲人及其他許多民族，這些民族的自決權，我們是不能拒絕承認的。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居住在舊俄帝國內的民族都不能拒絕這點。就假令巴什基爾人在我們幫助下會推翻他們底剝削者，但這只是在革命已經完全成熟了的地方才能做到。並且要做得很謹慎，以免我們的干涉阻礙着我們所應當促進的無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試問我們對於那些至今還處在阿洪影響之下的基爾吉茲人、薩爾特人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俄國，居民有過與牧師周旋的長期經驗，所以前者才幫助我們把這些牧師趕掉。但你們知道，新婚姻法至今還執行得很壞。我們是否可以走到這些薩爾特人跟前，向他們說：

『我們要打倒你們的剝削者』？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們還是完全服從自己的阿洪。這裏必須等待這一民族的發展，等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成份分化開來，而這種發展過程是必不可免的。

布哈林同志却不願意等待。他急不可耐地說：『爲什麼要等待？既然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我們還要這樣做呢？』這是帶鼓舞性的號召，並含有對我們道路的指示，但如果我們在黨綱中宣佈這樣一點，結果便會不是黨綱，而是一張宣言了。我們可以宣佈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宣佈完全鄙視那些值得加以千百次鄙視的資產階級，可是在黨綱中應當絕對確切地寫出真情實況。只有這樣，我們的黨綱才會是無可爭辯的黨綱。我們是站在嚴格的階級觀點上。我們在黨綱裏所寫的東西，也就是承認在我們寫過一般民族自決權的時代以後所實際發生了的事情。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共和國。當這類共和國已經出現之後，也祇有按它們的實現程度，我們才能寫出像我們寫在這裏的此種條文：『按蘇維埃式樣組織起來的聯邦國家』。蘇維埃式樣

並不就是如在俄國已經存在着的蘇維埃，但是蘇維埃式樣已在成爲國際性的式樣。我們所能說到的，僅僅到這裏爲止。再往前去，那怕是再多進一步，再進一寸一分，就已是正確的了，所以在黨綱裏也就不能這樣規定。

我們說：必須顧及到這個民族是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的哪一個階段。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切民族都有權自決，不值得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門人特別提出來說。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至少十分之九，也許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適合於這種論斷，因爲所有一切國家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道路上。這是必經的道路。再說多一點便不行了，因爲再多說，便會是不正確，便會是不合乎實際情形。勾去民族自決字樣而寫上勞動者自決字樣，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爲這樣的提法便是不顧及各民族內部的分化經過着如何困難，如何曲折的道路。在德國，這種分化的進展情形是與俄國不同的；在某些方面進展的快些，而在另一些方面則進展得慢些，並且還是經過流血的道路。在我

國，如像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的這種怪誕思想，是任何一個政黨也沒有接受過的。然而我們還須與這些民族比隣而居，現在謝德曼派已經在說我們想佔領德國。這當然是很可笑的無稽之談。但是資產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發行有千百萬份的報章雜誌，向全世界大聲宣傳這一點，而威爾遜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擁護這一點。他們說，波爾什維克擁有很大的軍隊，想用佔領的手段來在德國培植波爾什維主義。德國的優秀人物——斯巴達克團員——告訴我們，人們挑撥德國工人反對共產黨員說：你們看，波爾什維克那裏的情形是多麼壞啊！而我們現在也不能說我們這裏的情況是很好的。於是在德國，他們就用這種理由去影響羣衆說，在德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就會是造成與俄國一樣的混亂狀態。我們的混亂狀態是我們綿延不癒的疾病。我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必得來克服極大的困難。當德國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雖是一部份工人，還受着那種說「波爾什維克想用強力手段建立自己制度」的騙語威嚇時，「勞動者自決」的公式是不會使現狀好轉的。我們應當做到，使德國社會主義叛徒們無法來說波爾什維克強制人

家接受他們的萬有制度，似乎這種制度可以由紅軍的刺刀帶到柏林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自決的原則，那人家就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

我們的黨綱不應當說勞動者自決，因為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的黨綱應當說現有的實在情形。既然各個民族還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中不同的階段上，那末我們黨綱中所寫的這個原則便是絕對正確的。我國在這條道路上有過許許多多迂迴曲折。每個民族都應當獲得自決權，這也就會促進勞動者底自決。在芬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是進展得非常顯明，強而有力，並且是很深刻的。那裏的全部過程定會與我國有過的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說不承認什麼芬蘭民族，而只承認勞動群眾，這就是空洞至極的廢話。不承認實在情形是不行的：這種實在情形會強迫你承認它的。在不同的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離是各自走着特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的動作應當極端謹慎。尤其是對於各國不同的民族要特別謹慎，因為對民族懷着不信任的心理，是最壞不過的事情。在波蘭，無產階級正在進行自

決。以下便是華沙工人代表蘇維埃成份最終的數字：波蘭社會主義叛徒三百三十人，共產黨員二百九十七人。這就表明，照我們的革命年歷看來，那裏很快就到『十月』了。這已經是一九一七年的八月或九月。但是第一，還沒有頒佈過法令，要所有一切國家都遵行波爾什維克的革命日曆，就即令頒佈了這樣的法令，也是不會執行的。第二，現在的情形，乃是比我國工人先進，文化程度較高的波蘭大多數工人，都持着社會護國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觀點。必須等待一下。這裏決不能說什麼勞動羣衆自決。我們應當宣傳這種分化。這點我們已經在作，但毫無疑義，現在決不能不承認波蘭民族自決。這是十分顯然的。波蘭無產階級運動是與我國無產階級運動走的同樣的道路，即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前進，可是前進的方式却與俄國的不同。而在那裏，人們用下面的話來恐嚇工人：向來壓迫波蘭人的大莫斯科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在共產主義名稱掩蓋之下把他們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移植到波蘭來。共產主義是不能用強力手段來移植的。有一個優秀的波蘭共產黨員同志聽見我向他說：『你們要用另一個樣式做去』，他便回答我說：

『不，我們要同樣的來做，不過要比你們做得好一些』。對於這種說法，我絕對無法反駁。應當讓他們有可能實現這個謙虛的願望：把蘇維埃政權建立得比我們的好一些。不能不顧及到那裏所走的道路帶有特殊性，決不能說：『打倒民族自決權！我們只讓勞動羣衆有權自決』。這種自決過程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現時除俄國以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自決，必須預先見到其他各國發展的種種階段，決不要從莫斯科發出任何指令。所以這個提議在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根據我們擬定的計劃，我來說到我應當說明的以下各點。我把小私有者和中農問題提在第一位。關於這一點在黨綱第四十七條上說：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有計劃地逐漸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的任务是要使中農和富農分離，用仔細關心中農需要的辦法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同時用從思想上影響的手段，決不是用高壓手段去和他們的落後性作鬥爭，凡是觸犯到他們生活利益的地方，都必須力求同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上要向他們讓

步」。

我覺得我們這裏所構成的語句是社會主義創始人對中農問題也說過多次的話。這個條文的缺點只是不够具體。在黨綱內，我們未必能寫得更具體一些。但是在代表大會上必須提出的，不僅屬於黨綱的問題。關於中農問題，我們也應當加倍地，再三加倍地注意。恰巧此刻我們得到消息，說在已開始氾濫於俄國諸農業區的暴動中，顯見有一個總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是與原已決定在三月間舉行總進攻並組織多處暴動的白黨底軍事計劃，顯然有着聯繫。代表大會主席團擬定有一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不久會報告給你們聽的。這些暴動再明顯不過地向我們表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份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曾在布良斯克組織暴動——充當白黨的直接奸細。白黨的總進攻，農村暴動，斷絕鐵路交通：難道這樣還不能把波爾什維克推翻麼？這裏，中農所起的作用特別重要，特別生命攸關。在代表大會上，我們不僅應當強調我們對中農的讓步態度，而且要想出許多可以直接給中農某些利益的更具體的辦法。這是爲了自衛起見，爲了反對我們的

一切敵人起見所迫切要求的辦法，這些敵人知道中農是動搖於我們與他們之間，而極力企圖引誘中農離開我們。就我們的現狀看來，我們擁有巨大的後備力量。我們知道，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發展着，並且發展得很快。這些革命會給我們以無產階級後備力量，會減輕我們的困難而大大鞏固我國無產階級的基地，這種基地此刻在我們這裏原是薄弱的。這是在最近幾月內發生的事變，可是我們不知道這事變究竟會在哪一天發生。你們知道，現在進到了非常緊張的關頭，所以現在中農的問題也就獲得了極大的實踐意義。

往下我想說到合作社問題，——這就是我們黨綱第四十八條。這條黨綱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陳舊了。當我們在委員會裏起草這條黨綱時，我國只存在有合作社，可是還沒有消費公社，但幾天之後便通過了把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合併為統一的消費公社的命令。我不知道這個命令會否公佈，在這裏出席的大多數人是否已見過這個命令。如果沒有公佈的話，那末，這命令明天或後天定會公佈的。這條黨綱在這一方面是已經陳舊了，但是我覺得這條黨綱仍然需要，因為我們大家都

知道，從頒佈命令到執行命令，其中的距離是相當遠的。關於合作社的事情，從一九一八年四月起我們就已費盡心力來料理，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但這還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成就。把居民聯合在合作社裏的事業，有時我們達到了這樣大的範圍，就是在許多縣份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農村居民已經聯合起來了。但這些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就已存在了的合作社，澈頭澈尾地浸透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精神，而領導這些合作社的，又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資產階級專家。我們還無法使這些合作社服從我們，在這方面，我們的任務仍是沒有解決的。我們的法令，在建立消費公社的意義上說，是前進了一步，命令中指出，全俄所有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都必須合併起來。但是這個命令，即令我們把它完全執行，也還是會把工人合作社保留為將來消費公社中自主的部份，因為熟悉底細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們證明說，工人合作社這較為發展的組織，應當保存起來，因為它的活動是客觀上所必須的。我們黨內關於合作社問題有過不少的紛歧和爭論，合作社裏的波爾什維克工人與蘇維埃裏的波爾什維克工人之間，發生過

磨擦。我想在原則上，這個問題無疑是應當按這樣的意思來解決：既然這種組織是資本主義在群眾中準備起來了的唯一組織，是在還處於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農村羣衆中從事活動的唯一組織，所以這個組織無論如何都應當保存和發展起來，最低限度也不應該拋棄它。在這裏，任務是很困難的，因爲充當合作社領袖的人，大半都是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往往還是真正的白黨份子。由此也就發生了對他們的仇恨心理，正當的仇恨心理，由此也就發生了反對他們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當然應該進行得很巧妙：要斬斷合作社工作人員中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可是這不應成爲是同合作社組織作鬥爭。一面排除這些反革命的活動份子，同時應當使合作社組織本身都服從我們。在這裏的任務也是與對待資產階級專門家的態度一樣，後者已是我所指出的另一個問題了。

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磨擦和意見上的分歧。日前我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作報告時，寫來問我的問題中有幾個是關於薪資定額的問題。有人問我：難道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裏，薪資可以達三千盧布之多麼？實際上我們在黨

網裏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在這一點上發生的不滿已經是很厲害的了。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在軍隊裏，在工業裏，在合作社裏都發生着，到處都發生着。這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只有利用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來把共產主義變成爲大眾所容易接近的東西時，才能建成共產主義。想用別一種方法來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不行的。而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建成共產主義，就必須把機關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就要吸收所有這些專門家來參加工作。我們在黨綱中故意把這個問題發揮得很詳細，以便用急進方法來解決它。我們明白知道，俄國文化落後是什麼意思，這種落後性對蘇維埃政權發生怎樣壞的影響；蘇維埃政權雖在原則上給予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對全世界作出了這種民主制的模範，可是這種文化落後性却玷辱蘇維埃政權並復活着官僚制。蘇維埃機關在口頭上是全體勞動羣衆都能接近的，而在實際上却遠不是他們全體所能接近，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根本不是法律妨礙了這一點，如像**在資產階級時代那樣；恰恰相反，法律並促進這點。但是這裏單有法律還不够。**

必須有廣大的教育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而這需要長期的巨大工作，決不是法律所能迅速作成的。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問題在本屆代表大會上應當有極肯定的解決。這樣的決議就會使那些無疑義是在傾心諦聽這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有可能憑藉代表大會的威信來進行工作，並親眼看見我們遇到了怎樣的困難。這樣的決議會幫助那些隨時隨刻都碰到這個問題的同志們至少是來參加這方面宣傳工作。

到莫斯科來出席代表大會的斯巴達克團的代表同志們告訴我們說，在德國西部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即斯巴達克團在工人中影響最大的區域，雖然斯巴達克團在那裏還沒有獲得勝利，可是在許多極大企業裏的工程師和經理們到斯巴達克團員那裏來說：『我們跟你們一塊走』。我們這裏沒有過這樣的情形。顯然那裏由於工人的文化水準高些，技術人員更無產階級化些，也許還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便造成了這種與我國情形多少不同的關係。

無論如何，這裏正是我們繼續前進中的主要阻碍之一。我們應當立刻，不等

待其他國家的援助，馬上提高生產力。要做到這點，沒有資產階級專門家參加是不行的。應該這樣肯定不移地說。當然，這些專門家中大多數人都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必須由工人政治委員們和共產黨支部造成同志合作的氣氛，來包圍他們，要使他們無法脫去，但同時應當讓他們有可能獲得比在資本主義下更好的工作條件，因為不如此，則這個由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階層就不會替我們工作。想用強迫手段使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行的，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可以迫使他們不去積極參加反革命陰謀，可以恐嚇他們，使他們害怕伸手去拾起白黨的宣言。在這一方面，我們波爾什維克是動作得很積極的。這是可以作到的事情，這也是我們作得很充分的事情。我們大家都學會了這樣作。但是，要用這樣手段來強迫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批人慣於文化工作，他們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推進過文化工作，就是說，使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無產階級所分受的份量却渺小得不足道了，——但是他們總算推進了文化，這也就是他們的職業。當他們看見工人階級中湧現出有組織的先進階層，這

些階層不但重視文化，而且在群衆中幫助推行文化工作，那時他們就會改變對我們的態度，當醫生看見無產階級喚起勞動群衆自動來進行防疫事宜時，他就會用完全另一樣態度來對待我們了。在我國這種由資產階級的醫生，工程師，農業技師，合作社手所組成的階層是很廣大的，當他們在實踐上看見無產階級吸引愈益增多的廣大群衆參加這種事業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僅在政治上斬斷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而已。那時我們的任務就會容易些了。那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的被吸收到我們機關中來，而成爲它的組成部份。爲了這點，必須作相當犧牲。爲了這點，那怕付去二十萬萬盧布都是渺小不足道的。害怕這種犧牲便是幼稚氣，因爲這就是不懂得擺在我們面前的那些任務。

運輸業解體，工業和農業解體就破壞着蘇維埃共和國的整個生存。這裏我們應當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使全國所有一切力量都極度緊張起來。對專門家，我們不應當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門家不是剝削者的傭僕，而是文化工作者，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曾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全世界社會主義者都說，這些人在

無產階級社會裏是會向我們服務的。在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應當盡可能給他們較好的生活條件。這將是頂好的政策，這將是最合理的經營辦法。否則我們節省了幾萬萬盧布，却可能喪失甚至幾千萬萬盧布所不能恢復的東西。

當我們和勞動人民委員施米特同志討論薪資定額問題時，他舉出了以下的事實。他說，我們在平衡工資水準方面作了很多工作，這種工作是何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作過，並且是它們在今後幾十年中所不能作到的。例如戰前的薪資定額：粗工每天一個盧布，每月二十五盧布，而專門家的薪資每月是五百盧布，更不待說那些領得幾十萬盧布薪資的人了。專門家領的薪資比工人多過二十倍。我們現在的薪資定額，是從六百盧布起到三千盧布止，高低相差只到五倍。關於平衡工資一層我們作過很多的事。不錯，我們現在是對專門家付給了高的薪資，但爲了受到教益才付給他們多餘的薪資，這不僅值得，而且是應當的，在理論上是必須的。我以爲這個問題在黨綱上規訂得充分詳細。必須加倍着重指出這個問題。在這裏，不僅要在原則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要使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回到各

地去時，在向自己組織作報告和在各人的全部活動中，都能把這一點加以實現。

我們已經在動搖不定的知識份子中獲得了巨大的轉變。如果我們昨天說過使小資產階級政黨合法化，而今天却逮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末，在這種擺動中我們是執行着完全肯定的路線。這種擺動裏貫徹有一條最堅決的路線，就是斬斷反革命活動，以及利用資產階級文化機關。孟什維克是社會主義的最兇惡的敵人，因為他們披上了一層無產階級的外皮，但實際上是個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在這個階層中只有極少數上層份子是无產階級出身，而這個階層本身却是由小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這個階層已在趨向於我們。我們要把這個階層都爭取過來。每當他們趨向於我們時，我們都說：『請你們來吧』。每一次這樣的擺動，都有這個階層中的一部份人走到我們這方來。孟什維克和新生活派⁷⁰的情形會是這樣，社會革命黨人的情形也會是這樣，所有這些動搖份子的情形，也將是這樣，這些份子還會在很長時期內，東搖西擺，垂頭喪氣，從一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對於他們這些人是無法可想的。但是我們會從這一切擺動中得到文化知識份

子階層來參加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隊伍，而摒除那些繼續擁護白黨的份子。

按照分工報告辦法我所要說明的下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官僚主義以及吸引廣大群衆參加蘇維埃工作的問題。老早以前就聽見過對官僚主義的怨聲，這種怨聲無疑是有根據的。我們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作到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作到的事情，那種激頭激尾都是官僚主義的和帶資產階級壓迫性的機關，甚至在最自由資產階級共和國中都仍舊是這種性質的機關，已經被我們連根帶蒂剷除了。單就法庭來說吧。自然在這裏的任務是比較輕易一些，在這裏會不須建立新的機關，因為根據勞動階級的革命法權意識來裁判，這是誰都會作的事情。我們在這方面還遠沒有把一切貫徹到底，可是在許多方面，我們已把法庭照應有的那樣建成起來了。我們建立了這樣的機關，它們能夠吸收每一個人，不僅男子，而且婦女，即最落後和最不靈便的份子，人人都來參加。

在另一些管理部門中的職員，是更加守舊的官僚。在這裏，任務是要困難些。沒有這種機關便行不通，所有一切管理部門都需有這種機關。在這裏，我

們正受着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在德國，大概這種痛苦要輕微一些，因為德國的官僚機關經過了很大的考驗，官僚們在那裏絞盡腦汁，可是那裏也強迫他們工作，而不像在我國辦公室的那些人，專門坐在安樂椅上安閑度日。我們已經把這種舊官僚主義份子趕走掉，檢舉過，然後又開始委派他們担任新的職務。沙皇時代的官僚漸漸轉入蘇維埃機關，實行官僚主義，裝扮為共產主義者，並且爲了鑽營障遷起見，設法取得俄國共產黨的黨證。所以剛剛把他們趕出大門之後，他們又從窗戶裏鑽進來了！這裏主要是由於文化工作人材不夠。這些官僚本來可以驅散，但是決不能一下子把他們改造過來。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就是組織任務，文化任務和教育任務。

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澈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不僅不可能，並且法律本身也妨礙這樣作去。那怕在最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儘管那裏底民主制如何發展，還是有無數法律上的障礙，阻礙着勞動群衆去參加管理工作。我們已經澈底掃除了這些

障礙，可是我們至今還沒有達到使勞動羣衆能够參加管理工作的地步，——因爲除了法律之外，還有文化水準，而這你是不能使之服從任何法律的。這種低度的文化水準遂使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經過勞動羣衆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在實際上，却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爲勞動羣衆而實行管理的機關，但不是經過勞動羣衆本身來從事管理。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只有用長期教育工作才能解決。目前這個任務對於我們是困難到了極點，我已屢次指出過，這是因爲担任管理的工人幹部還異常缺乏。我們應當獲得後援。照各種情形看來，國內的這種後備力量正在增長着。莫大的求知慾望以及往往是由校外學習辦法所達到的莫大教育成績，亦即勞動羣衆在教育方面所獲得的巨大成績，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種成績雖非任何學校範圍所能包括，但它確是非常巨大。一切標誌都表明在最近將來就可獲得巨大的後備力量，來代替很感缺乏的無產階級幹部中那些勞累過度的人們。然而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官僚已被打敗了。剝削者已被剷

除了。但是文化水準還沒有提高，所以官僚們又佔據了舊有的位置。要把他們排擠出去，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比迄今以前更大規模地組織起來，同時真正實行吸引工人來參加管理的種種辦法才能作到。這些辦法，你們在每個人民委員部方面都很知道，我也就不來詳細說明了。

我必須講到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剝奪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的憲法承認無產階級比農民佔有優越地位，承認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西歐方面的純粹民主主義者攻擊我們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我們回答過他們，而且現在還回答他們說，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忘記了他們那裏所說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我們却已進到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在吸收工人和貧苦農民參加國家管理這點上，蘇維埃共和國過去幾個月來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一個國家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做到的。這是絕對的真理。誰也不會否認：我們對於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民主制，對於吸收工農參加管理方面所已經做了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國在幾百年內所未曾做到，而且也是它們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決

定了蘇維埃的意義，正由於這一點，蘇維埃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口號。

但是這絲毫也不能使我們擺脫因為羣衆文化程度不够所碰到的困難。關於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絲毫也不是從絕對的觀點來出發，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隨時隨地都還要鎮壓資產階級，但可以不必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這在理論上是完全允許的。這是理論上完全可以想像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就不把我們的憲法提作其他國家的模範。我們只是說，誰認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無須鎮壓資產階級，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鎮壓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必要的，但剝奪它的選舉權與平等權却不是必要的了。我們不願意給資產階級以自由，我們不承認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可是我們在黨綱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認爲也如工人與農民不平等這類的辦法一樣，就根本不是憲法上所必須載定的。憲法是在這些辦法業已實現以後，才把它們明文規定下來。蘇維埃的憲法甚至不是波爾什維克擬訂的，而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波爾什維克革命以前就擬訂出來，實則是反對他們自己的。他們是按照實際生活所擬訂的那樣來擬訂這憲法。無產階級

組織的發展比農民組織的發展快得多，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而給了工人實際上的優越地位。往後的任務就是要從這種優越地位逐漸過渡到工農間的平等地位。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以後，誰也沒有把資產階級趕出蘇維埃去。是資產階級自己遠遠離開了蘇維埃。

關於資產階級選舉權問題，情形就是這樣。我們的任務，便是要把問題提得十分明顯。我們絲毫也不會說我們的行動不對，但要完全確切地列舉出真正的事實。我們的憲法，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曾不得已才把這種不平等加入進去，因為文化水準低，因為我們的組織弱。可是我們並不把這點看成是理想，恰恰相反，按照黨綱，我們黨定要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來消滅這種在較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不平等，一到我們提高了文化水準，我們就要把這種不平等現象消除掉的。那時我們就可以不要這種限制了。這種限制就在革命勝利後不過十七個月的現時，其實踐意義已經是很微小的了。

同志們，這就是我認為在討論黨綱時所必須說到以供大家今後討論的主要幾

點。(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代表大會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三一至一四七頁

在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長時鼓掌）。同志們，我要向你們道歉，我沒有可能參加本代表大會所選出的農村工作副委員會的一切會議。所以從開始就參加了該副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們底發言，會來補充我的報告。副委員會終於擬定了提綱，並交給了委員會，這個提綱，以後還會向你們報告的。我祇想來說說這問題底一般意義，這個問題在副委員會工作結束後怎樣提到了我們面前，以及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現在怎樣提

到全黨面前的情形。

同志們，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每一階段上，我們必須把社會生活中某種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提到首要地位，這是完全自然的。革命總是觸動，而且不能不觸動最深刻的基礎和最廣泛的民衆，所以在革命時期，任何一個黨，任何一個甚至最接近羣衆的政府，也絕對不能一下子就顧及到生活各方面，這也是很自然的。我們此刻要來討論關於農村工作問題，並在這問題中特別注意到中農狀況的問題，這從無產階級革命一般發展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什麼奇怪失常的地方。當然，無產階級革命會必須從解決兩個敵對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開始。其基本任務就是要使政權轉入工人階級手中，保證工人階級專政的實現，推翻資產階級，並剝奪資產階級政權底那種經濟策源地，即無條件是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障礙的經濟策源地。我們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都深信這樣一個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這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的原因，能起着決定作用的，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現在我們却看見有許多

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在孟什維克營壘中——斷言說，似乎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決鬥期間可能有一般民主制底統治。百般應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孟什維克就是這樣說着。好像並不是資產階級依據切身利益來自行建立或取消民主制一樣！既然如此，那末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就根本談不上什麼一般民主制。所令我們驚訝的，只是這類馬克思主義者或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我們的孟什維克，如何迅速地揭穿自己，如何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面目。

馬克思一牛鬥爭得最多的，就是反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幻想。馬克思對於自由平等的空話譏笑得最爲厲害，這些空話所掩護着的，是工人餓死的自由，或出賣勞動力者與那好像是在自由市場上自由而平權地購買工人勞動等等的資產者之間的平等。馬克思在其所有一切經濟著作中，都闡明了這點。可以說，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全書專係闡明這一真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設人，

領導者，推動者，無產階級則是這個社會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夠代替它的力量。在馬克思底任何一部著作中，沒有一章不是闡明這個問題的。可以說，參加第二國際的全世界各國社會黨人都曾千番百次在工人面前賭咒發誓，說他們了解這個真理。但是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已進到爭奪政權的真正決鬥的時候，我們却看見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全世界老社會黨的領袖都忘記了這個真理，而來純粹機械地重複着什麼一般民主制的庸俗詞句。

在我國，有人企圖使這些話表現得似乎更爲『有力』，而說什麼『民主派專政』。這就簡直是荒謬無稽之談了。我們從歷史上明明知道，民主資產階級底專政不過是對起義工人所實行的鎮壓而已。從一八四八年起就是這樣，無論如何也不遲些，但是個別的例子在這時以前也就可以找到。歷史告訴我們，正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才廣泛而自由地開展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之最尖銳的鬥爭。在實際經驗中，我們也見到了這個真理底正確。如果說，蘇維埃政府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所採取的一切步驟，都特別表現出在各種根本問題上的堅定性，這正是

因爲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真理，從來也沒有忘記過這個真理。只有一個階級底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問題。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戰勝資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群眾來反對資產階級。

但從此決不應得出結論說，當資產階級已被推翻，政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裏，而在往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似乎我們也可以不要中間份子參加；這種說法是極端錯誤的。

自然，在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時期，這革命活動家們底全部注意力都要放在解決主要的基本的問題上，就是放在解決無產階級底統治以及用戰勝資產階級來保證這個統治，——保證資產階級不能復辟的問題上。我們明明知道，資產階級至今還佔有這樣的優勢，即它在其他國家內還保存有自己的財富，或者，有時甚至在它國內它還握有巨量的金錢。我們很好地知道，還有許多比無產階級更有經驗的社會成份幫助着資產階級。我們又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沒有拋棄復

辟的念頭，沒有停止恢復自己統治的企圖。

但是遠還不僅如此。資產階級所最重視的原則是：『哪裏好，那裏就是祖國』。從金錢意義上說來始終是國際主義的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此刻還是比我們強些。資產階級底統治是在迅速毀壞着，它看見有如匈牙利革命這樣的例子，關於匈牙利革命我們昨天已很榮幸的通知了你們，今天又得到證實這點的消息，它已經開始懂得它的統治是在動搖中。它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但是此刻如果估計到全世界範圍內的物質資料，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在物質方面，現在還是比我們強些。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實際活動，本來是而且不能不是放在解決這個基本問題上：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根除資產階級復辟的任何可能。這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必須的，而且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成效地作了許多事情。

現在就應當把關於其他階層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應當把有關中農的全

部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我們大家在農村工作副委員會中所得出的結論，而且我們相信全黨工作人員都會同意這一點的，因為我們不過是把他們觀察所得的經驗作了一個總結而已。

當然，也許會有人不去思考我國革命進程如何，不去思考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什麼，反而利用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每一步驟來加以譏笑，來進行所謂批評，正如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老爺們所幹的那樣。這些人至今沒有了解，他們終久應當在我們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我們對於這些人表示了多番容忍態度，甚至是寬大態度，我們再一次地讓他們能來感受我們的這種寬大態度，但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要改變這種容忍和寬大態度了，而如果他們再不選定自己的立場，那我們就要絕對嚴重地向他們提議，叫他們到高爾察克那裏去。（鼓掌）。我們並不期望這批人會表現出什麼特別輝煌的本事。（笑聲）。但是可以期望，這批人親身嘗到高爾察克底殘暴滋味之後，一定會懂得，我們有權要求他們在我們與高爾察克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如果在十月革命

後的頭幾月中，有許多很幼稚的人抱着這類蠢想，以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偶然現象，那末現在甚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應當懂得，這乃是在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逼攻下所進行的鬥爭中合乎規律的現象。

實際上只樹立有兩種力量：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誰讀了馬克思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誰讀了所有一切偉大社會主義者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那他從來也不會是社會主義者。絲毫也不懂得社會主義，只不過是自己冒稱為社會主義者罷了。對於這些人，我們給他們一個短促的考慮期限，要求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人，是因為他們現在說，或者將來會說：「波爾什維克提出了中農問題，就是想向他們頻送秋波」。我知道得很清楚，這類論據和更壞的論據在孟什維克刊物中是散佈得很廣的。我們不去理會這些論據，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把我們敵人的空談胡說看作有什麼意義。這些至今擅長於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跑來跑去的人們，是可以隨便信口開河的。而我們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條道路。

決定我們道路的，首先是對階級力量的估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經常發展着。當這個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前，我們就要把加倍的注意力，集中到將這個鬥爭進行到底。這個鬥爭現在還沒有結束。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成就。現在國際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之發生，便是最好不過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我們在鄉村中的建設事業，顯然已超出了那一切都服從於爲政權而鬥爭的這基本要求範圍之外。

這一建設事業經歷過兩個主要階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同全體農民一塊去奪取政權。這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爲當時鄉村中的階級鬥爭還沒有開展起來。我已經說過，鄉村中的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直到一九一八年夏季才開始。假使我們不曾善於發動這個革命，那我們的工作便是不完全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城市中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管理制。第二個階段是在鄉村中分出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成份，使之與城市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在鄉村中進行反對資產階

級的鬥爭——這點對一切社會主義者說來，都是主要的，不承認這點，則社會主義者便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了。這個階段基本上也已經完結了。我們最初為這個目的而建立的組織，即貧農委員會，已經非常鞏固，以致我們已有可能用正當選舉出的蘇維埃來代替它們，就是說，把鄉村蘇維埃加以改組，使其成為階級統治的機關，成爲在鄉村中無產階級政權底機關。不久以前中央執委會所通過的，而且當然是大家週知的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以及關於轉到社會主義農業的過渡辦法的法令，從我國無產階級革命觀點上來說，乃是對過去階段所做的一個總結。

成爲無產階級革命之首要基本任務的主要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正是因爲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現時工程上便提出了更複雜的任務：對中農的關係。誰以爲提出這個任務，就好像是削弱我們政權的性質，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就好像是改變我們基本的政策，那怕是部份的改變，那怕是稍微的改變，——誰這樣想，誰就是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的任務，共產主義革命的任務。我相信，在我們黨內不會有這樣的人。我只是想警告同志們一聲，要提防那些在工人政黨外

可以找到的這一種人，他們之所以會這樣說，並不因爲這是從什麼世界觀裏產生出來的意見，而祇不過是爲了損害我們的事業和幫助白匪，簡言之，就是想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中農始終是動搖的，他們不能不動搖，而且還會在很長時期內動搖不定的。這種人爲了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便會說：『看吧，他們向你們頻送秋波了！可見他們重視了你們的暴動，可見他們動搖起來了』等等等等。必須使我們所有一切同志在思想上都武裝起來反對這種煽動。我相信，我們現在若能從階級鬥爭觀點提出這個問題，那我們的同志才能在思想上武裝起來。

很顯然的，這個基本問題乃是更加複雜而又同樣迫切的任務，即怎樣確定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態度？同志們，這個問題，從理論上看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困難問題，因爲這種理論已爲極大多數工人所領會。你們總還記得，例如，在考茨基著的論土地問題一書中，那時他還是正確敘述馬克思學說並爲大眾公認爲土地問題上負有絕對權威的人，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點，他說道：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就是要中立農民，即是使農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

鬥爭中守中立，使農民不能去積極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我們。

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很長時期內，農民總是擁護資產階級政權，總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祇要注意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及其統治底政治手段，那麼，這種原因是很清楚的。我們不能指望中農立刻會站到我們方面來。但是我們若能執行正確政策，經過一個時期，這種動搖就會停止，農民也就會站到我們這方面來。

恩格斯當與馬克思共同奠定科學馬克思主義基礎，亦即我黨所經常作為南針，特別是在革命時期作為南針的學說時，就已確定了農民的分類，他把農民分為小農，中農和大農，這種分類直到現在對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恩格斯說：『或許甚至對大農也不是到處都定要用強力鎮壓』。至於說到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用強力來對待中農（小農是我們的朋友），這點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設想過。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即他逝世前一年，當土地問題已擺在日程上時所說的話。這個觀點所表明的真理有時為人們所遺忘，可是這在理論上我們大家都是同意的。對於地主和資本公司，我們的任務就

是要完全剝奪他們。但是對待中農，我們則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力手段。甚至對待富農，我們也不能像對待資產階級這樣肯定不移地說：要絕對剝奪富農。在我們黨綱中已載明了這種區分。我們說：鎮壓富農底反抗，鎮壓富農底反革命陰謀，這還不是完全剝奪富農。

我們對待資產階級和對待中農的基本區別，就是完全剝奪資產階級，而與不剝奪他人的中農聯盟，這個基本路線在理論上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對這一路線並不貫徹遵守，有些地方機關並沒有學會遵守這個路線。當無產階級已推翻資產階級並鞏固了自己政權而從各方面從事建立新社會的時候，中農問題就提到了第一位。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否認建設共產主義的情形在大農國與小農國是互不相同的。這是最初步的起碼的真理。從這個真理中就得出結論說，我們愈接近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我們的注意力在某種範圍內也就會正是集中到中農問題上。

有許多事情都取決於我們如何確定對中農的態度。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已經

解決了的。可是我們有過很好的經驗，我們根據自身經驗知道在理論上解決問題與實際上執行決定這兩者間的區別。我們已緊緊接近到了足以作為法國大革命特徵的那種區別，那時法國國民公會宣佈了許多規模浩繁的設施，但却無應有的支柱來實現這些設施，它甚至不知道，爲了執行某種辦法，究竟應該依靠哪一個階級。

我們所處的條件是幸運得無比的。由於有了整整一世紀的歷史發展，我們知道我們要依靠哪一個階級。但我們同樣也知道，這個階級的實際經驗還非常非常不夠。對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說來，基本任務是很明顯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把政權交給工人。但是要怎樣來實現這一點呢？大家都記得，我們從工人監督工業進到工人管理工業時經過了何種困難，作過了多少錯誤。而這還是我們隨時接觸的，我們階級內部，即無產階級內部的工作咧。現在我們却要確定我們對新階級，對城市工人所不知道的那個階級的態度。我們必須確定對這個沒有一定鞏固地位的階級的態度，無產階級大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眾是反對社會

主義的，——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當我們進到對待中農這樣的階層時，就可見到這是一個動搖不定的階級。這個階級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它不剝削其他勞動份子。它會須在幾十年內，經受千辛萬苦來保持自己的生活地位，它親身嘗到地主和資本家剝削的苦況，它經受住了一切苦難，而同時它又是私有者。所以在我們對待這個動搖階級的態度中，有着莫大的困難，根據我們一年多來的經驗，根據我們半年多在鄉村中進行的無產階級工作，根據鄉村中已經發生的階級分化情形，我們在這裏首先要避免急性病，避免死板理論。避免強求把我們正在擬訂的東西，把我們還沒有擬訂的東西，當作是已經規訂好了的現成東西。在副委員會選出的委員會所向你們提出，並且以後還有個報告人會向你們宣讀的決議案中，你們就會看見對這一點已有充分的警告。

從經濟觀點上說來，我們顯然必須幫助中農。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我們實際的習慣中，在我們現有的文化水準下，在我們可以派到鄉村中去的

具有文化和技術知識的幹部不够的情形下，在我們對待鄉村工作常覺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我們的同志就常常使用強迫手段，因而損害着全部事業。就在昨天，有一個同志交給我一本由俄國共產黨（波）尼什哥羅得委員會印行的叫作尼什哥羅得省黨工作佈置指令的小冊子；我在這本小冊子裏，例如在第四一頁上，看見有以下的語句：『關於非常稅的法令應當把全部重担加到鄉村富農、投機者以及一般中農身上』。請看，這真算是人們如何『瞭解了』！或者這是一個印錯了的字，但這樣的錯字是決不容許的！或者這是由於工作慌忙，在這種事業上稍一慌忙，該是如何危險。或者這裏簡單是由於不瞭解，而這是最壞的推測，我很不願這樣來推測尼什哥羅得的同志。很有可能，這簡單是由於疏忽的原故。

有一個同志在委員會內敘述到實踐中常發生過的下列情形。有次，許多農民圍繞着這個同志，每個農民都向他問道：「請你斷定斷定，我是不是中農？我有兩匹馬和一條奶牛。我有兩條奶牛和一匹馬」，諸如此類等等。你們看，這被派往各縣的鼓動員必須有一隻準確的溫度表，以便放到每個農民身上去測量一下，

然後來斷定他究竟是不是中農。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知道每個農民經濟的全部歷史以及他對上層農民和下層農民的關係，而我們要確切知道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這裏需要有許多實踐才幹，要熟知地方情形。這種本領我們還沒有。承認這一點，根本沒有什麼慚愧；我們必須公開承認這點。我們從來都不是空想家，從來也沒有想像過：我們要用純粹共產主義社會中產生和教育出來的純粹共產主義者之純潔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這乃是童話。我們要用資本主義的殘磚碎瓦來建設共產主義，而且只有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那個階級才能做成這件事情。你們明白知道，無產階級並不是沒有沾染資本主義社會底缺欠和弱點的。它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同時也反對本身方面的缺點。無產階級優秀的先進的部份，既然幾十年內在城市中進行了拚命的鬥爭，也就得以在這個鬥爭中接受城市 and 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並且在相當程度內已經承受了這種文化。你們知道，甚至在各先進國中，鄉村都註定是黑暗無知的。當然，鄉村的文化會由我們提高起

來，但這是多年的事業。這就是我們同志往往忘記了的事情，這也就是據各地來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中特別明顯向我們表明的情形，他們不是此地的知識份子，也不是機關人員，這些人的話，我們聽得很多，——而是在實踐上觀察過鄉村工作的人。正是他們所說的話，在土地問題副委員會內對我們特別有價值。我相信現在整個黨代表大會上也會特別重視他們的話，因為這些話不是從書本上拿來，不是從法令中得來，而是從實際生活中學來的。

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們去研究如何儘量明顯地確定我們對中農的態度。這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為這種明顯性是實際生活中所沒有的。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要想立刻一下解決，那它是無法解決的。有人說：『本來用不着頒佈這樣多的法令』，並責備蘇維埃政府，說它只會起草法令，但不知道如何去執行這些法令。實際上這些人沒有覺察到，他們如何滾到白匪方面去。假使我們曾希望頒佈成百個法令就可以改變鄉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真會是十足的呆子了。但假使我們拒絕用法令來指明道路，那我們就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這些在實踐上不

能立刻完全執行的法令，本來也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以前我們是用一般的真理來作宣傳，現在我們却是用實際工作來作宣傳。這也是一種宣傳，但這是用行動作宣傳，不過不是某些暴發戶底單個行動，對於這種暴發戶，我們在無政府主義者和舊社會主義盛行的時代曾多番加以嘲笑過。我們的法令是一種號召，但不是按以前那種精神的號召：如『工人們，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啊！』。不是這樣的，而是對群眾的號召，號召他們去作實際的事情。法令，這是一種號召人們去做廣泛實際事業的指令。這是最主要之點。就讓這些法令中有許多是不中用的，有許多是實際生活中行不通的。可是在這些法令中有供實際事業採用的材料，而法令底任務也就是要教會那些聽從蘇維埃政權的千百萬人去進行實際步驟。這是在鄉村中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之實際行動的試驗。如果我們這樣看法，那末從所有一切法令、命令和決議中，就可以得到極多的益處。我們並不來把它們當作無論如何都要立刻一下執行的絕對的決議。

必須避免所有一切能在實踐上助長個別舞弊現象的事情。有些鑽營份子，野

心家，已在某些地方混入了我們的隊伍內，這種人自稱爲共產主義者來愚弄我們，他們之所以鑽進我們隊伍裏來，是因爲共產黨現在掌握政權，是因爲那些比較誠實的『公務人員』由於他們的思想落後，沒有來到我們這裏工作，而這班野心家却毫無思想，毫無良心，這種人只求陞遷拔擢，他們在各地實行強迫手段，並且以爲這是很好的辦法。在實際上這有時引起農民說：『蘇維埃政權萬歲，祇是打倒康姆尼！』（即共產主義）。這樣的事並不是誰捏造出來，而是由實際生活中，由各地同志報告中得來的實際情形。我們不應當忘記：任何的放肆，任何的急躁和慌忙，都會造成莫大的害處。

以前我們是必須無論如何都要用拚命跳躍的手段，來趕急跳出帝國主義戰爭，因爲這個戰爭把我們弄到破產了，必須拚命努力來擊潰資產階級，擊潰那些想來壓倒我們的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不這樣，我們當時便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如果對待中農也採取同樣方式來行動，那就是十足的愚痴，十足的魯鈍，十足地足以顛覆我們的事業，祇有挑撥離間份子才能自覺地這樣做。現在的任務應當

完全是另一樣的。現在的任務已不是打破那些顯然是剝削者的抵抗，戰勝他們，推翻他們，如像從前那樣。現在，我們既已解決了這個主要任務，於是在日程上就提出更複雜的任務了。這裏採用強力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西歐方面，雖然那裏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和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雖然該處本來最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哪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主張過用強力手段對待中農。

我們在奪取政權時，曾經依靠了全體農民。那時全體農民只抱有同一個任務，就是與地主作鬥爭。但是直到現在農民中還保存有反對大農莊的成見。農民想到：『如果有了大農莊，那我又要當僱農』。當然這是錯誤的。但農民對大農莊的這種觀念，是由於他們仇恨和回想以前地主怎樣壓迫人民的事實。這種心理還存在着，這種心理還沒消除。

我們所應首先倚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可以拆去，而把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都保留起來。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禱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康姆尼』是最好的東西。當然如果在鄉村裏出現了急忙從事的人，他們從城市裏飛跑來，一度閒談，鬧了幾次知識份子的意氣，有時甚至非知識份子的意氣，然後吵鬧一頓，就走掉了，這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這是常有的情形。這班人不但不會引起敬意，反而會引起譏笑，而這種譏笑乃是完全合理的。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承認，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但應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以便奪得農民的信任。際此以前，我們還是農民的學生，而不是農民的教師。誰對農業及其特點一竅不通，跑到鄉村中去，只是因為聽說公營農莊有

益，因為疲於城市生活才想到鄉村去工作，而自認為在各方面都是農民的教師，那他就是再蠢笨不過的了。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再愚昧不過的了。

這裏的任務不是剝奪中農，而是要顧及農民生活底特殊條件，要向農民學習過渡到優良組織的方法，決不可擅自發號施令！這就是我們為自己所定下的規章。（全場鼓掌）。這就是我們在決議草案中所力圖說明的規章，因為，同志們，我們在這一方面真正犯過不少的錯誤。承認這一點絲毫不慚愧。過去我們沒有經驗。我們同剝削者鬥爭的方法本身也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如果有時人們因我們採取這種方法而責難我們，那我們就說：「資本家老爺們，這是你們自己的罪過。假使你們不是這樣野蠻地，這樣狂妄地，這樣厚顏無恥拚死命地抵抗，假使你們沒有去和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那末，革命也就會採取比較和平的形式」。現在我們打退了各方面的瘋狂進攻之後，便可以轉到採用另一種方法了，因為我們不是二萬小組，而是領導千百萬人的政黨。千百萬人不能一下子就懂得方

針改變，所以原本是用來給予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頭上。這是毫不足怪。只是必須懂得，這是由於歷史條件所引起，這種歷史條件業已消失，而對於這個階級的新條件和新任務却要求有新的心理意識。

我們關於農民經濟的法令，基本上都正確的。我們沒有根據來拒絕或惋惜其中任何一個法令。但法令雖然是正確，但若用強力去強迫農民來接受，便是不正確的了。在任何一個法令中都沒有這樣說過。這些法令，作為指明出來的道路，作為進行實際設施的號召，是正確的。當我們說：『鼓勵建立組合吧』，這等於發出指令，這指令是應當經過多次試驗，以便找到實行這些指令的最終形式。既然說必須求得自願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這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是不好的事情。假使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末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起初需要證明這樣的組合真是好些，把人們組合起來時，要使他們是真正被組合起來，而不是一開而散，要證明這樣組合是有

利益的。農民是這樣提出問題，我們的法令也是這樣提出問題。如果我們以前還不善於這樣做，這並沒有絲毫可羞的地方，我們應當公開承認這一點。

我們已經解決了的，暫時還不過是一般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基本任務，即戰勝了資產階級。這個任務我們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雖然現在開始了最困難的半年，這時全世界帝國主義者都在最後努力想來壓倒我們。現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自己已經懂得了，過了這半年後，他們的事情便會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或者他們現在利用我們疲憊不堪的時機，來戰勝我們這個國家，或者我們將成爲不僅專就我國一國而言的勝利者。在這半年中，當糧食危機和運輸危機都加厲起來，而帝國主義列強又想從幾條戰綫上向我們進攻之際，我們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是最後的困難的半年。必須仍然緊張一切力量，去與侵襲我國的外部敵人作鬥爭。

但說到農村工作底任務時，不管一切困難，不管我們的全部經驗至今是用在直接鎮壓剝削者方面，我們都應當記得，都不要忘記在鄉村中對於中農的任

務乃是另一樣的。

在彼得城，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和莫斯科，所有到過鄉村裏的覺悟工人都向我們舉出若干例子，說有許多看來是無法解決的誤會，有許多看來是非常重大的衝突，可是一當有能幹的工人出來說話時，——這些工人所說的不是書本上的話，而是農民所懂得的話，不是像指揮官一樣擅自發號施令，（雖然他們不懂得農村生活），而是像同志一樣來解釋實際情形，來喚起農民們那種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情感，——一當這些工人發言以後，誤會和衝突就減弱下去，消除下去了。這種用同志態度去解釋問題所達到的結果，是成千累百儼然以指揮官或上司自居的人所不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現在向你們提出的全部決議案中所貫注的精神。

我在自己的簡短報告，是想說明這個決議底原則方面和這個決議底一般政治意義。我想證明，——並且我希望是得以証明了，——從整個革命利益的觀點說來，我們路線上沒有任何變動，沒有任何變更。白黨份子及其幫手們都在叫喊

這點，或者將會叫喊這點。讓他們去叫喊吧。我們是不得去理會他們的。我們用最徹底地發揚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從鎮壓資產階級的任務，移到安排中農生活的任務上去。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居。只有當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來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

農民需要有城市工業品的供給，沒有城市工業，農民是不能生存的，而城市工業是握在我們手裏。如果我們能正確地進行事業，那末農民就會感謝我們從城市裏給了他們這些產品，這類工具和這種文化。把這些東西帶給他們的，不是剝削者，不是地主，而是與他們一樣的勞動同志，他們會非常深刻地珍視這些同

志，然而而是從實踐觀點上來珍視，只珍愛這些同志底實際幫助，却拒絕發號施令和自上而下的『指令』，而這種拒絕是完全公道的。

首先實行幫助，然後去奪得信任吧。如果這件事情能正確地進行下去，如果在縣裏，區裏，在徵糧隊裏，在任何組織裏，我們每個工作團底每一步驟都做得正確，如果我們的每一步驟都會從這個觀點來仔細加以檢閱，那時我們定能奪得農民的信任，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繼續前進。現在我們應當給農民以幫助，給他們以忠告。這應當不是指揮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那時農民就會完全擁護我們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決議案的內容，據我看來，這也就應當成爲代表大會底決議。如果我們通過這個決議，如果這個決議將決定我們全黨組織的一切工作，那末我們就能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第二個偉大任務。

怎樣推翻資產階級，怎樣鎮壓資產階級，這是我們已經學會了的，這是我們所足以自豪的。怎樣調整與千百萬中農的關係，用什麼方法去奪得他們的信任，

這是我們還沒有學會的，這點我們應當公開說出。但是我們已經懂得了這個任務，我們已經提出了這個任務，並且帶着全部希望，全部智識和全部決心向自己說：這個任務我們定會完成，那時社會主義便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長時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波）第八次代表大會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五八至一七一頁

關於幫助東方戰線事致彼得格拉工人的信

告彼得格拉工人同志們

同志們！東方戰綫上的情況非常惡化了。高爾察克今天佔領了沃特根工廠，布古里瑪會遭失陷，顯見高爾察克還會繼續前進。

這危險是很可怕的。

我們今天在人民委員會裏正要通過幫助東方戰綫的一些緊急辦法，正在加強鼓動工作。

我們請彼得城工人，把一切都發動起來，動員一切力量去援助東方戰綫。

東方戰線上的兵士工人都將自籌給養並寄送糧食幫助自己家屬。而主要的是那裏在解決着革命的命運。

那裏若獲得了勝利，我們便可以結束戰爭，因為那時對白軍的外援再也沒有了。在南方，我們快獲得勝利。當南方沒有獲得完全勝利時是不能由那裏抽調兵力的。

所以大家都要幫助東方戰線！

蘇維埃和職工會應當緊張全力，發動一切，用各種方法去幫助東方戰綫。

同志們，我相信彼得城工人定會成爲全俄的表率。

謹致

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莫斯科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刊載於彼得格拉真理報第八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二三頁

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 有關東方戰綫情況的提綱

高爾察克在東方戰綫的勝利造成了對蘇維埃共和國非常嚴重的危險。必須最大限度地緊張一切力量來擊潰高爾察克。

所以中央委員會向全黨組織提議首先用一切力量去執行下列辦法，這些辦法應當由黨的組織，特別是由職工會來加以實現，以便吸引工人階級中更廣泛的階層來積極參加國防工作。

（一）從各方面幫助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所宣佈的動員。

黨和職工會的一切力量應立刻發動起來，以便在最近幾日內就能毫不遲延地對於人民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宣佈的動員令給與最積極的幫助。

必須立刻使被動員者看見職工會的積極參加，並感覺到工人階級方面對他們的援助。

特別應當使每個被動員者都明瞭，立刻派他們上前線去便會保證他們有較好的糧食供給：第一，因為兵士在臨近戰綫的產糧地帶有較好的糧食條件；第二，因為領受運來飢荒省區糧食的人數便減少了；第三，因為正在廣泛組織從臨近戰綫地區寄送糧食給故鄉紅軍家屬的工作。

中央委員會要求每個黨組織和每個職工會組織，每星期作一次那怕是最簡短的報告，報告他們對於幫助動員和幫助被動員者所已作的事情。

(二) 在臨近戰綫地區，特別是在窩爾加河流域，應當把全體職工會會員一律武裝起來，萬一武器不夠時，便動員他們個個來作各種幫助紅軍的工作，以及補充傷亡戰士等等。

在坡克洛夫斯克城，職工會自行決議立刻動員百分之五十的會員，這樣的舉動應當成爲我們的模範。兩都和各最大工業中心不應當落在坡克洛夫斯克之後。

各職工會應當到處用自己的人力和財力將自己會員檢查登記一次，凡是沒有絕對必要留在本地的人，概行派往前線上去，參加保護窩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邊區的鬥爭。

(三)特別在加強應被動員和已被動員者中以及紅軍兵士中的鼓動工作方面，應當加以最嚴重的注意。不要限於採用做報告開群眾大會等通常的鼓動方式，而要工人在紅軍兵士中分組地和單個地進行鼓動工作，把各兵營，各紅軍部隊和各工廠中的鼓動工作，分定給這些由普通工人和職工會會員所組成的鼓動組去担任。各職工會應當舉行檢查，務使每個會員都參加挨戶鼓動，散發傳單和進行個別談話等工作。

(四)所有一切男職員均由婦女代替。爲了這層，必須舉行一次黨的和職工會的新登記。

對於全體職工會會員和所有一切職員，都頒發一種特別證，記上每人親身參加的幫助紅軍的工作。

(五)經過職工會，工廠委員會，黨組織及合作社等等，立刻建立地方的和中央的幫助紅軍委員會或後援會。這些機關的地址應當公佈。要把這些機關的情形最廣泛地通知所有居民。應使每個被動員的人，每個紅軍兵士，每個願意出發到南方，到頓河，到烏克蘭去參加糧食工作的人，都知道從這個對每一工人，每一農民都易於接近的援助紅軍委員會或後援會中，他可以得到指示，得到忠告，他能容易和軍事機關發生聯繫等等。

應該特別責成這種委員會來担承幫助紅軍的供給事宜。如果我們能改善軍隊武器服裝等等的供給，那就可以大大擴張我們的軍隊。在居民中還有不少藏着的或沒有交給軍隊使用的武器。在工廠內還有不少為軍隊所必需的各種儲存品，必須迅速找到這些東西，並把它送往軍隊中去。主管軍隊供給事宜的軍事機關應當獲得居民方面之立刻、廣泛和積極的幫助。必須用全力來執行這個任務。

(六) 必須經過職工會去廣泛吸收非農業省區中的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參加紅軍隊伍，並編成糧食隊和辦糧軍在頓河及烏克蘭區一帶去行動。

這種工作是可以而且應當大大擴展起來，這種工作既可以幫助首都和非農業省區的飢民，同時又可以加強紅軍的力量。

(七) 在現時狀況下，我黨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採取的路綫是：凡屬自覺或不自覺地幫助高爾察克的人，都一律禁錮起來。我們在自己的勞動者共和國，決不能容忍那些不實際幫助我們進行反高爾察克鬥爭的人。但是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間，也有人願意作這種幫助。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鼓勵，應給他們以實際工作，主要是讓他們在後方在技術上幫助紅軍，同時要嚴格地檢查這一工作。

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體黨組織和所有職工會都要按革命精神來進行工作，決不要限於籠統呆板的陳舊辦法。

我們能够戰勝高爾察克。我們能够迅速並澈底地戰勝他，因為我們在南方的

勝利以及逐日好轉而有利於我們的國際狀況，能保證我們獲得最終勝利。

只要緊張一切力量，擴展革命毅力，就可以把高爾察克迅速擊潰。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是可以而且應當守住和奪回的。

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七十九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二四至二二六頁

謹防奸細！

消滅奸細！

白軍向彼得格拉的進攻，顯然證明在全部臨近戰線區域內，在每個大城市中，都有白黨所建立的廣大奸細組織，他們進行叛變活動，炸燬橋樑，在後方舉行暴動，暗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組織底優秀份子。

大家都應當站在各人的崗位上。

到處都要加倍提高警惕性，想出各種辦法，最嚴格地去偵查並捉拿一切暗探和白黨陰謀份子。

鐵路工人以及所有各部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特別必須嚴加防範。

所有覺悟的工農都應當挺身捍衛蘇維埃政權，都應當奮起與奸細和叛徒白黨作鬥爭。讓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崗位上，並與黨委員會，與肅反委員會，與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最可靠和最有經驗的同志們發生不斷的，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聯繫。

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內務人民委員捷爾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二十六期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封鎖俄國，把蘇維埃共和國看成爲傳染病的策源地，力圖將它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開來。這些誇耀自己國家制度『民主性』的人，這樣盲目地仇恨蘇維埃共和國，竟沒有覺察到他們自己落到如何可笑的地步。祇想想吧：這些先進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國家，擁有全副武裝，在軍事方面獨霸全世界，却像害怕烈火那樣，害怕從一個經濟破壞的，飢餓的，落後的，而據他們說甚至是半野蠻的國家所流行出的思想傳染病！

單是這一個矛盾，就能使全世界勞動群衆認清真象，並幫助我們揭破克勒孟

梭，路易、喬治，威爾遜等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府底虛偽行爲。

但幫助我們的，不僅有資本家仇恨蘇維埃的盲目病，而且有他們相互間的糾紛，這種糾紛，使他們互相掣肘。他們彼此間商定了一種十足的默然抵制陰謀，極端害怕傳播一般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真實消息，特別是害怕傳播它的正式文據。但是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刊物時報（《Le Temps》）却刊載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消息。

爲了這點，我們應向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報，法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底這位領袖表示極崇高的謝忱。我們很想寫一封公函向時報鳴謝，感謝它這樣恰當，這樣巧妙地幫助我們。

從時報根據我們無線電訊編成自己消息的方式中，就可顯然看出這個金囊機關報的動機何在。它想向威爾遜放出一支暗箭，刺他一下：看，你是在同什麼樣的人談判！這些遵循金囊意旨來舞文弄墨的聰明角色却沒有覺察到：他們想用叫喊波爾什維克來恐嚇威爾遜，這在勞動羣衆看來，是等於替波爾什維克作廣告宣

傳。再說一遍，我們應向法國百萬富翁們的機關報表示極崇高的謝忱！

第三國際成立時的國際環境，就是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如德國的謝德曼，奧國的倫勒爾這類資本主義奴僕們，頒佈何種禁令，玩弄何種卑鄙手腕，都不能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阻礙關於這個國際消息的傳播以及阻礙同情這個國際的心理的擴展。這種環境是到處顯然突飛猛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勞動群衆中間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蘇維埃運動已發展成爲真正的國際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對資本舉行革命進攻的工人國際組織底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底國際組織，當時這個運動，是向橫廣方向發展，以致革命水準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而終於使第二國際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當時，許多年來，特別是大戰時期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和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過程，已使許多國家中成立了共產

黨。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個國際底主要特點和它的使命，就是要執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底遺訓，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的理想；第三國際底這個主要特點馬上就因此表現出來，即這個新的，第三屆的「國際工人協會」現時在相當範圍內已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符合了。

第一國際奠定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基礎。

第二國際是準備某地好在許多國家中廣泛發展運動的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工作底成果，排除了它那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穢物，並且已經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上昇革命的運動，即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的諸政黨所組成的國際聯合，現在有了空前鞏固的基礎：就是已經有了在國際範圍內體現着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對資本主義勝利的幾個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全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

總結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發展經驗時所提出的最偉大口號，即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英明的預見，這個英明的理論，已經開始成爲現實了。

這個原來是拉丁語的名詞現在已經譯成現代歐洲各國語言，而且譯成了全世界各種語言。

全世界歷史底新時代開始了。

人類已在擺脫最後一種奴隸制：資本主義奴隸制或僱傭奴隸制。

人類擺脫這種奴隸制，就是破天荒第一次進到真正自由。

爲什麼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竟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呢？這種矛盾，一方面俄國是個落後國家，另一方面它又「飛躍」到了最高形式的民主制，即越過資產階級民主制而逕直進到了蘇維埃民主制或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這一矛盾，可以說正是使西歐人特別難於瞭解蘇維埃底作用，或瞭解得很緩慢的原因之一（除了大多數社會主義的領袖已爲機會主義積

習和庸俗偏見所束縛的事實而外)。

全世界工人群眾本能地領會到，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鬥爭底武器和無產階級國家底形式。但是爲機會主義所敗壞了的「領袖」們，至今還在繼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一般的「民主制」。

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首先就表明出俄國落後性和它超過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飛躍」兩者間的「矛盾」，這是否值得驚訝呢？假使歷史讓我們實現新式民主制而不經過許多矛盾，那才真是可驚訝的了。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對現代一般科學有認識的人，如果有人問他說：「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平衡地或諧和勻稱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那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過什麼平衡，什麼諧和，什麼勻稱。在每個國家中，都是時而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這一方面或這一特點或這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時而又是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別一方面，或別一特點，或別些特性發展得

特別突出。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實現其偉大資產階級革命，喚醒全歐趨向於歷史上的新生活時，資本主義比法國更發達得多的英國竟成了反革命同盟底首領。而當時的英國工人運動，却英明地預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裏的許多東西。

當英國發生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即憲章運動時，在歐陸國家中大都還只發生着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却已爆發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在每個國家中用各種不同手段把各國的無產階級隊伍分別擊破了。

英國，照恩格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一塊造成了最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上層份子的模範國家。從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意義上說來，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竟落後了幾十年。法國在工人階級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所舉行的兩次有全世界歷史重大意義的反資產階級的英勇起義中，好像是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用盡了。隨後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中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轉到

了德國，那時德國在經濟上比英法都落後。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德國在經濟上趕過了這兩國的時候，充當德國工人黨這一全世界模範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人，却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惡棍，賣身給資本家了的最卑鄙的混蛋，即由謝德曼和諾斯克起到達維德和列金止這些從工人出身而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資產階級効勞的最可惡的劊子手。

全世界歷史一往直前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所走的遠不是平坦、簡單、筆直的道路。

當考茨基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因主張與謝德曼統一，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蘇維埃無產階級民主制而變成爲馬克思主義叛徒的時候，曾在二十世紀最初時期寫過一篇斯拉夫人與革命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敘述了那些使國際革命運動領導權可能轉到斯拉夫人手裏的歷史條件。

果然如此。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了俄國人手裏，正如這個領導權在十九世紀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起初操在

英國人手裏，隨後操在法國人手裏，然後又操在德國人手裏一樣。

我已屢次說過：俄國與各先進國比較起來是易於開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但是繼續這個革命以及使它達到最終勝利，即完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那就要困難些。

我們之所以較爲容易開始，是因爲，第一，沙皇帝制在政治上非常（對於二十世紀的歐洲說）落後，致使群眾底革命攻擊力量非常巨大。第二，俄國的落後性使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地主的革命特殊地匯合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我們就是從此開始的，假使我們不是從此開始，那末我們當時便不會這樣容易地獲得勝利。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就已經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有與農民戰爭特殊配合起來的可能，波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五年初起，就堅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使工農羣衆先鋒隊認識西歐社會主義底『新發明』這一意義上，以及在群眾革命行動的意義上，都使工農羣衆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訓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

七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和十月無產階級革命都會是不可能的了。第四，俄國的地理條件使它在反對外部資本主義先進國底優勢力量時，能比其他國家支持得長久些。第五，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者去影響鄉村半無產者的貧苦勞動階層。第六，長期罷工鬥爭的教育和歐洲廣大工人運動的經驗，使蘇維埃這種特殊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形式，易於在迅速而深刻尖銳化的革命形勢下，產生出來。

以上所述，當然是不完備的；但暫時可以此爲限。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已在俄國產生出來了。它是巴黎公社之後所成就的第二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穩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這新式國家，是已經不會死亡的了。它現在已經不是孤立的了。

爲要繼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爲要把這種工作貫徹到底，需要努力的地方還非常之多。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比重和影響較大的國家裏所建立的蘇

維埃共和國，祇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那它們是有一切可能趕過俄國的。

已遭破產的第二國際現時正在死亡，而成了腐爛着的活屍。它實際上是替國際資產階級當奴僕。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它那最重要的思想領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稱爲一般的『民主制』，或者更愚笨地，更粗魯地，稱之爲『純粹民主制』。

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過時了，正如先前必須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內準備工人羣衆的時候，做過歷史上必要的有益工作的第二國際已經過時了一樣。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來都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資本鎮壓勞動者的機器，資本政權底武器，即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約許過政權屬於人民大多數，並宣告過這樣的政權，但因存在有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它從來也未能實現這種政權。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自由』，在實際上只是富人享受的自由。無產者和勞動農民本來能够而且應當運用這種自由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資本 戰勝資

階級民主制，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勞動群眾照例是不能實際享受民主的。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供羣衆，供勞動者，供工人和小農享受的民主。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這種是大多數人民底國家政權，這種在事實上，是大多數人民掌握的政權。

這個政權鎮壓剝削者及其幫手底『自由』，它剝奪他們實行剝削的『自由』，發飢荒財的『自由』，爲恢復資本政權而鬥爭的『自由』，勾結外國資產階級來反對本國工農的『自由』。

讓考茨基輩去辯護這樣的自由吧。這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叛徒，社會主義叛徒才能作出的事情。

第二國際底思想領袖，如像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產，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他們完全不能了解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底意義，不能了解這民主制與巴黎公社的關係，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必要性。

在『獨立』的（請讀作市僧庸俗小資產階級的）德社國會民主黨底機關刊物自由報（Die Freiheit,）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七十四期上，登載了一篇告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篇宣言是由該黨中央及其在『國民會議』，即德國『立憲會議』中的黨團全體簽了字的。

這篇宣言責備德皇帝國取消蘇維埃，而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配合起來，給予蘇維埃以相當的國家權利，讓它在憲法中佔個相當的位置。

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合併起來吧，調和起來吧！這該是多麼簡單啊！這該是多麼英明的庸人思想啊！

所可惜的，只是這種思想已經在俄國克倫斯基執政時期，由聯合起來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試驗過了。

誰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每個尖銳的關頭，在每

一次嚴重階級衝突發生時，都只能有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證明仲對於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或政治學說，都是一竅不通。

但是爲要把二月十一日發表的這篇美妙絕倫、滑稽至極的宣言內所充滿的經濟政治荒謬論調盡行揭露，就非把希法亭和考茨基一流人主張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和平結合起來的這種英明庸人思想，專門分析一下不可。這點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去說吧。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四六至二五二頁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同志們！我們從匈牙利蘇維埃活動家那裏得到的消息，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欣歡和鼓舞。匈牙利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不過兩個多月，但在組織性方面來說，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看來已經超過我們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匈牙利人民的一般文化水準較高；其次，產業工人在全體居民中的比重更是高得無比（在現時匈牙利八百萬人口中有三百萬是集中在布達佩斯城）；末了，在匈牙利，過渡到蘇維埃制度，即無產階級專政，曾比我國容易而和平得多。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歐洲大多數社會黨領袖，無論是社會沙文主義派或考

「基派的領袖，都已完全沉溺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幾十年來較爲『和平』發展所養成的純粹市僧偏見中，以致根本不懂得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若不把這些領袖從自己道路上排除出去，不把他們趕走，便不能完成自己已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解放使命。這班人全部地或一半地相信了資產階級關於蘇維埃政權所說的謊語，而不會辨別體現在蘇維埃政權中的新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供勞動者享受的民主制，即社會主義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之間本質上的區別，他們奴僕似的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純粹民主制』，或一般『民主制』。

這些沉醉於資產階級偏見的盲人們，不懂得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他們把俄國蘇維埃政權和俄國歷史底某些特點及其發展同蘇維埃政權底國際意義混爲一談。

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見光明。匈牙利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

渡形式完全與俄國的不同：資產階級政府自願辭職，工人階級底統一社會主義底統一，立刻就在共產主義綱領基礎上恢復起來。蘇維埃政權底實質現今表現得更加明顯了；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有蘇維埃政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是以無產階級爲首的勞動者所擁護的政權。

這個專政必須要採用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強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抵抗。誰沒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應當被取消其爲無產階級領袖或顧問的資格。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質並不僅限於採用強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採用強力。無產階級專政底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群衆底先進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爲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成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較爲長久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方面因爲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

方面因爲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第三方面因爲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所以馬克思也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整個過渡時期中，對這個改革實行反抗的，既有自覺實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知識份子中爲數衆多的走卒，又有往往是不自覺實行反抗的大批過份拘守小資產階級習慣傳統，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份子。這些階層中的動搖現象乃是不可避免的。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趨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趨向於資產階級，趨向於自由貿易，即退轉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

需要有不產階級專政，一個階級底政權，需要這個階級底組織性和紀律性，需要由它那憑靠資本主義文化、科學、技術上一切成果所建立的集中權力，需要由它那與任何勞動者心理相近的本性，需要由它在鄉村中或小生產中那些渙

散的，較不開通的，政治上較不穩定的勞動者面前的威信，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引導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階層前進。在這裏，空談什麼一般『民主制』，空談什麼『統一』或『勞動民主派底統一』，空談什麼一切『勞動者平權』等等等，即從事於那些市儈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最習慣的空談，是無濟於事的。空談只能蒙蔽一般人的耳目，蒙蔽一般人的意識，而鞏固那種因循拘守資本主義，國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陳腐頑固習氣。

消滅階級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事情，這個階級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並不會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會變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爲更加殘酷的。

無產階級應當進行階級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底抵抗，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因循守舊習氣和猶豫動搖天性，這樣來捍衛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組織影響，『中立』那些害怕離開資產階級而跟隨無產階級走又太不堅定的階層，鞏固新的

紀律，即勞動者底同志紀律，鞏固勞動者與無產階級間的堅實聯繫，使他們在無產階級周圍團結起來，用這種新的紀律，用這種新的社會聯繫基礎去代替中世紀的農奴制紀律，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飢餓紀律，『自由』僱傭奴隸制紀律。

爲要消滅階級，就需要有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即被壓迫階級中這樣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這個階級不僅能推翻剝削者，不僅能無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與全部資產階級民主觀，與任何妄說一般自由平等的市僧空談絕緣（其實正如馬克思所早已指出的，這種空談是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平等』）。

不僅如此。只有受過幾十年反資本的罷工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教育、培養、鍛鍊而團結起來的那個被壓迫階級——只有領會了城市的，工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並有決心和本領來捍衛這種文化，保存並繼續發展其一切成果，把這些成果變爲全人民，全勞動者都能享受的那個階級，只有擔當得起歷史所必然加在堅決排除已往、大胆開拓將來新社會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難、考驗

和巨大犧牲的那個階級，只有其中優秀份子根本仇恨鄙棄一切市儈庸俗東西，根本仇恨鄙棄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份子』中間盛行的這種惡劣品性的那個階級，只有『經過了勞動學校鍛鍊』而善於喚起一切勞動者和一切誠實人尊敬自己勞動能力的那個階級，——才能用自己的階級專政來消滅階級。

匈牙利工人同志們！你們一下子就在真正無產階級專政綱領上，把一切社會主義者統一起來了，這樣就給全世界做出了比蘇維埃俄羅斯更好的榜樣。現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極高尚而極困難的任務，就是要在反協約國的艱苦戰爭中支持下去。希望你們堅定不拔。如果那些昨天加入到你們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的社會主義者中間，或小資產階級中間表現出動搖不定，那你們就要無情地鎮壓這種動搖。槍斃，這便是胆怯者在戰爭中應分遭受的命運。

你們進行着唯一合理的，正義的和真正革命的戰爭，即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戰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戰爭。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間所有一切忠誠份子都是站在你們方面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月比一月的

接近起來了。

希望你們堅定不拔！勝利定會屬於你們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一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三至三一六頁

偉大的創舉

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刊物上披露出紅軍兵士許多英勇奇蹟底例子。工農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以及地主和資本家的其他軍隊作鬥爭中，常常表現英勇和堅忍底奇蹟，捍衛着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品。根絕游擊主義殘餘，克服疲勞和廢弛現象，這一過程雖進展得緩慢，且有種種困難，但總在不顧一切地進展着。爲了社會主義事業勝利而自覺承受犧牲的這些勞動羣衆底英勇精神，就是紅軍中新的同志紀律基礎，就是紅軍復興，鞏固和增長底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勇精神，也值得同樣注意。在這方面，由工人自己倡首所組織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實有莫大的意義。顯然，這還祇是開端，但已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澈底，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底開端，因為這是對自身的因循守舊，放蕩行爲，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對萬惡資本主義所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積習的勝利。當這一勝利已臻鞏固，那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那時，而且只有那時，回返到資本主義才成爲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成爲不可戰勝的。

五月十七日真理報登載了阿、熱同志那篇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文章。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完全引證出來：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一封信，給了共產黨

組織和共產黨員以强有力的推動。舉國奮起的高潮使許多鐵路工人共產黨員上了前綫，但大多數鐵路工人共產黨員是不能放棄重要崗位不管，而去尋找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新方法的。根據各地來的消息，說動員工作緩慢，文案辦理手續遲延，遂使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不能不注意到鐵路業本身的機構。原來，因為勞動力缺乏和勞動強度薄弱，以致緊急定貨和火速修理機車事宜延滯起來。五月七日，在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全體大會上，提出了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來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這提議上說：

「由於國內外的嚴重情況，爲要取得對階級敵人的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又應當猛力加鞭，從自己休息時間內再抽出一點鐘來，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時間總和起來，在星期六這天一次去作六點鐘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收到實際的效果。我們認爲，共產黨員爲保護革命的勝利品，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副區

內施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

這個決議經過幾許猶豫後，就一致通過了。

五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鐘，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像兵士一樣，都到了場，排成隊伍，毫無擁擠，由工匠分派到各處工作。

以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立刻就有了成效。下表說明工作所在的部門和工
作性質。

工作地點	工作名稱	工人數目	工作時間	已進行的工作
莫斯科。 機車總 修理廠	裝載通波羅沃，木 姆，阿拉特爾和 薩上的鋪路材料 修理機車和車箱 備器材	四八 二一 五	工作 小時 總數	裝載了七、五〇〇普特 貨物卸載了一、八〇〇普特 貨物
			四五 四三 二〇	

	「彼羅沃」 總車輛廠	莫斯科。 車輛部。	莫斯科。 調車站	莫斯科。 客車廠。
	星期六，星期日的車 箱修理和小修理	旅客車箱的臨時修理	機車的臨時修理	機車的複雜臨時修理
	二四六 二三	一二	二四	二六
	五五	六	六	五
	二二〇 一一五	七二	一四四	一三〇
	總共修理好了四個機車 、十六個車箱，裝卸了 九、三〇〇普特貨物	兩個三等車的車箱	修理好了兩個機車，並 拆卸了四個機車應修理 的部份	總共修理了一個半機車
總 共	二〇五	二二	二四	二六

五十。
工作總值按定額工資計算為五百萬盧布，額外工作酬金要比這多百分之



裝載工作的勞動強度，較普通工人高百分之一百七十。其餘工作的強度，大致也是如此。

消除了因缺乏勞動力而將定貨（緊急的）由七天展至三個月之拖延現象。

工作進行時，因為工具損壞（本容易消除），以致單組工人被耽擱了三十分鐘。

管理局派來指導工作的人員，幾乎來不及準備新的工作。一個老匠師說，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做的事等於不自覺的鬆懈工人整整一星期內所做的事，這種說法也許不甚誇大。

因為蘇維埃政權普通的真誠擁護者也參加了工作，並可以指望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將來的義務星期六，以及其他各區也願意做法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共產黨員的先例，所以我就根據各地來的消息比較詳細地講講工作組織方面的問題。

參加工作的，約有百分之十的共產黨員是經常在該地工作的。其餘的則是鐵路政治委員直到單個部門政治委員這些負責者，以及由職工會或由鐵道管理局和鐵道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中提調出來的人。

工作中的熱誠和齊心協力精神是空前罕有的。當工人、事務員、管理局職員不出罵言，毫無爭論，抓着四十普特重的客車輪子，像酷愛勞動的螞蟻似的，滾到一定位置去的時候，心中便油然而發生了一種出自集體勞動的熱烈快感，並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決甕死不了勝利者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決等待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了這樣一幅空前未有的情景：成百的共產黨員雖然身體疲乏，但眼睛裏放出愉快的光芒，而以莊嚴的國際歌聲來歡祝事業的成功，儼如這凱旋國歌的勝利聲浪湧出牆壁向工人的莫斯科流去，好像石頭所激起的水波向工人的俄羅斯盪去，掀動着困憊鬆懈的人們。

阿、熱

眞理報於五月二十日在所發表的恩、爾同志一篇標題爲值得做法的例子文章中，論到這個卓絕例子時寫道：

『共產黨員這種工作的實例並非罕見。我知道在電站上和各鐵路上也有這樣的情形。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作了幾晚的額外工作，來搬起倒在轉盤上的機車；冬季在北方鐵路上，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者作了幾個星期的工作，來掃除鐵路上的雪堆；許多貨站上黨支部的全體黨員，爲了同竊貨行爲作鬥爭，乘夜沿站巡查，——但這種工作僅是偶然進行，並不是有系統地進行。嘉桑鐵路上的同志們却有了新的貢獻，把這一工作變成了有系統的經常工作。嘉桑鐵路同志們決議這樣作去，「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這也就是他們工作的全部意義。他們決定在整個軍事期間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的工作日延長一點鐘；同時他們又表明出了卓著成效的模範工作。這個例子業已引起，而且應當引起今後大家來做法。在亞歷山大鐵路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大會上，討論軍事狀況和嘉桑鐵路同志們的決議之後，曾通

通如下的決議案：（一）亞歷山大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者決定實行「義務星期六」。第一次義務星期六定於五月十七日舉行。（二）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組織成爲模範隊，它們應當表示給工人們看，應如何工作，以及在目前現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等情形之下，實際能够作成一些什麼。

據嘉桑鐵路同志們所說，他們的例子在人們中引起了很大的印象，他們預料到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來參加工作。當我們寫這些話的時候，在亞歷山大鐵路修理廠中，共產黨員的額外工作還沒有開始，只有預定進行這種工作的傳聞，可是非黨群眾就開始激動起來，說「要是昨天我們知道的話，那我們也就準備好了，也就工作過了」，「下次星期六我一定來參加」——聽到到處都有人這樣說。這種工作所引起的印象，是很大的。

後方所有的共產黨員支部，都應當來做法嘉桑鐵路同志們的例子。不僅莫斯科這鐵路樞紐上的各共產黨支部，並且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做法這一個例子。至於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就應當來組織替紅軍兵士代耕，幫

助他們的家屬。

嘉桑鐵路同志們在結束自己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工作時，高唱着國際歌。如果全俄羅斯共產黨組織都做這個例子，並毅然決然來按照這例子具體實行。那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全國所有勞動者的洪亮國際歌聲下，渡過臨近的困難月份：

共產黨員同志們，着手工作吧！」。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真理報上寫道：

「五月十七日在亞歷山大鐵路上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共九十八人，根據大會決議作了五點鐘無報酬的額外工作，只享有由各人付錢吃第二次午飯的權利，並且在吃午飯時與一般體力勞動工人一樣，各人由自己付錢到半磅麵包。」。

雖然工作準備得不充分，組織得不甚好，但勞動生產率終究比平常提高到兩三倍。

例如：

五個鐵匠在四點鐘內作了八十個轆輪。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二十個粗工在四點鐘內，收集了六百普特重的舊材料和七十個各重三普特半的車箱彈簧，總共收集了八百五十普特舊材料。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三百。

『同志們解釋這種情形時說，平時的工作作厭了沒有趣味，而在這裏，人們工作起來都興奮熱烈。但現時在平常工作中，要是比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時作的少些，那才可恥哩』。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聲明願意參加義務星期六。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動地決心要在義務星期六時，把蹬在「墳園」的廢機車拖出一架，把它修好使用。

接到消息，說在維亞茲瑪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義務星期六。

阿、嘉靖科同志在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寫到關於這些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的工作情形，現在我們就把他那篇標題爲義務星期六短評的主要部份引証如下：

「我和一個同志帶着極大的愉快心情，遵照鐵路副區黨委員會的決議，去參加義務星期六，暫時在幾點鐘內，讓腦子休息一下，讓臂膀來工作：我們被派往鐵路上的木工廠內。我們到達那裏，看見了自家人，彼此問過好，講了些笑話，點查人數共計祇有三十人：面前却站着一個「怪物」——重約六、七百普特的大汽鍋，我們要把它「另移地方」，即差不多要拖半俄里或三分之一俄里遠，拖到棧台跟前。心裏疑慮起來：但我們已動手工作：同志們隨便往鍋爐下安上木料，繫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了：鍋爐很不樂意移動，但終究還是把它拖動了。我們很高興，我們人雖是這樣少：要知道，這個鍋爐曾經有多過我們一倍以上的非共產黨員工人，幾乎拖了兩個星期還沒有拖動，祇是當我們來到後，才把它拖動了：我們在頭目同志多次「一、二、三」的勻調口令下，使勁地齊力地工作了一點鐘，鍋爐也就一步步地移動着。驀地出了什麼事！許多同志突然可笑地往後面倒去，——這裏我

們手裏的繩子「變節了」：大約停歇了一分鐘：改用粗索子：天色已開始斷黑，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那時才會很快把工作完成。雙手酸痛，掌心發燒，周身溫暖起來，使盡全力拖着，——事情也就有了成效。站着的「管理人員」驚於這種成就，也不由地拉着索子：你早就該來幫幫忙的！一個紅軍兵士很入神地聽我們工作。他拿着手風琴。他在想什麼？也許他想：他們是些什麼人？當星期六大家都坐在家裏的時候，他們却要幹什麼呢？我猜到他的心事，故意說道：「同志！給我們奏奏快樂的曲子吧，我們並不是什麼偷懶的工作人，而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我們做得多麼起勁，並不偷懶，而是努力地拖着」。於是紅軍兵士就小心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來抓住索子。

「英國人是聰明的！」武同志拉長宏亮美麗的高音唱着。我們都跟着應和起來，並高聲發出「唉嘿，棒子啊，唉嘿，拖吧，拖吧：」這工人歌曲的辭句。

由於沒有習慣的關係，筋肉疲乏，肩背酸痛，但是：我們的閒空日子——休息日就在前面，還來得及飽睡一頓。目的快達到了，經過一些小小的周折後，我們的「怪物」就已差不多被拖在棧台跟前：擱下枕木，滾上棧台！讓這個鍋爐去作人們所久已期待於它的工作吧。然後我們囂囂成羣地走進一間掛滿標語，架有步槍，燈光明亮的房子，也就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內，很好地唱完國際歌，然後喝過滲了「甜酒」的美茶，甚至吃了麵包，當地同志在我們做完繁重工作後，這樣來款待我們，真是再適當沒有了。爾後我們和同志們親密地告了別，便排成一個小隊走去。夜闌人靜中，革命歌聲響澈着酣眠的街道，勻整的步伐應和着歌聲。「同志們，提高脚步」，「一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於是大唱起勞動國際歌來。

過了一個星期。手臂都休息好了，現在我們要駛到九個俄里以外去作「星期六」，修理車箱了。我們是到彼羅沃去。同志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箱頂上，洪亮而美妙地唱着國際歌。乘客們靜聽着，顯然，是帶些驚異神

情。車輪有拍節地響着；我們沒來得及爬到上面去，就圍蹙在這「美國人」車箱的各梯板上，儼如「拚命搶上車」的乘客一樣。眼前就是車站。我們已到達目的地了，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就碰見那位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志。

——工作是有，但人太少！共三十個人，六點鐘內要把十三個須得進行中等修理的車箱修理好！面前就是做有記號的雙輪軸，不僅有空車箱，而且也有裝得滿滿的一輛火油車；但不要緊，同志們，我們是會「應付得來」的！

工作沸騰起來了。我和五位同志用槓桿作工。這些各重六七十普特的雙輪子，在我們肩膀和兩條槓桿推壓下，由「頭目」同志指揮着，迅速地從這道鐵軌上跳到另一道鐵軌上。這對輪子收拾好了，又來收拾另一對輪子。每對車輪都放到了一定的地方，我們就把這些陳舊了的東西，沿路軌迅速「發到」敞棚裏去：一、二、三、——它們就被一架轉動的起重機經空中抓走，軌道上再沒有這些雙輪子了。那裏，在黑暗中鐵錘聲大作，同志們已在自己

的「病」車箱前像蜜蜂般的忙碌着，既作木工，又上油漆，也蓋車頂，工作熱烈得使我們和政治委員同志都高興起來。以後，鐵匠們也需要我們幫忙。在一座移動的小熔爐上，放着一個燒紅了的「滑車柱」，即互鈎撞擊的車箱螺拴體。這螺拴體白晃晃的，帶着火花被柑到鐵蹄上，憑着有經驗同志的眼力，加上我們靈巧的錘擊，它就恢復了原狀。它還是明晃晃的，就被我們很快拾到自己位置上，並帶着火花被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便安置就緒了。我們爬到車箱底下。那裏這些互鈎和滑車柱的構造，完全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那裏有帶帽釘和旋簧的整個系統：工作沸騰着，天快斷黑了，火炬燃的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份同志「蹲靠」在一堆車輪邊緣上，並「慢吞」熱茶。清涼的五月之夜，美妙的新月當空。笑語，笑聲，辛辣的談諧。

——格同志，停工吧，算你們修好了十三個車箱就夠了吧！

但格同志却認這還不夠。

喝完了茶，我們就拉長着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不僅莫斯科開展了『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運動。六月六日，真理報載道：

『五月三十一日在特維爾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有一百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在鐵路上工作過。在三點半鐘內裝卸了十四個車箱，修好了三輛機車，鋸了十立方俄丈柴火，還作了許多旁的工作。熟練共產黨員工人的工作強度達到平常生產率的十三倍』。

爾後，六月八日真理報上又寫道：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薩拉托夫，六月五日。鐵路上的工人共產黨員爲回答莫斯科同志的號召，在全體黨員大會上議決：爲幫助國民經濟起見，決於星期六無報酬地額外工作五小時』。

我極詳細和極完備地引証了關於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消息，因為這裏，我們顯然看得到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上極重要的一方面，對於這一方面，我們的刊物沒有充分注意，而且我們大家都還沒有給以充分估計。

少發些政治喧嘩，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從生活中取得並為生活檢查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這個口號是我們全體，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員等所應該始終不倦重複的。

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第一個時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和基本的任務，即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戰勝剝削者，打破他們的陰謀（如黑幫派，立憲民主黨人以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律參加過的企圖讓出彼得城的『奴隸主底陰謀』），這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而外，同樣也不免要提出——愈往前去，便愈愈加頻繁地提出——積極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這一更重要的任務。

無產階級專政，——我已屢次指出過，例如，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過，——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種革命強力的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棍棒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勞動群衆極端愚昧，備受抑壓，而橫遭一小羣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飢餓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在最先進最文明的共和國內，雖然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着長足的進步，但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仍舊是一群愚昧無知，備遭一小群資本家掠奪侮辱的僱傭奴隸或貧苦農民。共產主義（其初步爲社會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則是靠那些既推翻了地主壓迫，又推翻了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羣衆本身底自由自覺紀律來維持的，而且愈往前去，便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既非從空而降，也不是出自善良願望，而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

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並且也只能從這種條件中成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便不會有這種新紀律。而這種物質條件底代表者或傳導人，便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啓發和鍛鍊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

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門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我們要在這括弧中指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成長出的新社會底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新社會底更高的，進一步的階段）。

伯恩國際⁷¹，即黃色國際底錯誤，就是它的領袖們只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

和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害怕澈底加以思索，恰巧害怕做出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爲資產階級絕對不能接受的那個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底一個時期，當階級尙未消滅之前，這個鬥爭是決不可避免的，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並且在推翻資本後第一個時期，成爲更形殘酷和更形獨特的了。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着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爲止，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採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着。

「消滅階級」又是什麼意思呢？凡屬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最終目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思考到這個最終目的底意義。所謂各個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份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集團。幾個階級就是這樣的幾個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佔的

地位不同，而使其中某一集團能够佔有另一集團底勞動。

顯然，爲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並且還要廢除對生產資料的任何私有制，還要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區別，以及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間的區別。這是需要很長的時期才可實現的事業。爲要完成這一事業，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小生產制無數殘餘底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和特別難於征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關連的極頑強的因循守舊習氣。

若認爲一切「勞動者」都能同樣進行這一工作，那便是最空洞的辭句或遠古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底幻想。因爲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並且只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只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之所以能够實現自己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因爲它是文明社會中最強有力和最先進的階級；第二，因爲它在各個最發達的國家裏佔居民的大多數；第三，因爲在俄國這

樣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居民的大多數都是半無產者份子，即照例是每年一部份時日度着無產者式的生活，照例是在某種程度內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僱傭勞動謀生的人。

誰想根據什麼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底平等這類的空泛辭句來解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如像考茨基，馬爾托夫及伯恩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作的那樣），誰就只是以此來暴露他們那種在思想方面奴僕式地跟着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僧的天性。只有具體研究已經奪得了政權的那個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與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特別關係，才能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並且這種關係不是在虛幻諧和的「理想式的」環境中形成起來，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和多樣反抗的現實情況下形成起來的。

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極大多數的民衆，尤其是勞苦群衆，都是連同自己的親屬千百次地經歷了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及其各種各樣

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即爲了解決是英國資本還是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這一問題，而屠殺數千萬人的戰爭，——把這種經歷異常加劇，擴大和加深了，使人們覺悟到這種經歷。所以極大多數民衆，尤其是勞苦群衆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爲它用英勇的果敢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資本束縛，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闢出建設不容有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不管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民衆所表現的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倒退到資產階級「福蔭」下去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動搖遊離心理如何強大，如何不可避免，但他們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擁有精神和政治上的威信，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不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還建設着嶄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繫，社會紀律，即自覺的和聯合起來了的工作者底紀律，這些工作者是不承認任何束縛的，除了自己聯合體底權力外，除了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底權力外，他們是不承認任何權力的。

爲了取得勝利，爲了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反資本的革命鬥爭底無限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鼓舞他們，組織他們，指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底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所有小資產者階層引上新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設新社會聯繫、新勞動紀律、新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新勞動組織把科學以及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果拿來共同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底普遍聯合制結合起來。

這第二個任務要比第一個任務更加艱難，因爲解決這個任務，絕對不能靠零星奮發的英勇氣概，而是需要廣泛日常工作中所表現的最長期、最頑強和最困難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同時又比第一個任務更加重要，因爲歸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有爲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而起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才能成爲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那種力量底最大泉源，才能成爲這種勝利堅固不移的唯一保證。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就是我們從這中間可以看出工人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勞動紀律以及創造社會主義經濟條件和生產條件方面所表現的自覺和自願的倡首精神。

受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教訓之後，未曾轉到沙文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方面而是轉到了社會主義方面的一位不可多得，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可比說過，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要比在薩多瓦近郊的搏戰⁷²，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是很公正的。薩多瓦近郊搏戰所解決的，是建立德國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究應屬於普奧這兩資產階級君主國中哪一個的問題。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是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達到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個小小的步驟。因而我們也可以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要比興登堡或者福熙和英國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帝

國主義者底勝利是爲了英美法三國富豪底利潤來屠殺千百萬工人，是垂死的，快脹死的和活活腐爛着的資本主義底殘暴行爲。而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却是爲使全世界各國人民解脫資本桎梏和戰爭慘禍的這種社會主義新社會底一個細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於自命爲『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底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舖裏栽大樹』，譏笑那些與盜竊公物、閑遊浪蕩、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習慣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義務星期六底數目。我們回答這班老爺們說：如果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把自己的知識用來幫助勞動群眾，而不是用去幫助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恢復他們的權力，那麼改革就會進行得更快而更和平。但這祇是空想而已。因爲問題是由階級鬥爭來解決的，而大多數智識份子則趨向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是藉這些智識份子底幫助，却是不管他們怎樣反抗（至少是在大多數場合下），摒除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同時改造和重新教育動搖份子，使之服從自

己，漸漸地把動搖份子中的大多數奪到自己方面來，這樣才會獲得勝利。對於改革中的困難和挫折表示幸災樂禍，散佈張惶心理，宣傳開倒車。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甘受這種辦法欺騙的。

如果按實質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過某種新生產方式，不是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失敗、三反四覆的錯誤，而是一下子發育起來的麼？農奴制顛覆了半世紀後，俄國鄉村中仍保存有不少的農奴制殘餘。美國廢除黑奴制半世紀後，那裏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着他們替資本服務的本色，總是抱定他們那種完全虛偽的論據：在無產階級革命前，他們責備我們爲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後，他們却要求我們用荒唐妄想的速度來剷除舊制度遺跡！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底真實價值，也知道習俗方面舊事物底遺跡在革命後相當時期內還是必然會對新事物底萌芽佔着優勢

的。當新事物剛剛誕生出來的時候，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幼芽底軟弱，表示輕浮智識份子底懷疑態度等等，——這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都是保護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底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殷勤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會死亡的。不能担保說，恰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定會發生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要扶助各種各類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會把這些新幼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出來的。既然日本一位學者，爲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竟有耐心接連試驗了六〇五種藥品，直到製出了能够滿足一定需要的第六〇六種藥品時爲止，可見，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更困難任務的人，也就應該具有堅忍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鬥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至從中製定出最適當的時候爲止。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爲開始這個運動的，並不是

境况特別優越的工人，而是具有各種專門手藝的工人，其中包括沒有專門手藝的工人，即處於通常最困難條件下的粗工。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現在不僅俄國一國，而且全世界各國都有的勞動生產率低落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破產和貧困，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怨恨心理和疲憊，疾病頻仍以及半飢半飽的現象。最後這點最關重要。飢餓——這就是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原因。爲了消滅飢餓現象，就必須提高農業、運輸業及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就成了這樣一個循環圈：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飢餓，爲要消除飢餓，就得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家知道，諸如此類的矛盾在實踐上是以這個循環圈底中斷，群衆情緒底轉變，個別集團底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這種轉變中往往起着決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鐵路工人（當然是大多數，而不是小群投機家，管理局人員等等白黨份子）是生活絕頂困難的勞動羣衆。他們經常是食不飽腹，而在現時青黃不接和糧食狀況一般惡化的情形下，簡直是經常挨餓。請看，這些處在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革命惡意煽惑包圍中忍飢受餓的工人，

雖然他們已經困乏不堪，因為食不飽腹弄得精疲力竭，却來舉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從事不領報酬的額外工作，並且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勇精神麼？難道這不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底開端麼？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澈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澈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最主要之點就在這裏。既然那些熬過了四年艱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爾後又熬過了一年半更艱苦的國內戰爭的飢餓工人，終於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飢餓的莫斯科開始這件偉大的事業，那末，當我們在國內戰爭獲得勝利並爭得和平時，繼續發展的情形又會是怎樣的呢？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底實際開端，而這乃是極罕見的事，因為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上，

『只是實行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公正地所說的那樣）。

當一般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增加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是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是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千百萬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又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人們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開始了的時候。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譏笑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大憲章』內的浮誇詞藻，譏笑了所有這些妄談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辭句，這些辭句是使各國市僧和庸人，直至現今卑鄙伯恩國際中一般卑鄙英雄們心嚮神往的。馬克思用來和這種華麗人權宣言相對立的，是無產階級一種平凡的，質樸的，務實的，日常的問題提法：由國家縮減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標本樣式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內容開展得愈強烈，馬克思意見底全部正確性和全部深刻性在我們面前也就暴露得愈明

顯，愈透澈。真正共產主義底『公式』與考茨基輩、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伯恩國際中親愛『兄弟』們底華麗、機巧、堂皇辭藻不同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式』把一切都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等等的空話吧：現代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在這些誇大詞句裏，容易看出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欺詐手腕，也如像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望見『善良君子』極『光澤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確切斷定他『大概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炭吧！設法使領工工人和襁褓農民所必需的這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炭，不是用投機買賣或資本主義方式，而是用莫斯科、嘉桑鐵路工和鐵路工人一類普通勞動者之自覺、自願與奮不顧身的英勇工作來獲得吧。

我們大家應當承認，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空口對待革命問題的這種態度底遺跡，是在在皆是，甚至我們隊伍裏也有。例如，我們刊物上很少向這些腐爛的，

資產階級民主舊制度的這種腐朽殘餘開火，很少對真正共產主義制度底平凡的，質樸的，日常的，但却是活生生的幼芽加以扶助。

拿婦女狀況來看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來也沒有作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存立後第一年內所作出的百分之一。我們澈底剷除了婦女不平等權的現象，限制離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底父親等等卑劣法律，此種法律底殘餘，在各文明國內還留下得極多，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奇恥大辱。我們十二分有權以我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來自豪。可是，我們把地基上舊時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廢物掃除得愈乾淨，那我們就能愈益顯明地看出，這只是爲建築物掃清地基，但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雖然頒佈有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還是家庭奴隸，因爲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末的，勞神的，祇是愚鈍人、折磨人的工

作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底真正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只在反對這種煩瑣家務的普遍鬥爭（爲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只是在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爲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

試問我們在實踐中對這個理論上是每個共產黨員都無庸爭論的問題注意得充分麼？當然，是注意得不充分的。試問我們對目前在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萌芽關心得很够麼？我再說一遍，是非常不够的。公共飯堂，托兒所和幼稚園，便是這些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手段實際能够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主義和社會生活作用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手段並不新奇，它們是由大資本主義所產生出來的（也如社會主義所有一切物質前提那樣），但它們在資本主義下，第一，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是營業性的企業，以免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一切弊端，或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理應受到優秀工人們方面的憎惡和鄙視。

毫無疑義，在我國，這樣的機關却已經是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開始改變。毫無疑義，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有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許多倍的組織人才，她們善於舉辦這類有很多工作者參加以及有更多的享受者參加的實際事業，但却沒有像往往自鳴萬能的『知識份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愛講空話，無謂忙碌，無聊爭吵以及空談計劃、體系等等的毛病。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來懇勸照護這些新事物的萌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吧。他們該是多麼會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啊！他們怎樣在自己發行的千百萬份報紙上讚揚資本家所視為『模範的』企業，怎樣把資產階級的『模範』組織當作民族的得意之作呵！而我們的刊物並不注意或幾乎全不注意來描述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來日常關心地把其中某些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並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下，能怎樣經濟人力，怎樣便利需求者，怎樣節省產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下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能够做到，能夠通行到全社會，通行到全勞動羣衆中去的。

模範的生產工作，模範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模範的關懷和忠誠於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的精神，模範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街坊內模範的清潔衛生工作，——所有這些，就是我們刊物以及每個工農組織所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注意和關注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底幼芽，而關注這種幼芽乃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義務。不管糧食情形和生產狀況怎樣困難，但在波爾什維克執政這一年半以來，情形畢竟無疑的是有全面的進展：糧食採量從三千萬普特（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到一萬萬普特（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園藝經濟增加了，未經播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雖然有燃料上的巨大困難，但鐵路運輸業已在開始改善以及其他等等。在這一般情景以及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贊助之下，共產主義底幼芽，不僅不會夭折，反而定會茁壯滋長並發展成爲完全的共產主義。

要好好地思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意義，以便從這個偉大創舉中得出

一切由此產生並絕頂重要的實際教訓。

從各方面來贊助這一創舉，——這就是第一個主要的教訓。『公社』這名詞，我們這裏常常應用得太輕易了。凡是共產黨員或在他們參加下所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是一下子就被宣佈爲『公社』；同時人們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以長期和頑強的勞動來爭得的，是要以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証實了的實際成效來爭得的。

因此，我以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決定廢除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公社』名稱的指令，是完全正確的。讓名稱簡單一些吧，那時新組織工作初步中的缺陷和缺點，就不會推往『公社』身上，而將落在（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好的共產黨員身上。最好是取締廣泛使用『公社』字樣，禁止隨便援用這個字眼，或者只承認那些在實踐中已真正証明（並由附近全體居民所一致公認）了有按共產主義方式辦理的能力和本領的真正公社，才有權援用這個名稱。你起初要證實自己有爲社會利益和全體勞動羣衆利益從事無償勞動的能力，有『用革命精神從事工

作」的能力，有提高勞動生產率 and 作出模範事業的能力，然後你才有權取得「公社」這個光榮稱號！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是最寶貴的例外。因為這裏，莫斯科、嘉桑鐵路粗工和鐵路工人起初在實際上證明了他們確實能像共產主義者一樣來工作，然後才稱呼自己的創舉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今後也要設法做到，並且一定做到，使一切和每個未經艱苦勞動及長期勞動或實際成效以及模範的真正共產主義的辦事方法加以証實，就把自己企圖、機關或業務稱作公社的人，都應遭受無情的嘲笑，被人視為騙子或空談家而受到恥辱。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偉大創舉，在另一方面，即清黨事業中也應當實地運用，在革命後的初期，當時很多「誠實的」和居心庸俗的人特別存着戒心，當時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自然是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全體怠工，並在資產階級面前趨炎附勢，於是野心家及其他危害份子便乘機混到執政黨裏來，成爲完全是不能避免的現象。任何革命中都避免不了，而且也不能避免這種現

象。全部問題在於依恃着健全有力的先進階級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

在這方面我們早已開始工作。要擊殺不坡孜孜不倦地繼續這一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去作戰這件事幫助了我們：胆小漢和惡棍逃出黨了。聽便他們往哪裏滾去罷！黨員數量上這樣減少，是意味着黨的力量和比重之大大增加。要利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創舉繼續清黨：比方說，只有在經過半年的『檢查』或『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候補期』的人，才被接受入黨。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入黨而沒有以其特別勞作或功績證明其絕對可靠，對黨忠實和能於成爲共產黨人的一切黨員，都應當經過這樣的檢查。

這樣以一貫的高黨對真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求爲標準的清黨工作，定會改善國家政權機關，並大大促進農民最終轉變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也就把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機關底階級性表露得非常明顯。黨中央委員會寫過一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這便是擁有十萬至二十萬黨員（我預料在嚴格清黨後，仍然會有這多，因爲現在的黨員

要超過這個數目）的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主張。

這個主張獲得了職工會中工人們的響應。這樣的工人在我們俄羅斯和烏克蘭達四百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二十萬與四百萬，這就是「齒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對比。還有千百萬農民，他們分成三個基本集團：數量最多和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集團，即半無產者或貧農；其次是中農；末了，便是數量極少的集團，即富農或鄉村資產階級。

當還有可能買賣糧食和利用飢饉來作投機事業時，農民仍是（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相當一個時期內是不能避免的）半勞動者，半投機家。一方面，他們是投機家，所以他們仇視我們，仇視無產階級國家，總想去同資產階級及其主張糧食自由貿易的，直至孟什維克舍爾或社會革命黨人別、切爾寧可夫爲止的忠僕們謀妥協。但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國家底朋友，是工人們在反地

見本卷第二六六至二七一頁。——譯者。

主反資本家鬥爭中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為勞動者的數千百萬農民大眾，是贊助一二十萬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並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者所組成的國家「機器」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比這更真正民主，更與被剝削勞動群眾有緊密聯繫的國家。正是這樣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所表示出來並經過這種方式具體實現出來的無產階級工作，才能澈底鞏固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尊敬和愛戴。這種工作，而且只有這種工作，才會使農民最終相信我們正確，相信共產主義正確，才會使農民成為我們無限忠實的擁護者，因而也就是把糧食困難完全克服，使共產主義在糧食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完全戰勝資本主義，無條件地鞏固共產主義。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三二五至三四九頁

大家都去與鄧尼金鬥爭！

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致黨組織的信

同志們！社會主義革命最危急關頭之一，也許甚至是最危急的關頭到了。剝削者，即地主與資本家在俄國國內和國外（首先是英法）的擁護人，拚命想在俄國恢復人民勞動掠奪者、地主和剝削者底政權，以便鞏固他們在全世界上正崩潰着的政權。英法資本家單用自己軍隊來奪取烏克蘭的計劃破產了，它們在西伯利亞對高爾察克的幫助也失敗了；紅軍在烏拉爾獲得全體起義的烏拉爾工人的支援，英勇地向前進展，正接近到西伯利亞，去把它從當地領主，資本家之空

前壓迫和暴行下解放出來。末了，英法帝國主義者，想藉反革命陰謀奪得彼得格[拉]的計劃也破產了，參加這次陰謀的，有俄國的保皇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連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不是例外。

現在國外的資本家拚命想藉鄧尼金底進攻來恢復資本桎梏，他們也像過去幫助高爾察克那樣，以軍官，軍需品，砲彈，坦克等等來幫助鄧尼金。

工人農民的全部力量，蘇維埃共和國的全部力量都應當緊張起來，以便擊退鄧尼金底進犯，並戰勝它，同時不須停止紅軍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勝利進攻。這就是：

目前主要的任務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體共產黨員，他們的一切同情者，全體正直的工農，全體蘇維埃公務員，都應按戰時要求振作起來，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和關心都

儘量轉到直接的戰爭任務上，轉到爲了迅速擊退鄧尼金底進攻這一任務上，並把自己其餘的一切活動加以縮小與改造，以服從於這個任務。

蘇維埃共和國被敵人包圍了。它應當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成爲統一的軍營。

使所有機關的全部工作都適應於戰爭，並按戰時要求來加以改造！

爲了解決工農國家的政務，集體領導制是必要的。但對集體領導制的任何誇大，對集體領導制的種種曲解以致造成遲滯和不負責現象，將集體領導機關變爲空談場所的一切嘗試，都是極惡大罪，無論如何都要盡量迅速，不顧一切來根除這種惡毒。

無論在委員會委員數量方面，或在實地進行工作方面，集體領導制的權能，都不應超過絕對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外，禁止『長篇大論』，要最快地交換意見，把交換意見變爲彼此通報，並作出實際提議等等。

稍一有可能時，集體領導制祇應限於在最小範圍的委員會內，最簡短地來討

論唯一最重要的問題，而實際處理本機關、企業、人事、任務的責任，則應委給一個素以剛毅堅決果敢見稱，長於處理實際問題，並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擔負。集體領導制無論如何而一無例外地都應與最確切規定每人對某一確定事務之個人負責制相輔而行。藉集體領導制來掩蓋的無人負責現象，是最危險的禍害，這種禍害能威脅着一切在實際集體領導工作中沒有充分經驗的人，而在軍事上則往往必然釀成災害、混亂、慌張、權力分散和失敗的惡果。

組織上的紛忙或組織上的虛幻計劃是同樣有害的。爲了戰爭的必要來改造工作，這無論如何也不應弄成爲改造機關，更不應是匆忙建立新的機關。這是絕對不許可的，這只能造成紛亂現象。改造工作應該是暫時停止那些非絕對必要的機關，或將其縮小到相當限度。但一切能幫助戰爭的工作都應完全和唯一經過已存的軍事機關來進行，要整頓、鞏固、擴大和贊助這些機關。建立特別的『國防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或『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這只能在例外的情形下；第二，這只有經過相當軍事機關或最高蘇維埃政權機關批准；第三，無條

件地執行以上這個條件，才能准許。

向人民解釋關於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真象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和唯一的嚴重敵人。若是沒有協約國（英、法、美）的幫助，那他們早已便破產了。只因協約國的幫助才使他們成爲強有力的。但他們終究不得不來欺騙人民，有時假裝爲『民主』、『立憲會議』、『人民政權』等等的擁護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樂意地帶他們欺騙。

現在關於高爾察克（而鄧尼金則是他的同胎兄弟）的真象已完全揭穿了。槍殺幾萬工人。甚至槍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鞭撻成縣成縣的農民。公開毒打婦女。這些地主子弟軍官之橫行無忌。沒有止境的掠奪。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真象便是如此。甚至就在本身是工入底叛徒，是站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方面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間，那不得不承認這一真象的人，也愈加增多了。

全部鼓動和宣傳的中心就是要使人民知道這點。要向他們解釋，或者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或者是蘇維埃政權，工人底政權（專政）；中間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不能有的。要特別利用那些不是波爾什維克方面的證據，即到過高爾察克或鄧尼金那裏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非黨份子的證據。讓每個工人和農民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來進行鬥爭，假若高爾察克或鄧尼金得勝的話，他們會遭遇到什麼。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爲幫助動員而工作，和在已動員者中的工作，目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基本對象之一。在集中有已動員者或有駐防軍，尤其是有後備營等等一切地方的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應當全體積極參加工作。必須把他們一無例外地組織起來，幫助動員和在已動員者及地方防軍兵士中進行工作，某些人每

天經常地工作，另些人，比方，每星期做四小時或八小時的工作，當然，這工作是在由地方黨組織和軍事當局指定每人承擔相當任務的條件之下，嚴格而有組織地來進行的。

居民中的非共產黨員或他黨黨員，當然不能進行思想上的反鄧尼金或高爾察克的工作。但根據這一理由而使他們不參加任何工作，這也是不允許的。應該找到各種方法來使全體居民（首先是城市和鄉村中較富裕的居民）在幫助動員或幫助已動員者方面，人人都必須有某種貢獻。

特種手段的幫助，應當是去促進最迅速地和最好地訓練已動員了的人們。蘇維埃政權要徵集所有先前的軍官軍士等等。共產黨以及全體同情者和全體工人都應來幫助農國家：第一，千方百計地協助拿獲一切逃避報到的舊時軍官軍士等等；第二，在黨組織監督下並在黨組織管轄下，把那些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例如，參加過帝國主義大戰）受過軍事訓練而能有所貢獻的人組織成若干集團。

在逃兵中的工作

近來在反逃跑現象的鬥爭中，顯然有了轉變。許多省份裏逃兵已開始大批轉回到軍隊中來，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逃兵已湧現到紅軍中來了。原因是：第一，黨的同志們進行過更巧妙和更有系統的工作；第二，農民日益悟解到，高爾察克和鄂尼金正在恢復比沙皇制度更壞的制度，恢復工農的奴隸身份，恢復鞭笞、掠奪和軍官貴族底侮辱行為。

所以就要在各處用全力加緊在逃兵中工作，並使逃兵轉回到軍隊裏來。這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事情之一。

也得提到，能夠用說服來影響逃兵以及這種影響底成功，都表明出工人國家對農民的特別關係，而與地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棍棒的壓迫或飢餓底壓迫，這便是後面這兩種國家之紀律底唯一泉源。至於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

政國家則可能有另一種紀律底泉源：由工人來說服農民，工農間的友誼聯盟。當你聽到眼見人講述說，在某某省（例如在梁贊省）有成千上萬的逃兵自願地轉回來，在各群眾大會上向『逃兵同志』的號召有時收到有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成功，這時你才瞭解，在工農這一友誼聯盟中，該蘊藏有多少尚未被我們利用的力量。農民固然有使自己贊成資本案，贊成社會革命黨人，贊成『自由貿易』的偏見，但同時它也有日益使自己去與工人結成聯盟的明見。

直接幫助軍隊

我們軍隊最需要衣服，靴鞋，武器，砲彈的供給。在遭到破壞的國家裏必須有巨大的努力才能供應軍隊底這種需求，而英、法、美資本家掠奪者所慷慨給予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那種幫助，才唯一拯救了他們由於缺乏軍需品而必然遭到的崩潰。

不管俄國遭受了怎樣的破壞，但國內終究還有不少的資源，我們還沒有加以利用，而且往往是不善于利用。還有很多沒被尋獲或未經檢查的軍需庫，很多沒有利用的生產資源，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於官僚們自覺怠工，一部分是由於遇事遲滯，機關主義，漫無條理和粗鹵笨拙，所有這些「往昔的罪過」都這樣必然，這樣殘酷地高壓着一切正向新社會制度「跳躍」的革命。

在這方面直接幫助軍隊是特別重要的。管理軍隊的機關，特別需要「煥然一新」，需要有別方面的協助，需要有當地工農之自願的，有力的，英勇的創舉。要號召全體自覺的工農，全體蘇維埃活動家盡量廣泛地來參加這種創舉，要在各地和各工作部門內在這方面試試幫助軍隊底各種形式。這裏，「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現象，比在旁的領域內要少得多，但這裏「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在居民中收集武器，也是這工作中的一部份。在經過了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爾後又經過兩次人民革命的國度內，農民和資產階級手裏暗藏有很多武器，這是

自然而然的現象。但現在既有鄧尼金岌岌進犯，就必須用全力來與這種現象作鬥爭。誰要暗藏武器或幫藏武器，誰就是反對工農的滔天罪犯，誰就應份遭到槍斃，因為他是使成千累萬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殞命疆場的優良紅軍兵士遭受犧牲的罪人。

彼得城同志當舉行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搜查時，就找到了成千上萬的槍枝。要使俄羅斯其餘地方也不落在彼得城之後，無論如何都要去趕上和超過它。

另一方面，毫無疑義，槍枝藏得最多的是農民，他們往往沒有任何惡意，不過是由於頑固成性不相信一切『國家』等等。既然我們能以說服工作，巧妙鼓動，適當處置問題等辦法在使逃兵自願轉回到紅軍中去這方面作出了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裏）事情，那末，在爲了使人自願歸還武器方面，毫無疑義也能够而且應當作出同樣多的，也許還要更多的事情來。

工農們！尋找藏着的槍枝，並把這些槍枝交給軍隊吧！那你們就能以此拯救自己免遭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毒刑，槍斃，大批鞭笞和劫掠呢！

縮小非軍事工作

爲了執行上面簡略規劃的工作，甚至是其中一部份，就需要有很多新的工作人員，而且是最可靠，最忠實，最富有毅力的共產黨員。可是當到處都在訴述這種工作人員缺乏和他們過份疲勞等情形下，又從什麼地方能找到這樣的工作人員呢？

毫無疑義，這類訴苦的話在多方面是公正的。如果有誰把近二十個月來，數目該是如何微末的先進工人和共產黨員，藉工農群衆的贊助和同情管理着俄國這點，來精確地計算一下，那就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了。但是我們却管理得大有成績，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同時克服空前的困難，戰勝着那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有聯繫而在到處日益抬頭的敵人，並且除了協約國這一敵人外，即除掉英雄強一世的英法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外，我們已戰勝了一切敵人，何況我們已折斷

了協約國這敵人的一隻手

高爾察克；現在威脅我們的，只剩下它的另一隻

手——鄧尼金了。

爲管理國家，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新的工作力量，很快成長起來，這便是這批青年工農；他們都在極誠實，極熱烈，極奮勇地學習着，吸受由新制度得來的新印象，拋掉舊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外殼，把自己鍛鍊成比他們的前輩人還更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可是，不管這新階級成長得如何之快，它如何在國內戰爭和資產階級瘋狂反抗的烈火中迅速地學習和成熟着，但在最近幾個月內，它終究還不能給予我們以培養好了的國家管理人員。但正是最近這幾個月，正是一九一九年的夏秋兩季將決定一切，因爲我們與鄧尼金的鬥爭急需立刻解決，而且定會立刻解決的。

爲要獲得大量培養好了的工作人員來加強軍事工作，就要縮小許多非軍事的，或更確切點說，不是直接屬於軍事的蘇維埃工作底部門和機關，要按這個方針（即縮小的方針）來改造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和企業。

例如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部這是個極有用的，爲了完備地建設社會主義，爲了正確計算和分配一切科學技術力量所必須的機關。但這個機關是否絕對必要呢？當然不是。如果把那些能夠而且應當立即用去作軍隊中的和直接爲了軍隊緊迫萬分的共產主義工作的人交給這個機關，那在目前簡直是一種罪行。

我們這裏，像這樣的機關和部門，在中央和在各地都很不少。我們力求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起初不能不立即着手成立這類機關。但如果現在當鄧尼金這大敵當前之際，我們竟不能這樣來改造隊伍，而使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東西都暫時停止和縮小起來，那我們就會是些蠢漢或罪人。

我們不應當陷於張惶失措和組織上的忙亂，不應當改造任何機關，不應當完全關閉它，不應當開始建設些新的機關，這在匆忙工作情形下是特別有害的。我們應當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和部門，暫時停閉三五個月，或者，當不能完全將其停閉時，那就把它們縮小而這樣（大概的）縮小一個時期，縮小到最大限度，即只留下最小限度的絕對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培養好了的，有經驗的，忠實的，受過考驗的共產黨員或同情社會主義的人來作軍事工作，因而我們就能這樣來冒一次險，使很多大大縮減的機關（或機關的某些部門）中，在相當時期內沒留下一個共產黨員，而把這些機關唯一交給資產階級的工作人員去料理。這並不是大的冒險，因為這只是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而言，由於削弱這些機關（一半已停止了）底活動是會有損失的，但這種損失並不會很大，它無論如何也不能致我們於死命。而一旦沒有充分力量去加強軍事工作，並且是要立即和大大去加強軍事工作，那這就能致我們於死命。這點正要明白瞭解，並要由此作出全盤的結論。

如果在各省縣等機關或機關部門底每個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支部，不喪失一分鐘的時機，向自己提出問題：某機關或某部門是否無條件地必要呢？若是暫時停止它的工作或將其工作縮小十分之九，讓那裏不留下一個共產黨員，這樣我們是否會招致死亡呢？——如果這樣提出了問題，接着就迅速而堅決地縮減工作和調開共產黨員（以及他們的同情者和非黨員中無條件是可靠的助手），那時

我們就能够在最短期間得到成百成千的人去到軍隊政治部中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員等等職務。那時我們也就真有可能，像戰勝了更強大的高爾察克那樣，來戰勝鄧尼金。

臨近戰線地區的工作

最近幾星期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臨近戰線地區已驚人地擴大，其面目也非常迅速地改變了。這是戰爭快到決定關頭和戰爭快近終結底預報或伴隨現象。

一方面，在烏拉爾一帶和在烏拉爾本地遼闊的沿戰線地區，由於紅軍勝利和高爾察克底瓦解，加之高爾察克佔領區中革命底增長，已成爲我們的臨近戰線地區了。另一方面，由於我軍的損失，由於敵人大大接近彼得城，以及從南部向烏克蘭和俄羅斯中心進犯，使彼得城近郊及南部一帶的沿戰線地區更形擴大了。

於是臨近戰線地區的工作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

在紅軍迅速前進的沿烏拉爾一帶，所有軍隊工作人員、政治委員、政治部人員等以及當地工農，都有一種自然願望，想在新收復地區安居下來進行創造性的蘇維埃工作，人們愈疲於戰爭，高爾察克破壞得愈是嚴重，則這種願望就愈加自然。但若實現這個願望，那便是再危險不過的了。這便會減弱我們的進攻，會使我們的進攻發生停滯，而增加高爾察克還能恢復元氣的機會。這在我們方面說來，簡直會是對革命的罪行。

決不要從東方軍隊中抽調一個多餘的工作人員來作地方工作！決不要減弱我們的進攻！完全勝利的唯一機會，是烏拉爾一帶和烏拉爾本地所有親身受過高爾察克『民主』恐怖的居民人人參加作戰，繼續向西伯利亞進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亞完全勝利為止。

◎ 沒有絕對的必要，一般就不抽調他們，需要時可從中部省份轉調！

讓烏拉爾一帶和在烏拉爾本地的建設工作延遲一下，讓這種建設在純粹是當地年輕沒有經驗和力量薄弱的人們參加的條件下，進行得緩慢一些吧。我們並因此就會招致死亡。但若減弱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進攻，那我們便不免於死亡，我們應當用烏拉爾起義工人底力量，用烏拉爾一帶農民底力量來加強這個進攻；因為這些工人農民現在已親身認識了孟什維克馬依斯基和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的「立憲」諾言是什麼意思，認識這些諾言的真正內容，即高爾察克，是什麼回事。

削弱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進攻，就是叛變革命，就是叛變把工農從高爾察克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事業。

在剛被收復的臨近戰線地區工作時，要牢記那裏主要的任務，不僅是要奪得工人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而且也要奪得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實際向它們解釋蘇維埃政權這工農政權底實質，一開始就把握住黨根據二十月來工作經驗估計所定下的正確方針。我們在烏拉爾，不應重複我們有時在大俄羅斯犯過，但我

們很快就會改正的那些錯誤。

在彼得城近郊沿戰線地帶以及在烏克蘭和南部那個擴大得如此迅速、如此可畏的巨大的臨近戰綫地區內，要把一切都轉入戰時狀態，把全部工作，全部努力，全部思想完全服從於戰爭，而且唯一服從於戰爭。否則就不能擊退鄧尼金底進犯。這是很顯然的。而這點要有明白的瞭解，並完全加以實現。

順便說說，鄧尼金軍隊底特點，就是它有大量的軍官和哥薩克。這種成份，沒有群眾力量作後盾，而非常善於迅速襲擊，實行冒險，採取拚命辦法，唯一目的是在散佈驚惶心理，是在盡情破壞。

在同這種敵人作鬥爭時，必須有最高限度的軍事紀律和軍事警惕性。遺誤時機或張惶失措，便會喪失一切。每個負責的黨工作者或蘇維埃工人都應當估計到這點。

在軍事和一切專業上都要有軍事紀律！

要有軍事警惕性和嚴格性，在採取一切慎重辦法時，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對軍事專家的態度

這次在紅丘發生而以出讓彼得堡爲目的的巨大陰謀⁷³，又特別迫切地提出了關於軍事專家以及後方肅反的問題。糧食和軍事狀況的尖銳化，毫無疑義必然使，而且最近將來還會使反革命份子的活動加強起來（參加彼得城陰謀的有『復興會』，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也有雖是單個個的參加，但終究還是參加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樣無疑義的，軍事專家中在最近期間定會產生出高度百分比的叛變者，如像富農，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但因爲這點就主張改變我們的軍事政策基礎，那便會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和不能饒恕的怯懦心理。成百上千的軍事專家叛變我們，而且將來還會叛變我們。我們將捉拿他們，槍殺他們，但我們這裏，還有成千上萬的軍事專家在有系統地和

長久地工作着，沒有他們參加，便不能把這從過去可恨的游擊主義中生長出的，並在東方獲得燦爛勝利的紅軍建立起來。富有經驗和領導我們軍事機關的人們公正地指出，在對於軍事專家和剷除游擊主義問題上最嚴格地執行了黨政策的地方，在紀律最堅固的地方，在軍隊中更關心進行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員工作的地方，——那裏一般講來，軍事專家中甘願叛變的人就最少，那裏便於這種人來實現自己圖謀的機會就最少，那裏在軍隊中就沒有廢弛現象，那裏軍隊的秩序和士氣就要好些，那裏勝利也就多些。游擊主義及其遺跡殘餘給我軍和烏克蘭軍隊所遭受的禍害、崩潰、失敗、災難以及人員和軍用品之損失，比軍事專家底一切叛變所給予我們的，要大得無可計量。

我們黨綱上，關於資產階級專家的一般問題，以及關於其中軍事專家的部份問題，完全確切地規定了共產黨底政策。我黨現在和將來都要「無情地反對那種假急進的，而其實是粗魯的自負心理，似乎勞動者無須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無須利用他們，無須有與他們多年共事的鍛鍊，便能戰勝資本主義和資產階

級制度」。

自然，黨同時對「這一資產階級階層，決不作絲毫政治上的讓步」，黨現在鎮壓着，並且將來還要「無情地鎮壓這階層的一切反革命密謀」。自然，當這類「密謀傾向」出現或多或少確定地露顯出來時，就要對它「無情地加以鎮壓」，這種鎮壓所要求的質量已經不是「多年共事鍛鍊」所要求所教育給人們的那種從容不迫，學生底謹慎心理等等的質量了。兩種情緒之間，即受過同軍事專家「多年共事鍛鍊」的人們的情緒，與那醉心於「無情鎮壓軍事專家反革命密謀」這直接任務的人們的情緒之間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果然引起了磨擦和衝突。對於必需的個人更換，有時是大批軍事專家的調動，也是一樣，這種調動是由於某種反革命「密謀」事件所引起的，更不消說大陰謀案了。

這些磨擦和衝突無論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用黨的方式來解決，並要求黨的一切組織都這樣做去，而且一定要使實際工作不受到任何損失，在採取必要辦法時，沒有半點延遲，在實行我們已規定的軍事政策原則時，沒有絲毫動搖。

如果黨的某些刊物對軍事專家有不正確的論調（像不久前在彼得格拉有過的那樣），或在個別情形下對軍事專家的『批評』已直接妨害到利用軍事專家這一套有系統的和頑強的工作時，黨應立即改正這種錯誤，而且將來還要改正這種錯誤。

改正這種錯誤的主要基本手段，是加強在軍隊中和在被動員者中的政治工作，振奮軍隊政治委員底工作，改善他們的成份，提高他們的水準，由他們來實際執行黨綱之所要求，而往往是執行得極不充分的東西，即是要『把在各方面監督軍隊指揮人員之權集中於工人階級手中』。從旁批評軍事專家，企圖『一舉』改正，這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所以也就是毫無希望而祇有害處的事。凡屬悟解到自己政治責任和憂慮我軍缺點的人，就讓他們加入隊伍行列，當紅軍兵士或指揮官，當政治工作人員或政治委員吧，讓每一個人——任何一個黨員都能按才致用——都到軍事組織內部去為改善這組織而工作吧。

蘇維埃政權早已極度注意到使工人，農民，尤其是共產黨員都能認真地學習

軍事。許多組織，機關和短期班內都在這樣進行，但還進行得非常不充分。這裏，個人的主動性，個人的毅力還應當作出很多的事來。共產黨員特別應當奮勉地學習機關槍，大砲，裝甲車等等，因為這裏我們的落後性便更加有害，這裏擁有大量軍官的敵人佔着更大的優勢，這裏不可靠的軍事專家能給予很大的危害，這裏共產黨員的作用也就大到極點。

後方肅反工作

也如像去年七月一樣，反革命勢力在我們後方，在我們中間抬頭了。

反革命勢力雖已被戰勝，但還沒有被消滅，它當然要利用鄧尼金的勝利和糧食困難的嚴重情況。那些始終是動搖的，無氣節的，藉辭藻粉飾自己行爲的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依然跟在直接的和公開的反革命後面，跟在那些因爲自己有資本，因爲與協約國帝國主義有直接聯繫，因爲瞭解

專政之不可避免並具有實現這種專政（按高爾察克式）的才能而表現強大有力的
黑幫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後面躊躇着。

對這方面不要有絲毫的幻想！我們知道產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亂，反革命陰謀等等的『策源地』，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鄉村富農，到處的『非黨』人士，還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要加倍地來監督這種策源地。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為從這方面來的反革命密謀，在目前以及在最近將來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基地上炸毀橋樑，組織罷工，進行各種偵探陰謀等活動，也自然是會多次重複的。凡在反革命『策源地』稍微可能『棲身』的一切而無例外的中心，都必須採取各種最強有力的，有系統的，再三再四的，普遍的和突然實行的預防方法。

關於孟什維克、右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要估計到最近這次經驗。在他們『周圍』中，在傾向於他們的人群中，毫無疑義，是有由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方面向蘇維埃政權方面接近的變動情形。我們估計到了這種變動情形，每當這種

變動稍微有點實際表現時，我們就從自己方面採取相當步驟去迎接它。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自己的這種政策，而由傾向於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份子方面，往那傾向於蘇維埃政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份子方面『飛躍』若底數目，一般講來，無疑是會增加起來。

但在目前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首的那班無氣節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是順風轉舵，向勝利者鄧尼金方面動搖着。這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一般『文藝集團』底『政治領袖』（如孟什維克中的馬爾托夫輩，右派社會革命黨中的切爾諾夫輩）說來，特別正確，至於這些『文藝集團』的會員，除其他種種原因外，還深深惱怨他們在政治上完全破產，因此也就含有未必能『醫治』的這種反蘇維埃政權的冒險趨向。

決不要被他們領袖底言詞和觀念以及他們個人的誠懇或虛僞所欺騙。這對他們每個人底履歷是重要的。但從政治上，即從階級關係，從幾百萬人間的關係上看來，並不重要，馬爾托夫輩『代表中央』莊重地斥責自己的『積極份子』，並

以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永遠都是威脅！）。但這並沒有消除這樣一個事實，這班『積極份子』是孟什維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們藏在孟什維克後面，並進行自己的高爾察克—鄧尼金式的工作。沃爾斯基輩斥責亞甫克森鐵夫和切爾諾夫輩，但這絲毫也不妨害亞甫克森鐵夫和切爾諾夫輩比沃爾斯基更加強而有力，絲毫也不妨害切爾諾夫說：『如果不是我們，如果不在現時推翻波爾什維克，那麼又有何人在何時來推翻波爾什維克呢』。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可能不與反動份子，不與切爾諾夫輩作任何勾結而『獨立』『工作』，但其實他們也是鄧尼金底同盟者及其走卒，如同那個因『思想』動機而給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和高爾察克開放戰綫的前總司令而現已去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穆拉維也夫一樣。

馬爾托夫和沃爾斯基之流自以爲是『高於』交戰兩方，自以爲是能够建立『第三方』的人。

這個願望，縱令它是誠懇的，也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幻想，他們在一八四八年後業已過了七十年的現在，還沒有學會這一初步常識，即在資本主義環

境中，祇能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決不能實現任何第三種專政。大概，馬爾托夫輩，至死也拋棄不了這個幻想。那就祇好聽他們的便吧。但我們却要記得，在實踐中這班人總是不免今天向鄧尼金動搖，明天向波爾什維克動搖的。今天要做今天的事。

我們的事是應當直接提出問題。究竟怎樣辦好些呢？是去把立憲民主黨人，非黨份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中那些『起來』（有的用武器，有的用陰謀，有的鼓動反對動員，如孟什維克中的印刷工人或鐵路工人那樣等等）反對蘇維埃政權，亦即擁護鄧尼金的幾百叛亂份子一律逮捕，關在牢裏，有時甚至槍決？抑或是讓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來把幾萬工農斬盡殺絕，一律槍斃，一概鞭死呢？要選擇並不難。

問題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

誰要是至今還不瞭解這點，誰祇會對這決議之『不公正性』訴泣，那他就是不可救藥的人，那他就應當遭受大眾的嘲笑和侮辱。

動員全民作戰

蘇維埃共和國是個被全世界資本所包圍了的要塞。只有那些積極參加戰事並極力幫助我們的人，才有權把這要塞作為躲避高爾察克的避難所，才有權在其中居住。由此就發生出我們的權利和我們的義務：動員全民參戰，有的動員去直接作戰，有的動員去參加有關作戰的各種輔助工作。

完全實現這點，需要有盡善盡美的組織。既然我們的國家組織還遠未臻於完善地步（如果估計到它還年輕，估計到它在發展中所遇到的新奇事物和特殊困難情況，這也就一點不奇怪），若是想規模浩大地立刻在這方面來實現某種完備無遺或那怕只是某種範圍廣闊的事情，那都會是組織上的一種最有害的虛幻計劃。

但爲了近於完善起見，在這方面也能作出很多局部的事情來，我們黨的活動份子和我們蘇維埃工作人員在這方面的『創舉』，表現得大大不充分。

這裏提出這個問題並引起同志們注意，也就够了。並沒有必要來加上某些具體指示或假定。

我們只要指出，那些最接近蘇維埃政權而照例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維克等等的某些人，特別憤慨人質制這種在他們看來是『野蠻』的辦法。

讓他們去憤慨吧，但沒有這辦法就不能進行戰爭，而在危險尖銳化的情形下，使用這種手段是必須的，真正說來，還要擴大使用，還要更多使用。例如，孟什維克的或黃色的印刷工人，『管理處人員』中和秘密投機家中的鐵路人員，富農，城市（及鄉村）富有者以及諸如此類的份子，常常用那種直接轉爲怠工之無限有罪和無限卑鄙的冷淡態度，來對待捍衛我國免遭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蹂躪的事業。要製定出這種種集團人底名單（或強迫他們自己組織連環保團體），不僅要他們去挖戰壕，像有時作過的那樣，而且也責成他們給予紅軍以各種的和多方面的物質幫助。

如果我們能更廣泛，更多方和更巧妙地來應用這種辦法，那末紅軍兵士的田地就會耕種得好些，對紅軍兵士之食品、馬合煙及其他必需品的供給就會組織得好些，成千上萬的工農因個別陰謀等等所遭受的死亡危險，就會大大減少。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總結以上所說，我們就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要求所有共產黨員，所有覺悟的工農以及每個不願意讓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的人，立即並在最近幾個月內，空前提高自己的毅力，要求他們『以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既然飢餓，疲勞和困憊的莫斯科鐵路人員，工人專門家以及粗工，爲了戰勝高爾察克和直到完全戰勝他爲止，竟能實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在每個星期內無報酬地作幾點鐘的工作，並在這裏發展着空前未有，比平常高過很多倍的勞動生產率，那末這也就證明出，還能作出很多很多的事。

而我們也應當作出這很多的事。

那時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

刊載於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紀事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第四期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十一期

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同志們！紅軍從高爾察克手裏收復了烏拉爾全境，並已開始收復西伯利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欣悅鼓舞地歡迎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政權正在以鐵帚掃除所有地主和資產階級惡棍，而這些惡棍是用苛捐雜稅，鞭笞拷打，侮辱蹂躪以及恢復沙皇壓迫手段來使人民受盡折磨和痛苦。

紅軍收復烏拉爾和進到西伯利亞，使我們大家感到無限歡樂，但這決不應該使我們泰然自安。敵人還遠未被消滅。敵人甚至還沒有被澈底摧破。

必須緊張全力來把高爾察克以及日寇和其他外寇驅出西伯利亞，並要更加緊

張力量來消滅敵人，不讓敵人再行開始他的強盜行爲。

怎樣才能達到這一點呢？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所受到的痛苦經驗，以及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弄得困苦不堪的全世界各國底經驗，我們是不應當空空放過的。

以下便是所有一切工農，所有勞動者都應當從這經驗中獲得出來，以資預防高爾察克叛亂災禍重演的五個主要教訓。

第一個教訓，爲要保護工農政權，使其不受匪幫、即地主資本家的侵犯，我們必須有強大的紅軍。我們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證明了：我們能够建立這樣的紅軍、我們學會了指揮紅軍並戰勝資本家，那怕資本家獲得有全世界最富強各國在武器軍裝方面的豐富幫助。波爾什維克已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所有工農——如果他們是有覺悟的話，——應當相信波爾什維克，不是根據空話（相信空話是很愚蠢的），而是根據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千百萬人的經驗。要把武裝工農的事與那大半是同情地主資本家的舊軍官的指揮職務結合起來，這是極困難的任

務。這個任務，只在具有最好的組織才能、嚴格和自覺的紀律，廣大羣衆對工人政治委員這領導幹部表示信任等條件之下，才能解決。波爾什維克已把這個極困難的任務解決了：舊軍官叛變的事情在我們這裏有過很多，但紅軍畢竟不僅在我們掌握中，而且它還學會了戰勝沙皇將軍，戰勝英法美等國的將軍們。

所以凡是真正想避免高爾察克叛亂慘禍的人，都應當把一切力量，一切資財，一切能力，完全貢獻到建立和鞏固紅軍的事業上。忠誠執行一切關於紅軍的法令和命令，維護紅軍中的紀律，每個人都要竭盡全力來幫助紅軍，這就是凡屬不願意遭受高爾察克匪患的覺悟工農所應盡的頭一個基本的和主要的天職。必須極力嚴防游擊主義，嚴防個別隊伍擅自行動與不服從中央權力等行為，因為這是會使事業陷於滅亡的；烏拉爾、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事變都證明了這一點。

誰不盡心竭力幫助紅軍，誰不盡力維護紅軍中的秩序和紀律，誰就是變節者，叛徒，就是高爾察克匪幫，就應遭受無情的殲滅。

我們若擁有強固的紅軍，便會是不可戰勝的。沒有強固的紅軍，我們必然會成爲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的犧牲品。

第二個教訓。國家若沒有豐富的存糧，則紅軍便不能鞏固，因爲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自由調動紅軍，不能好好訓練紅軍。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供養爲軍隊工作的工人。

一切有覺悟的工農都應當知道，應當記得，現在我們紅軍勝利還不够迅速，不够穩固的主要原因，正是由於國家的存糧不够。誰不把餘糧交給國家，誰就是幫助高爾察克，誰就是叛賣工農的人，誰就是造成紅軍中幾萬工農枉然遭受犧牲或痛苦的罪人。

一切騙子，奸商和完全愚昧無知的農民都這樣想：我把糧食照自由價格出賣，總比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所賺的錢要多得多。

但正是由於自由出賣就使投機業增長，使少數人發財，使富有者愈富，而工人群眾則仍舊忍飢受餓，這是我們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產糧最豐地區所實際看到

了的情形。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資本則雄霸一方，勞動則陷於飢餓貧困。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糧食價格會提高到每普特幾千盧布，貨幣跌價，少數投機份子發財，人民愈益貧困飢餓。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使國家存糧消耗一空，軍隊軟弱無力，工業停頓，而高爾察克或鄧尼金就必然獲得勝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農政權的死敵才自覺地主張自由出賣糧食。凡是因自己愚昧無知而主張自由出賣糧食的人，便應當從西伯利亞和烏克蘭例子中學會並了解，爲什麼自由出賣糧食便使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

還有一種愚昧農民說：讓政府先照戰前價格用很好的貨物來同我交換糧食，那時我就交出自己的餘糧，不然的話，我是不會交出的。騙子和擁護地主的人常常是利用這種言論來誘農民『上鉤』。

不難了解，工人國家因被資本家爲爭奪君士坦丁堡所進行的四年強盜戰爭弄

得破壞無餘，後來又被高爾察克，鄧尼金在全世界資本家幫助之下，因圖謀報復而大肆破壞，而這樣的工人國家此刻是無法給農民貨物的，因為工業在停頓中。既無糧食，又無燃料，又無工業。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農民都會同意把餘糧借給工人，而以將來用工業品償還為條件。

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一切覺悟的有理智的農民，一切人們，除了騙子和奸商以外，都會同意應當把所有的餘糧全部借給工人國家，因為那時國家就能恢復工業而給農民以工業品。

有人會問我們，農民是否會相信工人國家而把多餘糧食借給它呢？

我們就回答說：第一，國家給與借券，即紙幣。第二，所有農民都從經驗中知道，工人國家，即蘇維埃政權是幫助勞動者而反對地主資本家的，所以蘇維埃政權也就叫做工農政權。第三，農民沒有其他的出路：或者相信工人，或者相信資本家；或者信任工人國家，把糧食借給它，或者就信任資本家底國家。在俄國

以及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內，農民都是沒有其他出路的。農民愈有覺悟，就會愈加堅定地擁護工人，就會愈加堅決地盡力幫助工人國家，以便使地主資本公司政權無法復辟。

第三個教訓。爲要澈底消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就必須遵守極嚴格的革命秩序，必須神聖般地恪守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和指令，並監督一切的人來執行這些法令和指令。

根據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獲得勝利的例子，我們大家都明顯看到，稍微混亂而無秩序，稍微違犯蘇維埃政權底法令，稍不當心或稍許懈怠，都會立刻加強地主和資本家的勢力，促成他們勝利。因爲地主資本家並沒有被消滅，並不自認爲是失敗了的：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農民都看見，都知道，都懂得，地主資本家只是被擊潰之後躲藏起來了，隱藏起來了，往往改穿了『蘇維埃的』『帶保護色的』服裝。許多地主鑽進到了蘇維埃農莊中，許多資本家鑽進到各種『總局』和『中央』裏，變成了蘇維埃的職員，他們隨時隨地窺伺着蘇維埃政權的錯誤

和弱點，以便把這政權推翻，以便在今天幫助捷克斯拉伐克軍團，明天又幫助鄧尼金。

必須用全力偵察和捉拿這些盜匪，這些匿藏起來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在其一切掩蔽所裏去揭露他們，無情地懲罰他們，因為這是勞動者底死敵，是一些熟悉情形，富有經驗的奸滑敵人，他們耐心地等待着組織陰謀的便利機會；這是一些怠工者，他們不惜採用一切萬惡手段來危害蘇維埃政權。對付這種勞動者底死敵，對付地主和資本家，對付怠工者和白匪，應當是鐵面無情的。

爲要善於捉拿這些人，自己就必須是機敏的，謹慎的，有覺悟的人，必須極細心地監視每個稍無秩序的現象，每個略微表示不誠實執行蘇維埃政權法令的行爲。地主和資本家還是強有力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擁有知識和經驗，不僅是因為他們有世界上極富強國家的援助，而且還因為廣大羣衆的習慣和愚昧底勢力，這些羣衆想『照舊』生活，而不懂得必須嚴格而誠實的遵守蘇維埃政權的法令。稍微違反法律，稍微破壞蘇維埃秩序，便已經是可以立刻被勞動者底敵人利

用的缺陷，便是可以使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的支點。高爾察克叛亂開始是
由於對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稍欠謹慎，是由於個別團營之小小違反命令，——如果
忘記這些事情，便是犯罪的行爲。

第四個教訓。不僅忘記高爾察克叛亂係從細小事情開始，這是一種犯罪行
爲，而且如果忘記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了高爾察克叛亂的產生並直接擁
護了他們。這也是一種罪行。現在已是學會不按各政黨的言論而要按它們的行爲
來估計各政黨的時候了。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稱爲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乃是白匪的幫手，地主
資本家的幫手。實際證明這一點的，不僅單是個別的事實，而且有俄國革命歷史
上兩個偉大時代：（一）克倫斯基的叛亂，（二）高爾察克的叛亂。在這兩次事
變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
實際上則起着白軍幫手的作用。難道我們竟會這樣愚蠢，現在還相信他們的話，
相信他們向我們提議再允許他們『試驗』一次，而把這允許叫做什麼『社會主義

（或民主主義）統一戰線」嗎？難道在高爾察克叛亂後，除了個別份子外，農民還不懂得與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結成「統一戰綫」，便是與高爾察克幫手們實行統一嗎？

有人會反駁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經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放棄與資產階級結成任何聯盟。但這不是事實。第一，右派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甚至還沒有放棄這種聯盟，而這些「右派」是沒有一定界限的，其所以沒有，是由於「左派」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罪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甚至最好的份子口頭上「責斥」他們的「右派」，實際上却違反自己的言論而軟弱無力地與右派爲伍。第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甚至最好的份子，也恰恰在擁護高爾察克派的主張，這種主張是幫助資產階級和高爾察克與鄧尼金的，是掩蓋這些人所幹的骯髒血腥的資本主義勾當的。這種主張就是所謂人民政權，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制，立憲會議，出版自由等等。在全世界上，我們都看見各資本主義共和國正是用這種「民主」謊話來辯護資本家的統治，辯護爲奴役殖

民地而進行的戰爭。在我國，我們看見無論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以及任何一個將軍都樂意發出這種『民主』諾言。對這類因聽信口頭諾言而來幫助公開匪徒的人，是否可以信任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無例外的都在幫助公開的匪徒、幫助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而用虛假的民主主義口號來粉飾他們的政權，他們對俄國的進攻，他們的統治，他們的政策。所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向我們提議締結『聯盟』，其條件是我們向資本家及其領袖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讓步，例如『放棄恐怖手段』（當着全協約國的億萬富翁，所有在俄國組織陰謀叛亂的極富強國家正在聯盟採用恐怖手段反對我們的時候），或者要我們開放糧食自由貿易的道路等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提出的這些『條件』就是說：我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動搖到了資本家方面，須知資本家利用每種讓步來反對波爾什維克，而我們却願意與波爾什維克結成『統一戰線』！不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老爺們，現時在俄國別要想找到還會相信你們的人了。俄國有覺悟的工農都懂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白匪的幫手，其中一部份人是自

覺的惡意的這樣做，另一部份人是由於缺乏理智，由於堅持舊錯誤才這樣做，但是所有他們都是白匪的幫手。

第五個教訓。爲要消滅高爾察克及其黨羽，爲要不使他們能重整旗鼓，就必須使所有農民都毫不動搖地來選擇擁護工人國家這道路。人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甚至他們中間的『左派』）都用『一黨專政』，即波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專政來恐嚇他們。

農民從高爾察克例子中學會了不害怕這種恐嚇話。

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底專政（即鐵腕政權），或者就是工人階級底專政。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只有公子少爺，小智識份子這些瀏覽壞書一學無成的人，才會來憑空幻想中間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中間道路，而且決不能有中間道路。或者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而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說什麼人民政權，立憲會議，各種自由等等的漂亮言詞掩蓋着），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誰沒有從整個十九世紀的歷史中學會這一點，誰就是無可救藥的白癡。而在俄

國，我們大家都看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克倫斯基時代和在高爾察克統治下曾如何幻想這中間道路。

這些幻想是替誰效力呢？這些幻想又幫助了誰呢？只幫助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而已。幻想中間道路的人就是高爾察克的幫手。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業已根據經驗把資產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專政加以比較過。工人階級專政，是由波爾什維克黨實現的，這個黨還在一九〇五年，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已把全體革命無產階級溶成一片了。

工人階級專政，這就是說：工人國家要毫不動搖地鎮壓地主和資本家，鎮壓幫助這些剝削者的叛徒和變節者，並戰勝他們。

工人國家是地主和資本家、騙子和投機者底鐵面無情的敵人，是土地和資本私有制底敵人，是金錢權力底敵人。

工人國家是勞動者和農民底唯一忠實可靠的朋友和幫助者。絲毫不動搖到資本方面去，結成反資本的勞動者聯盟，工農政權，蘇維埃政權——「工人階級專

政」的實際意義就是如此。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想用這些話來恐嚇農民，這是不會成功的。在高爾察克叛亂後，甚至處在窮鄉僻壤的工人和農民都懂得，這些話恰恰是免除高爾察克災禍的良藥。

打倒動搖者，打倒無氣節者，打倒那些誤入迷途而幫助資本的人，打倒那些爲資本底口號與諾言所誘惑的人！與資本作無情的鬥爭，結成勞動者底聯盟，結成農民與工人階級底聯盟，這就是高爾察克事變所給於我們的最後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的一個教訓。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九十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四三一至四三六頁

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

莫斯科徵收黨員週恰逢蘇維埃政權的困難時日。鄧尼金的勝利，引起了地主資本家及其朋友方面拚命加緊組織陰謀，引起了資產階級加緊企圖擾亂人心，用各種手段摧損蘇維埃政權底堅固性。動搖者，觀望者，不自覺的庸人，而與之携手的還有智識份子，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果然都更加動搖起來，最先被資本家嚇倒了。

但是我認為，莫斯科徵收黨員週，恰值困難關頭，這一點反而與我們有利，因為這對於事情更有益處。我們舉行徵收黨員週，不是爲了炫耀觀瞻。裝飾門面

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我們也是不收的。世界上唯一不關心於增加黨員數量，而注重提高黨員質量，注意清洗『混進黨來』的異己份子的執政黨就是我們的黨，即革命工人階級底黨。我們重新登記黨員已不止一次，目的在於驅除這些『混進黨來』的份子，以便只讓那些覺悟的和對共產主義真正忠實的人留在黨內。我們利用了動員人上前綫和義務星期六的辦法，來清洗黨內那些只想藉執政黨黨員地位『營私謀利』，却不願担负自己工作底重担以利於共產主義的人。

現在當加緊動員人上前綫的時候來舉行徵收黨員週是很妥當的，因為不會使那些想混進黨來的份子有機可乘。我們所號召大批入黨的只是普通工人和貧苦農民，即勞動農民，而不是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並不因他們入黨就給這些普通黨員什麼預約，或者就給他們什麼利益。恰恰相反，現在黨員要担负比平常更困苦更危險的工作。這樣要好一些。這時只有真心贊成共產主義的人，只有誠意忠實於工人國家的人，只有真誠的勞動者，只有在資本主義下被壓迫羣衆底真正代表，才會入黨。只有這樣的黨員，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需要新黨員不是爲了壯耀觀瞻，而是爲了進行森嚴的工作。所以我們號召他們入黨。我們向勞動羣衆大開黨門。

蘇維埃政權是爲完全剷除資本壓迫而鬥爭的勞動者底政權。首先奮起進行這種鬥爭的，是各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工人階級。它獲得了第一次勝利，奪得了國家政權。

它使大多數農民與自己聯合起來。而趨向於資本，趨向於資產階級方面的，則只有農民中的小商人，農民中的投機者；而不是勞動農民。

最進步最覺悟的工人，即彼得城工人，推拔出了最多的人材來管理俄國。可是我們知道，在普通工人和農民中，忠實於勞動羣衆利益，能够担任領導工作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在這些人中有許多具有組織天才和管理天才的人，資本主義不讓這些人發展，我們却盡力幫助這些人，並應當幫助他們上進，以便担负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要找到這些樸質而不露頭角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要吸引那些歷來被地主資本家壓迫和恐嚇的普通工農來參加國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們所應該進行，而且必須進行的，正是這種不容易的工作，以便從工人階級，從勞動農民的深處吸取新的人材。

非黨的工人和勞動農民同志們，加入黨裏來吧！我們並不因此約許你們什麼利益，我們號召你們來進行困難的工作，進行國家建設的工作。如果你們是忠誠擁護共產主義的人，那你們就大胆來負起這種工作，不要害怕其中的新事物和困難，不要被以爲只有受過官家教育的人才能勝任的陳腐偏見，弄得惶惑不安吧。

這樣是不對的。普通工人和勞動農民能够，而且應當人數日益增多地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

勞動羣衆擁護我們。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此。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不可戰勝的泉源也就在於此。多吸收羣衆中新的工作者入黨，使其獨立參加建設新生活的

工作，這就是我們克服一切困難的手段，這就是我們走向勝利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二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八四至四八五頁

告紅軍兵士同志們

紅軍兵士同志們！這些沙皇將軍，在北方是尤登尼奇，在南方是鄧尼金，又一次緊張力量，想來戰勝蘇維埃政權，恢復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

我們知道，高爾察克同樣的企圖有了怎樣的結果。他欺騙了烏拉爾工人和西伯利亞農民，爲時是不久的。烏拉爾工人和西伯利亞農民看清了這種欺騙之後，遭受了地主資本家子弟軍官們無窮的暴行、鞭笞、搶劫之後，就幫助我們紅軍打敗了高爾察克。奧倫堡的哥薩克直接轉到了蘇維埃政權方面。

所以我們堅信，我們定會戰勝尤登尼奇和鄧尼金。他們想恢復沙皇地主政權

的企圖是不會成功的。這是決不會有的事！農民已經在鄧尼金底後方起義了。在高加索，反鄧尼金的起義火焰已經熾燃起來了。庫班一帶的哥薩克大不滿意鄧尼金爲了幫助地主和英國人所採用的強暴搶劫手段，都憤激不平起來。

紅軍兵士同志們，堅如鐵石吧！工人和農民愈益團結地，愈益有覺悟地，愈益堅決地站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

紅軍兵士同志們，前進啊！爲工農政權而挺身赴戰，反對地主，反對沙皇將軍！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尼、列寧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一九年十月刊載於紅軍兵士雜誌第十至第十五期合刊上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八九頁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臨到蘇維埃政權第二週年的時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寫一本小冊子，可是因爲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還祇初步地準備了個別章節。所以我決定嘗試嘗試，用提綱方式把我認爲是本問題中最重要意思簡略敘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敘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點的，但在一篇不大的雜誌論文中，也許總可以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即指出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以供各國共產黨員討論。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橫着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含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底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具有這種過渡時期特點的整個歷史時代底必然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有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對於發展論有相當認識的人，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麥克唐納和龍格，考茨基和阿得列爾之流在內，不管他們掛着社會主義的假招牌，都是這樣的民主派），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這種顯然的真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厭惡階級鬥爭，幻想避免這種鬥爭，力圖輾

平、調和及鈍化這種鬥爭底鋒芒。所以這類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則認定自己的任務，不是領導兩種鬥爭力量一方的鬥爭，而是把兩種鬥爭力量調和起來。

二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會社經濟底基本形態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祇能牽涉到非最主要的東西。

這些社會經濟基本形態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共產主義。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俄國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廣大的全國統一範圍內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這種勞動底初步形態，與小商品生產，與尚保存着並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復活着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鬥爭。

其所以說勞動在俄國已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了起來，第一，是因為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全國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國有土地上和國有企業中的大生產，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來分配勞動力，把屬於國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

我們是說俄國共產主義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黨黨綱就是這樣說的），因為這些條件在我國還祇部分地實現，換言之，這些條件的實現還在開始的階段。我們用革命打擊手段，一舉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實現的事情實現了：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無報償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剝奪了。在幾個月內就同樣毫無報償地把幾乎所有大資本公司以及工廠、股份公司、銀行和鐵路等等的私有主剝奪了。由國家來組織工業中的大生產，從『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工廠和鐵路，——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實現了，但在農業方面，這還祇是剛剛開始實行（由工人國家在國有土地上組織『蘇維埃農莊』，

即大農莊)。同樣把小農組織成爲各種共耕社，作爲從小商品農業進到共產主義農業^①的過渡辦法一舉，也剛剛才開始進行。至於由國家組織物品分配來代替私商，即是由國家採辦糧食並運給城市，採辦工業品並運給鄉村這件事，也是如此。下面就關於本問題的統計材料。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有非常廣闊，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一般就是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

① 在蘇俄已經成立的蘇維埃農莊約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個，農業公社約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約有三千六百九十六個。我們中央統計局現時正在把所有蘇維埃農莊和農業公社作一次精確的登記。登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就會開始收到。

爲了說明這些抽象的理論原則，且來引出一些具體的統計材料。

根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在俄國境內由國家採辦的糧食，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約三千萬普特。下一年約計一萬一千萬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頭三個月的採辦結果大約可達到四千五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裏（八月至十月），則僅有三千七百萬普特。

從這些數目字中間就可看出，在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我們的情形雖改善得很慢，但總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這種改善，是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用盡世界列強所有一切力量來組織國內戰爭，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難條件下達到的。

所以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和暗藏的幫手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主義

者』)怎樣造謠，怎樣誣蔑，但有一點總是不容懷疑的：即從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觀點來看，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對波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波爾什維克，正是因為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會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決不會成功的。

我們在所得到的這個短期間內，並在行動時所處的那種舉世未有的困難條件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戰勝了資本主義，這從下述總結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製定了預備發表的關於蘇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總結如下：

蘇俄二十六省	產量 省區	消費 省區	總計
(單位百萬人)	城市……四·四 鄉村……二八·六	城市……五·九 鄉村……一三·八	(二十六省)五二·七
產糧數量 (不計種子 和飼料) (單位百萬普特)	六二五·四	一一四·〇	七三九·四
運到的糧食數 (單位百萬普特)	二〇·九	二〇〇·二	五三·〇
居民所擁有的糧食 總量(單位百萬普特)	四一·五 四八一·八	四〇〇·〇 一五一·四	七一四·七
每人消費的糧食量 (單位百萬普特)	九·五 一六·九	六·八 一一·〇	一三·六
由人民委員部運到 的	一〇·九	一一二·一	一二三·〇
由投機小販運到 的	二〇·六	二〇〇·〇	二二〇·六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糧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糧食人民委員部運到的，另一部是由投機小販運到的。據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糧情形確切調查結果來看，其比

例正是如此。但由國家運到的糧食，工人所付的價格要比由投機小販運到的少九倍。糧食的投機價格比國家定價高到十倍。這就是確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確切材料。

勞動羣衆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爲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

但是勞動羣衆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

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裏，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却把幾萬萬普特的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和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爲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於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份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只是一部份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份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得無比的任務。而且由於客觀必然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

務是不能用推翻某個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這樣的過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會阻滯這種過渡並增加其困難。只有採取各種使農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農業技術，並把這技術加以根本改造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爲了解決這個最困難的第二部分任務，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在自己對農民的政策方面，一貫地執行以下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勞動者和農民私有者，即是把農民中的工作者和農民中的商人，農民中的勞動者和農民中的投機者分別開來。

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所在。

無怪乎那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考茨基之流）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底這種實質。

這裏所說的分別是很難實行的，因爲在實際生活中，「農民」所有的一切特

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異，如何互相矛盾，總是溶合爲一個整體。但是把他們分別開來，還是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條件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案，投機小販，奸商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內）所壓迫。勞動農民在幾百年中養成了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實際生活的『教養』，就迫使農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案，反對奸商，反對投機小販。同時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環境又必然使農民變爲（並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如此）投機小販和奸商。

根據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顯然看出農民勞動者與農民投機者的區別。有一種農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爲了供給城市裏受餓工人，而按照國家固定價格，把四千萬普特糧食交給了國家機關，雖然當時這些機關還有許多缺點，而這種缺點是工人國家所明白認識，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時期中，是無法免除的，——這種農民就是勞動農民，他們完全不愧爲社會主義工人底同志，是社會主義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會主義工人在反資本壓迫鬥爭中

的骨肉兄弟。還有一種農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飢餓，暗地裏用超過國家定價十倍的價錢，出賣了四千萬普特糧食，這樣來欺騙國家，到處引起並加強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這種農民就是投機者，就是資本家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敵人，就是剝削者。因為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從全國公有土地上收割來的，而其所用的農具不管怎樣都不僅是由農民，而且是由工人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等等；用餘糧去投機，這就是剝削忍飢受餓的工人。

人們從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憲法上工農不平等，指責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用強力奪取餘糧等事實說道：你們是破壞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作過這樣多的事情，來消滅勞動農民千百年來所備受苦痛的那種實際上的不平等，那種實際上的不自由。可是對於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承認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認剝削者可以與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與飢餓者「平等」，不承認前者有劫掠後者的「自由」一樣。而對於那些不願意了解這種區別的有學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對待白黨

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那怕這種人自稱爲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考茨基派，切爾諾夫派，馬爾托夫派等等。

五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階級一消失，專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雖然還是存在，但每個階級都改變了，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並不消失，而只是採取別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壓迫階級，是被根本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是唯一直接而完全與資產階級對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夠澈底革命的

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成爲統治階級；它掌握着國家政權，它擁有已經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它領導着那些動搖的中間的份子和階級，它鎮壓着剝削者愈益增長的反抗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底特殊任務。這種任務，是無產階級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不能提出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着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爲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們擁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這使他們獲得極大極大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之反對已獲勝利的被剝削羣衆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得無可比擬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用改良幻想去代替這革命概念（如像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幹的那樣），那麼情

形也就只能這樣。

末了，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眾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慣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

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或者說，對於這種社會成份的任務，就是要領導他們，爭取對他們的影響。領導動搖份子和不穩定份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一切基本力量或階級及其由無產階級專政所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比

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國際一切代表們中所流行的，說什麼「經過一般民主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極了。這種錯誤觀念底基礎，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下來的偏見，以爲「民主制」包含有絕對的，超階級的內容。其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鬥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從於階級鬥爭。

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具體任務，就無異是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從無產階級方面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出：是擺脫哪一個階級壓迫而獲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與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爲基礎的民主制，還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爲基礎的民主制？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⁷⁴一書中早已解釋過，平等概念是商品生產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瞭解爲消滅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會變成一種偏見。關於資產階級

民主主義平等概念與社會主義平等概念不同的這種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這個真理，那就顯而易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滅階級的方向上實現了最重大的前進步驟，無產階級爲要把消滅階級這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鬥爭、影響和逼迫手段。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待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〇七至五一五頁

◎ 本文未完——編者。

與燃料恐慌作鬥爭

給各地黨組織的通告

同志們！我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負有統一工人階級鬥爭並領導它爭取工農蘇維埃政權勝利的任務。我們兩年來勝利地進行了這種鬥爭，現在便明白知道，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才克服了由於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弄得國家破產以及由於俄國和國際一切剝削者羣起抵抗之在我們面前所造成的莫大困難。

同志們！我們力量的主要泉源就是我國工人的自覺性和英勇精神，以及勞動農民對工人所不能不始終表示的同情和擁護。我們各次獲得勝利的原由，是由於

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把一切當前困難和當前任務公開宣告於勞動群眾；善於向羣衆解釋，爲什麼在某個關頭應當致全力於蘇維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善於鼓舞羣衆底毅力，熱情和英勇精神，而把革命的高度努力集中於當前最主要的任務之上。

同志們！當前這一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與燃料恐慌作鬥爭。我們正在肅清高爾察克底殘餘，我們戰勝了尤登尼奇，我們開始了對鄧尼金的順利進攻。我們大大改善了採辦糧食和儲藏糧食的工作。但燃料恐慌有破壞全部蘇維埃工作的危險。工人和職員因飢寒交迫開始棄職離散，運輸糧食的車輛中途停止着，正因爲缺乏燃料而使真正的災禍日益逼近起來。

燃料問題成了其他一切問題的中心。無論如何都要把燃料恐慌克服下去，否則糧食任務，軍事任務，全國經濟任務，都無從解決。

燃料恐慌也是有法克服的。因爲我們雖然失去了頓巴斯的煤炭，又沒有可能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迅速增加煤炭開採量，但我們還有許多森林，我們可以砍伐和運來足夠的木柴。

燃料恐慌是有法克服的。現在要善於集中主要力量來對付我們目前主要的敵人，即對付燃料恐慌，要善於引起勞動羣衆的熱情，要善於按革命精神聚張一切毅力來極迅速地大批地開採和運到各種各樣的燃料：煤炭，岩炭和泥煤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所有各地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既在兩年來表現有能力有智慧用革命手段解決比這一並不輕易而是更加困難得多的任務，現在也定能解決這個任務的。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各地黨組織特別提出下列辦法

(一) 所有黨組織今後應當經常在黨的會議，首先是在黨委會議的議事日程上提出燃料問題以及與燃料恐慌作鬥爭的問題。爲了挽救燃料恐慌，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應當做些什麼？怎樣加強這種工作？怎樣使這種工作更有成效？——所有一切黨組織現在都要來注視這些問題。

(二) 各省執行委員會，各市執行委員會，各縣執行委員會，各區執行委員

會，總而言之，一切蘇維埃領導機關，也都應當這樣做去。黨員應當負起首倡責任，來在全國範圍內加強統一這種工作，並使這一工作緊張起來。

(三) 要到處進行極廣泛的鼓動工作，主要是在鄉村中進行鼓動工作，來解釋燃料問題對於蘇維埃政權的意義。特別要進行鬥爭反對在燃料事宜上專注意地方利益，鄉土利益，狹隘利己傾向。要向大家解釋，不來為全國需要而進行自我犧牲的工作，便不能挽救蘇維埃共和國，便不能捍衛住工農政權。

(四) 要萬分仔細地檢查黨底指示和蘇維埃政權底委託、要求、指令之實際執行的情形。在最近一次徵收黨員週入黨的新黨員，都應當被徵收來檢查全體人員怎樣執行了自己的義務。

(五) 全體居民義務勞動制，或動員一定年齡的人去採掘和運輸煤炭，砍伐和運輸木柴到各鐵路車站去，這一工作應當以最大的速度和最嚴格的紀律進行起來。必須規訂勞動標準額，並無論如何都要設法完成。對於那些違背再三告誡、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須嚴格無情的加以處分。任何寬容態度，任何軟

弱態度，都是對革命的犯罪行爲。

我們提高了軍隊紀律。我們現在應當提高勞動紀律。

(六) 義務星期六應當多多進行，要更加積極，更有系統，更有組織，並且首先是在燃料工作中去進行。黨員在遵守勞動紀律和努力工作方面應當成爲一切人的模範。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和其他中央機關以及各地蘇維埃機關關於燃料問題的決議，都應當真心誠意地加以實現。

(七) 應派黨內優秀工作人員去加強各地方燃料機關。幹部的分配，應按照這種目的來加以審查和相當改變。

(八) 從中央派出的同志，應給以一切幫助，達到在組織、佈置和進行燃料工作方面，能培養出 並且要在實踐中培養出——盡量多的青年人材。在地方刊物上要對這種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把真正優良的模範工作很關心地表彰出來，使大眾知道，同時要無情地反對個別區域，個別機關，個別部門的落後懈怠現象或不善於工作的情形。我們的刊物應當成爲推進落後者，教育人們去執行工

劫，遵守勞動紀律，從事組織等等的工具。

(九)保證採掘及運輸燃料人馬的糧食和飼料，應成爲糧務機關最重要的任務。要從各方面來幫助這些機關，加強它們的工作，監督工作的執行。

(一〇)在一切燃料機關中(以及在一切蘇維埃機關中)要孜孜不倦地力求做到在實際上保證各人親自·担·負·一·定·的·工·作·，即嚴樁而確切指定了的工作或一部份工作。集體討論的辦法，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無論何時也不要阻礙迅速和果斷決定問題，無論何時也不要停息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性。

(一一)關於一切燃料問題的公文手續，必須特別確切而迅速。稍有遲誤，就應受到無情的懲罰。向中央的報告應當是模範式的報告。

(一二)一般說來，全部燃料工作應當按軍事方式來進行：用戰爭所要求的同樣毅力，速度和最嚴格的紀律來進行。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克服。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挽救。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全體同志都會緊張全力最積極最確切地來執行這

些指示。

爲戰勝燃料危機而鬥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二至五三五頁

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

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同志們！我非常高興地代表政府向你們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致敬。你們大家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當然都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公社協作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早已撥出了十萬萬盧布基金來幫助創辦這種事業。在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條例上特別指出了公

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業的意義；蘇維埃政權也就用全力來使這個法令不致成爲一紙空文，而能真正收到它所能收到的成效。所有這種企業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因爲原來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仍舊不變，那末任何堅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也就無從談起。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哪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各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來從外面，從旁邊去強迫加以改造，那就是完全荒謬的思想。我們明白懂得，要想影響千百萬小農經濟，只能採取逐漸的謹慎的辦法，只能用實際模範例子來表明，因爲農民非常講求實際，與舊式農業聯結得非常鞏固，要使他們作某種嚴重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要是這樣辦，那就既不可

備，而且荒謬。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身經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家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嚴重的進步。所以這個賦予你們大家以巨大國家義務和社會主義義務的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底巨大意義，自然使得蘇維埃政權及其代表們對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和特別謹慎。

在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法令中說過，我們認為所有一切共耕的合作的農業企業絕對不應與附近農民隔離起來，表示特殊化，而是必須幫助他們。在法令中這樣寫着，在公社章程中又這樣重複着，在我們農業人民委員會各指令中也經常發這種點，而這乃是最主要的事情。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找到真正實際辦法，怎樣來實現這點。在這裏我還不能肯定說，我們已經克服了這個主要困難。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你們既是從全俄各地來到的公共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就有可能互相交換經驗，所以我想，代表大會定要掃除一切懷疑，而証明我們是已經通曉着或已開始通曉着這鞏固勞動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種集體、公共農業企

業的實際事業。但是要証明這點，就需有真正實際上的成果。

當我們讀到農業公社章程或論述本問題的書籍時，總覺得我們過多注意於宣傳和在理論上論證公社組織底必要。當然，這是必須要做的；若沒有詳細的宣傳，若沒解釋共耕制農業的優越性，若不把這個意思千番百次加以說明，我們便不能指望廣大農民群眾會對本問題發生興趣，而開始來具體試驗實現它的種種辦法。宣傳當然是必要的，再三重複是庸不著害怕的，因為對於我們似乎是重複，而對於成千成萬的農民也許會不是重複，而是他們第一次發現的真理。若認為我們過於注重宣傳，那就應當說，我們還必須加一百倍的這樣做去。但我說這話，只是想表明這樣的意思，即如果我們向農民一般解釋農業公社制度的好處，同時却不會在實際上把共耕社和勞動組合所給予他們的實際益處表明出來，那末農民就不會信任我們的宣傳。

這法令上說，公社、勞動組合、共耕社應當幫助附近的農民。但是國家，工人政權撥出了十萬萬盧布的基金來幫助農業公社和勞動組合。當然，如果某個公

社從這基金中拿出一點來幫助農民，那末，恐怕這就只會引起農民方面的譏笑。而且這種譏笑是完全有根據的。任何一個農民都會說：『既然撥了上十萬萬的基金給你們，那你們自然不難從這基金中掏出一點，讓我們也來沾沾光哩』。恐怕農民只會譏笑這種行為，因為農民對於這個問題非常注意，而且抱着極不肯輕信的態度。農民千百年來從國家政權方面所遇到的只是壓迫，這點已司空見慣了，所以農民對於凡是官家做出的事情總是表示不肯輕信。因此，農業公社對農民實行的幫助，如果只是爲了奉行法令，那末這種幫助不僅無益，而且只會有害。因爲農業公社是個很響亮的名稱，是與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有聯繫的。如果公社在實踐上表明自己是真正在進行認真改良農民經濟的工作，那才名符其實，那時就無疑地會提高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底威信。但往往也有這樣的情形，公社只是激起農民對自己的反感，而『公社』這個名詞有時甚至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口號。並且這種情形不僅當人們荒謬絕倫地企圖用強迫手段迫使農民加入公社時，發生出來。這種荒謬舉動如此刺目，使得蘇維埃政權早已就在反對這種行動。我希

望，假如現在還能遇到有採用強力手段的個別例子，那末這種例子是很少的，而你們也就要利用本屆代表大會來把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殘跡從蘇維埃共和國中根本剷除乾淨，使附近農民不能找到半點口實來擁護舊的成見：似乎加入公社，都是與某種強力手段有關。

但即令我們消除了這種舊缺點和完全克服了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我們還不過是做了我們所應作的極小的一部份工作。因為由國家幫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假使我們若不極力由國家來幫助各種集體農業，那我們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便不是擁護建樹社會主義經濟的人。我們之所以不得不這樣做，也因為這是適合我們全部任務的設施，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共耕社，勞動組合和集體組織都是新的創舉，如果執政的工人階級不給這些創舉以幫助，那它就不會發育起來。爲了使它真的發育起來，正因為國家根據實情給它以金錢上的及其他各種幫助，我們就要做到使農民不致於來譏笑這種創舉。我們應當常顧慮到，使農民不會說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的社員是靠官家養活的，說他們與普通農民的區別，只在

於他們受到有官家的優待。如果除了土地外還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撥出錢來補救費，那末任何一個傻瓜都會比普通農民過着較為富裕的生活了。農民會說：這裏哪談得上什麼共產主義，這裏有什麼改良，他們有什麼值得我們敬佩的地方呢？當然，如果選出幾十個或幾百個人來，給他們幾十萬萬盧布，那他們都是會工作的。

最使我們憂慮的正是農民的這種態度，我很希望參加此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注意。必須在實踐上適當解決這個問題，使我們能夠自備地說，我們不僅免除了這種危險，而且找到了方法來使農民不僅不會這樣着想，反而使他們在每個公社中，在每個勞動組合中，都看到由國家政權幫助的某種事情，並在其中找到，不是從書本上和言論中找到，——這是很容易的，——而是從實際生活中找到表明自己是優於舊式的那種新的農作方法。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所以如果我們手邊只有一些枯燥的數目字也就很難判斷，是否我們已實際證明了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都是真正高於所有一切舊時企業的組

織，是否證明了工人政權在這裏幫助農民。

我想，爲要實際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是由你們這些實際認識當地許多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情形的人，製訂出真正實際的監督辦法，來監督那責成農業公社幫助附近農民的法令之實施；監督怎樣實際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去的辦法，以及這些辦法在每個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中的具體表現何在；究竟這個法令是怎樣實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實地執行這個法令，又有多少是僅僅在準備執行這個法令；公社對農民的幫助有過多少次，這種幫助的性質如何，是慈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

如果公社和勞動組合從國家對它們的補助金中分出一部份給農民，那末這只會使每個農民想到，這不過是一些善人在幫助他，但完全不是證明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事實。農民對於這樣的『善人』，自古以來就是懷着不肯輕信的心理。要善於檢查這個新社會制度真正表現何在，究竟用什麼方法向農民證明了，採用共耕和勞動組合辦法經營土地，比個體農民獨自耕種的辦法要好些，其所以善

些，並不是由於官家幫助；要設法善於向農民證明，沒有官家幫助，這種新制度實際上也是能夠實現的。

可惜我不能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出席到底，所以我不能來參加規定這些檢查辦法。但我相信，你們和我們農業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同志一塊，定能找出這樣辦法來的。我很滿意的讀過了農業人民委員謝略得同志寫的一篇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着重指出說公社和共耕社不應當與附近農民隔離，而是要努力改善農民經濟。要把公社經營成爲模範農莊，使附近農民自願做法公社；要善於作出實際例子給它們看：應當怎樣來幫助那些在貨物缺乏和全般經濟破壞的困難條件下經營農務的人們。爲要決定實現這點的實際辦法，就必須製定一個非常詳細的指令，在這個指令中，應當列舉幫助附近農民的各種方式，應當詢問每個公社，究竟它在幫助農民方面做了一些什麼事情，應當指出具體辦法，如何達到使現有的兩千公社和大約四千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在實際上成爲鞏固農民信念的核心，使農民相信集體農業這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辦法是有益處的東西，而不是空想，而

不是夢囈。

我已經說過，法令責成公社幫助附近農民。要在法令中用另一種方式來表明這種意思，寫出某些實際的指示來，是不可能的。我們本來是要規定出一般的原則，而指望各地有覺悟的同志們會誠意執行這種法令，並善於找到許多辦法，按照各地具體經濟條件來實施這個法令。但是對任何一個法令當然都有法迴避，甚至能夠在外表上假裝實行而來加以迴避。所以關於幫助農民的法令，如果不誠意實行的時候，它可能變成一種真正玩具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

公社所應當發展的方向，就是要使農民在與公社接觸時，能得到物質的幫助，而開始來改變自己的經營條件；要使每個公社，勞動組合或共耕社都善於奠定改良這些條件的基礎，並在實際上加以改良；這樣來實際證明給農民看，這種改變只會對他們有益處。

你們自然可以想到，人們會說，要改良經濟就要有比現在好一些的條件，而現在的條件，乃是由於四年帝國主義大戰以及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進行的兩年國

內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在現時我國這樣的條件下，怎麼還可以想到廣泛推行改良農業的事情，要是能勉強強強過下去不致於餓死，也就算是托天之福。

當然，這樣的懷疑是可以發生的。但如果我遇到了這種反駁意見，那我就要用以下的話來回答。就假令由於經濟解體，經濟破壞，貨物空虛，運輸力薄弱，工具和牲畜已被毀滅，以致真正無法廣泛進行改良農業經濟吧。可是，在許多個別情形下，相當改良農業經濟，毫無疑義是可能實現的。就假令連這點也不能辦到，那末，這是否就可以說，公社無法使附近農民生活改變，無法向農民證明出，集體農莊不是人工培植的暖室植物，而是工人政權對勞動農民的新幫助，是協助農民去反對富農的辦法呢？我相信，就假令這樣提出問題，就假令我們在現時經濟破壞條件下無法實行改良，但是如果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有誠意工作的共產黨員，那還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績來的。

爲了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就來舉出我們在城市裏叫做義務星期六的事情來做例子。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時間之外再爲社會需要做幾點鐘的某種義務工作，

這種辦法就叫做義務星期六。這種義務星期六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倡首實行的。蘇維埃政權有次在號召中指出說，紅軍戰士在前線上忍受着空前的犧牲，他們雖然經受各種困苦，還能獲得對敵人的空前勝利；同時又說，我們要把這勝利貫徹到底，就必須使這種英勇氣概，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不只表現在前線上，而且也表現在後方。莫斯科工人就以實行義務星期六來回答了這一號召。毫無疑義，莫斯科工人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要比農民厲害得多，如果我們考查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並想一想他們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下竟能開始實行義務星期六，那末你們就會同意，決不靠藉任何困難條件來拒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實現的事情，只要能運用莫斯科工人所運用過的這種辦法。當義務星期六已經不是單個的現象時，而非黨工人又在實際上看見執政的共產黨黨員担負起這種義務，看見共產黨徵收新黨員並不是使他們利用政府黨的地位來獲得利益，而是使他們做出真正共產主義勞動的模範，即做出無報酬工作的模範，——正是這樣的義務星期六最能幫助提高共產黨在 cities 中的威信，最能幫助增強非黨工人對共產黨員

的敬仰。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那時人們從事勞動，都是由於覺悟到必須爲共同利益而工作。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勞動制，——希望我們的兒輩，也許孫輩能够把這種制度建成起來也就好了。但是我們說，執政的共產黨黨員也挺身担負着在與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大多數困難，既動員優秀的共產黨員上前線，而對於那些不能上前線的黨員，就要求他們執行義務星期六的工作。

這種義務星期六現時已在每個大工業城市中推行起來，現在黨要求每個黨員都參加這種工作，對於不執行這種要求的黨員，甚至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如果你們把這種義務星期六的辦法也在公社中，勞動組合中和共耕社中實行起來，那就甚至在最壞的條件下，你們都能够而且應當達到如下的成果，即使農民認識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每個共耕社的特點不在於它領得官家的補助金，而在於這些組織中都有工人階級的優秀份子參加，他們不僅向別人宣傳社會主義原則，而且善於親身實行這種原則，表明甚至在惡劣條件下，他們都能够用共產主義方

法來經營農業，並盡量幫助附近農民。對於這一點是不能用任何遁詞來推卸的，這裏決不能藉口說貨物空虛，種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這裏我們得以實際檢查，這種檢查至少使我們能於精確判斷，究竟我們把擺在自己面前的困難任務實際執行到了何種程度。

我相信，這次公社，共耕社和勞動組合全體代表會議上會把這個問題加以討論，並將懂得採用這種辦法會真正成爲鞏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極好手段，而且能達到實際成果。使俄國每個地方都不會發生任何農民對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表示敵意的事情。但不僅如此，還要做到使農民對它們表示同感。我們，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自己要盡力來幫助這一點，使我們國家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或其他來源中撥出的補助金，僅僅在勞動公社和勞動組合能與附近農民生活實際接近起來的時候，才來動用。沒有這種條件，則任何對公社和共耕社的幫助，我們都認爲不僅沒有益處，而且是絕對有害的。不能把公社對附近農民的幫助當作只是由於富裕有餘，而是要使這種幫助成爲社會主義性的幫助，即是造成使農民能從單

獨、個體經濟過渡到共耕農莊的條件。而要做到這點，也就只有用我在這裏說過的義務星期六辦法才行。

如果你們估計到那些比農民生活壞得無可計量，而却首先開始了義務星期六運動的城市工人底經驗，那末我深信，在你們全體一致贊助之下，我們定會達到使現存的幾千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成爲在農民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和概念的真正苗圃，成爲實際上的先例來向農民表明出，雖然它們還是嫩弱的幼芽，但畢竟不是用人工造成，不是暖室中培植出來，而是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時，我們才能鞏固地戰勝舊的黑暗勢力，才能戰勝破產和貧困現象，只有那時，我們才不會害怕橫梗在我們前途上的任何困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和二百七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至五八六頁

關於戰勝鄧尼金事致烏蘭克工人和農民的信

同志們！在四個月以前，一九一九年八月末的時候，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我曾寫過一封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現在爲了戰勝鄧尼金事，我就把這封信全部抄錄下來作爲致烏克蘭工農的信。

紅軍克復了基也輔，坡爾塔瓦，哈爾科夫並勝利地向羅斯托夫推進。在烏克蘭，反鄧尼金的起義正在沸騰中。必須集聚一切力量以便把那企圖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的鄧尼金軍隊澈底粉碎。必須消滅鄧尼金，以保證再不遭受任何新進攻的

危險。

對於俄國全體工農從高爾察克佔領西伯利亞以及人民受過地主資本家多月壓迫之後又經紅軍收復這一經驗中所得到的教訓，烏克蘭工農應當加以認識。

鄧尼金在烏克蘭的統治，正如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的統治一樣，是一個極痛苦的考驗。毫無疑義，這種痛苦考驗底教訓會使烏克蘭工農也如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一樣，更加明白瞭解蘇維埃政權底任務，並更加堅定地來保衛蘇維埃政權。

在大俄羅斯，地主土地私有制已全部消滅了。在烏克蘭也應當這樣做，烏克蘭工農蘇維埃政權應當把澈底消滅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事業鞏固起來，使烏克蘭工農完全擺脫地主的任何壓迫，並根本消滅地主。

但是除了這個任務以及其他許多仍舊擺在大俄羅斯勞動群眾和烏克蘭勞動群眾面前的共同任務以外，還有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底特殊任務。這特殊任務中有一個在現時是值得格外注意的。這就是民族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烏克蘭成爲單獨

的，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結成聯盟（聯邦），或者烏克蘭與俄羅斯組成爲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共和國。對這
個問題，所有的波爾什維克，所有的覺悟工農，都應當仔細加以考慮。

烏克蘭的獨立已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
俄國共產黨一波爾什維克所承認了，所以不言而喻，並爲衆所公認的就是，只
有烏克蘭工農自己在他們的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才能解決並且定會解決這
樣一個問題：究竟烏克蘭與俄羅斯溶合爲一個國家，還是烏克蘭成爲獨立自主的
共和國，而在後一種情形下，則烏克蘭共和國與俄羅斯間，究應建立何種聯邦關
係。

從勞動羣衆利益的觀點看來，從勞動羣衆爲使勞動完全擺脫資本壓迫之鬥爭
勝利的觀點看來，究應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勞動底利益要求在各國勞動者間，各民族勞動者間，有最完全的信任
和最緊密的聯合。擁護地主資本公司，擁護資產階級的人都力圖分裂工人，加強民

族糾紛和民族仇視，這樣來削弱工人，鞏固資本政權。

資本是國際的勢力，要戰勝這種勢力，就需要有工人底國際聯合，工人的國際親密關係。

我們是反對民族仇視，反對民族糾紛，反對民族孤立的。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力圖實現使全世界各國工農密切聯合，並完全溶合爲一個統一的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勞動者不應當忘記，資本主義把民族分成爲極少數壓迫的、雄強的（帝國主義的）、有全權的、有特權的民族和極大多數被壓迫的、附屬的、半附屬的、不平權的民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最萬惡最反動的戰爭更加加強了這種區分，使在這種基地發生的憤懣和仇恨更加尖銳化了。不平權的和附屬的民族對雄強的和壓迫的民族如像烏克蘭民族對大俄羅斯民族那樣，所懷抱的義憤和不信任心理，業已積累好幾百年了。

我們主張建立自願的民族聯盟，即不允許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施行任何強

力的聯盟，即基於充分信任和明確悟解親密合作而完全自願同意的聯盟。這樣的聯盟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應當以最大的耐心和謹慎態度來逐漸實現這種聯盟，以免損害事業，以免引起不信任心理，好使那種由於歷來地主資本家底壓迫由於私有財產以及因瓜分和重分這私有財產而引起的仇視等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得以泯滅下去。

所以，在力求實現各民族統一和無情打擊一切離開民族的行為時，我們應當非常謹慎，耐心，對民族不信任心理的殘餘採取讓步態度。但在為擺脫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凡是有關勞動基本利益的一切事情，我們應當是毫不讓步，毫不調和的。至於現在暫時怎樣來決定國界（我們是主張完全消滅國界的），這乃是一個非基本的，不重要的，只有次等意義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可以而且應當從緩解解決，因為在廣大農民和小業主群衆中，現有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常常是保持得很牢固，急驟辦法反而可以使這種心理加強起來，即是說，反而會危害完全澈底統一事業。

俄國工農革命，即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底經驗，以及這個革命在兩年內勝利地進行反對國際資本家和俄國資本家侵犯的鬥爭底經驗，顯然表明資本家得以暫時利用了波蘭，拉脫維亞，愛斯特蘭，芬蘭農民和小業主對大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得以暫時煽起了他們和我們之間在這種不信任心理基礎上發生的糾紛。經驗表明，這種不信任心理是在逐漸消失着，不過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下去，而且曾在長期中充當壓迫民族的大俄羅斯人若表現得愈加謹慎，愈有耐性，則這種不信任心理底消除就會愈有保障。正是承認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斯特蘭，芬蘭的國家獨立，我們就可雖則緩慢但能一往直前地奪得這些隣近小國中最落後，最受資本家欺騙和壓詐的勞動群眾底信任。正是採用這種方法，我們就能最有把握地把他們從『自家的』民族資本家影響下解脫出來，最有把握地使他們走向完全信任，走向將來統一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

當烏克蘭尚未完全從鄧尼金統治下解放出來時，它的政府，在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就是全烏克蘭革命委員會，其成份除了烏克蘭共產黨人波

爾什維克之外，還有以政府委員資格參加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鬥爭派份子。鬥爭派與波爾什維克的區別，主要是在於前者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獨立。波爾什維克並不將這看作是足以引起分歧和分裂的緣由，並不認爲這可以妨碍協同一致的無產階級工作。只要有在反對資本壓迫，爭取無產階級專政鬥爭中的一致，共產黨人不應當因民族國界，因兩國聯繫的聯邦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問題而發生分歧。在波爾什維克中間有人主張烏克蘭完全獨立，有人主張建立比較密切的聯邦關係，有人則主張烏克蘭與俄羅斯完全溶合。

因這些問題而發生分歧是不可容許的。這些問題將由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解決。

如果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堅持要烏克蘭與俄羅斯溶合，那烏克蘭人便易於懷疑他們辯護這種政策的動機，不是想使無產者統一起來進行反資本的鬥爭，而是由於舊時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偏見。這種不信任心理是很自然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且合理的，因爲大俄羅斯人歷來在地主資本家壓迫下，浸染

了一種醜惡可恥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偏見。

如果烏克蘭共產黨人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的國家獨立，也可以使人懷疑他們辯護這種政策不是從烏克蘭工農反對資本壓迫的暫時利益的觀點出發，而是由於具有一種小資產階級性，小業主性底民族偏見。因為過去經驗千百次地告訴了我們，各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如像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等一切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假裝爲無產階級擁護者，其惟一目的就是用欺騙手段來偷運與『自己』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妥協以反對革命工人的政策。這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國克倫斯基時代的例子中看見了的，這是我們過去和現在在所有各國中都看見到的。

由此可見，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和烏克蘭共產黨人之互不信任心理是易於發生的。怎樣來與這種互不信任心理作鬥爭呢？怎樣克服這種互不信任心理和怎樣造成互相信任的心理呢？

要達到這一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反對各國地主資本家，反對他們企圖恢復

其專橫權力的鬥爭中，爲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而實行共同的工作。這種共同鬥爭會在實踐上顯然表明，不管如何解決國家獨立或國界問題，但大俄羅斯工人和烏克蘭工人必須有密切的軍事和經濟聯盟，因爲不如此，則『協約國』，即英法美日意等最富強資本主義國家底聯盟就會把我們各個擊破，分別宰殺的。我們反對那受了這些國家資本金錢和武器供給的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鬥爭經驗顯然表明了，這種危險是存在的。

誰破壞大俄羅斯工農與烏克蘭工農的統一和最密切聯盟，誰就是幫助高爾察克輩，鄧尼金輩以及各國資本金強盜們。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應當極端嚴格地防止自己隊伍中有絲毫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因爲這種表現，一般地本是叛變共產主義，便會造成莫大的危害，而使我們和烏克蘭同志之間發生分裂，這樣就正便利於鄧尼金和鄧尼金匪黨。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當有關烏克蘭國家獨立問題，有關烏克蘭和俄

羅斯聯合的形式問題以及一般民族問題而與烏克蘭共產黨人波爾什維克及鬥爭派發生爭執時，便應採取讓步態度。我們大家，無論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或烏克蘭共產黨人，或任何一個其他民族的共產黨人，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與資產階級妥協，不容許分散我們在抗拒鄧尼金中的力量等這些對一切民族都同樣是基本的和根本的問題上，應當是不讓步，應當是不調和的。

戰勝鄧尼金，消滅鄧尼金，使這種進犯行為決不能死灰復燃，這就是大俄羅斯工農和烏克蘭工農共同的根本利益。這個鬥爭將是長久而困難的，因為全世界資本家現時都在幫助鄧尼金，而且將來也還會幫助各種各樣的鄧尼金的。

在這個長久而困難的鬥爭中，我們，大俄羅斯工人與烏克蘭工人，應當建成密切的聯盟，携手前進。因為我們若是各自奮鬥，便定會戰勝不了敵人。至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國界如何劃定，兩國相互關係的形式如何確立，這都是不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而且應當讓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反覆試驗這種那種或第三種辦法，工農底事業，戰勝資本主義的事業是不會因此遭受覆滅的。

但倘若我們不善於保持彼此間最密切的聯盟，來共同反對鄧尼金，共同反對我國和一切國家中的資本家和富農，那末勞動事業定會遭到覆敗，而在長久年代中無法再振，這意思就是說，那時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羅斯就可以被資本家壓倒和窒死的。

各國資產階級和各種小資產階級政黨，以及贊成與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來反對工人的『妥協』黨，他們所最努力的是要分裂各民族工人底團結，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壞工人們密切的國際聯合和國際友愛關係。資產階級若辦到了這一點，工人事業就會一敗塗地。希望俄羅斯共產黨人和烏克蘭共產黨人能耐心地，堅持地，頑強地共同奮鬥，來戰勝任何一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反動陰謀，戰勝各種各色的民族主義偏見，而向全世界勞動大眾作出各國工農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消滅地主資本家底壓迫，爭取建立全世界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中之真正鞏固聯盟的模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三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六五五至六六〇頁

論勞動紀律

爲什麼我們竟戰勝了獲得有全世界資本家幫助的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呢？

爲什麼我們堅信我們現在定能戰勝經濟破壞，定能恢復工業和農業呢？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地主資本家，是因爲紅軍兵士和工農都知道，他們是爲自己的切身事業而奮鬥。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是因爲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在這次反剝削者的戰爭中表現了空前的英勇精神，建樹了神勇奇蹟，忍受了空前的困

苦，甘願自我犧牲，無情地排除了一切自私自利和貪生怕死的份子。

現在我們之所以相信我們定能戰勝經濟破壞，是因為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用同樣堅定的意志，同樣英勇的精神，並同樣自覺地起來奮鬥。

當千百萬勞動者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跟隨本階級的優秀人物前進，那時勝利也就會有了保證。

在軍隊中驅逐了自私自利之輩。我們大家現在都要高呼：

『打倒自私自利份子，打倒那些專圖私利和投機，專想逃避工作的份子，打倒那些害怕爲了勝利而忍受必要犧牲的份子！』

勞動紀律萬歲，熱心工作，盡忠於工農事業吧！

走在紅軍前列而犧牲的戰士永遠光榮！

現在引導千百萬勞動者以最大熱情在勞動軍前列中行進的人們永遠光榮！

一九二〇年初的演說詞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二頁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

四月五日俄國共產黨（波）第

九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三月二十九日）

同志們，我在沒有開始報告之前，要說一說，這個報告也像在前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樣分爲兩部分：政治部分和組織部分。這種劃分首先就令人想到中央工作從外表上，從組織上看來，其情形怎樣。我們黨自斯維爾德洛夫同志⁷⁵逝世

後，已經過去一年了，這個損失不能不影響到中央的整個組織。沒有人能像斯維爾德洛夫同志那樣，善於把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兼負於一身，因而我們就不得不試圖用集體工作來代替他一人工作。

這一年來的中央工作，在執行日常工作上講來，是由中央全會所選舉的兩個集體機關，即由中央組織局和中央政治局來擔負的；同時爲了使兩局決議互相吻合，彼此一貫起見，就由中央書記兼任兩局委員。於是在工作中組織局底真正主要任務就是分配黨的幹部，而政治局底任務就是解決政治問題。自然這種劃分是相當勉強的，自然，任何政策若沒有人員底任命和調動，便無法執行。因此任何一個組織問題都有政治意義。所以在我們的實踐中，照例只要有一個中央委員作出聲明，就可以根據某種理由而把任何一個問題都看成政治問題。想用別種辦法來劃分中央工作未必適當，而在實踐中未必能達到目的。

上述工作方式達到了非常順利的結果：在我們兩局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困難。這兩個機關底工作一般說來是很一致的，由於中央書記參加兩局而使實際運

用方面便利得多了，並且中央書記是完全而惟一執行着黨中央底意志的。爲避免發生某種誤會起見，必須首先着重指出，只有中央已採取的集體決議，即由組織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會業已通過決議的那些問題，黨中央書記才加以執行。否則中央工作是不能正確進行的。

簡單說明中央工作內部分工後，我現在就來執行自己的任務，即作關於中央工作的報告。要作中央政治工作的報告，老實說，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年來政治局底工作，大部份都是隨時解決一切有關於政治，有關於統一各蘇維埃機關和黨底機關及一切工人階級組織底行動，有關於統一並力圖指導蘇維埃共和國全部工作等的問題。政治局曾解決了所有一切關係於國際和國內政策的問題。當然，要想把這些問題來大約列舉一下，都是不可能的。你們可以從中央對本屆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上看到必需的總結材料。要想在報告中來重複這一總結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事，而且我覺得也是代表們所不感興趣的。我們每個人在黨和蘇維埃底某個組織中工作時，每天都注視着國內外變化更迭日新月異的各種政治問

題。在蘇維埃政權頒佈的法令中，在黨組織底工作中，在每一轉變中關於這些問題的決定，也就可以用來估計黨中央委員底工作。必須指出，問題既如此之多，往往只好在非常匆忙的條件下來解決，只是由於集體中的各成員有完全的相互瞭解，相互信任，知道各人意見上的出入，才得以完成這個工作。否則，甚至這集體底人數再增加兩倍也是無法辦到的。往往有許多複雜問題必須用電話商談來代替開會解決。祇有深信某些顯然複雜而帶有爭論性的問題不會疏忽過去，才是這樣作法。現在當我要來作一總的報告時，我不來作按年月先後的總覽和按問題門類的敘述，而只說明那些主要的、最重要的問題，並且只是把昨天經驗，出確些說，即過去一年的經驗與目前任務聯繫起來的問題。

現在還沒有到寫作蘇維埃政權歷史的時候。即令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那我要代表個人說，並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說，我們不預備作歷史家，而我們所關心的只是現在和將來的問題。過去的一年，我們把它當作材料，當作教訓，當作我們往前行進的踏板。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央工作可以分爲兩大部門：一部門是

與軍事任務及與決定蘇維埃共和國國際地位的任務有關的工作，另一部門是國內和平經濟建設的工作，這個工作也許只是在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當已完全顯露出，我們在國內戰爭有決定意義各戰綫上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時，才提到第一位的。去年春季，我們的軍事情況是困難到了極點，大家記得，當時我們將要受到多次失利及以前料想不到的反革命勢力和協約國代表從新舉行的大進攻。所以很自然的，這一時期的工作，大半是解決軍事任務和國內戰爭任務，這個任務，在所有那些怯懦無能之輩，更不用說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以及中間階層大眾看來，都覺得是無法解決的，遂使他們完全坦白地說這個任務不能解決，說俄國落後，俄國疲憊不堪，既然西歐革命遲遲未發，那俄國是無法戰勝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所以那時我們必得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完全的堅定態度，保持絕對信心說，我們一定能勝利，必得發出並實行『一切都為勝利！』『一切都為戰爭』的口號。爲了實現這個口號，也就必得完全自覺地和公開地不去滿足許多最迫切的需要，往往使極多的人有求無助，

而深信我們應當把全力集中於戰爭上，以便在協約國強迫我們進行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只是因為黨曾時刻戒備，因為黨有極嚴格的紀律，因為黨底威信把一切機關及部門都統一起來了，而數十數百數千以至數千百萬人都一致遵循中央發出的口號行動，只是因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犧牲，只是因為有這一切，才造成了現有的這種奇蹟。只是因為有這一切，才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舉行二次，三次以至於四次的進攻，而我們終能獲得了勝利。當然，我們不僅要着重指出這一方面，而且要注意到這一方面所構成的教訓：沒有紀律，沒有集中制，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實現這個任務。爲了剷除反革命而拯救祖國，爲使俄國革命戰勝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我們所坦受的空前犧牲就是全世界社會革命底保障。爲要實現這一點，會必須使黨有紀律，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絕對相信成千成萬人的犧牲定能有助於這一切任務之執行，絕對相信這是真正可能做到和有了保障的事。爲了這一點也就必須使我們黨和實現專政的階級，即工人階級成爲團結俄國以至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因素。

如果想想，何以一個被削弱的貧弱落後國家竟能戰勝世界上各頭等強國，這種歷史奇蹟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深刻根源究竟何在，那末，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集中制，紀律和空前的自我犧牲精神。這是從什麼基地上發生出來的呢？在一個組織素養最少的國家中，千百萬勞動群眾之所以能夠組織起來，這種紀律，這種集中制之所以能夠實現起來，也就是因為受過資本主義鍛鍊的工人，已由資本主義所團結起來，因為在一切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業已團結，而且國家愈是先進，則這種團結規模便愈加廣大；另一方面，是由於私有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商品生產中的小私有制却又使工人們分裂起來。私有制分裂勞動者，我們則團結勞動者，把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日益增多地團結起來。現在可以說，甚至盲人，至少是那些不願看見這件事情的人都已經看見到了這點。愈往前去，我們的敵人就愈加分裂。他們爲資本主義私有制，爲商品生產私有制所分裂了，不管這些人是投機出賣餘糧，利用工人飢餓來發橫財的小業主也好，甚至是擁有軍事實力，創立了『國際聯盟』這全世界一切先進民族偉大『統一聯盟』的各國資本

家也好。這樣的統一純係虛構，純係欺騙，純係偽造。我們在這方面看見過一個極好的例子，即這個大名鼎鼎的『國際聯盟』，它企圖把管理某些國家的權利分授給人，企圖分割世界，可是這大名鼎鼎的聯盟，原來是一場虛構，馬上就化爲烏有了，因爲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之上的。我們在莫大的歷史範圍中看見了這一點，而這也就證實着一個基本的真理，根據這個真理，我們證明了自己的正確立場，建立了自己的絕對信心，深信十月革命必然勝利，深信我們所負起的事業，雖然有很大的困難，雖然有無數的障礙，但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一定會奮起加入的。我們曾知道，我們有同盟者，但必須在這一個人負有歷史上光榮艱鉅任務的國家中，善於表現自我犧牲精神，那時這些空前犧牲的代價便能得到千百倍的報酬，因爲我們在自己這國家中每多經歷一個月，我們便能在全世界上獲得千百萬新的同盟者。

如果想想，到底當時爲什麼我們能够勝利，爲什麼我們必然勝利，這只是因爲所有我們的敵人，那些在形式上與世界最強大的資本政府及資本代表有一切聯

緊的敵人，不管他們在形式上是如何統一，實際上却是分裂的；他們之間的內部聯繫其實又分裂他們，使他們互相敵視，加之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瓦解他們，把他們從同盟者變成野獸，以致他們看不到同情蘇俄的人，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的英國兵士中，在塞瓦斯托坡里登陸的法國水兵中，在世界各國工人中，日益增多起來，而在所有一切先進國家裏社會妥協派都公開站到資本方面去了。歸根到底，就是這個基本原因，這個最深刻的原因，使我們獲得了最可靠的勝利；這個原因便是我們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主要泉源；我們有了這個泉源，就可以大胆地說，當我們在本國實現了完滿的無產階級專政，並經過無產階級先鋒隊，經過它的先進政黨而把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那時我們便可以期待世界革命的到來。這在實際上也就是表現無產階級底意志，表現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決心，表現無產階級與全世界千百萬工人聯合的決心。那些資產者老爺們和第二國際中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却把這稱為鼓吹的辭句。不對，這是歷史的真情，這是俄國國內戰爭中流血困苦經驗所證實了的真情，因為這次國內戰爭是反對全世

界資本的戰爭；這個資本在戰鬥中自行崩潰下來了，它自己把自己吞食下去了，而我們在一個飢餓殆斃，傷寒症盛行的無產階級國家中，却由於這次戰爭結果，成爲更有鍛鍊，更加強堅的了。我們在這個國家裏有日益增多的勞動群衆歸附於我們。以前妥協派覺得是鼓吹辭句而資產階級所慣於拿來嘲笑的东西，在我國革命這一年中，尤其是在報告所包括的這一年中，最終變成了無可爭論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使我們可以極肯定地說，既然我們作到了這一點，就證實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基礎，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廣泛得多的基礎。我們有國際聯合，這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記載出來，沒有正式固定起來，從『國家法權』觀點來看是一無所有，而實際上，在腐朽着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却是無所不有的。我們與空前強大敵人對抗的每一個月，不管我們是奪得了新的陣地或者只是保持了原有陣地，都向全世界證明我們是正確的，並使我們獲得千百萬新的同盟者。

這個過程看來是很艱難的，並且遇到了幾次莫大的失敗。在芬蘭開始了空前白色恐怖之後，接着正在過去這年內又有了匈牙利革命的失敗，協約國代表們欺

驅本國國會，與羅馬尼亞訂立秘密條約，而把這個革命撲滅了。

這是最卑鄙的叛賣行爲，這是協約國底反動陰謀，目的是要用白色恐怖來撲滅匈牙利的革命；更無須說它們怎樣對德國妥協派實行各種妥協，以便撲滅德國革命；無須說這般揚言李卜克內西是正直德國人的人怎樣像瘋狗一樣與德國帝國主義者攜手，來猛攻這個正直德國人的事情了。他們之如此窮兇極惡，肆意採用高壓手段，只使我們更加鞏固和加強起來，同時却毀壞它們自己的基地。

我覺得，我們已有的這個基本經驗，是我們應當特別估計到的。在這方面最要緊的是要在我們的鼓動和宣傳工作中，極力分析和解釋我們何以獲得勝利的原因，說明爲什麼國內戰爭中那些犧牲的代價能得到千百倍的報酬，並且根據這個經驗，應當怎樣作法才能在另一個戰爭中，在不流血的戰爭中獲得勝利，這一戰爭只是改變了形式，而進行這種戰爭來反對我們的，却仍然是舊資本主義世界底舊代表，舊奴僕和舊領袖，不過是進行得更加熱心，更加瘋狂，更加奮熾罷了。在我國革命中，比在任何其他革命中都更加顯著的證明了下述這個原理：革命底

力量，革命進攻底力量，革命底毅力，堅決性和勝利愈大，則資產階級方面的抵抗力也就愈益加強。我們的勝利愈多，則資本主義剝削者也就愈益學習怎樣聯合起來，轉而採取更堅決的進攻。因為你們大家都記得很清楚，——從時間上說，這是不久以前的事，可是從事變過程說，却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在十月革命開始時，人們把波爾什維主義當作一種笑柄；在俄國，這種觀點很快就不得不被拋棄了。而在歐洲，這個表明無產階級革命尙不發展，尙很薄弱的觀點，結果也被拋棄了。波爾什維主義成了全世界範圍的現象。工人革命抬起頭來了。蘇維埃制度，即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建立起來並在其中一面繼承了一九〇五年底遺訓，一面又創作出了自己經驗的這個蘇維埃制度，成了全世界規模的和有歷史意義的現象。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現在在全世界範圍內有兩個營壘完全自覺地互相敵對着。但是應當指出，只是從過去這一年來，它們彼此間的敵對才進到最後決戰的形勢。現在，恰當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我們也許正經歷着最巨大，最急劇而尚

未完結的轉變關頭之一，即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關頭之一。你們都知道，協約國各帝國主義列強底領袖們以前向全世界高喊着：什麼『我們永遠也不停止反對那些篡竊政權，行同匪盜，敵視民主的波爾什維克的戰爭』；你們知道，他們後來却不得不始而撤消封鎖，接着連他們想統一各小國的企圖也破產了，因為當時我們不僅善於把各國工人吸引到了自己方面，而且也得以把各小國底資產階級吸引過來，因為帝國主義者不祇壓迫本國工人，並且也壓迫各小國底資產階級。你們知道，我們怎樣把各先進國家內的動搖資產階級也吸收到了自己方面；結果，現在協約國只好違犯自己的預約、誓言，並違反自己與俄國各種白黨所訂立的幾次條約，而且也只好望着這些廢紙廢眉與嘆，因為它們爲了這些條約，曾耗費了億萬金錢，却落得一無所成。現在它們撤消了封鎖之後，實際開始與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和平談判，而它們現在又不把這種談判進行到底，所以各小國喪失了對它們的信心，喪失了對它們力量的信心。我們看見，協約國本身狀況，它們外部的情勢，從法理學的通常觀點看來，簡直無法判定。各協約國對波爾什維克的關

係，處在不和不戰的狀態中，既承認我們，又不承認我們。我們的敵人原來深信自己是一種力量，現在它們完全崩潰的情形，表明它們絲毫也沒有力量，而不過是一群互相嘶吵，完全無法傷害我們的資本主義的野獸。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拉脫維亞正式的我們作了和平提議；芬蘭打來了一個電報。正式提議劃定界線，其實這也就是過渡到和平政策。最後還有波蘭，波蘭的統治派會特別耀武揚威以戰爭來威脅，而且現在還繼續這樣威脅我們，它從協約國方面已領到的和仍在領着的大砲最多，並且協約國答應，只要它繼續和俄國鬥爭，便幫助它所需的一切，加之它的政府地位不穩而不得不去作任何冒險戰爭，甚至處在這樣狀況中的波蘭也送來了請開和議的照會。必須極端謹慎。我們的政策要求非常小心。在這裏極難找到正確的路綫，因為誰也不知道，此刻火車所停的軌道是通往何處，連敵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它今後要怎樣辦才好。挑唆波蘭最厲害的法國政策代表者老爺們以及波蘭地主資產階級領袖都不知道以後的情形將會怎樣，都不知道究竟自己想做什麼。他們今天說：「老爺們，給我們幾列

車大砲，幾萬萬墩子，我們就決意和波爾什維克作戰」。他們隱瞞了罷工浪潮在波蘭日益高漲的消息，他們嚴令檢查機關，不許洩露真情。而那裏的革命運動却愈益增長起來。德國革命底高漲已進到了新的階段，工人在經過了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政變之後，現時正式成立紅軍，最近從那裏發來的電訊直截指明工人愈益熾烈起來的事實。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腦子裏不由地開始瞭解：「不嫌遲麼？不會在國家尚未作出或和或戰的正式舉動以前就已在波蘭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麼？」。他們不知怎樣辦才好。他們不知道明天的吉凶如何。我們却知道，每一個月都會大大增加我們的力量，而且會愈增愈多的。所以現在我們所處的國際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鞏固些。但我們對待國際危機應當非常小心，並準備應付任何不測的事變。我們已得到了波蘭正式的媾和提議。這些波蘭統治者現正處在如此絕望的狀況中，弄得他們的朋友，即德國帝制派這些更有鍛鍊的，更有政治經驗和知識的人們都徬徨失措，挺而走險，舉行科爾尼洛夫式的政變。波蘭資產階級急於發出媾和提議，因為它知道，冒險就會是波蘭的科爾尼洛夫式的政變。既然我

們知道我們的敵人處在絕頂困難狀態中，——這些敵人不知自己想做什麼，不知明天要做什麼，——所以我們要十分肯定地自認說，雖然有了和平提議，但戰爭還是可能的。他們往後的舉動如何，是無法預見到。這種人，我們都是看見過的，這些克倫斯基之輩，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流，我們都是知道的。在這兩年過程中，我們看見，他們今天怎樣跑到高爾察克方面，明天又幾乎跑到了波爾什維克方面，然後又跑到鄧尼金方面，而這一切都是用自由和民主的辭句作爲藉口哩。我們既知道這批老爺們，所以我們要用雙手抓緊媾和提議，而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我們相信，與各小國締結和平，對於推進事業來說，要比戰爭好到無數倍，因爲帝國主義者用戰爭欺騙勞動羣衆，在戰爭掩蓋下，隱瞞着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真象，所以任何樣的和平都會使我們的影響百倍增加和擴展起來。在過去這幾年中，我們的影響本來已經是很巨大的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已獲得空前的勝利。但是，我們同樣也知道，隨時都有迫使我們作戰的可能。我們的敵人自己還不知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本事實究竟怎樣。他們正在進行各種的戰爭準

備，這是無可懷疑的。現在有很多與俄國毗鄰的國家，也許還有很多非毗鄰的國家都在進行這種全國的武裝準備。所以在我們的國際政策中最能隨機應變，最堅決地抓住我們已定的方針，並隨時準備應付一切事變。爲和平而戰我們是用了極大毅力來進行的。這戰爭正給予我們以最好的果實。在這種戰場上，我們表現得很有本事，至少也不比紅軍在流血戰場上的活動壞些。但是，即令這些小國真正希冀和平，然而與我們締結和約的事情，還不是依它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它們完全依賴於協約國，而在協約國那裏則正在進行拚命的互鬥和競賽。所以我們應當記着，從國內戰爭和反協約國戰爭所開闢的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和平當然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一面作各種促進和平的步驟，同時應當極力備戰，絕對不解除我們軍隊底武裝。我們軍隊是使帝國主義列強不敢作絲毫侵犯我們企圖的真實保障，因爲它們縱然可以指望起初獲得某些僥倖一時的勝利，但結果任何一國都不免要爲蘇俄所粉碎。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這應當成爲我們鼓動和宣傳底基礎，我們要善於準備這一看，要善於在疲憊日增的情形下解決那迫使把和與戰兩

者結合起來的任務。

現在我要說到使我們要用極大決心引導勞動群衆利用軍隊來解決當前基本任務的最重要的原則理由。舊的紀律泉源，即資本，現在已經減弱了；舊的團結泉源已經消失了。我們應當造成另一種紀律，另一種紀律和團結底泉源。強迫手段引起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憤懣，叫囂，喧嚷和號泣；當班人空喊『自由』與『平等』，却不懂得使資本享受的自由便是反勞動群衆的犯罪行爲。我們爲了反對虛言假語，就決定在實行勞動義務制和團結勞動者的事業中，絲毫不害怕採用強迫手段；因爲從來沒有過進行革命而不採用強迫手段的，無產階級也有權採用強迫手段，以便無論如何都要保持住自己的勝利品。當資產者老爺們，妥協派老爺們，德國獨立黨老爺們，奧國獨立黨老爺們和法國龍格派老爺們爭論歷史因素問題時，他們總是把無產階級底革命決心，堅定性，不屈不撓精神這樣的因素忘記了。當各資本主義國家崩壞，資產階級崩壞的關頭，當資產階級處在絕望和危機的關頭，決定一切的，也只有這個政治因素。至於什麼少數和多數，民主和自由

的詞句，不管已往時代的英雄們怎樣陳述過這些東西，都是不能絲毫解決問題的。這裏要由工人階級底覺悟性和堅定性來解決。如果工人階級決心作自我犧牲，如果工人階級表明善於緊張自己的全部力量，那末這就可以解決任務。要把一切都用來解決這個任務。工人階級底果斷精神，它那實現自己「寧死不屈」口號的堅決意志，這不但是歷史的因素，而且是決定一切，戰勝一切的因素。我們有了這個勝利，有了這種信心，才過渡到，並且已經走到實行和平經濟建設的任務，解決這些任務，就是我們本屆代表大會底主要職責。在這一方面，我以爲不能說是中央政治局底報告，或更正確些說，不能是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而應當直截了當地說：同志們，是的，這便是應當由你們來解決的問題，這便是你們應當用黨底最高機關底權威來作一估量的問題。我們把這個問題清清楚楚地提到了你們面前。我們已採取了固定的立場。你們的責任就在於最終批准，更正或改變我們的決定。但是中央在自己的報告中應當說，它對於這個基本的迫切問題是採取了完全固定的立場。對的，現在的任務是要把無產階級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

把無產階級底絕對統一都用在經濟建設的和平任務及恢復被破壞了的生產任務上去。這裏需要有鐵一般的紀律，鐵一般地整齊行列，若是沒有這種紀律和行列，那我們不僅不能支持兩年有餘，甚至兩個月都是不能支持的。要善於運用我們的勝利。另一方面應當懂得，這個過渡是需要大量犧牲的，這種犧牲，我國本來也就已經忍受的够多了。

原則方面的問題，對於中央是很明顯的。中央全部工作都是服從於這個政策，根據於這種精神。例如你們將要解決的關於集體制與一長制的問題，看來似乎是個局部的問題，若是割斷其與各方的聯繫而單獨提出，當然不能說是有根本原則意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都要根據我們在知識，經驗，革命實踐方面之基本收穫的觀點出發。例如有人對我們說，『集體制是廣大羣衆參加管理的形式之一』。可是我們曾在中央討論過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有過決定，而且我們應當向你們報告說：同志們，這種理論上的錯亂是決不能容忍的。假如我們在軍事工作和國內戰爭的基本問題上犯有十分之一的這種理論上的錯亂，那我

們就早已被人打敗，而且是理應被打敗的。同志們，請讓我在報告中央工作中，在關於新階級是根據集體制還是根據一長制參加管理的問題上，稍微作點理論上的說明，指出一個階級怎樣實行管理，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這點對我們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而我國革命與已往一切革命的區別，也就在於我國革命中沒有空想成份。新階級之所以能取舊階級而代之，只是由於在與其他諸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它才能保持住自己，而且只有當它能實行根本消滅階級時，才能獲得最終勝利。階級鬥爭底巨大複雜過程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不這樣，你們就會陷於糊塗觀念的泥坑中。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資產階級對封建主實行的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憲法上明文規定了自由平等。這些都是騙人的話。當有勞動者存在時，私有者是善於幹投機勾當的，而且正由於他是私有者，也就不得不幹這種投機勾當。我們却說，平等是沒有的，在飽食者與飢餓者之間無所謂平等，在投機者與勞動者之間也無所謂平等。

現時，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無產階級底統治就表現在剝奪了地主的

私有權和資本家的私有權。以前所有一切憲法，以至最共和、最民主憲法底精神和基本內容唯一是歸結於私有制。我們憲法之所以奪得了在歷史上的存在權利，是因爲不僅在紙上寫着廢除私有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了私有制，並澈底破壞了私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裏。首先就表現在私有制問題上。當在實踐上解決了私有制問題的時候，階級統治也就以此得到了保證。然後，又有憲法在紙上記載那在實際生活中解決了的問題：廢除資本家和地主的私有制，並補充說：據憲法規定，工人階級比農民享受更多的權利，而剝削者則沒有絲毫的權利——這就是憲法上記載着我們業已實行的本階級底統治，藉此我們也就把勞動者底一切階層和小集團與本階級聯繫起來了。小資產階級私有者是分散的；其中擁有較多私有財產者便是那些擁有較少私有財產者底敵人，無產者廢除着私有制，便向他們公開宣戰。有許多不覺悟，不開通的人，他們完全擁護着任何一種自由貿易，可是當看到在戰勝剝削者的事業中的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時，他們便不能參加作戰，他們既不擁護我們，但也無力來反對我們。關於私有制以及某個階級

居上的問題，只有由階級統治來決定。誰把階級統治表現所在的問題與「民主集中制」問題混爲一談，——這是我們所常看見的，——那他就造成莫大的錯亂，以致在這個基礎上任何順利的工作也無法進行。明顯性是宣傳鼓動工作底基本條件。如果我們的敵人承認說，我們在開展鼓動和宣傳方面作出了奇蹟，那末這就不應當從外表上來瞭解，以爲我們有許多鼓動員，我們耗費了無數紙張等，而應當按內部實質來瞭解，就是說，我們鼓動中所含有的真理鑽進到了所有一切人的頭腦中。而這個真理是不能拒絕的。

當一個階級代替了另一個階級時，那它就改變了私有制的關係。資產階級代替了封建階級之後，也就改變了私有制的關係，資產階級底憲法上說：「擁有私有財產的人是不與乞丐平等的」。這就是資產階級底自由。這種平等，把國家統治權賦予了資產階級。你以爲資產階級代替了封建階級之後，它就把統治和管理混爲一談了麼？沒有的事，他們不是這樣的傻瓜，他們說：要管理就要有善於管理的人材，爲了這點，那就要把封建階級的人拿來改造改造。他們果然也就這樣

作了。這是他們作了錯誤麼？同志們，不是的；管理的本領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並非自然產生的，不會因這個階級是先進階級，它就一下子變成了有善於管理的本領的。我們從歷史例証中看見，當資產階級初獲得勝利時，它就從另一階級，即封建階級出身的人們中找到實行管理的人，否則，它便無從找到這種人。要清醒地觀察事實，資產階級從以前階級中找到人材，而我們現在也就有同樣的任務，要善於採取以前階級底知識和素養，善於利用它，馴服它，為本階級底勝利而運用這一切。所以我們說，獲得勝利的階級，應當是成熟了的階級，而成熟性不是由什麼文件證書所能證明，而是要由經驗和實踐來證明的。當資產者獲得了勝利但尚不善於管理時，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就宣佈了新的憲法，並從自己階級中徵選出行政人員，利用以前統治階級底行政人員而開始向者後學習，並教育本階級中的新人員，訓練他們的行政能力，爲了這件事，運用了全部國家機關，取締舊的封建機關，只讓富人子弟進學校裏去學習，於是經過許多年份，經過幾十年後，他們便從自己階級中培養出了行政人員。現時在按統治階級模

樣組成的國家中，也應照以前所有一切國家中的辦法來作。我們若不願站到純粹空想和徒託空言的立場上，那我們就要說，我們應當估計已往年代的經驗，我們應當保障革命所奪得的憲法，但是我們爲了管理，爲了國家建設，就應當擁有具備管理技術，具備治國經驗和經濟經驗的人材，而這樣的人材也只有從以前統治階級中才能找到。

主張集體制的議論中，往往浸潤了一種極愚昧的精神，即反專門家的精神。具有這種精神是不能達到勝利的。爲要獲得勝利，就必須懂得舊資產階級世界底全部深刻歷史，爲要建設共產主義，就必須獲得技術，獲得科學，並把它們運用到更廣大的羣衆中去，但這種技術和科學也只有從資產階級方面才能獲得。這個基本問題應當提得十分明顯，應當提作經濟建設底基本任務。我們應當藉助於被我們推翻了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來從事管理，這些人浸潤了本階級底偏見，我們應當重新教育他們。同時，我們應當從自己階級隊伍中選拔自己的管理人員。我們要運用全部國家機關，做到使校內教育，校外教育，實際訓練等等這一切，都

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從事培養無產者，培養工人，培養勞動農民。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事情佈置妥當。我們既有了兩年來的經驗之後，我們決不能這樣議論，好像我們是第一次才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在斯莫爾雷時期，及斯莫爾雷以後不久的時期中，我們作了够多的蠢事。這是沒有什麼可恥的。當我們第一次來幹新事業時，是無從找到天才的！我們這樣試作過，那樣試作過。我們曾隨波逐流，因為那時不能把正確成份與不正確成份區別開來，要辦到這點是需要時間的。現在這已經是過去不久的事了，我們已經離開了這過去時期。這一充滿混亂和熱情的過去時期已經過去了。證明這個過去時期的文件，便是布列斯特和約。這是歷史的證據；不僅如此，這是一個歷史時期。我們之所以被迫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約，是因為當時我們在各方面都是孱弱無力。這個歷史時期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孱弱無力的時期；我們現在已經克服了這種孱弱無力狀態。這又是通盤集體領導制的時期。如果有人說，集體制是培養管理人才的學校，要知道這都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但決不能永遠停留在學校預備班裏！

這樣是行不通的。我們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如果我們的舉動仍舊像小學生一樣，那我們在各方面都會要挨打的。應當前進。應當用毅力，用統一的意志猛求上進。職工會面前有着極大的困難。要極力使職工會理解，真正担負起這個任務就要與標榜一時的民主制殘餘作鬥爭。所有這種關於指定委派的叫喊，那在各個決議案中，在各種談話中常常說到的全部有害的老廢物，應當一概掃除乾淨。否則，我們是不能獲得勝利的。如果我們在兩年長的期間內竟不能領會這種教訓，那我們就是落後，而落後的人是會挨打的。

任務非常困難。我們的職工會在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方面有過莫大的幫助。職工會是黨與千百萬愚昧群眾發生聯繫的環節。我們不要蒙住眼睛：當職工會幫助國家辦理糧務工作時，它會完全負責來與各種困難作鬥爭。難道這不是極大的任務麼？不久前出版了中央統計局要覽。在那裏統計學家們作出了總結，而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是有信仰波爾什維主義嫌疑的。在那裏有兩個極有趣的數目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消費省區中每個工人每年領得了七普特糧

食，而產糧省區中每個農民每年却消費了十七普特糧食。在戰前，這些農民是每年只消費十六普特糧食的。這就是兩個表明糧食鬥爭中階級相互關係的數目字。無產階級繼續忍受犧牲。人們却還高喊什麼強力手段呢！但是無產階級證明了採用強力手段是必要的，並法定了這種手段，而以担負最大的犧牲來證明了採用這種強力手段是正確的。在我們飢餓破產的俄國，產糧省區中的大多數居民，即農民，第一次比幾百年來的沙皇資本主義俄國時代吃得好些。但我們要說，當紅軍還沒有獲得勝利時，群眾是會要忍飢受餓的。會必須使工人階級先鋒隊承擔這種犧牲。它在這個鬥爭中已經有了經驗，但獲得這種經驗之後，我們應當繼續前進。現在無論如何都要作到這一步。如同任何一種職工會一樣，老職工會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和過去。在這個過去時期中，職工會是反對壓迫勞動制度，即反對資本主義的機關。而當工人階級成了統治階級時，當工人階級現時要担負極大犧牲，要忍受死亡飢餓時，情形就完全改變了。

這種改變，不是一切人都瞭解到，不是一切人都深刻注意了的。在這裏，有

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了我們，他們要求用集體制來代替一長制。同志們，對不起，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我們已經摒除了這一套。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極複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線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線上獲得勝利。這一戰爭更加困難。這個戰線是最艱鉅的戰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到這點。經過了那次我們已在戰綫上經住了的戰爭之後，應當還有不流血的戰爭。結果便是我們的勝利愈多，那末像西伯利亞，烏克蘭和庫班這樣的省區也就會愈益頻繁。那裏富裕的農民多，那裏沒有無產者，縱令有無產階級，它也是已經被小資產階級習慣所腐化；並且我們知道，凡是有塊小土地的人都說：『我管政府幹嗎。我要乘別人飢餓發財，想怎樣便怎樣，政府不值得我一睡！』。現在協約國將會幫助那些原來陷在鄧尼金統治下，以後又動搖到了我們方面來的農民投機者。戰爭改變了戰線和形式。現在的戰爭是商業戰，是小販戰，這種戰爭使小販業成爲國際性的。在中央新聞報上登載過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提綱內，把這點的原則基礎完全表明出來了。他們想使小販業成爲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

的經濟建設變為和平地來瓦解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正在嚴加戒備。我們說：我們作戰過了，所以我們繼續把那曾經幫助我們致勝的口號，作為基本口號；我們將這個口號完全保留起來，並把它用到勞動方面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底堅決性與統一的意志。原來留下的那些舊偏見，舊習慣，應當一概掃除：

我在結語時，還要講講古塞夫同志寫的一本小冊子，據我看來，這本小冊子有兩方面都值得注意：它的優越處，不僅是在形式上，也不僅因為是在我們這代表大會開幕前寫成的。不知怎的我們至今都慣於寫決議案。據說，除了枯燥無味的文藝作品外，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都是好的。我以為，凡是決議案都應當歸於枯燥作品之列。如果我們都能效法古塞夫同志的先例，儘量少寫決議案，多寫出些小冊子來，雖然那裏也有像他這小冊子內所充滿的大批錯誤，倒是要好些。但是即令有這些錯誤，而這還是一本很好的小冊子，因為其中所注意的是復興全國工業與生產底基本經濟計劃，因為其中一切都服從於基本經濟計劃。中央委員會

今天業已發給大家的大綱中，有整整一節完完全是從古塞夫同志底提綱內摘引來的。我們可以藉專門家們的幫助，更詳盡具體地擬定這一基本經濟計劃。我們應當記住，這個計劃是打算在很多年內實行的，我們並不諾許一下子就使我國免於飢荒。我們說，鬥爭將比在軍事戰綫上更加困難，但這個鬥爭會引起我們更大的趣旨，它是更接近我們那真正基本任務的門徑。這個鬥爭要求極度緊張一切力量，要求意志統一，這種緊張與統一，我們以前曾表現過，現在我們也應當表現出來。如果我們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時我們在不流血戰綫上獲得的勝利，決不會少於在國內戰爭戰綫上所獲得的勝利。

一九二〇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九四至一〇八頁

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我們這個報紙是專論共產主義勞動問題的報紙。

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首先就要好好懂清楚，祇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祇有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之後，祇有在爭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那些組織拚命反抗、組織反革命暴動和國內戰爭的剝削者獲得了決定勝利之後，才能實際上提出這個問題來。

這個時光，一九一八年初，好像業已來到！而在德帝國主義二月（一九一八年）向俄國開始武裝進攻之後，果然來到了。當時，這一時光竟出現得這麼短

促；新的、更強有力的反革命暴動與侵略的浪潮竟襲來得這麼急速，使我們黨維埃政權方面簡直沒有可能來多少聚神地、頑強地從事從事和平建設。

現在我們業已經歷過兩年飢餓、窮困、貧乏這空前未聞與不可思議的困難，同時這兩年又是紅軍對國際資本主義反動寇羣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勝利。

現在已經有了真正的機會來指望到（如果法國資本案不把波蘭誘入戰爭），我們將取得比較穩固，比較長期的和平。

兩年來我們已經有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行建設的某些經驗。所以關於共產主義勞動問題，可以而且應當嚴重提出，——更正確些，就得這樣說：不是共產主義勞動，而是社會主義勞動，因為這裏不是指從資本主義中成長出來的新社會制度發展底高級階段而言，而是指它的低級階段，即初級階段而言。

共產主義勞動一語，若是比較狹義地，嚴格地說來，乃是有利於社會的無償勞動，這種勞動，不是爲了履行一定的義務，不是爲了獲得領取某種物品的權利，不是按照事先規定的法定標準額，而是自願的勞動，超過定額的勞動，不打

算領到報價的勞動，沒有報價條件的勞動，而是爲了公共利益按習慣來操作的勞動，而是按必須爲公共利益操作的這種自覺態度（已成爲習慣）來勞動的勞動，——是爲了健全身體所自然需要的勞動。

大家都明白，我們，即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結構隔那廣泛地、真正普遍地運用這種勞動的距離，還非常遙遠。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已由全體先進無產階級（共產黨和職工會）及國家政權提出來，這已經是按這條道路走去的一個前進步驟。

要向大的目標走去，就得從小的目標開始。

然而另一方面，既有了『大的』變革，有了這會推翻資本家所有制而將政權轉交到無產階級的國家變革之後，而在新基礎上來建設經濟生活，就祇能從小的開始。

義務星期六、勞動軍、勞動義務制 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動與共產主義勞動在不同形式上的具體實現。

在實現這種勞動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缺點。用譏笑（或忿怒）態度來對待這些缺點，祇有完全不善於思索的人才做得出來，更不待說那些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了。

在這樣嶄新、這樣困難、這樣偉大的事業中，缺點，謬誤和失錯的地方是決不可避免的。誰若是害怕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誰若是對這些困難表示畏縮，灰心絕望或倉皇失措，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創立新的勞動紀律，創立人與人之間新的社會聯繫形式，創立吸引群眾從事勞動的新形式和新方法，——這需要有多年的，幾十年的工作。

這是最能收效和最高尚不過的工作。

幸而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壓倒了資產階級底反抗之後，我們已能爭得了使這種工作成爲可能的這一基地。

所以我們也就用全副精力來担负起這一工作。堅韌，堅定，決心，果斷，善於千百次來嘗試和千百次來加以改正，無論如何非達到目的不可，——這種品

質，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之前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內就鍛鍊起來的，而它在十月革命之後這兩年期間，雖忍受空前未有的窮困、飢餓、破產、貧乏的苦痛，又繼續鍛鍊過了。無產階級底這些品質也就是無產階級一定勝利的保證。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刊載於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報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四八至一五二頁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

意義。這裏我所講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它的廣義而言：若按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上具有國際意義，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字底極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客觀情形却正是如此，即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

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柯得列爾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爲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ücher-Heft 11;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

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做了一篇標題爲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爲，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漸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裏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俄國會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爲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熾熱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

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够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 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寫得多麼漂亮呵！

(一) 波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

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堅定性，需要紀律，需要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波爾什維克致歡迎辭外，不是還應把波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去極認真地加以分析麼？

波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波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波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够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群眾——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群眾，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波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波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專制壓迫之下，迫切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用了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

悉，實爲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波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爲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聚積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爲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迫切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 波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凡群眾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來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刊物上看到它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之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中間的、過渡的、不澈底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己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

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經受着群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法』發展時期底整整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

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沈、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謬妄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秘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波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的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好，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

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它最能於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和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波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他們不願瞭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公開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連拿慘案⁷⁸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波爾什維克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波爾什維克。但如果波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非法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法可能」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波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

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波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波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⁷⁹。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國外僑民這裏的報紙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高傲態度，聳起鼻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祕密）交換意見，自由（祕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因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惡劣的叛徒。波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意大利的屠拉梯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

齷齪，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波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現象（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它的莫大的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自由一些的共和國。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閣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和諾斯克，考茨基和希法亭，倫勒爾和阿烏斯鐵爾里茨，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事實上也是如此）都是枯燥無味地重彈

那套陳腔舊調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什維克那裏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底故技，變本加厲地表演出來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丟醜行為與糊塗觀念，特別『燦爛地』表明出來了，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偽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以至於破了產；現在，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

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波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會制（事實上的）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波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

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波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波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波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波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波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

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完全認定，並已爲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所充分證實的是：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群眾代表），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有組織、有紀律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至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以及迅速轉爲馴服、消沈和幻想，甚至轉爲『瘋狂』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種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自己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即前此所未見過的外形，重新發作起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的一種處罰。這兩種畸形互

相補充。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雖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影響上却比較微末，其原因，一部分毫無疑義是由於波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之所以說「一部分」，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發展得異常繁盛，因而澈底暴露了它的不正確性，暴露了它不能成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波爾什維主義還在一九〇三年產生時，便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來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而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自己基礎的時候，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波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在三個主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厲害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

黨，絕不願（確切點說：是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須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把個人恐怖和暗殺手段，看作是自己的特殊『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表現，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至於有些人竟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行為，或一般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採取的恐怖手段，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被普列漢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過和唾棄過。第三個主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自己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惡意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同時他們自己却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模倣該黨內極端的机会主義者。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的事實，現時已在全世界歷史巨大範圍內証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就是說，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

普列漢諾夫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要求開除伯恩施坦底黨籍，而波爾什維克始終繼承着這種傳統，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列金底全部卑叛變行動⁸⁰。原是最·近·似·於·革命無產階級爲取得勝利所必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它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國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克黨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考茨基、希法亭、萊得布爾、克里斯平之流底機會主義和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我們現在把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止這時期作一總的考查，便可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

（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致伯爾的信，異常明顯厲而直截了當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機會主義國家觀，可是這封信被伯爾由一八七五到一九一一隱藏了達三十六年之久）；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它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波爾什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其範圍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組織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時）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波爾什維克，由於固執己見，不願瞭解必須參加反動『國會』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很好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的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宣佈召集諮詢性的

「國會」時，波爾什維克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什維克相反，會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就果然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估計了當時的客觀形勢，即使群眾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再轉為革命罷工，再轉為武裝起義的這種形勢，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爲了這樣一個問題：讓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議機關，還是要設法把這召集權從舊政府手中奪取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斷定，是否會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以及這種形勢是否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所以，抵制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波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為它表明了，在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但若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便是大錯特錯。一九〇六年波爾什維克抵制杜馬，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個不大

的，容易改正的①。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能很快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整個歷史環境，使我們必須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互相配合起來。現在試一回顧已經完全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繫，已完全表現出來了，——就特別顯著地表明，假使波爾什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鬥爭形式與秘密鬥爭形式配合起來，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

① 凡評論個人的話，當相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糾正這種錯誤的人。

部。

一九一八年的鬥爭不曾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單獨團體或「小組織」，而且時間也不久。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都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並且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是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的有害行為。這的確是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種妥協正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的這個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聯底領袖們說，如果波爾什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的時候，我總是首先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說：

假定你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自己的金錢，護照，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你因此才得幸免匪患。這當然是一種妥協。"Do ut des,"（「我給」

你的金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安全脫身的機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合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與這樣的妥協相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國的鮑威爾與阿得列爾（更不用說倫敦爾這批先生們），法國的倫諾德爾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份子」）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以及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真是同強盜合夥哩。

結論是很顯然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地絕對地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幼稚氣，同這種幼稚氣甚至難於認真講話。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應當善於根據具體情況去辨別哪種

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為的，對這類具體的妥協便要用全力去批評，最無情地去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它宣戰，決不許那些老於世故『拘於細行』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狡猾之徒，藉『一般是否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工聯『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所作的叛賣行為和已實行的這種確是最惡劣機會主義、叛賣、變節的妥協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與的禍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這班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夥分贓。這點在政治上決不是隨時都像在這個幼稚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辨。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想出一個包診百病的萬應藥方，或者約許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那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試來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這個政黨，從一九一四年末，就曾提出它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它不怕在兩縣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使沙皇帝制失敗的主張，它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議論。這個政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却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革命興起，推翻了沙皇制度，建設了民主共和國，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好了推倒他們，並且果然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澈底廢除了地主與資本家底私有制。這個政黨既公佈和廢棄了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密約，又向各國人民建議和平，直到英法帝國主義者拆除了和議而波爾什維克業已竭盡全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政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締結的這樣的妥協，其完全正確性，對於一切人都已是日益昭然若揭的了。

俄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上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或間接辯護「保護祖國」口號，即保護本國的強盜資產階級。他們所繼續的叛賣行動，就是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與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聯合，後來又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聯合，正如他們在國外的同道者與各該國資產階級聯合一樣，都是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打劫。

（五）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

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我們所要說到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他們不稱自己爲「左派」，而稱

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中可以看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是由「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地方黨組」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該反對派意見底實質，敘述得最顯著、確切、簡明而扼要。只須引證其中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底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該作者便實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

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包括參加國會）的問題」，只是爲要掩飾它想與獨立黨人聯盟的真正主要圖謀，這本小冊子上接着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以爲共產黨統治與黨底專政的問題，只是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底統治乃是各種政黨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底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目的。因之，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妥協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應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爲要包括那些應在共產黨指導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及階層，就必須建立具有最廣闊基礎和最廣大範圍的新的組織形式。這種爲一切革命份子所匯集的地點，便是以工廠組織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聽從『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在

這裏。正是在這裏，把從事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爲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至於此外對從事鬥爭的群眾之政治教育以及鬥爭中的政治指導，則是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可見，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着：

『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面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它不惜採取妥協政策，贊成國會制度，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可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群眾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並採用一個明確趨向於目的的方法，就是排斥任何國會制度和機會主義手段；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條件的推翻資產階級，以便然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專政——這裏是羣衆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旨。

每個波爾什維克，凡是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波爾什維主義底發展史，一讀到這番議論之後，便立刻會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慣了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幼稚氣！」

但是我們要把這種議論更切近地考察一下。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群眾專政（羣衆黨）？」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枉費心機，異想天開，結果却弄巧反拙。誰也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一般極大多數並不區分其在生產中之社會地位的人民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誰也知道，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

是簡明的事實。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胡說八道？偏要這樣標新立異呢？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祕密狀況之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之間的普通、正常、簡單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地位而弄得糊塗莫解。在德國，也如在歐洲其他國家裏，人們太習慣於合法生活，習慣於由各政黨按期舉行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來自選舉『領袖』，習慣於用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情緒等等的簡便辦法來檢閱各政黨底階級成份。但是當革命急劇進展，國內戰爭擴大，因此不得不拋棄這種種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轉到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其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來提出或推出或保留『一批領袖』——這個時候，人們便張皇失措，於是妄想出一種絕無僅有的謬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內某些黨員，由於他們不幸生在一個小國內，享有特別優越與特別穩固的公開狀況底傳統和條件，從來不曾見過公開狀況與祕密狀況之互相更替，於是陷入迷途，茫然無措，竟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撿拾一些所謂「群眾」、「領袖」這類現代「時髦」字眼，而毫不加以思索，隨便爛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並且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善於想一想這彼此間的關係，不善於把問題闡明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以及戰後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群眾」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表現得特別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再三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產生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底領袖，總是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受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豢養。馬克思之所以從這班混蛋那裏博得令人尊敬的仇恨，就是因爲他公開指斥他們爲叛徒。最新（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替某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在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了變節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祇顧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於是就造成機會主義政黨之脫離「群

衆』，即脫離最廣大勞動階層，脫離他們中間大多數，脫離工資最低工人的現象。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鬥爭，不把這些機會主義的變節領袖加以揭破，加以恥辱和驅逐，則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便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所進行的也就是這樣的政策。

在此種情況下，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殊不知在『打倒領袖』這口號掩飾之下，實際上却把一些胡言爛語怪誕絕新的新領袖推舉出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持着一般人性見解的舊領袖，這就尤其可笑了。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里夫赫木，霍爾聶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額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都是具有『資

○ 共產主義工人報（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所載額列爾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若先破壞政

「資產階級性」的，宣佈政黨根本上就不需要，這真是絕頂的荒謬之談，我們只有對之搖頭棄絕。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深刻地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就常常可以弄成怪誕絕倫的大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

黨，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制」。

拉丁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亂昏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莊重的德國人（額列爾及霍爾遜爾在上述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倫的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原理）也發表這種完全不合適的議論。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俄國特別往往是「時髦的」。

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會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就無異是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而不經過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一躍而至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正經歷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任何地方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多年內，階級還是會存在的。只有在英國，這個時期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總還是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身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自傷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狂熱轉為灰

心等等舊病復發的現象。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制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劣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和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組織者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底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成鋼鐵一般政黨，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大資產階級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以其日常、瑣碎、無影無形、不可摸捉的腐化作用所造成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誰祇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

會的問題。但首先讓我根據我黨經驗來講幾句結束前一問題的話。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一八九五年第一次有過這樣的攻擊，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城的中央團體已開始形成，它應當負起指導各區團體的責任。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曾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發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共產黨左派』的一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雖不經有變危險就可以痊愈的，病後機體甚至還會強健一些。另一方面，因公間工作和秘密工作之迅速更替，而必須把總指揮部，必須把領袖特別『隱藏起來』，特別秘密起來的這種情形，會常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就是一九一二年馬林諾夫斯基這個奸細混進了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一事實。他使幾十幾百個極好極忠實的同志遭到破獲，弄得他們坐苦工牢獄，弄得其中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未能造成更大的禍害，只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得恰當，馬林諾夫斯基身任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為博得我們底信任起

見，不得不幫助我們創辦公開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沙皇制度下面也能够進行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够採用適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波爾什維主義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幾個優秀的波爾什維克幹部送進苦工獄，送去遭死，而另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刊物，訓練出成千成萬新的波爾什維克。對於這個事實，那些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美、法、意的同志們），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現時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派遣奸細，而且將來也還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的。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確結合起來。

○ 馬林諾夫斯基後來會被德國俘虜。他在波爾什維克執政時回到俄國，立刻被捕，交法庭審判，並被我們的工人檢決了。孟什維克特別厲害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了黨中央委員會。但是在古倫斯基執政的時期，我們要求逮捕杜馬議長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已決然對這個問題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空洞言論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反革命的』『反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作得特別『有力』和特別魯莽的，要算是霍爾斯爾了)，也就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羅將科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好細，却沒有把這事實通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羅將科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投奔到鄧尼金那裡去了。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堅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而其實，這種策略乃是根本錯誤，內中除了空話之外，別無絲毫內容。

爲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波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今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國家中去。

領袖、政黨、階級、群衆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我國的具體情形，有如下述。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波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據最近一次蘇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黨員共有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前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 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 少得多。我們擔心黨過於擴大，因爲一般趨炎附勢巧於鑽營的人，勢必乘機混進到執政黨內來，而這些人本來是只值得槍斃的。一九一九年冬，當尤金尼奇離彼得堡只有幾俄里遠，鄧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時候，即當蘇維埃共和

國危在旦夕之際，而野心家，無賴漢和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份子，決不能指望把加入共產黨作為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遭受絞死和拷打）的時候，——這時我們才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是對於工人和農民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來領導全黨；同時還有人數更少的機關常駐莫斯科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均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五個中央委員組成之。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在我們的共和國內，不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一個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職工會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已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職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是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底一切指令。一般和整

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闊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就是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職工會底熱烈擁護，如果沒有職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奮不顧身的工作，那當然，我們不要說兩年，便是兩個月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踐上乃是很複雜而紛繁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在羣衆中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人員舉行會議，與孟什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很少），他們教唆這些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鼓吹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實行怠工等等爲止。

我們認爲經過職工會來與『羣衆』發生聯系，還是不夠的。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這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我們要用全力來

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需要，從他們中間提拔出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担任國家職務等等。最近頒佈的將國家督監事宜人民委員部改組爲『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担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關，就在世界上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會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於這種大會是極爲注意的），並經過特別派往鄉村去担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來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對資產階級性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進行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踐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一般機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波爾什維克既熟悉這種機構，又親眼看見這種機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那他們聽了什麼

「自上」或是「自下」，什麼領袖專政或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辯，如像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些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那種莊重的、非常淵博的、極端革命的論調，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內工作，什麼可以拒絕這種工作，什麼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種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樣的論調，我們也不能不覺得是同樣幼稚可笑的廢話。

資本主義所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歷來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它們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才可以而且定會發展成爲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不僅包含同行、同業和同一職業、並包含整個生產部門），然後經過這種生產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以及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具有全面智識的、受有全面訓練的人，即能够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去，它必須向這

個方向走去，並且定能到達這個目的，不過須要經過許多年份。目前就企圖具體實現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所將造成的這種未來結果，就無異於教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够（而且應當）不是用幻想的，不是用我們所特別造就出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簡直不值一提的輕舉妄動。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當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享有這種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不問政治的態度以及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

底互相聯繫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底巨大進步，何況這時，黨必須不僅用舊的精神，而且更要用新的精神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黨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期間內還會是一種必需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自己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使全國經濟底管理職能首先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上所必需的工人團體。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底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色彩』，企圖避開它，跳過它，那便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就等於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所應起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群眾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那種作用。另一方面，倘若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推延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

會和工聯主義偏見的工人的那天，這更是大錯特錯。政治家底藝術（而且是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瞭解）也就在於正確地估計這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去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於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之充分廣大階層底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以後能於教育、訓練和吸引日益增多的勞動群眾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得而且應當表現得比俄國更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裏，孟什維克以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職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由於存在有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職工會內『盤據』得更加牢實，那裏所形成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只圖私利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趨向於帝國主義的、受帝國主義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要比俄國有過的強大得多。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在

西歐，而專指對索靈，如沃聚，亨德孫輩，麥爾黑娘輩以及列金之徒作鬥爭，要
比在我國鬥爭者維克作鬥爭口實得多，我們這裏的孟什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
觀點上與這些人完全是一丘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那
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
人物完全革除。並使他們趕出工會之外為止。如果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
度，那末，我們就不可能試行德京政權，何況這種一定的程度，
在各國不同的國家裏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估計這種程度，只有各國
那些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我國一
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幾天，即十一月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
舉，也就可用作爲測量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尺度。在這次選舉中，孟什維克一敗
塗地，他們僅僅得七十萬票，加上南滿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只有一百四十萬
票；而波雷什維克均獲得了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選舉與無產階
級專政，（見蘇俄雜報第七、八兩期合刊上）。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群眾的名義來進行的，並且爲的主要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們作鬥爭，並且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真是愚蠢。而像博『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份子』反動和反革命爲理由，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聯盟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蠢事，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須知我們的孟什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無非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稱呼孟什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class）這是美國的丹尼耳、德立昂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通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底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於一八五二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⁸²）底影響之下。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羣衆』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高喊『羣衆』是怎樣濫用這個名詞。要想能够幫助『群衆』，並獲得『群衆』底同情、愛戴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他們由於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搗亂、陷害、幽禁和攻擊，而是直接與羣衆工作，要與羣衆去工作。應當善於承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忍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具有無產階級群衆或半無產階級群衆的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哪怕這些組織是極端反動的。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群衆薈萃的這種組織。據瑞士人民政治日刊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的統計，英國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到一九一九年末，其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邊沒有關於德法兩國這同類的材料，但人所共知的確鑿

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也大量增加了。

這些事實最顯著不過地說明了一件也爲其他千百個例子所證實了的事情，即正是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組織渴望，日益增長着，在英法德各國，有好幾百萬工人初次從一盤散沙現象，進到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接近的（對於那些還受着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所薰染的人們說來）組織形式，即職工會，而那班雖則革命，但是不高明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羣衆」「羣衆」！竟拒絕在職工會內進行工作！！藉口這些職工會「反動」而拒絕工作！！臆想一種嶄新的、純潔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具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所作的這種更沒有理智，更危害革命的事情，是再也想像不出來的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職工黨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

兩年半空前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群眾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份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臆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絕。

無疑的，葛培爾茲輩，亨德孫輩，如沃輩，列金輩那班先生們一定很感謝這類「左的」革命家。因為他們正像德國的「原則」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裏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並拒絕在工會中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排出工會，使他們極不便於在工會中工作，並對他們施以侮辱、攻擊和追究。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動，巧智，非法手段，緘默態度，隱瞞真情，祇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內面，無論如何都要在那裏進行共產主

義的工作。在沙皇時代，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公開的機會」，但當暗探局長祖巴托夫⁸³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來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石金同志，他是彼得城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沙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和群眾取得聯絡，想方設法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祖巴托夫派底影響⁸⁴。在西歐，因為趨向於合法的，憲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偏見，特別根深蒂固，所以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而且必須有系統地去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

○ 葛培爾、茲登，亨德森，如沃輩，列金之徒與祖巴托夫派毫無二致，所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服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那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際代表大會提議實斥那種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極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屬共產黨某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直接地或間接地，公開地或暗藏地，整個地或局部地——都贊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和第一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應該迴避，不應該抹煞，而更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已經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七）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用極鄙視而且極輕浮的態度，否定地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有什麼證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國會鬥爭形式，都

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

這樣張大其辭算是到了可笑的地步，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制度！莫非德國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那麼又怎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空談麼？

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了」。在宣傳上講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廢除國會制度，還相隔得很遠。幾十年前，本有全部理由來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了」，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很長期和很頑強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講來，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了」，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但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這在全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看來，並無足輕重，從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是渺不足道，甚至無法加以大略的估計。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便是理論上莫大的謬誤。

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麼？這却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左派』底立場就很穩固了。不過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加以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這種分析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February 1920）上，載有關於國會制度問題，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的左派或左傾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析，在下面我們就可以看見，也是十分糟糕的。

第一，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為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這些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知道，『左派』是錯誤了的，單是這一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那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據。『左派』應該證明，爲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顯然錯誤，現在已不復成爲錯誤了。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

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執行自己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仔細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樣也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不是羣衆底政黨，而只是知識份子和少數沾染知識份子惡習的工人底小組和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法蘭克福城地方小組所出版的該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無數萬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輕浮，太誇張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乃是確鑿

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証實自己的錯誤。既然「數百萬」和「無數萬」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制度，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末又怎能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是把自己的主觀願望以及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作爲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因爲沙皇制度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酷，而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時日，並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中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和意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所犯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地觀察過，特別注意地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當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時，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制度，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們所認爲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爲過時了，羣衆也認爲過時了的東西。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準上去，不應

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準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制度的成見，叫做一種偏見。但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正是全體勞動羣衆（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份子）之覺悟程度與準備程度底實在情形。

就即令不是『數百萬』和『無數萬』，而只有人數尚多的少數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神父走，只有少數農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和富農（Grossbauern）走，那末，根據這一點，也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選舉，參加國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不關通的、被抑壓的和愚昧無知的羣衆。在你們還無法解散資產階級國會和其他任何反動機關的時候，你們便必須在這些機關內部工作，正是因爲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關於我們波爾什維克，說了很多稱讚的話。有時我禁不住要說：你們最好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多認識認識這些策略吧！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不正確，那就應該明白指點出來，並加以證明，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須的。如果是正確，那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當然，決不能把俄國條件與西歐條件等量齊觀。但當專門談到這樣一個問題：『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絕對必須切實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為如果平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那麼這一概念就很容易變成空話。我們俄國波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

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別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波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至於這幾次選舉曾經得到非常寶貴的(而對於無產階級也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這點，我敢說，我在上述那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的論文中，已經證明出來了。

由此得出不容爭辯的結論，證明了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群眾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了」的東西。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同時却希冀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眼光來製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便犯了極大的錯

誤，這正是在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在事實上背棄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看『荷蘭左派』主張不參加國會的論據。上面所說到的『荷蘭派的』提綱，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即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處在革命狀態之中，此時參加國會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直接行動比較起來，已逐漸失去意義了。在這種條件下，國會將成爲反革命底中心，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自己政權底工具，這時，拒絕參加任何一種國會活動，甚至必要的』。

第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爲羣衆直接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爲重要，而不僅在革命時候或有革命形勢的時候才是如此。這種顯然毫無根據，從歷史和政治觀點看來都是錯誤的論證，祇是特別明顯地說明，作者絕對沒有估計到一般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革命前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沒有估計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

文），即關於配合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這一意義重大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因爲在一切先進的文明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內戰日益成熟與逼近，由於盡情破壞合法權利的共和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對共產黨人所施行的瘋狂追究等等，以致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的配合，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很快就會一天比一天成爲必要（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成爲必要了）。這一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一般左派份子却絲毫沒有瞭解。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觀點上看來，是錯誤的。我們波爾什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這種參加，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不但有益，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所謂國會日益成爲反革命底機關和中心（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過去任何時候，國會都沒有成爲反革命底中心，且也不能爲反革命

底中心），而工人正在建設作爲自己政權工具的蘇維埃，由這兩句話中就可得出結論說，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起來，以便進行蘇維埃反對國會的鬥爭，由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政府的蘇維埃派存在，不但不會促進解散國會，反而會使這件事情困難起來。當我們進行勝利鬥爭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在他們那裏有站在蘇維埃方面的無產階級的反對派這一事實，而對我們的勝利毫無關係。我們明白知道，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在將被解散的反革命立憲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反對派，有澈底的波爾什維克派和不澈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這個提綱的作者們，完全弄糊塗了，他們縱然不是忘記了一切革命的經驗，至少是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反動國會以外的群衆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如果是直接贊助革命的，那就更好）反政府派聯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一般『左派』

在這方面的議論看來，他們不過是這類的革命教條主義者，從來未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也未曾深刻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只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爲主觀上『否認』某種反動機關，便算是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這機關破壞了一樣。

破壞對新政治（不僅是政治）思想的信任並加以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藉擁護這種思想爲名而把這種思想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因爲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說的一樣），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上所能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可以弄成荒謬論，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它甚至會必然被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荷蘭的和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此種欲益反損的蠢笨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這裏我不來試圖說明在哪些條件下抵制國會才是有益的，因爲本文底任務，祇是關係於討論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幾個迫切問題，而來估計到俄國的經驗。俄

國經驗告訴我們，波爾什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而正確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誤的（一九〇六年）。當我們分析第一次情形時，便可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沒有召集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群眾革命行動（尤其是罷工運動）發展得異常迅速，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給反動政府以任何的贊助，革命無產階級由於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而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羣衆的影響。十分顯然，這個經驗對目前歐洲的情形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的理由，也同樣十分顯然，荷蘭人及「左派」擁護（那怕是有條件的）不參加國會的主張，根本上是不正確，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祇有害處。

在西歐與美國，國會已成了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份子所特別仇恨的東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也是完全自然的，因為在戰時和戰後，國會中絕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底行為實在是最卑污、最無恥、最變節的了。但在解決怎樣去與公認的毒禍作鬥爭的問題時，若為仇恨國會的情緒所迷惑，那就不僅是

愚蠢，而且是罪惡。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罕有的東西」，因為人們期待這種情緒，實在是太長久，太枉然，太迫切了，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就使他們這樣易於為情緒所屈。自然，沒有羣衆中的革命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使革命的策略變為行動，但我們在俄國，由於有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經驗，確信到這樣一個真理，就是說，革命策略決不能祇根據革命情緒來規定。規定策略，就必須把本國（及鄰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一切階級力量加以清醒而極客觀的估計，並且估計到革命運動底經驗。僅僅咒罵國會機會主義，僅僅否認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正因為太容易，所以這不是解決困難任務，更不是解決最困難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國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國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祇是下列全部真理底局部表現，而全部真理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而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却就比西歐各國難些了。我選

在一九一八年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結束工農深受其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爲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爲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波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的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要想『繞過』這種難局，『跳過』爲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國會的難關，那真是十足的孩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同時却害怕在反動國會內建立由堅決忠實英勇共產黨人所組成的卓越國會黨團時所遇到的困難！難道這不是孩稚氣麼？德

國的李卜克內西，瑞典的赫龍特，甚至沒有羣衆自下的贊助，尙且能作出用真正革命精神去利用反動國會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懷有失望與憤激情緒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惡劣的國會內鍛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羣衆，尤其是西歐小農中的落後羣衆所浸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制度偏見，比俄國的要厲害得多，所以共產黨人祇有在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堅強的、百折不回的鬥爭，以便去揭發、消除和克服這種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領袖」壞，因此悲觀失望，以至走到「否認」「領袖」的可笑地步。在「領袖」們常須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受到考驗和有威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而且若不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配合起來，若不使「領袖」受到考驗（就中也要在國會鬥爭舞台上考驗「領袖」），是無法克服這種困難的。我們的批評，並且是最嚴厲、最無情和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拿來反對國會制度或國會活動，而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善於以革

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壇的領袖，特別是反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領袖。只有這樣的批評——當然同時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代之以適當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群眾的領袖，同時又教育群眾，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情況，並學會瞭解從這種情況中產生出來往往是非常複雜錯綜的任務。

○ 我很少有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補派」，租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無疑義是不對的。可是據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和由塞拉底同志主編的四本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內出版），以及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織之攻擊屠拉梯及其同道者，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人留

(八)「不作任何妥協」麼？

我們從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中引來的那段話裏，看見過「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惜，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

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裡，依然當國會議員，並繼續他們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塞拉底同志及幾個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種現象，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屠拉梯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議員們採取這樣錯誤的，不澈底或無氣節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辯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塞拉底同志顯然不對，他指斥議員屠拉梯「不澈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澈底」的，却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屠拉梯等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願意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反對那三十三個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所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也是屬於那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之列的，他們每部大作中的每一句話，都含有極深遠的意思。

恩格斯說：

『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我們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是由於我們在達到我們目的的道路上，不停頓於什麼過渡階段，不去妥協，因為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底壽命：』。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是經過一切非由他們而由歷史進程所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清楚楚看見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和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以為自己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便是萬事妥貼了，如果日內『動起手來』

(這是他們確信的)，而政權落到了他們手中，那末『就會施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辦到的話，那他們也就不做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燥性，當作理論根據，這是何等幼稚氣啊！』(見恩格斯著：布朗基派公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民國報 (Volkstaraft) 上，一八七四年，第七十三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城出版，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對於瓦爾揚深致敬意，說瓦爾揚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瓦爾揚和黑得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大的領袖)。但對於他的明顯的錯誤，恩格斯却詳盡地加以分析過。自然，在年齡很輕毫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也如歲數頗大很有經驗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不可瞭解和不正確的勾當。並且許多詭辯家(這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羅斯白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橫

會主義領袖底議論一樣：『既然波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經過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者，通常都能很好領會恩格斯所敘述的這一深邃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忍受過『妥協』，即當工人要求條件全未達到，或僅僅達到一部分，也不得不去上工，這時他們只好同被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妥協』。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矛盾加劇的環境之下，常常看見兩種妥協間的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窮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忠於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他們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効勞，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屈服於勸說，或爲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工聯會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

國工人，也在各種不同的形式內，看見了類似這樣的現象）。

當然，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某種『妥協』底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之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罷工時是合理的『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出賣階級的領袖等等所進行的背叛階級的『妥協』，要困難得多。若是想擬定一種包治百病的藥方，或製定一種能適用於一切情形的總規則（『不作任何妥協』！），那就是荒謬的想法。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善於來分別考察各個事實。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內領袖底作用，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有思考力的代表[⊖]，在長期的、艱苦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警覺性，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祇要一般地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任何界限，對機會主義，我們正在進行而且必須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至於這些人們，假使他們還不懂得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就只有給他們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及增加其政治閱歷和生活經驗才能加以糾正。在每一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底實際政治問題上，重要的事情，是善於辨別出其中表現最主要形式的不可容許的、叛賣的、體現着危害革命階級之機會主義的妥協，說明這種妥協的害處，並用全力去與這種妥協作鬥爭。當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

○ 每個階級，即令在最開明國家底環境下，即令是最先進的階級而且因目前形勢使它的一切智慧力發揚到最高度的時候，其中總還有——而且當階級尚屬存在，當無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基礎上完全鞏固和充分發展起來時，必然會有本階級的、不去思想和不會思想的代表。否則，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兩夥同樣掠奪和同樣殘暴的國家中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最主要的、最基本形式的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掠奪利益。在戰爭以後，保護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訂立的聯盟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容許的叛逆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爲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那小冊子上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一切機動和妥協的政策』。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此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責斥波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波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

革命後，都充滿着它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種的方向麼？而那些沒有經驗和缺少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爲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說這類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裏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哩！！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

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要薄弱些，首先簡單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繫，其次就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個國家內各種或各派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各種機會（那怕是極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是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地應用這個真理，那他還沒有學會怎樣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社會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就已說過：『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這是彼得堡一條寬廣，清潔，平坦，筆直的大街）上的康莊大道』。自契爾內舍夫斯基以來，我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達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於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曾費了如此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沙皇制度崩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就是說同他們締結過多次實際的妥協；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當波爾什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老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

派政治領袖司徒盧威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雖則爲時並不長），同時我們却善於不斷地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去防止工人運動內部有絲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表現。波爾什維克總是繼續採用同樣的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同時向來都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第二級選舉或複選時），並且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揭發他們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在選舉杜馬時，波爾什維克曾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過短期的正式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時，我們會幾次多年地在形式上與孟什維克共處於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看作是在無產階級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份「社會革命黨人」（如切爾諾夫，那唐松），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美爾瓦爾得和昆

塔爾一齊開會，發表過共同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來反對『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完全接近我們，幾乎是與我們心投意合的一個『革命共產主義』民粹派者）。正當十月革命之際，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非正式，但極為重要（而且是很有成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而未加以絲毫修改，這也就是我們無疑地締結了妥協，以便向農民證明，我們並不想以多數壓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妥協。同時我們會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至布列斯特和約成立後，他們破裂了這個同盟，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時，甚至舉行武裝暴動，後來竟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所以，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便攻擊中央，我們自然認為這是

「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表現「左派」錯誤的明證。我們俄國也有過與德國謝德曼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也有過會反對孟什維克右派而與德國考茨基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工人群眾之逐漸離開孟什維克而轉向波爾什維克，這種情形，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顯然可以看出到：在一九一七年六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祇佔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佔有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佔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工人這種與俄國全係同一性質的由右向左的轉變趨勢，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却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從來不曾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曾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祇是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底勢力呢？

很明顯的，這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德國共產黨人執行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胆地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拒絕參

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左傾」幼稚病底無數表現，這種病症現在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此也就可以更好更快地，對於身體更有益處地把這病症療治好。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證明自己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考茨基，希法亭，而克里斯平，萊得布爾之流，看來，大半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即無產階級派，這個派別發展得非常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大概共有七十五萬），是離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比錫城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提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獨立社會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了。反之，共產黨人定要去尋找而且要找到他們作這樣一種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並加速與此派作必要的完全溶合，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

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祇有騙子才會約許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有「容易」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沒有為那些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這形形色色的無數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開通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幫、職業、有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即共產黨方面，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的及小業主的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問題是在於我們應當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我們應當順便指出一下：波爾什維克戰勝了孟什維克，這不僅會要求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即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策

略，都是足以促進、增進、鞏固和增強波爾什維克而削弱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也在內）必然要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搖擺於愛護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應忽視這種動搖；既是利用這種動搖，那便要對某些傾向於無產階級的份子讓步，當其傾向的時候予以讓步，視其傾向的程度來決定我們讓步的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的份子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什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頑強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優秀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優秀份子，都轉入到我們營壘裏來。這乃是長期的過程，那種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機動』的十萬火急的『決議』，只能去妨害那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己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

誤之一。像霍爾壽爾的這種見解，表現得愈加「莊嚴」和「鄭重」，愈加「堅決」和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現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僅僅唾棄那種荒謬絕倫得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便對協約國作戰的『民族波爾什維主義』（勞芬別爾格等），是不夠的。應當瞭解，不允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的這種策略，根本錯誤。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謝德曼輩高踞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要求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所作的機動迂迴辦法，實在不好得很，因為他們多少替出賣階級的謝德曼派分担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而且是極冷靜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了『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去。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

應當肯定聲言，說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認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屢次叛賣了階級，結果障礙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危害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加以否認。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障礙着這種運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此，根本的差別也就在此。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把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都空空放過了，那末，這罪過就應由他們去担負。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具有全世界威力的堡壘）。把解除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定要必須立刻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擺脫帝

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就是市僧國家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奧托·鮑威爾這一流人去提倡的），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無論哪一個大國家裏，德國也在內——實現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革命是一個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話，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而且應當的。既然俄羅斯一個國家爲了革命利益能够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那末，蘇維埃德意志，在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盟之下，爲了革命利益而忍受爲時更久的凡爾賽和約，也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做好圈套來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挑撥他們說：「請你們講，你們不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不去巧妙地運用機動以反對奸狡百出的而且此刻還是強於他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却像三歲孩子一樣，果然走上這個圈套。事先束縛自己的手足，公開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且何時要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我們明知這場戰鬥對敵

人有利，對自己不利，却居然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自己的戰鬥，那末，這種政治家，是絲毫也沒有用處的。

（九）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闊的、強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極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它們想建立共產黨，彼此間正在進行這一談判。『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的工人無畏艦週刊（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由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主編，其中載有她寫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敘述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根據加入第三

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來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等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那知對於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的共產黨加入舊的「工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這個「工黨」係大半由工聯組成之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也同「社會主義工黨」^①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對反加入「工黨」，因此就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黨員，或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前者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共產主義政黨中的右派」（見潘克赫爾 斯 特 底 論 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分歧正和德國的相同，雖然分歧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的，比在英國的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來把「左派」的論據考查一下吧。

（似乎社會主義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反對參加國會。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了登載於該期週刊上加拉克爾（W. Gallacher）同志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國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底左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底代表，這個革命運動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以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國會議員們吵鬧得够久了。我們認為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蘇格蘭獨立工黨底大批黨員羣衆，一想起國會制度，就愈益覺得討厭；一切地方團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蘇維埃。當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說服他們

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所有着重點都是作者加上的）擁護這夥匪徒。我們在這一方面的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底叛變。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顯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德孫，克略英斯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爾，斯腦頓這夥人底營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群眾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們，都不過是幫助麥克唐納爾，斯腦頓這班先生們。不列顯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這裏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份子來叛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種反動份

子非常貪圖擷取議員的「尊號」(？——問號是作者加上的)，如火如荼地想証明他們也和「主人們」一樣，即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異常透澈。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極有價值；應當善於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會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羣衆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關心地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衆，單靠情緒是不夠的；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波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底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老百姓』都瞭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底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治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樣的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瞭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國會，凡是至今尚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是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誠實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總是一個最兇惡的反動者。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不從國會內部來瓦解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將來解散國會這一任務

上的勝利，這樣是否能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曾想到有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同時該作者却說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科學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底經驗，尤其是這些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業已經歷過的十分類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動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羣衆，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亨德孫，克略英斯，麥克唐納爾，斯騰頓之流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很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並且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共同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式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獲得政權，定會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正確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贊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們以相當的幫助。爲了說明這個意

思，我且來引用英國現時兩種政治文件：（一）內閣總理路易、喬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上面的記載）；（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在上述的她那篇論文內所發表的議論。

路易、喬治在他的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當時特請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那些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有些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密切聯合，否則，那圖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即路易、喬治所寧願稱爲『社會主義』黨的工黨，就會獲得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的聽衆，向着那以前大概還不瞭解這點的國會主義的自由黨黨員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波爾什維主義」。路易、喬治又說明，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爲自由黨人是根本贊成私有制的。他說：「文

明到了危險境界了』，因此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必須聯合起來：路易、喬治接着說：

『：如果你們走到農業區域去，那末，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自然依舊是那些沒有什麼變動的老黨派。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就會和現在某些工業區域一樣的巨大。我國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注意到的一種情形。法國居民大都從事農業，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國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開始動搖起來，那末，由於上述原因，它就會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加厲害』。

讀者從這裏可以看出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他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路易、喬治那裏來學些東西吧。

我們再從路易、喬治演講以後所進行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有趣的問答：

「**窩·雷斯**（Wallace）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許多援助，請問內閣總理認為自己在工業區域裏對於產業工人採取的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該不會因此使目前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所抱定的完全是另一種見解。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件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很能幹，現在他們都從事於破壞政府底威信。結果無疑是大大加強同情工黨的輿論。一般輿論，並不趨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趨向於工黨，這是最近補選運動所証明了的事實」。

附帶說說，這一段話特別表明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弄得怎樣糊塗而不能不幹些無可救藥的蠢事。就在這點上資產階級也會滅亡的。我們的人，或許也會做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改正），但我們

的人終歸會成爲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的以下一番議論：

『邁克平同志（不列顛社會黨總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於工黨的意見。工黨黨員雖多，但裏面有很大一部分黨員是消極的和萎靡不振的。這些男女工人之所以加入工聯，因爲他們廠內工友是工聯會員，又因爲他們都想領取補助金』。

『但是我們認爲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爲工黨是一派思想底產物，而英國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現時還沒有走出這派思想底圈子，雖然民衆底腦筋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而快要改變這種情形』。

『不列顛工黨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團體一樣，在社會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會上台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就是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也就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或遊移不定』。

『我們不應當因增加工黨底力量，而來分散自己的力量；工黨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必須準備着向工黨政府進攻』。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他們歷史上已為百年來經驗所體証，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底兩黨）制，認為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鬥爭。一部分自由派，好像覆舟時的老鼠一樣，紛紛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工黨必然會上台執政，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他們根據這種情形，竟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用以下的話把這個結論說出來了：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任何妥協；它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爲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爲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或謝德曼輩這批人走，因爲他們還沒有嘗過由這批人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國和德國，正因爲嘗過這種滋味，工人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由此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承認亨德孫和斯腦頓政府成立後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去戰勝聯合起來的路易、喬治和邱吉爾。若是不這樣做，便會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爲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只靠宣傳是決不行的。如果工人中現在顯然無力的少數，知道（或至少必應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期以後，在亨德孫和斯腦頓戰勝路易、喬治和邱吉爾的條件之下，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表示失望，轉而擁護共產主義

（或者至少會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大半是守善意的中立），而此時，這無力的少數人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要勇往前進』，這種口號，顯然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交戰一樣，前者本來應當『停住』，『轉折』，甚至締結『妥協』，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做，却前去與敵人硬拚。這只是知識份子的幼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一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

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被壓迫勞動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能作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十倍或甚至百倍地驟增起來），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

在英國，這兩個使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得到勝利的條件，很明顯地正在日益發展着，這是從路易·喬治底演說中也看得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為我們看到有些革命者對於這兩種條件，都抱着不充分思索、不充分注意、不充分自覺、不充分估量的態度。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爭取羣衆（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簡單的空談家），那末，第一，就必須幫助亨德孫或斯騰頓去打倒路易·喬治和邱吉爾（更確切點說：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從自己的經驗上看出我們主張底正確，即是說，使他們確認亨德孫和斯騰頓這流人物完全無用，確認這流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階級的天性，確認這些人物之必然破產；第三，就必須促進下面這種時機

的到來，那時多數工人由於對亨德孫輩失望，便可以一舉推翻亨德孫之流的政府，且有獲得勝利的極大可能；因為既然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路易·喬治，尚且表現張惶失措，並由於他昨天和邱吉爾『磨擦』，今天又和阿斯克維特『磨擦』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削弱（並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末，將來亨德孫這批人底政府就定會更加張惶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更具體地來說一說。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是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可以向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提議『妥協』，提議訂立選舉協定，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前去反對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辦法）來分配國會中的議席，同時我們要保持着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的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去和他們聯盟，因爲否則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

的完全自由，如同俄國波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總共十五年內）對於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即對於孟什維克所堅持過並爭得了的一樣。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並不去追逐議席，在這件事情上儘可讓步（但亨德孫之流，尤其是他們的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目的是爲了獵取議席）。我們贏了，因爲正當路易·喬治自己『激動』群眾之際，我們能在羣衆中來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因而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自己的政府，而且幫助羣衆加速瞭解我們共產主義者反亨德孫輩的全部宣傳，我們應該毫無避諱，毫不緘默地去進行這種宣傳。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同我們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爲我們立刻便指明給羣衆看（要注意，甚至在純粹是孟什維主義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也贊成蘇維埃）：亨德孫這批人寧願接近資本家，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在羣衆面前佔了上風，這些羣衆聽了路

易、喬治那段很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的）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便贏了，因為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了亨德孫和斯腦頓這班人害怕戰勝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路易、喬治底幫助，而路易、喬治却公然想去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舊曆）革命之後，我們波爾什維克反孟什維克和反社會革命黨人（即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所進行的宣傳，也正是在上述情況內，獲得了勝利的。我們那時告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着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波爾什維克只佔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俄國的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害怕拋開資產階級而取得政權，資產階級却明知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將一定獲得多數^①，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拖延下去，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

維克却沒有能力來毅然決然地澈底反對這種拖延現象。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則共產主義者立刻就可在奪取群眾同情心並使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喪失信用這方面，獲得贏局，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是毫不重要的。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絕對可靠的區域內，即是說，只在我們候選人之提出不致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那時我們在選舉鼓動中，要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並在沒有我們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候選人而反對資產者。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同志，如果認為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

○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根據當時消息，其結果如下：參加選舉者有三千六百萬人以上，波爾什維克獲得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底各政黨共獲得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以及同類的各小團體共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或是放棄反對社會主義叛徒的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會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去接近羣衆，甚至於要使羣衆聽完他們的話，那時常感覺棘手。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講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德孫而反對路易·喬治，那末羣衆定會聽我講話的。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制」招牌作掩飾的）邱吉爾專政好，而且也可以說明我之所以要投票贊成亨德孫，支持亨德孫，正好像絞索支持着絞犯一樣。使亨德孫這批人能更快地組織他們的政府，這也會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會使羣衆轉到我這方面來，也會促進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正如他們在俄德兩國裏的同道者所遭遇過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羣衆不會了解，說這種策略會分散和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對這些「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教條主義的論調，加到羣衆

身上去吧！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大概不會比英國的高，而要比英國的低些。但羣衆瞭解了波爾什維克；波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即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了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又舉行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波爾什維克就把這個立憲會議解散了，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碍波爾什維克，反而幫助了波爾什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意見分歧，亦即是否要加入工黨這個問題，我在這裏不能多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所知道的材料太少，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為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本身結構上，與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太不相同。不過毫無疑義的是，第一，要是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就想根據這一類原則得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末，他在這個應否加入『工黨』的問題上也必然要犯錯誤的。因

爲這一類原則，只不過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們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任何妥協和任何過渡階段的錯誤。第二，毫無疑義，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和任何時候一樣，也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原則，應用到本國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底特殊情形上去，應用到本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這種特殊情形乃是各國互異的，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猜度這種特殊情形。

然而這不僅有關英國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有關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總結。現在我們就來講述這個問題。

(一〇)幾個結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現出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世界上第一次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底範圍和力量達到了空前

未有的程度。單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內，罷工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每年罷工人數，超過了十倍，而自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罷工不斷增多，且規模宏大。落後的俄國在許多異常特殊的歷史條件影響之下，第一次向全世界不僅昭示了被壓迫群眾在革命時的自動精神之躍進式的增長（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了無產階級底作用比它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若干倍，昭示了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接着由政治罷工轉爲武裝起義，以及產生了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各階級之羣衆鬥爭及群衆組織底新形式——蘇維埃。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首先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全面的發展，隨後就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成爲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時證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歷着這種鬥爭，即日益生長、日益強健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之首先而且主要與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什維主義』，就是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第二，也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

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開展起來，這種鬥爭乃是第二國際（目前實際上已被打死了）和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過去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制度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同時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也就是說，非但在國際性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之內，無疑義地，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經過實質上乃是同類的預備學校以達到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經歷這一發展過程時，都是各自不同的。並

且巨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走着這條道路，比波爾什維主義快得多，波爾什維主義成爲有組織的政派以後，歷史給了它十五年的準備期間，它才獲得了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極短期間內，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把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擊潰了，而第二國際僅在幾個月前，還是比第三國際強大得無可比擬，儼如牢不破的龐然巨物，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刊物）和思想的贊助。

現在的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國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鬥爭之原則上的基本任務，同時又顧計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種種特徵以致這種鬥爭所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得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正在繼續擴大和增加，這種不滿是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一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

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定、彼此雷同的基礎上。當各民族間的民族差別和各國家間的國家差別尚屬存在時（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在很長時期內存在着），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多樣性，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確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底細節方面能有正確的形式上的變動，使這些原則能正確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在每個國家中為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為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為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而採取具體辦法的時候，應當善於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個民族的特點，這便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贊助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制度，贊助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事情（自然還不是所有一切事情，然而主要的事情），

已經是做到了的。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往下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是比較次要，但在實踐上，却更切近於實際解決任務：這就是要找得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的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

識字的群眾，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孤立無援，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醜陋，感覺到若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端反動份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及其同類）底專政。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集團和派別，其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把廣大群眾（而現在廣大群眾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守舊、因循，而沒有醒悟的）引導到這種新立場上，確切一點說，就是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領導這些群眾，以便使他們接近和轉到新的立場上來。從前若沒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當時那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的任務），就不能解決；現在若不消滅左傾教條主義，不完全克服和擺脫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這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群眾走上能够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新立場這任務，同樣也就不能完成。

當以前我們的任務是在於吸引無產階級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時候（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還是這樣），宣傳便佔了第一位；在這方面講來，甚至那些小組雖帶着小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能作出成效來。但是現在到了群眾實際行動的時候，要佈置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述語的話），要配備現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單靠宣傳的老技巧，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時，不能像未曾領導過群眾的小組宣傳員所本來計算的那樣，只計算到幾千人；這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和幾千萬人。這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定要是毫無例外的一切階級之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佈置就緒，以致決戰時機已經因下列條件而完全成熟，也就是說：第一，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第二，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

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第三，在無產階級中，群眾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一方面在邱吉爾派和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微少的民族差異）中間的分歧，他方面在亨德孫派和路易·喬治派中間的分歧，從純粹共產主義、即抽象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作實際行動、作群眾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看來，是渺小而毫不重要的。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看來，這種分歧却是極端極端重要。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個覺悟的、篤信的、有思想原則的宣傳家，而且想做一個革命中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到這些分歧，在於猜透這些「朋友」中間之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候。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忠忱，與善於在實踐方面從事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轉

折、退却等等的才幹融匯起來，以便促進亨德孫這流人（如果不舉出人名，那末，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即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們）底政權之成立與倒台；促進他們在實踐上必然破產，因爲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個方向去啓發羣衆的；促進亨德孫派——路易、喬治派——邱吉爾派中間（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帝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卡普派中間等等）必然的磨擦、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以使用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切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史，總是最好的政黨，即最先進階級底最覺悟先鋒隊所想像的，其內容要豐富得多，繁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們一切才智能力特別高漲和緊張之際，由最激烈之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來實現的。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

結論 第一，革命階級爲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把握毫不除外的一切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候還要冒着巨大危險去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業）；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時準備着極迅速地突然地由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若不決心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那麼誰也會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愚蠢，或甚至是一種罪行。可是這點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加明顯。因爲在政治上愈難趁先知道，在將來此種或被種條件之下，究竟哪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倘若我們不把握一切鬥爭手段，那末，當其他階級的狀況，發生不以我們意志爲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特別薄弱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把握了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形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能極迅速地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爲我們所代表的是真正先進真正革命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以爲公開的鬥

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時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和愚弄了工人；往往以為只有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但這不正確。正確的是那些例如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在最自由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極無恥和極厲害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大戰底強盜性質這一真理的條件下，不能和不願（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願』罷）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末，他們便是極壞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並熾烈起來的時候，不管是誰都參加革命，有的由於狂熱黨心，有的由於追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由於貪圖祿位，這時做一個革命者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極大困難，受盡千辛萬苦，才能擺脫這類的假革命家呵。當進行直接公開的、真正群眾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具備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瞭解必須採用革

命行動方法的群眾中，來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也就有價值得多了。要善於尋求、探索和正確判定那種把群眾引向於真正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之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現時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知道，而且任何人也不能預先斷定，那裏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足以喚醒、掀起並推動那些目前還未醒覺的極廣大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準備妥當，以便把『四肢都裝上蹄鐵』（正如已逝世的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那樣）。引起『山崩地裂』的，或許是國會危機；或許是由紛亂到了極點而日益險惡和日益加劇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是某種第三類的事變等等。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哪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懷疑，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是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是堅定不移地解決了的），我們所說的，究竟是

哪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在沉眠中的無產階級羣衆動作起來，並把他們直接引到革命跟前去。我們不要忘記，例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在無諱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會比現時少一百倍的環境中，單是像反動軍閥千百次無恥行爲之一（德來福斯案）的這樣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也就足以激動人民直接去實行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地，毫不放鬆地既利用國會選舉，又利用不列顛政府底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政策上的一切事變，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門和各方面等，按照新的方法，即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用第三國際底精神而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此地我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波爾什維克』式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國外的共產主義者說，過去俄國的國會選舉運動，與通常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的國會制度却是另一個樣子』。

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第三國際擁護者底任務，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門中，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改造爲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在俄國底選舉裏，也曾經常有過真正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只顧小利的，資本主義投機撞騙的行爲。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迥非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祿位的國會工作方式：務使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口號，務使真正無產者在沒有組織的，備遭抑壓的貧民幫助之下，散發傳單，走遍工人住宅，走遍鄉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幸而歐洲所有的窮鄉僻壤，要比俄國少許多倍，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走到最平民式的茶樓酒肆中去，鑽進最大衆化的會社、團體和偶然集會裏去，在同民衆說話時不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在國會中說話的語氣），絲毫也不爭逐國會議席的缺位，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揭破資產階級食言的地方，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舉行的選舉，向國民所發表的口號，來使羣衆盡量認識波爾什維主義；要知道，除選舉

外，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本來是得不到這種機會的（自然大罷工的機會是例外，因為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類似的全民鼓動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在西歐和美國，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這些事情是可以進行而且應該進行的，因為不費氣力，一般地就不能解決共產主義底任務，既然花費氣力，那就要解決日益複雜，日益和社會生活各部門緊相聯系，並把各部門先後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實際任務。

在英國，也應當在軍隊中，在『本』國被壓迫和不平等民族中（如愛爾蘭，各殖民地）按照新的方式（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式，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式，不是用改良主義手段，而是用革命手段）來進行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須知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地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大戰後的現在，當各民族已飽受戰爭痛苦而迅速認識真情實況的時候（這種真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被打死和變為殘廢，只是為的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成衝突，掀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

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都有無數火星到處橫飛，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顆火星子能燃起大火，即能特別喚醒群眾，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走到各方面，甚至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是毫無希望的方面去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担負起自己的任務，便不能照顧到各方面，便不能掌握所有各種武器，便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把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按資產階級的方式建成了——而現在也按資產階級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能準備好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組全部社會生活。

現在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出乎資產階級及庸夫俗子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都改換了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改換了樣子。資產階級爲『波爾什維主義』所嚇倒，它因痛恨『波爾什維主義』幾至神經錯亂，所以它一方面既促進事變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波爾什維主義，因此它也就在其他許多方面削弱了自己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

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人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波爾什維克時，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而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更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出版至幾百萬份的資產階級報紙用盡各種腔調，大罵波爾什維克，反而喚起了群眾去估計波爾什維主義；況且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生活中，由於資產階級『熱心』，反而大大引起了對波爾什維主義問題的爭論。現在各國百萬富豪在國際上的行動，也使我们不得不對他們表示誠懇謝意。他們盡心竭力攻擊波爾什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之流毫無二致；他們做這件事情，也和克倫斯基一樣，做得『太過火了』，因而也幫助着我們。法國資產階級把反波爾什維主義問題作為選舉問題的中心，而責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傾向波爾什維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認為是波爾什維主義的嫌疑犯而大肆逮捕，到處造謠，說波爾什維克陰謀不軌，因之造成一種人心惶惶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它怎樣聰明，

怎樣富有經驗，却做出了想像不到的蠢事，它建立了經費極端充裕的『反波爾什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評論波爾什維主義的書報，添僱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神父來專門反對波爾什維主義；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應該鞠躬致謝。他們在替我們效勞工作。他們幫助我們，促使群衆來注意波爾什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問題。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另一種作法，因為要想『緘口不說』波爾什維主義，要想剷除波爾什維主義，這點他們已經是辦不到了。

但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波爾什維主義底一方面：只看見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準備在這一方面，極力抵抗。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單個的國家裏，在某種短促期間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辦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顧及到這一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縱能達到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可說是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生長起來』，它的萌芽真正是無處不有，『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使用的最『愜意』的比喻）已經根深蒂固地侵入到全機體之內。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

「傳染病」又會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憶想不到的出口迸發出來。這是生活的必然現象。儘管資產階級東奔西撞，兇狂暴戾。肆意橫行，做出許多蠢事，預先報復波爾什維克，並儘情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幾千、幾十萬個明天或昨天的波爾什維克；儘管資產階級這樣橫行無忌吧，但它的命運總是和以前被歷史判處了死刑的一切階級底命運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將來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既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同時又能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估量資產階級瘋狂奔撞的行動。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波爾什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帝制派將軍們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手段所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日益鞏固，日益發展着；它是這樣根深蒂固，甚至連摧殘追究都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着共產主義運動。要使我們更加有把握和更加切實地走向勝利，

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覺悟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各先進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所缺乏的，正是這種覺悟以及在實踐中體現這種覺悟的本事。

那些博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前是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們如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底破產，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覺悟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証法，而且以此教育過別人（從前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証法的時候，却犯了極大的錯誤，或在實踐上完全暴露他們是非辯証論者，完全是不善於估計到形式底迅速更變，以及舊形式中迅速充滿新內容的人，遂使他們底命運與漢德曼、黑得和普列漢諾夫相差無幾。

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祇是『呆呆注視着』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缺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種因客觀條件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轉變，而繼續千篇一律地重複那種簡單

的、讀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經充實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這班聰明角色却固執成見，過去現在都還繼續在那裏肯定地向自己和別人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主義者，不要重複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要趕快糾正並要使機體少受損害而迅速消除那種爲『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不僅右傾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與『右傾』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比較起來，前者的危險性與嚴重程度，要小一千倍，然而，這祇不過是由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爲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也許容易醫治好，所以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

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已經發展到無法包容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上看來，我們現在有了這樣堅固、這樣強大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足以使這種內容能夠而且應該無論在新的形式或舊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它能夠而應且該改造、戰勝與征服一切的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要與舊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所有一切新舊形式變為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澈底的勝利所運用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發展，走上最直接，最便捷的道路，向着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獲得勝利的目標前進。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彷彿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樣，說什麼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不容許機動，通

融和妥協，這就已經是錯誤了；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而且局部地已經並在繼續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右傾教條主義會因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忽略新內容，而完全破產了。左傾教條主義現在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能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開闢自己的道路，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把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別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去適應於不是由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由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各種更替。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慘禍，其卑鄙醜惡內容及其所造成的無出路狀況，如此強有力地推動和加速了全世界革命，這個革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發展得這樣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更替着的形式，供獻這樣有教益意義而在實踐上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據，以致使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可以很快地完全地醫治好『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增 補

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行報復，曾把我國掠奪一空，並不顧對本國工人所說的任何諾言，繼續加以掠奪和封鎖，而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我國印刷局已設法料理好來印行我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却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材料。我並不把這本小冊子看作是什麼比政論家短評較大的著作，因此要簡略地補述下列幾點。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現已成爲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

另行組織『共產工黨』，以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走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是因為我僅僅有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左派報紙蘇維埃（*All Soviet*），上面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與必要，同時也講到抵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派別）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內的。

與『左派』，即『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在職工會內工作）實行分裂，好像過去與『中派』（或者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樣，也許要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觀念混亂要好些，因爲觀念混亂既妨礙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也妨礙黨內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實際把自己考驗一番吧，讓他們不要嚴格集中和具有鐵的紀律的黨，不要有善於掌握各方面、各部門、各種政治工作與文

化工作的能力，去試試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吧。實踐經驗很快就會教訓他們的。

不過必須加緊努力，要使與『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儘少妨碍在最近將來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份子必然而且定要匯合成爲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波爾什維克所特別稱幸的，就是他們還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直接鬥爭以前，有十五年工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反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反對『左派』。而在歐美，現在却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這種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覬覦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觀念和『光明正大態度』的話），但工人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成爲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能力的黨。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曾說過，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事。此後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証實了。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Die Rote Fahne, Zentralorgan des Komm.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第三十一期上，載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關於「左派」共產黨人，即反國會派，將來與一般共產黨人合併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椿長處，就是他們比較一般共產黨人善於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我在波爾什維克黨的經歷上也屢次看到過這類的事情，不過範圍較小並且是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裡，而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波爾什維克有時候在某些地方鼓動羣衆，比我們更有成效。局部地這是因為在革命時候

卡普和留特維茨軍事「盲動」及關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正確。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聲明對於那個「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參加的社會主義政府」，採用「善意反對派」底態度（就是不準備用「強力來推翻」這個政府）。

這個策略，基本上無疑義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

或者革命情景還歷歷在目的時候，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比較容易接近羣衆。然而這還不足以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領導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或先進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羣衆，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那末，它就必須善於採用不管對於城市、對於工廠「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接近、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的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的工作。

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也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之爲『社會主義的』政府，謝德曼這一流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這類的話，並且決不能寫出像『聲明』底第四條這樣的語句：

『：當政治自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當資產階級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專政時，這種情形，從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來看，爲了繼續奪取無產階級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爲重要：』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德孫派（謝德曼派）斯麟頓派（克里斯平派）跳不出，且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又不能不是資本底專政。德國共產黨中央爲要達到它所全然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便完全不應當寫這些在原則上不正確和在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祇須說（如果要講講國會式的客氣話）：當多數城市工人跟隨着

獨立黨人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祇好讓這些工人，去嘗試「他們自己」政府底經驗，以便他們自己能拋棄最後的市僧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種說法完全足以做這種真正必要的妥協的根據，而妥協的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但是在日常的群眾鼓動工作中，並不受官場的國會式的客氣語所拘束，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輩這類下流東西，考茨基，克里斯平輩這批庸俗之徒在事實上揭穿自己如何自欺，又如何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會「最清潔不過地」做這一番「清洗」工作，來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叛賣階級的社會主義底骯髒馬廐，「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現時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已經根本喪失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為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得多）底真正面目，在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的事變時，就是在卡普和留特維茨底政變時，又

一次地暴露出來了。一個雖然簡短，却很明瞭的描述，便是考茨基所做的一篇小文章，題目叫做決勝負的關頭（*Entscheidende Stunden*，），這篇文章登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Freiheit，（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同時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論政局一文（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會用革命家的態度去思索和論斷問題。這些些只會嚶嚶啜泣的市僧民主派，如果他們自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末，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便要增加千百倍，因為他們事實上，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必然要作出叛賣的勾當；同時却『竭誠地』繼續自信，以為他們是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由於胆小

○ 這次政變，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三十日奧國共產黨極好的機關報紅旗上異常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闡述過（*Die Rote Fahne*，Wien 1920.

Nr. Nr. 266, 267, L.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和無氣節的緣故，認爲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毫無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時他們也是想「幫助」無產階級啊！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一類黨員，甚至這一批議員在自己的隊伍內，乃是一種錯誤。例如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駐羅馬通訊員這個局外的證人，更證實了這點，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了他和屠拉梯的一篇談話。這個通信員寫道：

「……屠拉梯先生認爲革命的危險，並不很大，不至於在意大利引起無根據的煩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祇是爲要使羣衆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與緊張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是一無適用的。它只能是使勞動階級經常覺得有所希望。用這種學說做

幻彩去眩惑無業者的人們，迫不得已進行日常鬥爭，以圖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好來遷延時日，使工人階級不致即時喪失自己的幻想，喪失對自己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接連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嚴重局勢，愈加嚴重。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全國憤慨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全國頹靡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還遠未覺悟到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其實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國內秩序和優裕生活：」

很明顯的，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教唆人等所掩蔽所粉飾的實情，却被英國的記者洩漏出來了。這種實情就是屠拉梯，特別維斯、莫其良尼、杜郭尼一流先生們底思想和政治工作正與英國記者所描寫的恰恰相同。這是激頭激尾的社會主義叛徒。他們主張在僱傭勞動奴役制下為資本案發財而工作的工人應遵守秩序與紀律，單就這一點說，已是十足的叛變行爲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對於我們俄國人該是何等耳熟呵！他們說群眾擁護蘇

維埃政權，該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呵！他們竟絲毫不懂得自發開展的罷工運動底革命作用，該又是何等鈍拙，何等鄙陋的資產階級心理呵！真的，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記者替屠拉梯一流先生們幫了一次欲益反損的忙，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波爾迪加同志及其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想在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那就得仗義聲討，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真正的共產黨。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波爾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從對於屠拉梯這流先生們所下的正確批評中，作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爲凡是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證據來辯護這個觀點。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上有過用真正革命方式，即真正共產主義方式利用資產階級國會而毫

無疑義是有益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模範例子。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千番百次以至無窮地說那種「舊的」、非波爾什維克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的所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在一切活動方面都應該加添（而且若不進行長期的、堅持的、頑強的工作，便無法加）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底傳統不同的東西（同時要保留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工作來說吧。報章，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一個多少文明的國家內，羣衆運動決不能沒有編輯機關。儘管你責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要使羣衆不受領袖底影響而保全純潔，也還是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還是不能使我們脫離在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的」氣氛和環境。甚至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兩年半以後，

還是爲羣衆（農民和手工業者）中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所形成的這種氣氛，這種環境所環繞着。

利用國會是工作底一種形式，編輯事業是工作底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人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政黨底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無論在前一方面或後一方面——而且在資本主義下，以及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無論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中——都必然會遇到這樣一些困難和特殊任務，這種困難和任務是無產階級爲要利用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知識份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爲要戰勝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成見和影響，爲要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抵抗力（往後還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環境）所必須加以克服和解決的。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以前，在各國，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等等痛罵國會制度，嘲笑被資產階級所腐化了的社會黨議員，抨擊鑽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着編輯工作，借着工會工作，去做同樣資產

階級式的鑽營祿位的勾當，難道這樣的例子當時我們不是看得非常之多麼？如果只就法國來說，難道如沃和麥爾黑姆這些先生們底行爲，不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拒絕』參加國會的幼稚氣，就在於他們想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來『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罷了。極無恥的鑽營祿位行爲，資產階級式的利用議席肥缺，改良派的對國會工作的驚人曲解，卑鄙的市儈陋習——凡此種種，毫無疑義都是資本主義到處產生着的，不僅在工人運動以外，而且在工人運動內部產生着的通常和最流行的標本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滅得很慢，因為農民經常不斷地重新產生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各方面，都產生出形式上稍有差別，而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勾當，民族沙文主義，市儈卑污行爲等等。

親愛的抵制國會派和反國會派的人們呵，你們自己覺得自己『異常革命』，

但事實上，你們是看見與在工人運動內部之資產階級影響作鬥爭時發生了比較大的困難，就爲這些困難所嚇倒了，殊不知你們的勝利，即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事業，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困難的程度要大得多，要大無數倍。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今天的小困難所嚇倒了，却不知道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還必須學習，必須補習怎樣去克服同樣的，而程度却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時，會有更多的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人鑽入到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裏面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機關中來，因爲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並無從去建設共產主義，因爲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我們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淘養和重新教育他們，——猶之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一樣，因爲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

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現在反國會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目空一切，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想一揮手就拋開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也就是這些任務要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中間復活起來（我們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且打破這種制度是很正確的，但是它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底名義之下，又重新復活起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內享受特權的，即熟練程度最高、待遇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制所固有的一切壞處都在不斷地復生着，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作再接再厲、堅持不懈的長期頑強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面，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本主義陋習，是很『困難的』事情：要把被資產階級偏見所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爲常的、當國會議員的領袖們趕出黨去，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中

間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人數很少的相當一部分人）來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真正不愧爲工人階級代表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在群眾中進行宣傳、鼓動、組織的迫切工作，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很『困難』，這是用不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爲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若與無產階級在準備獲得勝利的時候，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終歸必須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如同兒戲。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來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

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黨團，乃是一樁輕而易舉，形同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派』以及反國會派的同志們，連像克服現在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末，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使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服從自己並改造這些份子和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這些事情，並由於這樣倉卒補習，就會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則資產階級的環境，自私的習慣，市僧的傳統，就一定會從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社會活動底一方面，即國會活動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所有各方面，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臺上，毫無例外。在某種工作上，遇着某一樁『不痛快的』任務或困難，使想畏難偷安，託詞躲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爲了這點，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的。應該

學習並學會毫不除外地掌握所有一切方面的工作和活動，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氣、傳統和習慣。另一樣處置問題的辦法簡直是不鄭重的舉動，簡直就是幼稚氣。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寫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間

一九二〇年六月印成單行小冊子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五至二五〇頁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祇有由共產黨領導的城市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才能使農村勞動羣衆解脫資本和大地主土地佔有制底壓迫，免除破壞的災亂，免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一再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浩劫。除非與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奮不顧身地來援助它爲推翻地主（大土地佔有者）與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革命鬥爭，農村勞動羣衆則別無自救的辦法。

另一方面，如果工業工人將以狹隘行會利益和狹隘職業利益固步自封，並自

滿自足地只關心到改善自己有時是小康的生活狀況，那他們也就不能執行其使人類解脫資本壓迫和免除戰爭災禍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使命。

在許多有「工人貴族」的先進國家內，情形正是如此，這班工人貴族乃是第二國際中所謂社會主義政黨底基礎，而其實他們是社會主義底死敵，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是市僧沙文主義者，是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底代辦。無產階級要成爲真正革命的階級，成爲真正按社會主義精神來行動的階級，就祇有在自己的一舉一動上都以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先鋒隊資格，以其在推翻剝削者所進行的鬥爭中的領袖資格來出現；但如果不把階級鬥爭引進到鄉村中去，不把農村勞動群衆聯合到城市無產階級底共產黨周圍，不由城市無產階級來教育農村勞動羣衆，那末這個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二) 城市無產階級所應當引導來參加鬥爭或至少也要吸收到自己方面的農村被剝削勞動羣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階級：

第一是農業無產階級或僱傭工人（年工，季工，短工），這是黨在資本主義

農場中出賣勞動力爲生的人。把他們與農村居民的其他集團分開，成立這個階級的單獨組織（政治的，軍事的，工會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等等的組織），加緊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吸引他們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這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二是半無產者或最小農，這是一部分靠在資本主義農業和工業內出賣勞動力，一部份靠在僅能少許自給的小塊私有土地或租來土地上勞作爲生的農民。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村勞動居民中這一集團的人數是很多的，但資產階級底代表們以及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社會主義者』往往蒙蔽這一農民集團的存在以及他們的特別狀況，部份的是爲了自覺地欺騙工人，部份的是由於盲目地爲種種庸俗因循觀念所蠱惑，竟把這個集團與一般普通『農民』羣衆混爲一談。資產階級愚弄工人的這種方法，在德國和法國表現得最明顯，其次就是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如果共產黨的工作路線正確，則這一農民集團乃是共產黨的極可靠的擁護者，因爲這種半無產者的生活艱難，他們從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能够

立刻獲得極大的利益。

第三是小農，他們擁有私人的或租來的小塊土地，足以養活家口及供農莊的需用，並不要僱傭他人的勞動力。這一階層無條件地能從無產階級勝利方面得到好處，因為無產階級勝利後能立刻地、完全地給他們以下列利益：（甲）免向大地主繳納租金或現糧（例如法國的 *metayers* 租糧，意大利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乙）免付典押金；（丙）解脫大地主方面多種形式的壓迫及其對大地主的依賴（在使用森林方面等等）；（丁）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幫助他們的經濟（可以使用無產階級所剝奪來的資本主義大農莊的農具和部分建築物，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把原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替富農與中農服務的這類組織，如農村合作社和共耕社，變成爲首先幫助貧民，即幫助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的組織），以及其他許多利益等等。

同時共產黨應當明白瞭解，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個階層中，不免或至少有一部分人會動搖到求得絕對自由貿易和

自由使用私有制權利那方面去，因為這一階層，既在出賣消費品（雖則範圍不大），也就是被投機業和私有制積習所腐化了的人。但在堅強的無產階級政策下，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充分堅決懲治大地主與大農的條件下，這一階層的動搖不會是很大的，並且這種動搖性不能改變一般和整個說來這階層將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來的事實。

（三）以上所述農村居民底三個集團總計起來，就組成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不僅在城市內，而且在鄉村中都有了充分的保障。與這相反的意見却流行得很廣，但第一，這種意見祇是由於資產階級科學與統計材料之有系統地進行欺騙，極力蒙蔽上述農村各階級與地主資本家剝削者之間，即一方面是半無產者和小農，另一方面是大農之間的深刻分裂現象；第二，這種意見是由於黃色第二國際英雄以及各先進國內被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不善於與不願意在貧農中進行真正無產階級的革命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機會主義者底全部注意力無論過去或現在都集中在怎樣去同資

產階級，其中也有大農與中農（關於他們的情形可參閱下文）作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妥協，而毫不注意到由無產階級舉行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與資產階級；第三，這種意見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成見（與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制偏見及國會制偏見結連着的），以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充分證明及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所完全證實了的真理表示一竅不通，這個真理是說：以上所述這空前備受抑壓、零散凋弊，而在一切最先進國家中是必然要度着半野蠻生活的三種農民，雖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對於社會主義勝利都饒有興趣，但祇有在無產階級爭得政權之後，祇有在無產階級堅決懲治大地主與資本家之後，祇有在這些備受壓迫的人從實踐上看出他們具備了這種有組織的，充分雄強堅實的領袖和保護者能來幫助和領導他們，向他們指出正確道路的事實之後，他們才能堅決不移地贊助革命的無產階級。

（四）所謂「中農」，這在經濟意義上應瞭解為小的農作者。他們第一，按私有權或租佃權也擁有不多的土地，但這塊土地上的收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畢竟照例不僅供養活家口與農莊上的粗糶用度，並且可能有某種剩餘，這種剩餘至少在好年份內可以變為資本，第二，往往（例如兩三家農戶中便有一家農戶）可以僱傭他人的勞動力。在德國，各擁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集團，可作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中農的具體例子。據一九〇七年的統計，這集團中僱有農業工人的農戶數約佔該集團全農戶數的三分之一。在法國，因為例如葡萄這類需要有更多更多勞動花費到土地上去的特別農作物更加發達，大概這個集團內使用

○ 確切數字如下：各擁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數為六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總農戶數為五百七十三萬六千零八十二；內中各種僱傭工人數為四十八萬七千七百零四，家庭的工作者（*Familienarbeit*）為二百萬零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在奧地利，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這一集團的農戶數為三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內中十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六戶是使用僱傭勞動的；僱傭工人數為十四萬六千零四十四，家庭的工作者為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九人。奧地利的總農戶數為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九。

僱傭勞動力的範圍，還更要廣泛。

革命的無產階級，至少在最近將來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不能把吸引這個階級到自己方面這點作爲自己的任務，而應當祇限於中立中農，即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使中農中立起來。這個階級之動搖於兩個勢力之間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新時代底初期，在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這個階級的主要趨向，將是贊成資產階級的。因爲這裏是私有者底世界觀和情緒佔優勢；直接的趨向是樂於投機買賣，樂於貿易與私有制底『自由』；與僱傭工人的對抗是公開發展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消滅地租與典押金，將直接改善這個階級的生活狀況。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政權決不應該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並且無論如何都要保證小農與中農：不僅保留他們的土地，而且要把這土地面積擴大到他們平素租來的全土地面積（廢除地租）。

把這種辦法與無情地去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結合起來，就可以完全保證中立政策的成功。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祇有在極端謹慎，按步就班，藉實例之助，不對

中農施用任何強力的條件下，才能施行過渡到集體農業的步驟。

(五)大農(Grosbauern)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主，照例在經營業務中都雇有幾個僱傭工人，他們之所以與「農民」有關，祇是因文化水準不高，生活常規相同，在自己農莊內親身參加勞動。這是資產階級內，即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和堅決敵人內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共產黨在全部農村工作中，應該主要注意到同這一階層作鬥爭，要把農村居民中佔大多數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從這些剝削者底思想和政治影響下解脫出來等等。

當城市無產階級勝利之後，這個階層方面的一切反抗形式，怠工和直接反革命的武裝發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開始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來準備必需的力量，以便澈底解除這個階層的武裝，除了推翻工業中的資本家以外，同時還要乘這階層底反抗初一露頭的時候，便給它以最堅決最無情的殲滅打擊，爲了這點，就得武裝農村無產階級，並在鄉村中組織蘇維埃，其中決不能有一個剝削者，而且必須保證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在裏面佔着優勢地位。

但是，甚至剝奪大農都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底直接任務，因爲還沒有相當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也沒有社會條件來把這樣的農莊公有化。在個別的，大概是例外的情況下，要將他們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份或爲附近小農所特別需要的那部份加以沒收；此外還要保證小農在某種條件下，無代價地來使用大農底一部份農業機器等等。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應當保全大農自己的土地，祇有在他們反抗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政權的情形下，才實行沒收這些土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其中反大農的鬥爭由於許多特殊條件曾顯現得複雜而又遲延）底經驗終究表明出，這一階層因極小的抵抗企圖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訓之後，也能於恭順地執行無產階級國家所給予的任務，並甚至開始來尊重——雖則非常緩慢，——這捍衛一切勞動者和無情對待寄生蟲富人的政權。

在俄國，當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進行反大農的鬥爭時，使這一鬥爭陷於複雜遲緩的那些特殊條件，主要是俄國革命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變革之後，經歷過全體農民反對地主的這「一般民主」的，即其基

礎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鬥爭階段；其次是城市無產階級文化上和數量上的薄弱；未了便是區域潦闊以及交通極為不便。既然在各先進國家中沒有這些阻滯條件，所以歐美無產階級應當更積極地準備着並更迅速、更堅決、更順利地貫徹鎮壓大農反抗的完全勝利，奪去他們可以進行反抗的任何可能。這是萬分必要的，因為在尚未達到這種十二分完備的勝利之前，鄉村中的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不能相信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已是充分鞏固了的。

(六) 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和無條件地沒收地主與大農業主底土地，這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就是那些直接或經過自己的業戶來有系統地剝削僱傭勞動力和四周小農（一部份也往往剝削中農）的人，他們不參加任何體力勞動，他們大半是屬於封建主（如俄國、德國、匈牙利的貴族，法國復辟了的領主，英國的貴族，美國先前的奴隸主）底後裔，或屬於特別豪富的財閥，或屬於這兩類剝削者和寄生蟲底混合種。

在共產黨隊伍中，決不容許宣傳或實行報償那些被剝奪了的大地主的土地，

因爲在現代歐美各國條件下，這樣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就是對被剝削勞動群衆施行新的貢稅，因爲戰爭大大增加了百萬富翁的數量，使他們發了大財，而勞動群衆所受的戰禍則最爲深切。

至於說到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所沒收來的大地主土地上之經營方式問題，那末在俄國，因爲它經濟落後，主要是由農民來分受這些土地，祇有在相當稀罕的例外，才保留過所謂『蘇維埃農莊』，這些農莊由無產階級國家自力經營，並把那裏以前的僱傭工人變爲執行國家委託的工作員和管理國家的蘇維埃委員。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說來，共產國際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保留大農業企業，並做俄國『蘇維埃農莊』的型式來經營這種企業，乃是正確的辦法。

但如果誇大或死板執行這一例規，而絕對不容許把從剝削者那裏剝奪來的一部分土地無代價地分給附近的小農，有時也分給中農，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一，人們常常藉口大農業在技術上佔優勢這一無可爭辯的真理來反對分配大田產，實際上不過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和背叛革命的主張。無產階級爲了這一

革命底勝利，決不要害怕生產暫時低降的現象，猶之北美奴隸制底敵人資產階級未曾因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內戰結果所引起的棉花生產一時低落而裹足不前一樣。對資產者說來，重要的是爲生產而生產，對無產者和被剝削民衆說來，最重要的的是推翻剝削者，是保證勞動者確有爲自己工作而非爲資本家工作的條件。無產階級底首要與基本任務，便是保證無產階級之勝利及其穩固性。而如果不中立中農，如果沒有若非全體小農，至少也是極大部分小農底贊助，則無產階級政權便不能穩固。

第二，不僅提高農業中的大生產，甚至是保留農業中的大生產，都必須首先有充分開通的，富有革命覺悟，並在職業上、政治上真正受過有組織鍛鍊的農業無產者。凡是在還沒有具備這種條件或者還沒有可能把這一事業適當地委託給覺悟而又練達的工人的地方，如果企圖把大農莊急速轉交國家經營，這種辦法只能破壞無產階級政權底威信，那裏在建立「蘇維埃農莊」時，必須萬分小心，必須有最縝密的準備工作。

第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還保留有大土地佔有者對附近小農所施行的中世紀式、半勞役式的剝削制殘餘，例如德國的 *Instleute*、法國的 *metayers*、美國的半成農（在美國南部，黑奴多半是受着這樣的剝削，但有時白種人也受這種剝削）。際此情況下，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把小農所承租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原來這些佃戶使用，因為此外沒有別的經濟技術基礎，並且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這種基礎。

大農莊的農具，應實行沒收，轉為國家的公有物，但必須使國營大農莊有了這些農具的保證，而附近小農在遵守無產階級國家所製訂的條件下可以無代價地來使用這種農具。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初期，不僅絕對必須立刻沒收大土地底田產，而且絕對必須把他們這些反革命頭目和殘酷壓迫農民的人一律驅逐或加以拘禁；依無產階級政權不僅在城市而且在鄉村鞏固的程度，就必須有系統地努力做到，使這階級中擁有寶貴經驗、知識和組織才能的現有一切人力，都能利用來（由最可靠的工

人共產黨員特別監督）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

（七）祇有當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最終壓倒了剝削者底一切反抗，保證了自己地位完全鞏固及政令能充分施行，而在大集體生產與最新（基於全部經濟電氣化）技術基礎上改組着全部工業的時候，則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底鞏固才可以說是有保證。祇有這樣才會使城市能給落後的零散的鄉村以急進的技術幫助和社會幫助，藉此建立大大提高耕作中和一般農業中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基礎，根據實際例子，並且是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來喚醒小農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的，使用機器耕種的農業上去。這一爲全體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所公認而無可爭辯的理論真理，却在實際上被那統治着黃色第二國際的以及德國和英國「獨立黨人」、法國龍格派等等領袖們的機會主義所曲解。這種曲解就在於他們把注意力移轉到比較遙遠的，美妙的將來，而忽視了這種困難的具體過渡階段和進到這一將來的最近任務。在實踐中這無非是鼓吹與資產階級妥協，鼓吹『社會和平』。即完全背叛無產階級，而這無產階級現時正在因戰爭所造成的到

處空前破產貧困的條件下，正在因戰爭所引起的一小群富豪空前發財與卑鄙無恥的條件下奮鬥着。

爲使農村中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真正能收到成效，第一，就要各國共產黨都能這樣教育工業無產階級，使他們自覺瞭解到推翻資產階級與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便必須忍受犧牲，並且有承擔此種犧牲的決心，因爲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善於組織並引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群衆，同時它這個先鋒隊有着爲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去表現最大犧牲精神與英勇氣概的本領；第二，就要農村中的勞動者和最受剝削的羣衆能從工人勝利方面，在損害剝削者利益的條件下，得以立刻並大大改善本身生活地位，因爲不如此，就不能保障農村來贊助工業無產階級，特別是工業無產階級就無從找到糧食來供給各城市。

(八)因爲在資本主義把農業中勞動羣衆陷入異常疾苦，零星散漫，往往是受着半中世紀制束縛等條件下，組織與教育這些勞動羣衆去參加革命鬥爭一事具有極大的困難，所以各國共產黨必須特別注意農村中的罷工鬥爭，並加緊援助和

從各方面去開展農業無產者及半無產者底羣衆罷工運動。由現在德國和其他先進國經驗所証實與擴大了的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表明祇有日益開展着的羣衆罷工鬥爭（在某種條件下，農村中的小農也罷工而且應當被吸引到這鬥爭中來）才能打破鄉村內的沉眠狀態，才能喚醒鄉村被剝削羣衆底階級覺悟以及必須有階級組織的覺悟，才能在他們面前明顯地實際地暴露出他們與城市工人聯盟的意義。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斥責這班可惜不僅出現於黃色第二國際，而且出現於退出這國際的歐洲三個特別重要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是叛徒，是變節者，他們不獨巧於對農村罷工鬥爭取冷淡態度，並藉口有減低消費品生產的危險而公開反對這種罷工鬥爭（例如考茨基）。假若在實踐上沒有實際証明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善於把發展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看得高於一切，善於爲着這一革命去担负最艱鉅的犧牲，那末任何綱領，任何冠冕堂皇的聲明，都是一錢不值的，因爲要避免飢餓、破產和新的帝國主義大戰，此外則別無出路。

尤其要指出，那班現時爲了保存自己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衆中的威信常常在口頭上向共產主義讓步，或甚至在名義上轉到共產主義這方面來的舊社會主義底領袖與「工人貴族」代表們，正要在革命意識與革命鬥爭發展得最厲害，地主與資產階級（大農，富農）反抗得最殘酷，社會黨妥協派與共產主義革命家之間區分得最清楚的地方，正要在這裏的工作中受到考驗，證明他們是否忠實於無產階級底事業以及能否担任負責的職務。

（九）共產黨應當用一切力量儘快地在鄉村中去首先建立僱傭工人和半無產者的代表蘇維埃。祇有與羣衆罷工鬥爭及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聯繫着，蘇維埃才能執行自己的使命，才能鞏固，而使小農受着自己的影響（然後把他們吸收進來）。但如果因爲地主與大農方面的繁重剝削，又因爲沒有工業工人及其工會方面的援助，以致罷工鬥爭還不發展，農業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力還嫌薄弱，那末，成立鄉村代表蘇維埃就需要有長期的準備，其方法是建立甚至是不大的共產黨支部，加緊鼓動工作，最通俗地來說明共產主義底要求，根據最顯著的剝削與壓迫實例

來解釋這些要求，有系統地派工業工人到鄉村中去等等。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九卷，第二六六至二七八頁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來，關於一般平等（其中也有民族平等）問題之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乃是這一民主制所特有的現象。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示有產者與無產者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在形式上或法權上的平等，藉此來極端欺騙被壓迫階級。資產階級藉口彷彿個人絕對平等，而把本身上就是反映商品生產關係的平等思想，轉爲反對消滅階級的一種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思也就祇是要求消滅階級。

（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枷鎖而鬥爭底自覺的代表者，它根據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並揭破其荒誕和偽善性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也應當提出抽象的與形式上的原則，而是應當：第一，精確估計到具體歷史環境，首先是經濟環境；第二，把被壓迫階級和被剝削勞動者底利益，從一般人民利益的概念，即表現統治階級利益的普泛概念中，明確區分開來；第三，同樣將被壓迫的、依賴的、不平權的民族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全權的民族區分清楚，而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對立起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正是蒙蔽着財政資本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有現象，即由寥寥無幾的最富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地球上極大多數人口所施行的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的事實。

（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在所有一切民族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面前，特別顯著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辭句底虛偽性，事實上表明出標榜爲『西方民主』的凡爾塞和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凱撒底布列斯特和約更加野蠻，更加下賤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強暴力量，國際聯盟以及協約國戰後全部政策把

這一真理揭露得更加明顯，更加激厲，並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及依賴國一切勞動羣衆革命鬥爭，而使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處和一律平等的這種市儈民族幻想加速破產。

(四)從上述基本原理中就得出如下的結論：共產國際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上的主要政策，應當是使一切民族和各國無產者與勞動羣衆接近起來，進行共同的革命鬥爭去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祇有這樣接近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若沒有此種勝利，便不能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權現象。

(五)現今世界政治形勢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到了日程上面，而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環繞在一個中心點：即環繞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鬥爭底周圍，而蘇維埃俄國却必然一方面團結着各國先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着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民族根據自身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外，對他們說來，是別無救亡之策。

(六) 所以現時不能局限於空口承認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勞動羣衆互相接近，而必須進行這樣的政策，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之與蘇維埃俄國間的緊密聯盟得以實現，根據各個國家無產階級中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根據落後國家或落後民族中工人和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來確定這一聯盟底形式。

(七) 聯邦制是進到各民族勞動者之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現在的阿捷爾拜疆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中，以及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與原先既沒有國家生存權又沒有自治權的各民族（例如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一九二〇年建立的韃靼共和國）的關係中，聯邦制已在實踐上表現了自己的適當性。

(八) 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用經驗來

檢査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地上所發生着的這些新的聯邦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就必須力求達到由聯邦進到更加緊密的聯盟，因為，第一，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最緊密的聯盟，便無法捍衛住被軍力方面雄強得無比的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必須有各蘇維埃共和國之密切的經濟聯盟，否則便無法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及保證勞動者的福利；第三，要估計到按各國無產階級所調整的總計劃，建立統一的整個的全世界經濟體系的趨向，這種趨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充分顯然地表現出來，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則是無條件地會繼續發展和臻於完善的。

(九) 在國家內部關係方面，共產國際底民族政策，對民族平權問題決不能限於一種空洞的、形式的、純粹宣言式的、實際上毫無責任心的承認，如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管是那些公開自認爲是這種民主派，抑或藉社會主義者名稱掩飾的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們，都是一樣——所承認的那樣。

不僅在共產黨底全部宣傳鼓動工作，即國會講壇上與國會講壇外的宣傳鼓動

工作中，都應當不屈不撓地揭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違背它們的「民主」憲法，經常破壞民族平權，破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種種事實，並且第一，必須經常解釋，說明祇有蘇維埃制度才能在事實上給予各民族以平等權利，它在反資產階級鬥爭中始而把無產者，繼而把全體勞動羣衆聯合起來；第二，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幫助各依賴國或不平權民族（例如在愛爾蘭，在美洲黑人中等等）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沒有最後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則反對壓迫依賴國和殖民地的鬥爭以及承認他們有國家分立權等都無非是一種假招牌，正如我們從第二國際黨那裏所見到的一樣。

（一〇）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在全部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中，却以市儈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來代替了國際主義，這不僅是在屬於第二國際的各政黨中，而且是在退出了這個國際的各政黨中，甚至往往是在現時自命爲共產主義的政黨中最通常的現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由民族性的（即存在於一個國家之

內，還不能左右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為國際性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的，能夠對全世界政治起決定作用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任務愈迫切，則同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民族成見這種禍害作鬥爭，就愈加重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宣稱祇要承認民族平權就算是國際主義，同時却保留着（更不待說這種承認是純粹口頭性的）民族利己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求：第一，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應當服從於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正在實現戰勝資產階級的這個民族要能夠並有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担負最巨大的民族犧牲。

因此，在已經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真正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工人政黨的國家中，第一等重大任務就是要與曲解國際主義及其政策的機會主義和市僧和平主義作鬥爭。

（一一）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及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中，應特別注意以下各點：

第一，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首先是該落後民族在殖民地關係或財政關係上所依賴的那個國家內的工人，應該負最積極幫助的責任；

第二，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很大影響的僧侶教徒及其他中世紀式的反動份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其國王、地主、阿洪等地位的汎回教主義及其他此類流派作鬥爭；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地主、反大土地佔有制、反各種封建表現或封建殘餘的農民運動，極力使農民運動帶有最大的革命性，並實現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及一般落後國家內農民革命運動間之儘量緊密的聯盟；

第五，必須堅決進行鬥爭，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共產國際祇是在這種條件下，即當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這

些將來無產階級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底份子，能修覺悟到自己與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特別任務，而從此組織起來並受到鍛鍊的時候，才應當援助該國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該去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底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決不要同他們融成一片，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在萌芽狀態時，也無條件地要保持這一運動底獨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國家內，特別是向落後國家內的最廣大勞動羣衆不屈不撓地解釋並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政策，它們建立政治上表面是獨立的國家，却泡製着經濟上、財政上、軍事上都完全依賴於自己的那種國家；在現代國際形勢下，除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則依賴國和弱小民族是別無救亡之策的。

（一二）帝國主義列強歷來加於殖民地與弱小民族的壓迫，引起被壓迫國家勞動羣衆對一般壓迫民族，同時也對這些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僅表示憎惡，而且表示不信任。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這一無產階級底大多數正式領袖們按社

會沙文主義精神藉口『保護祖國』來掩蓋其保護『本國』資產階級之壓迫殖民地及掠奪財政上的依賴國底『權利』，以致他們這種卑鄙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爲，會不能不加強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愈是落後，則這國家內的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成見，如民族利己主義及民族狹隘性特別加強和穩固起來。既然這些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逝之後，只有落後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激劇改變之後，才能泯滅，那末這些成見要消亡下去，就不能不是很緩慢的。所以，各國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對於遭受壓迫極久的國家和民族內的民族感覺殘餘，要特別慎重，特別注意，同樣爲了更迅速地消除以上所說的不信任心理與種種成見，還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方面以及全體勞動羣衆方面之自願力謀聯盟與統一的願望，則戰勝資本主義這一事業便不能順利完成。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五至二九〇頁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於八月七日閉幕了。自從共產國際成立以來祇有一年多的時日，但在這短促期間內，已經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巨大成就。

一年前，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祇是樹起了共產主義底旗幟，在這旗幟下面，本來還要把革命無產階級底力量聚集起來；曾經向第二國際，即黃色國際宣了戰，這個國際將那些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並與資本家結成聯盟來敵抗工人革命的社會黨叛徒，都聯合到自己隊伍裏去了。

工人羣衆中對共產主義同情心底增長，迫使第二國際內最主要的歐美政黨：

如法國社會黨，德國和英國的「獨立」黨，美國獨立黨，都退出了第二國際，單就這一事實看來，也可顯見這一年來該達到了如何巨大的成就。

全世界各國革命工人底優秀份子已經站到了共產主義這方面，擁護蘇維埃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歐美各先進國內，已經有了共產黨或人數衆多的共產主義集團。在八月七日閉幕的代表大會上，不僅團結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倡導者，而且還團結了與無產者羣衆聯繫着的各堅強雄大組織底代表。這也就是現在擁護共產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底國際軍，也就是這國際軍在這次剛閉幕的代表大會上形成了自己的組織和獲得了明確周詳的行動綱領。

代表大會拒絕了立刻將至今選把「孟什維主義」、叛變社會主義、機會主義等底權威代表者保留在自己隊伍中的政黨，如像上述那些已退出第二國際，即黃色國際的政黨，接受到共產國際隊伍裏來。

代表大會在充分確定的諸決議案中否斥了向機會主義開放任何門徑，要求無條件地同機會主義分裂。在代表大會上宣佈的各種勿庸置疑的材料也表明了，工

人群眾是擁護我們的，而機會主義者定會被澈底戰勝的。

代表大會糾正了某些國家中那班絕對希望『向左走去』的共產黨員所犯的錯誤，他們否認必須在資產階級國會內，在反動職工會中，在一切凡是有仍被資本家及由工人出身的資本家奴僕，也就是黃色第二國際代表所愚弄着的成百萬工人的地方工作。

代表大會建立了全世界共產黨的空前未有的團結精神和紀律，這種精神和紀律使工人革命先鋒隊能够邁步前進，去達到自己的偉大目的，即推翻資本主義的枷鎖。

因為有同時舉行的國際女工代表大會，所以代表大會也能鞏固與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聯繫。

各強盜民族底『文明』聯盟所如此野蠻切掠、征服和奴役的東方殖民地及落後國底共產主義集團與共產黨，也同樣派來了代表出席大會。假如在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中，不與遭受這些資本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充分地和最密切

地聯合一起。那末，先進國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就不過是一種騙局。

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戰勝了地主與資本家，戰勝了尤登尼奇輩、高爾察克輩、鄧尼金輩、波蘭白匪以及他們的兇幫——法英美日諸國。這些軍事勝利是很偉大的。

可是我們奪取工人、勞動者、受資本壓迫羣衆底意識與心靈的勝利，即全世界上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勝利，還要更加偉大。

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枷鎖，這一事業正在實現着，而且在全世界各國內都定會實現的。

一九二〇年刊載於女共產黨員雜誌八九兩月第三、四兩期合刊上。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七〇至三七一頁。

青年團底任務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

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想來談談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基本任務是什麼，以及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般青年組織應當是怎樣一種組織的問題。

其所以特別要講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真正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正是要由青年來擔負。須知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培養出來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滅建築在剝削上面的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他們至多也只能建

立一種新社會制度來幫助無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保持自己的政權並奠下堅固的基礎，至於在這個基礎上來實行建設，就只有靠已經是在新條件下，即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已不存在的環境中從事工作的一代人去擔負。

所以，從這個觀點上來觀察青年底任務問題時，我應當說，一般青年底任務，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一切組織底任務，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學習。

當然，這僅僅是『一句話』。這句話還沒有答覆主要和最重要的問題——學習什麼和怎樣學習？可是全部關鍵就在於從改造舊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起，那些將擔負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新代人底學習、訓練和教育，也就決不能是舊時那樣的了。青年底學習、訓練和教育應當是把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材料作為出發點。

只有從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智識、組織和機關底總和出發，並利用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人力與資材，我們才能來建設共產主義。只有把訓練青年、組織青年和教育青年的事業根本改造，我們才能使這代青年努力的成果得以建立起一個

與舊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

因此，我們必須詳細講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教青年學習什麼，真正想不愧為共產主義青年的青年應當怎樣學習，以及我們應當如何來培養青年，使他們能够澈底完成我們所已經開始了的事業。

對於這個問題，似乎首先而且極自然地應當這樣來回答，就是說青年團以及所有一般想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但『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回答還未免太寬泛。爲了學會共產主義，我們究竟需要什麼呢？爲了求得共產主義知識，我們究竟應從一般知識總和中挑選出哪些東西來呢？這裏我們可能遇到許多危險，而這種危險往往當人們把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或者對這任務理解得太片面時，就會馬上呈現出來的。

驟然看來，總不免以爲學習共產主義便是領會共產主義教科書、小冊子和著作裏的一切知識。但把研究共產主義的任務說成這樣，未免太粗笨，太不妥當了。

如果說，研究共產主義只限於通曉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末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是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因為這種人雖把共產主義書本上的東西都讀得爛熟，却不善於將這一切知識融會貫通，也不會按共產主義的真正要求去實際行動。

資本主義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實踐完全分離，因為我們有過的那些書裏，把一切都描寫得再好沒有了，那知它們大半是些極可惡的謊言謬語，虛假地向我們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的情景。所以單從書本上來通曉論述共產主義的書籍裏所說到的東西，便會是極不正確的。

現時在我們的言論與文章中，已經不是簡單重複以前關於共產主義所說的那些話，因為我們的言論和文章都是與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聯繫着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那末單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上的共產主義知識，可以說是一文錢不值，因為這種知識仍舊會是把資本主義舊社會中最可惡的特徵，即理論與實踐脫離的現象保存下去。

假如我們祇求通曉共產主義的口號，那就更加危險了。我們若不及時認清這種危險，若不用全力去消除這種危險，那末，有五十萬或一百萬青年男女這樣學習過共產主義之後便自稱為共產主義者，這一事實就只會使共產主義事業遭到大大的損害。

這裏便發生另一個問題：爲了學習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把這一切結合起來呢？從舊時學校，舊的科學中，我們應當採取一些什麼呢？

舊時學校總說它是要培養出通曉各種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爲當時整個社會都是建築和支持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壓迫着的基礎之上。自然，舊時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學校，祇能使資產階級底兒女獲得知識。這種學校裏的每一句話，都無非是根據資產階級利益捏造出來的。

在這樣的學校裏，工農青年所受到的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爲迎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爲資產階級造成適用的奴僕，

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所以我們反對舊時的學校，祇從這種學校中採取我們爲了實行真正共產主義教育所必需的東西。

這裏，我就要講到人們常常用來斥責與非難舊時學校的說法，這種說法往往作出完全不正確的結論。

人們說，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學校。這是對的，但是總選要把舊時學校中壞的東西與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區別開來，應該善於從舊學校中挑選出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並把他們變成一些依法泡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無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爲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爲無須領會共產主義學說本身所由產生的全部知識，而祇要通曉共產主義口號，祇要通曉共產主義科學底結論就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便是共產主義從人類思想總和中產生出來的標本。

你們讀過和聽說過，主要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科學，即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位固然是天才社會主義者底紙上著作，這一學說已經成了全世界千百萬無產者底學說，千百萬無產者已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運用着這個學說。

如果你們要問：爲什麼馬克思底學說能够掌握這最革命階級中千百萬人的心靈，那你們祇能得到一個回答：這是因爲馬克思憑藉了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獲得的那些知識底堅固基礎；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便瞭解到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會引向到共產主義，而且主要的，是他只依據於對資本主義社會之最確切、最精密和最深刻的研究，藉助於充分領會以往科學上所貢獻的全部知識，才證實了這個結論。

凡人類社會所創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態度來審查過，任何事物也沒有忽略過去。凡人類思想所建樹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並根據工人運

動的實踐來一一檢驗過，於是就作出了那些爲資產階級狹隘性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例如，當我們說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到這點。若不清楚瞭解到，祇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祇有改造這種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若不瞭解這點，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任務。

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爲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爲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發展底必然結果。

所有這一切大道小徑，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通向於無產階級文化，猶之馬克思所改造了的政治經濟學同我們指明了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指明了進到階級鬥爭，進到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

當我們聽到有些青年代表者以及某些擁護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攻擊舊時學

校，說它是呆讀死記的學校時，我們便回答說，我們應當採取舊時學校中那些優良有用的東西。

我們決不能採取舊時學校裏那種用十分之九無用，十分之一被曲解了的累贅知識來充塞青年頭腦的辦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祇可限於學得共產主義的結論，祇可以去背誦共產主義的口號。須知這樣做去，是建立不了共產主義的。祇有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寶藏充豐富自己的頭腦時，才能成爲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呆讀死記，但是我們一定要使每個學習者用基本事實底知識來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思考力，因爲如果不把所學得的全部知識加以融匯貫通，那共產主義也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變成一塊空招牌，那共產主義者也就祇會是吹牛家。你們不僅應當通曉你們所學得的知識，並且要用批判態度來領會這些知識，使得自己腦子裏，不是被一堆無用的垃圾充塞着，而是爲現代每個有學識的人所必備的科學知識所豐富着。

假如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根據自己所學得的現成結論，却不用一番極認真，

極艱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所必須用批判態度來對待的實際事物，便想用共產主義這字眼來妄自誇，那末，這樣的共產主義者是很可悲的。這樣一種走馬看花一知半解的態度，是極端有害的。明知我自己懂得的太少，那我就設法使自己懂得的更多，但若有人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同時又認爲自己根本就無須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決不能成爲一個類似共產主義者的人。

舊時學校所培養出來的是資本家所必需的奴僕，舊時學校把科學人材訓練成爲適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破壞這樣的學校，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從這種學校裏採取人類所積聚起來，而爲人們所必需的一切呢？

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善於去區別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東西與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呢？

我們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內違反大多數人意志所施行的舊的強迫紀律，採用工人和農民底自覺紀律，這些工農份子不但能仇視舊社會，而且具有團結和組織自

己力量去進行鬥爭的毅力、本領和決心，以便把這分離渙散在遼闊國度內千百萬民衆底意志，統一成爲一個意志，因爲沒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是必然會遭到潰敗的。沒有這樣的團結，沒有工農這種自覺紀律，我們的事業便毫無希望。不具備這些條件，我們便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我們就會甚至連基_地也不能鞏固，更談不到要在這個基地上來建_成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同樣，我們雖反對舊時學校，對舊時學校懷着完全正當與必要的仇視心理，重視那種毀壞舊學校的決心，但我們却應當瞭解到，廢除舊時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方式時，我們必須善於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使我們這裏的共產主義不會是什麼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經你們自己深思熟慮過的東西，是從現代知識上看來必不可免的結論。

這就是當我們說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時所應當提出的基本任務。

爲要向你們說明這點，同時講到怎樣學習的問題，就讓我來舉出一個實際例子。你們都知道，緊接着軍事任務，即保衛共和國任務之後，立刻就_在我們面前

出現了經濟的任務。

我們知道，如果不復興工業和農業，並且還不是按舊方式來復興工業和農業，那末共產主義社會是建設不成功的。必須在現代最新科學基礎上，來復興工業和農業。你們知道，這樣的基礎就是電氣化，祇有當全國電氣化，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都電氣化的時候，祇有當你們真正擔負起這個任務的時候，你們才能替自己建成老年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產主義社會。

你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在經濟上復興全國，就是要在基於現代科學和技術、基於電氣的現代技術基礎上，來改造和恢復農業與工業。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電氣化事業中，不識字的人是沒有用處的，而且僅僅是識字還不够。這裏祇懂得什麼是電氣還不够；應該懂得，怎樣在技術上把電氣應用到工業，農業以及工農業的各個部門中去。每個人必須學會這點，必須教導整個勞動青年後輩都學會這點。

這就是一切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底任務，也就是每個自認爲是共產主義者，

深知自己一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就負起了幫助黨建設共產主義，幫助整個青年後輩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責任的青年人底任務。他必須認清，祇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他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通曉這種知識，那共產主義就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

老年一代人底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那時，主要任務是批評資產階級，發展群眾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心，提高階級覺悟，善於團結本階級的力量。

新起一代人底任務，就更加複雜了。你們不祇是應當團聚自己的一切力量來援助工農政權擊退資本家的侵犯。這點你們應當做到。這點你們懂得很清楚，這點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明確了解。但是這還不夠。

你們應當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前一半工作在許多方面已經作成了。舊的東西已經像應份被破壞的那樣被破壞了，它已經像應份變成廢墟的那樣變成廢墟了。地基業已清除好了，共產主義青年後輩底任務，也就是應當在這塊地基上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任務，你們祇有通曉了一切現代知識，善於把共產主義從背得爛熟的現成公式、意見、方案、章程和綱領變成爲包括有你們直接工作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成爲你們實際工作的南針，那時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這就是你們在教育、訓練和啓發全體青年的事業中所應當奉行的任務。一切男女青年都應該成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建設者，而你們就應當是千百萬青年中的一批建設人。

不吸收全體工農青年來參加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你們就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這裏我自然要講到這樣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我們的方法應該有什麼特點。

我在這裏首先要講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你們應當把自己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青年團底任務，便是要這樣來進行自

己的實際活動，使這些青年，一面從事學習、組織、團結和鬥爭，同時就把自己以及所有一切認為它是領袖的人，都培養成爲共產主義者。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養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爲在青年中養成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

但是，究竟有沒有共產主義道德呢？有沒有共產主義德性呢？當然是有的。人們往往硬說我們沒有自己的道德；資產階級特別常常責備我們，說我們共產黨人摒棄一切道德。這無非是淆亂視聽，蒙蔽工農耳目的一種手段而已。

究竟在什麼意思上我們摒棄道德，否認德性呢？

是在資產階級所宣傳的道德這意思上，因爲他們是從上帝意旨中引出這種道德來的。關於這點，我們當然說我們不信仰上帝，並且我們明明知道，僧侶、地主和資產階級都是假借上帝名義說話，爲的是要來貫徹他們這些剝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從德性趣旨中，不是從上帝意旨中，而是從唯心主義或半唯心主義論調中引出這一道德來，但這種論調始終是與上帝意旨很類似的東西。

我們摒棄一切從超人類和超階級的概念中援引出來的德性。我們說，這是欺

囉，這是爲了地主資本家利益來愚弄和禁錮工農頭腦的伎倆。

我們說，我們的德性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我們的德性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中引伸出來的。

舊社會是建築在地主資本家壓迫全體工農的基礎上面。我們本來應當毀壞這個社會，本來應該打倒這些壓迫者，但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建立一種聯合。上帝決創造不了這種聯合。

這種聯合，祇有工廠，祇有受過訓練而從舊日沉眠狀態中醒覺了的無產階級，才能建立起來。祇有當這個階級已經形成的時候，才有群眾運動開始起來，這種運動已造成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情形，即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最薄弱的國家中已獲得的勝利，這個國家爲捍衛自己而擊退全世界資產階級底逼攻，業已有三年了。

同時我們也看見，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上日益增長的情形。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實際經驗來說，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創造這樣一種堅強團結的力量，既引導零

星散漫的農民前進，並且在抗拒剝削者底各次逼攻中支持下來了。祇有這個階級才能幫助勞動大眾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並澈底捍衛和澈底鞏固共產主義社會，把共產主義社會最終建成。

所以我們說：在我們看來，超人類社會的德性是沒有的；這是一種欺騙。在我們看來，德性應該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

這種階級鬥爭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資本家，消滅資本家階級。

一般說來階級究竟又是什麼呢？這就是使社會上一部份人佔有另一部份人的勞動的情形。

如果社會上一部份人佔有全部土地，那就是說有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份人擁有工廠，擁有股票和資本，其餘一部份人却在這些工廠內作工，那就是說有了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

趕走沙皇，本來就不困難——這總共只花費了幾天工夫。趕走地主也不很困

難，這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趕走資本家同樣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消滅階級，那就困難得不可比擬了；工人和農民的區分總還存在着。如果一個農民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擁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餘糧食，而其餘的一切人却沒有糧食可吃，那末，這個農民也就變成爲剝削者了。他所剩餘的糧食愈多，他能獲得的利益就愈大，讓其餘的人去挨餓吧：「他們愈飢餓，我這糧食就能賣得愈貴」。

應該使所有的人，都按照公共計劃和公共規則，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廠中工作。這點容易做到麼？你們知道，要做到這點，決不能像趕走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這裏需要無產階級去重新訓練重新教育一部份農民，將勞動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以便把那些富裕的，因別人貧困而發財致富的農民底反抗消滅下去。

可見，推翻了沙皇，趕走了地主與資本家，無產階級鬥爭底任務並沒有因之完結，而我們所稱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制度，也就是要求完成這一任務。

階級鬥爭還在繼續着；它不過只改變了自己的形式。這是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其目的就是要使舊的剝削者不能翻身，使散漫落後的農民群眾統一成爲一個聯盟。階級鬥爭在繼續着，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這個鬥爭。

所以我們也就要使我們的共產主義道德服從於這一任務。我們說：道德就是用來破壞舊時剝削者社會，並把全體勞動大眾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工具。

共產主義的道德，也就是爲聯合勞動者去反對一切剝削制，反對一切小私有制的這一鬥爭服務的，因爲小私有制把全部社會勞動所創造出的東西都交給一部份人的手中。

我國的土地已經是公共的財產。

但是，假如我從這公共財產中拿來一塊土地，種上超過我所需要一倍的糧食，然後把這種餘糧用來投機漁利，那又怎樣呢？假如我這樣打算：餓肚子的人

愈多，那我出賣糧食的價錢就愈高，那又怎樣呢？難道我這是共產主義者的行為麼？

決不是的，這是剝削者的行爲，這是私有者的行爲。應該同這種行爲作鬥爭。

如果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那一切都會向後倒退，回復到資本家政權，回復到資產階級政權去，如像過去一些革命中所常有過的情形一樣。爲了使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再復活，就要禁止投機買賣，就要使個人不能用損人利己的手段來發財致富，就要使全體勞動者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這也就是共產青年團和共產青年組織基本任務的主要特徵。

舊社會所倚據的原則：不是你去掠奪別人，便是別人來掠奪你；不是你替別人工作，便是別人替你工作；你或是當一個奴隸主，或是當一個奴隸。顯然，凡是在這個社會裏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從吃奶的時候就染上了這樣一種心理，習慣和觀點。不是當奴隸主，就是當奴隸，或者是當一個小私有者，小職員，小

官僚，知識份子，總之是當一個只關心自己不顧及旁人的人。

既然我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翁，旁人的事與我全不相干；如果旁人挨餓，那就更好，我可按更高的價錢出賣我的糧食。既然我有了一個醫生、工程師、教育或職員的小職位，那末，旁人的事也就與我完全無關了。也許，只要我獻媚取悅於有財有勢的人，我就不僅能保住我的這個位置，並且還可以高昇到資產者的地位上去。這樣的心理和情緒，是共產主義者所不應該有的。

當工人和農民已經證明我們能於用本身力量來捍衛自己並創造新社會的時候，也就開始了新的共產主義教育，即在同剝削者作鬥爭中受到的教育，在聯合無產階級反對利己主義者和小私有者，反對那認為『我的目的祇在謀利，其他一切與我無關』的心理和習慣的鬥爭中受到的教育。

這就是對於青年後輩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問題的回答。

青年們祇有把自己學習、教育與訓練中的每一步驟同無產者勞動者反對舊的剝削者社會所不斷進行的鬥爭聯繫起來，才能學習共產主義。

當人們向我們講到道德的時候，我們回答說：對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道德都包括在這種堅固團結的紀律和反對剝削者的自覺群眾鬥爭中。我們不相信永恒不變的道德，並且要揭破一切關於道德的騙人的話。

道德就是要幫助人類社會昇到更高的水準，使人類社會擺脫勞動剝削制。

爲了實現這個任務，就需要有在同資產階級作有紀律的殘酷鬥爭環境中開始變成爲自覺人物的一代青年。他們只有在這一鬥爭中，才會教育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應當使自己學習、教育和訓練的每一步驟都服從於這一鬥爭，都與這一鬥爭聯繫起來。

教育共產主義青年，決不是向他們講授關於道德的各種甘言和條規。教育的主旨並不在這裏。

祇有當人們看見他們的父母怎樣在地主資本家壓迫下生活的時候，當人們親自也受到那些發動反剝削者鬥爭的人所受到的痛苦的時候，當人們看見爲了保持已經爭得的成果而繼續奮鬥是要經受怎樣的犧牲，看見地主資本家都是如何兇


暴的敵人的時候，——那時他們才會在這種環境中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

鞏固與完成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是共產主義道德底基礎。這也就是共產主義教育、訓練與學習的基礎。這也就是對於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的回答。

如果學習，教育和訓練只局限於學校以內，而與蓬勃的實際生活脫離，這樣的教育方式我們是不會相信的。工農一天還處在地主與資本家底壓迫之下，學校一天還操縱在地主資本家手裏，那末青年人始終還會是愚昧無知的。

但是我們的學校却應當使青年獲得基本知識，使他們具有獨立養成共產主義觀點的本領，應該把他們培養成爲有學識的人。我們的學校必須使人們在學習期內便能成爲參加推翻剝削者鬥爭的人。

共產主義青年團，祇有當它能把自己學習、教育、訓練的每一步驟都與參加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總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才配稱爲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你們很清楚地知道，俄國暫時還是個唯一的工人共和國，其餘整個世界上還存在着舊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仍然是比它們弱些，我們隨時都有遭到新的進攻的危



險；祇有我們學會團結一致時，我們才能在今後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而當我們業已鞏固之後，那我們才會成爲真正無敵的力量。

因此，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就是要把全體青年都組織和團結起來，要在這個鬥爭中作出受教育與守紀律的榜樣。那時你們才能開始並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大膽的事業。

爲了使大家都更清楚地了解這點，我來向你們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我們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者呢？

『共產主義者』是拉丁語源的名詞。『共產主義者』這字是從『公社』一字來的。所謂共產主義社會，意思是說：土地、工廠、一切都是公共的；公共勞動，——這就是共產主義。

如果每人都在單獨一塊土地上經營自己的業務，那末，勞動能否成爲公共的呢？公共勞動不是一下子就能造成的。公共勞動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需

要努力，吃苦，創造，而且是鬥爭進程中造成的。這裏，不能憑靠舊的書本，書本是誰也不會相信的。這裏要憑靠自身的生活經驗。

當高靈察克從西伯利亞，鄂尼金從南方進攻時，農民是站在他們那方面的。當時他們不歡迎波爾什維克，因為波爾什維克按固定價格收買糧食。但當農民在西伯利亞與烏克曼嘗試過了高靈察克和鄂尼金政權的味道之後，他們才認清了，農民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或者說，農民走到資本家方面去，同時資本家就要你去當地主的奴隸；或者說，農民跟工人走，工人雖不允許給你什麼天堂生活，並且還要你在艱苦鬥爭中，遵守嚴格的紀律和表現堅強意志，可是它能使你從資本家地主的奴役中解脫出來。

當那些甚至黑暗無知的農民也根據自身經驗懂得和認識了這點的時候，那他們便成爲自覺的，經過嚴酷戰鬥的共產主義擁護者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就應當把這種經驗作爲自己全部活動底基礎。

我回答過了：我們應當學習什麼，我們應從舊學校和舊科學中採取一些什麼

的問題。現在我還想來回答應當怎樣學習的問題，我回答說：祇有把學校活動的每一步驟，把教育、訓練和學習的每一步驟，與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學習這些東西。

我要從某些青年組織底工作經驗中舉出幾個例子向你們具體說明，應該怎樣來進行這種共產主義教育。

大家都在說掃除文盲。你們知道，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不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單靠蘇維埃政權頒佈命令，或者由黨發出一定的口號，或者派一部份優秀工作人員去進行這種工作，是不夠的。還需要這代青年人自己把這一工作担負起來。

共產主義就是要男女青年團員親自說出：這是我們的事情，我們要聯合一起到鄉村中去掃除文盲，使我們這代青年中沒有一個不識字的人。我們力求使青年們能把自己的自動精神用來進行這一事業。

你們知道，要很快就把俄國從一個不開化不識字的國家變成人人都識字的國

家，是辦不到的；但如果青年團員負責來進行這一工作，如果全體青年都為公共福利而努力工作，那時這包含有四十萬青年男女的組織，便有權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了。同時青年團員底任務，是還要通曉某種知識好來幫助那些不能自力從黑暗無知中解脫出來的青年。

做一個青年團員，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用去為公共事業服務。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的實質。祇有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青年男女才能培養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祇有當他們能在這種工作中收到實際效果時，他們才會變成爲共產主義者。

就拿城郊菜園工作來做例子吧。這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之一。人民在忍飢受餓、工廠裏在鬧飢餓。爲要消除飢餓，應該發展菜園業。但耕作還在按照舊方法進行。

所以必須有更覺悟的份子來擔任這一件事情，那時你們就會看見，菜園業會擴大，菜園面積會增加，結果定會好轉起來。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踴躍參加這件事

情。每個青年團組織，每個青年團支部，都必須把這看成是自己切身的事情。

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是在一切工作中都能出力幫助，都表現出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的突擊隊。青年團應當成爲這樣一個團體，使得任何工人都感覺到，這團體中人們底主義，也許還是他所不懂得的，也許他還不會一下子就相信，但從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活動上，他却看出他們是真正能向他指明正確道路的人。

假如共產主義青年團不能在各方面這樣來建立自己的工作，那它就會迷失到資產階級的舊道路上去。

我們的教育應當與勞動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結合起來，爲的是要幫助勞動大眾來解決從共產主義學說中產生出來的任務。

每個青年團員都應當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閒時間去改善菜園業，或在某個工廠裏去組織青年學習等等。

我們要把俄國從窮困貧瘠的國家，變成爲一個富裕的國家。所以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把自己的訓練，自己的學習，自己的教育與工農底勞動結合起來，不

要關閉在自己的學校內，不要祇限於閱讀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子。

祇有在勞動中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才能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必須使大家都看到，青年團員個個都是有知識的，同時又都是善於勞動的。當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已經廢除了舊學校裏的舊的強迫紀律，實行了自覺的紀律，看見全體青年去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看見他們利用每個近郊菜園來幫助居民，那時人民就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待勞動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更是要在農村中或在自己街坊裏來實行幫助如像——我舉出這樣一個小例子，——保證清潔或分配食物的事情。

在舊時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些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當時每個人祇管自己工作，誰也不去注意那裏是否有衰老的或患病的人；或者是全部家務都落在婦女肩上，因而婦女也就處在被抑壓和被奴役的地位。誰應當來反對這種現象呢？青年團。青年團應當出來說：我們來把這件事情改作好，我們組織些青年隊去幫助厲行清潔或分配食物，有系統地去挨戶檢查，有組織地

來爲全社會公益事情服務，正確地分配力量，並表明出勞動應該是有組織的勞動。

現在已到五十歲以外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能看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因爲那時，他們都會死去了。

至於現在還祇有十四五歲的這一代人，他們既可以看出見共產主義社會，也還會親身參加建設這個社會。

所以他們就應當知道，他們畢生的唯一任務便是建設這個社會。

在舊社會中，是各個家庭單獨勞動，除了壓迫民衆的地主與資本家外，誰也沒有把勞動結合起來。任何一種勞動，不管它怎樣髒污，怎樣困難，我們都應當把它這樣組織起來，使每個工人和農民都會對自己說：我是偉大自由勞動軍中的一份子，我能不能資本家和地主，親自建設自己的生活，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秩序。

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自覺的有紀律的勞動中教育所有一切從十二歲起的

青年。

這樣我們才能指望現在所提出的任務定會得到解決。

我們應該估計到，要把全國電氣化，使我國的貧瘠土地能用最新技術來經營，那至少要花十年工夫。

所以，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每天在任何鄉村，任何城市裏，都能實際解決公共勞動中的某種任務，那怕是最微小，最不常的任務。

要保證共產主義建設成功，就要看上述工作在每個鄉村裏進行得怎樣，就要看青年能夠結合自己勞動的實際本領怎樣。

祇有從保證這種建設成績底觀點上來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祇有經常反躬自問，爲了或爲團結和自覺的勞動者，我們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祇有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中，共產主義青年團才能把自己五十萬團員聯合成爲一支勞動大軍，博得普遍的尊敬。

一九二〇年十月五日，六日，七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二十一期，第二百二十二期和第二百二十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三至四一七頁

致土拉城同志書

親愛的同志們！

據你們來函上所述理由看來，我同意你們的意見。但如果你們想利用我的意見來反對你們的「反對者」，那就請把你們的來函連同我的回信一齊交給他們。那時他們就會明瞭真象，也能把他們的理由告訴給我，那時我才不致於祇知道單方面的意見。

按問題實質我祇來簡略地說幾句話。當我們還未澈底粉碎弗蘭格爾，還未收復全克里木之前，軍事任務是佔首位。這是絕對不容爭辯的事。

至於對土拉說來，因為那裏有些槍械和子彈製造廠，在一定期間內，甚至在戰勝弗蘭格爾之後，把出產槍枝子彈的工作貫徹到底，這一任務很可能依然是頭等任務，因為要準備軍隊在春季行動。恕我答覆簡略，並請通知我，你們是否把我的這封回信以及你們的來函都交給「反對者」看過。

此致

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四二年發表於列寧文存，第三十四卷，第三七二頁

簡要註釋

五八 是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俄國由浮虜編成的捷克斯拉伐克軍團而言。一九一八年五月間，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得到蘇維埃政府許可，取道西伯利亞和遠東回歐洲去，沿途掀起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這次叛亂是由外國幾個國家在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積極贊助之下所組織起來的。——（見正文第一七頁）。

五九 見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馬克思致布拉克的信（普達綱領批評）。——（見正文第三三頁）。

六〇 引自恩格斯所著論威權主義一文，載於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一卷，第三九頁。——（見正文第四六頁）。

六一 列寧是指共產黨宣言德文版（一八七二年）序言中如下一段話：「……因為首先既有

二月革命的實踐經驗，後來又尤其是有了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當時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過政權連兩月之久，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特別是公社証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馬恩合著共產黨宣言）。（見正文第四七頁）。

六二 見恩格斯著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起源一書。（見正文第五二頁）。

六三 波特魯什卡是果魯斯著長篇小說死人口中的一個奴僕。其特色是讀書時只求動聽，不求解意。（見正文第一〇三頁）。

六四 猶大什克，果魯斯略夫是薩爾退可夫、謝德林所著中篇小說果魯斯略夫一家中的一個農奴地主形象，以喪盡天良、貪吝鄙陋為特色。（見正文第一〇八頁）。

六五 沙溫可夫（一八七九——一九二五）是社會革命黨人。

李伯爾唐恩是兩個孟什維克領袖李伯爾與唐恩的諷諷綽號。

波特列索夫（一八六九——一九三四）是孟什維克領袖之一。（見正文第一〇九頁）。

六六 見註釋第10。（見正文第一一七頁）。

六七 普、馬斯洛夫是一個孟什維克，俄國土地問題一書底作者。——（見正文第一四一頁）。

六八 斯、馬斯洛夫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農業總長。——（見正文第一五三頁）。

六九 這是指給各土地委員會的所謂農民委託書而言，該委託書包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公報。二月八日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之「土地法令」中。或

為「蘇維埃政府」委託書之第四至第七至四六二頁。——（見正文第一六一頁）。

七〇 孟什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新生活報所開的所謂「孟什維克國

際主義者」集團。——（見正文第二三六頁）。

七一 是廿第二國際而言，它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起，就分裂成許多單獨的社會沙文主義政黨，而不復是國際組織了。大戰後，正式恢復第一國際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是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在伯恩舉行的。——（見正文第三一五頁）。

七二 是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普魯戰爭中的一次搏戰，這次搏戰決定了普魯士勝利的戰爭結局。——（見正文第三二二頁）。

七三 一九一九年六月「紅丘」砲台發生的叛變，以及全部反革命陰謀都在斯大林同志親

身領導之下被消滅了，當時斯大林是受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託來到彼得格勒組織該城防衛的。（見正文第三五七頁）。

七四 日恩格爾斯著《杜林》一書，一九三九年本出版局德文版第九七頁。（見正文第四〇七頁）。

七五 普列漢諾夫著《一八八五——一九一九年波爾什維克黨卓越的活動家，蘇維埃政權的創始者之一，波爾寧和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一書，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他當選爲全俄中央黨委委員主席。（見正文第四四六頁）。

七六 斯莫爾雷，即彼得格勒的前斯莫爾雷女子大學的校舍。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遷都到莫斯科以前，這所學府是俄國政府最初所在地。（見正文第四七一頁）。

七七 該小冊子原作者爲亞托·謝威爾。（見正文第四八四頁）。

七八 連拿慘案是指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公曆十七日）沙皇軍隊槍殺連拿金礦西伯利亞一中舉行罷工反對東方殘酷剝削的工人而言。俄國各地工人用羣衆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回答了這次慘案。（見正文第四九五頁）。

七九 第四次國家杜馬中的波爾什維克代表因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以「叛國」罪名，

一九一五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見正文第四九六頁）。

八〇 列金是德國職工運動中著名的活動家和德國國會裡社會民主黨黨團中的一員。這裡是指列金於一九一三年在美國衆議院中所作的那次充滿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精神的機會主義演說而言。——（見正文第五〇四頁）。

八一 是指一九一五年列寧在彼得堡創立的「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而言。本協會將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統一爲一個集中的組織，它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萌芽。——（見正文第五二二頁）。

八二 是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馬恩通信集）。——（見正文第五三五頁）。

八三 祖巴托夫（一八六三——一九一七）當時任莫斯科暗探局局長，是所謂警察社會主義底授意人，祖巴托夫建立了受憲兵警察監護的僞工人組織，目的是引誘工人離開革命運動。——（見正文第五三九頁）。

八四 俄國共產黨（波）土拉省委主席團幾個委員在致列寧的信中請示「在蘇俄現今局勢下，是把和平建設提到第一位的立場正確呢，還是把緊張一切力量來解決我國軍事任務提到

「第一位的立場正確呢」。該信作者們害怕第一種觀點勝利，結果會減弱土拉軍事工廠中的張工作和紀律。——（見正文第七〇六頁）。